

The Inside Stories of The Diplomacy between
Communist China and America

天安門事件後 | 陳有為◎著

中共與美國 外交內幕

一位中國大陸外交官的歷史見證

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亞太政策中心總裁**帕爾**
約翰·霍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研究系主任**蘭普頓**
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亞洲部主任**沃倫·柯恩**教授
華盛頓郵報資深外交記者**奧勃多佛**等中國問題專家鄭重推薦。



本書簡介

本書作者在天安門事件前後任中國大陸駐美高級外交官。十年後，作者以目擊者與見證者的身份，通過親身回憶與深入探討，展現了當年中（共）美關係急劇惡化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情況。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鄧小平與中南海領導人對美外交決策，對蘇聯東歐劇變與波斯灣戰爭的內部看法與對策，以及中美兩國高層外交的內情。

本書為中國大陸人士第一本以獨立見解寫成的外交回憶錄，內容豐富，分析深刻，文筆生動，乃了解中共外交決策所必讀。









作者與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左）合影。



作者夫婦與美國國務院中國處副處長、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貝德（中）合影。



作者與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鮑大可（左）合影。

The In
between



作者與前美國國務卿海格(右)合影。



韓敘夫婦
離任回國時攝於
中國大使館門前。
左一為作者。

Ins
ween



作者夫婦與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夫婦（中）合影。

作者於1985年10月隨趙紫陽總理參加聯合國成立四十週年活動，在紐約郊外Adam House與錢其琛（左）、李肇星（中）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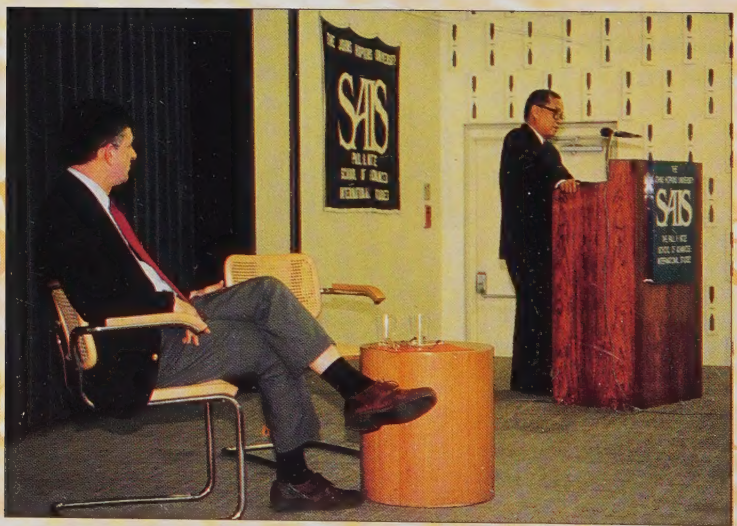


作者（右三）1987年隨楊尚昆（右四）訪問美國、加拿大，攝於加拿大外交部樓頂。

The
China

diplomacy and America

作者攝於美國國務院大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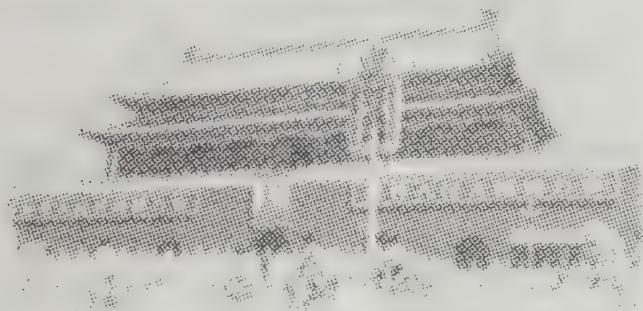
作者（右立者）在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舉辦的「中國論壇」上演講，分析江澤民權力地位問題。

The Inside Stories of The Diplomacy between
Communist China and America

天安門事件後
中共與美國
外交內幕

一位中國大陸外交官的歷史見證

陳有為◎著



獻給讀者的卷首語

天安門事件過去整整十年了。

雖然這一場震撼中國與世界的風暴已經煙消雲散，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化下來，但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將永遠銘刻在人們心裡和現代史冊上，值得追思和探究。

無論它是一團照耀歷史的光輝，一片籠罩大地令山河嗚咽的陰雲，讓死者無謂犧牲、生者無限傷痛的悲劇，或者只有歷史長河的汨汨流水才能加以洗刷清晰的懸案，反正它總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烙印。

對它，既不能隨意地加以片面定性，更不能簡單的說一句，既已「作了結論」，「Let bygones be bygones」，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吧。

作為一名親身經歷過中美關係巨大波折的中國駐美外交官，那風雲激盪的內外形勢，那動人心魄的日日夜夜，那一樁樁難以忘卻的人與事，多年來總是在記憶中揮之不去，從腦海裡不時浮現出來。

雖然作者不在北京而在華盛頓，不是決策者而是執行者，但是

從中美關係的角度來說，我是這一段活的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在那些緊張複雜、起伏多變、困難重重的日子裡，我耳聞目睹，我親身經歷，我以全部身心從事我的崗位工作，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我沒有過任何越規的行動。但是，在所有的活動中，我內心始終保持著獨立思考，以我的良知，以一個歷史事件觀察家所應有的客觀性來觀察、思考和對待我所看到的、經歷的一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事情的來龍去脈確是像官方所說的那樣嗎？為什麼連執行政策的人也會對這種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感到懷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和解釋這一切的前因後果？

從事實中，我產生了問題；從問題中，我需要尋求答案。

有關中美關係的這一段歷史真相，現在還被禁錮在歷史的保密櫃裡。由於它牽涉到某些決策者的是非功過，也許永遠也不會讓它出來曝光。

但是，讓重要的歷史事實展現在世界面前，是歷史的需要，也是知情者的權利和義務。這就是作者要寫這本書的意願和目的。

好，現在讓我把歷史的帷幕拉起一角，讓世人窺見中美雙方大

大小的人物：從鄧小平、江澤民、李鵬、錢其琛、韓敘、朱啟禎，到布希、斯考克羅夫特、白宮與國務院的高級官員，以及微不足道的作者本人，在那風雨交加的時刻，在那閃電雷鳴的國際舞台上，是如何有聲有色地扮演各自角色的。

從這本書裡，人們可以看到，在中美關係出現轉折和危機，世界局勢發生急劇動盪和演變的關頭，中國高層是如何了解情況，進行判斷，作出決策，而這種決策又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在這本書裡，作者不但展現了許多至今鮮為人知的內幕情況，還加上了自己在當時與後來的見解分析。

經過十年的進退反覆，現在中美關係終於又回到正常的軌道，甚至比過去有了新的發展。對於中美兩國利益，亞太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來說，這是值得肯定的好事。但是中美關係的基礎仍然潛伏著不穩定的因素，兩國之間仍然充滿著相互的疑慮，存在著難以消除的分歧與爭執。在美國，對中國與中美關係抱有疑慮的人不是「一小撮」，而是大多數。朱鎔基最近的訪美之

行，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在世界行將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眾多變數的新世紀時，中美兩國將來究竟是否能夠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會不會出現不斷的摩擦與抗爭，以至於最後不幸地走向對抗衝突，從而嚴重影響到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和平穩定，這是誰也難以預料和斷言的。

自古以來，中國的無數先賢都強調過溫故知新的重要。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齊國政治家管仲就指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就是說，今天有所疑難問題，不妨回頭看看過去；如對將來缺乏把握，可以從以往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以避免歷史的重演。事隔十年以後的今天，對於當事人來說，重新回顧當年這段歷史，看看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今後應當如何避免過去不適當的想法和做法，難道沒有好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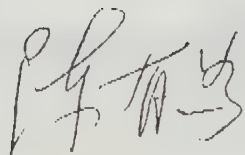
然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又說過：「歷史與經驗告訴的是，人民與政府從來也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或者按照歷史所演繹的原則來行動。」（《歷史的哲學》）

中國外交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問題。美國有些跟

中國打交道的學者，即使對中國不存偏見，甚至相當友好，也會感嘆地說，中國是從來也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過錯的，它只是眼睛盯著別人，而不看看自己。這個話雖不中聽，未必不是事實，很值得深思。

為了促進中美關係，必須首先知己知彼，增進雙方的相互了解並消除誤解。希望本書能對此有所貢獻。

末了，借此機會，作者謹向所有對本書的材料收集以及在寫作與出版過程中進行交談，以各種方式提供幫助的中外朋友們，表示由衷的謝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陈有忠' (Chen Yongzhi)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1999年5月於美國華府

天安門事件後 中共與美國外交內幕

一位中國大陸外交官的歷史見證

【目次】

第 1 章

從卡洛拉馬窗口看世局風雲變幻

- 從記者到外交官 從北京到華盛頓.....4
- 春花秋月變成天崩地裂.....8
- 形勢估計失誤再失誤.....12
- 是歷史的終結 還是共產主義的終結.....15

第 2 章

使館內外的震盪

- 沸騰的康街.....20
- 華人痛心疾首.....26
- 電視室裡看北京罵李鵬.....28
- 他們一個個走了.....31

第 3 章

天安門槍聲使中美關係一落千丈

- 暖流變成了寒流.....36
- 美國輿論一邊倒.....40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午三點鐘」.....	44
美國對華政策的「義」與「利」.....	47

第 4 章

李鵬不同意說中國孤立

扳倒趙孝陽 李鵬掌實權.....	50
駐美使館電報說實話吃批評.....	55
他從骨子裡親蘇反美.....	60
中國孤立難道不是事實嗎？.....	63

第 5 章

萬里訪美進退兩難 北京發來三封急電

訪問日程精心安排.....	70
使館自作主張勸阻萬里訪問.....	73
北京風雲突變 萬里舉棋不定.....	75
上海避風頭 高處不勝寒.....	78

第 6 章

鄧小平決策：對內用武力，對外抗壓力

- 泰山崩於前而色變.....84
- 從匈牙利事件到天安門事件.....87
- 要尼克森轉告布希：中國讓不起，美國須主動.....92
- 韜光養晦 站穩腳跟 沉著應付.....98

第 7 章

布希與中國：「情結」變成了「死結」

- 韓敘官邸的聖誕晚宴.....103
- 福特要他當大使 不愛倫敦愛北京.....106
- 入主白宮先訪中國 鄧小平大罵北極熊.....111
- 在六·四風暴中受到兩面夾攻.....118
- 北京有人批評布希是兩面派.....127

第 8 章

斯考克羅夫特的北京之行

- 白宮謀士 布希親信.....136

暗渡陳倉 會見鄧李江	140
北京錯估形勢 失去修好時機	146
蘇東形勢大變 美國以壓促變	151

第 9 章

江澤民因禍得福 從上海灘掉進中南海

臨危受命 權力架空	158
左右搖擺 從馬拉松到百米衝刺	165
無奈錯打蘇聯牌 舊地重遊莫斯科	171
總書記對美國：嘴上硬心裡熱	176

第 10 章

錢其琛剛中有柔 力爭中國擺脫孤立

形勢急轉直下 內外壓力重重	189
使節會議：議論形勢，商討對策	195
穩定周邊 開拓外交 扭轉局面	200
訪華府進白宮見布希 出奇制勝記者傻了眼	204

第 11 章

大使的艱難使命：從韓敘到朱啟禎

- 友好大使臉上不再有笑容……………210
- 無心戀棧離任回國 「白宮」餞行賓主惜別……………216
- 走馬換將中南海領旨 呈遞國書布希不提李鵬……………223
- 中美關係問題成堆 橋牌高手扳不回敗局……………229

第 12 章

一個外交官的責任與良心

- 麥迪遜旅館嘉賓雲集 即席發言掌聲四起……………244
- 賓大演講受「圍攻」 從容對答充「靶子」……………253
- 「眼看中美關係毀於一旦，我真是傷心得想哭」……………259
- 不知北京誰作主 怎能冒險發電報……………271

第 13 章

波斯灣戰爭：中南海在迷茫震驚中決策

- 伊拉克入侵使北京左右為難……………278
- 美國陷入波斯灣危機對中國最有利……………281

安理會678號決議 既不Yes也不No	284
布希「新秩序」出籠 北京驚魂	288

第 14 章

蘇聯變色：七十年社會主義一風吹

莫斯科後院烈火熊熊 骨牌效應紛紛倒下	294
戈巴契夫：改革者成了掘墓人	299
從華盛頓看蘇聯帝國像「鐵達尼號」沉沒	305
鄧小平再也無法「四兩撥千斤」	308

第 15 章

從天安門事件看中國外交決策思維

敵我觀念支配決策思想	312
中美兩國既相合又相剋 「戰略夥伴」可望不可及	322
睡獅醒來後，它會怒吼嗎？	333
觀測中國未來動向要看 P-P-P	340

第 1 章

從卡洛拉馬窗口 看世局風雲變幻

在希臘文裡，Kalorama是一個美麗的字眼。它是由Kalo與Rama兩個單字組成的複合詞，具有「美景」的含意，常常被用來描繪「風光秀麗」和「景色優美」的地方。

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西北，有一處以卡洛拉馬（Kalorama）命名的高地。它處於著名的康乃狄克大道與麻薩諸塞大道的繁華鬧市之間。但在路脈縱橫、房舍錯落的這個地區，卻是佳木蔥蘢，曲徑通幽，鮮花常開，顯得分外的寧靜幽雅。從高地北邊的塔夫特大橋俯瞰，下面就是著名的石溪（Rock Creek）公園。那裡林木參差，濃蔭覆蓋，像綠色的雲海籠罩著片片谷地，而在一片深廣的谷地中間，那清澈的溪水，沿著曲折的山澗，悄悄地蜿蜒向南，流入江水滔滔的波托馬克河。若在大雪紛飛的冬天，坐車緩緩行進在谷地裡，無論地面、天空或樹梢，上下四周紛紛揚揚，白雪皚皚，有如進入了一個童話般的銀粉世界。

1890年以前，華盛頓市區的北部邊界還沒有超出佛羅里達大街。那時卡洛拉馬高地還只是首都郊外的一片農田，分別歸屬於開

國總統華盛頓的侄子威廉·奧古斯丁（William Augustine）、著名的外交官與詩人作家久爾·巴洛（Joel Barlow），以及軍火投資商喬治·波姆福德（Geroge Bomford）所有。後來，因為這裡環境優美又靠近市區，很多富商與權勢人物就紛紛前來購置土地，建造宅第，使這一帶出現了許多風格不同的建築物，慢慢地發展成為名人聚居之處，和吸引無數遊客的外國使館區（Embassy Row）。

如今，在卡洛拉馬高地及其附近一帶，分布著一百多個外國使館。其中包括門前有邱吉爾銅像的英國使館，內部珍藏著路易十四時代藝術品的氣派非凡的法國大使官邸，懸掛著太陽旗但毫無日本特色的日本使館，全是玻璃鋼筋結構的巴西使館，大門常年緊閉的伊朗使館，以及印度、泰國、敘利亞、紐西蘭、冰島、奧地利、肯亞、哥斯大黎加等國家的使館。其中有一些館舍，過去曾經是美國名人的住宅。如非洲馬利使館曾是美國總統羅斯福任海軍部長助理時的舊居，埃及使館曾被三十年代初下野的美國總統塔夫特居住過。現在，這個地區已成為華盛頓的一個景點和歷史古蹟保護區，每年到這裡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就座落在這個風景秀麗的地段。它位於康乃狄克大道2300號與卡洛拉馬大街相交的一個街口上，可以說是外國使館區東北角的第一家。這幢八層樓的紅磚大廈原來屬溫莎旅館所有，七十年代末中美關係正常化後，被中國政府以五百萬美元代價買下來改建為使館。裡面有幾百個房間，最多時曾經住過兩百多名外交官與各類工作人員。

從記者到外交官 從北京到華盛頓

華盛頓是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而中美關係又是中國外交的重點。中國大使館配備的外交官人數及其工作量，在所有中國駐外使館中占第一位。除了大使及其副手一名公使之外，全館有二十幾名參贊級外交官，光是負責政治事務的參贊就有四、五名。使館每年發回北京的外交電報，包括情況報與分析報，其數量大約占中國一百幾十個駐外使館發報量的三、四分之一，有時甚至將近一半左右。

1988年8月11日，我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參贊，從北京來到華盛頓。至1992年7月9日退休為止，在美國首都度過了四年的外交生涯。

在回顧我這一段外交生涯之前，我必須首先簡單地介紹一下自己過去的經歷。我是在年過半百之後，從新聞工作崗位轉入外交部的。到華盛頓就任新職之前，我已經訪問過美國六次。

我曾在中國最大的報紙《人民日報》工作了三十四年。我的第一篇以美國和平運動為題材的國際評論文章，發表於1950年5月18日的《人民日報》。當時年僅二十歲，還是一個涉世未深，剛剛參加革命的小青年。從那以後，直到我1984年離開新聞崗位為止，我在《人民日報》以及中國其他中央級報刊上，以本人真名、不同的筆名與人民日報評論員名義，發表過一百多萬字的文章，包括社論、評論、政論、專論、隨筆、散文、通訊與國外遊記。其中有一

些評論與文章，曾經被全文轉載在蘇聯《真理報》上（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間），被收入美國大學的漢語教材，中國的高中語文課本與新聞文選、散文文選、國外遊記文選，或被電台配樂廣播。我還出版過兩本深受讀者歡迎，暢銷二十萬冊的著作：《季辛吉評傳》與《風情、人情、世情》。

由於意識形態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外交政策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以及具體主張，常常通過中央黨報的社論評論宣示出來。從六十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報紙評論實際上取代了外交部發言人與政府聲明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國，只有《人民日報》與「新華社」才有權發表反映官方立場的國際評論。大部分評論都是由官方授權寫作，其中最重要的還必須經過中央討論與領導人的審定。作為中共第三代的國際問題「筆桿子」，我所寫作或參加起草的評論，其題材內容涉及五十年代的韓戰、越南戰爭、社會主義陣營與波蘭匈牙利事件，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與中蘇爭論對抗，七十年代的中美關係、美蘇關係、中蘇關係與印度支那局勢，八十年代的世界形勢、裁軍問題、聯合國、第三世界、南北關係，以及中國對外政策等等。在執筆寫許多重要評論時，我必須和外交部有關部門如蘇聯東歐司、亞洲司、西亞非洲司、美國與大洋洲司、西歐司、國際司、新聞司主管人員以至部領導建立工作關係，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由他們作最後的審定。久而久之，我的知名度提高了，在有關人士中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2年3月，出乎我的意料，《人民日報》領導通知我，外交部要借調我去執筆起草黃華外長出席裁軍特別聯大的重要講話稿。過去這種聯大發言稿，都是在外長喬冠華親自主持下，先開會議論多次，然後再由喬冠華統一修改，甚至完全重寫。從起草到最後定稿，往往要歷時一兩個月時間。這樣重大的任務忽然落到我這三尺微命、一介書生頭上，當然是外交部領導對我的信任，相信我能勝任這個任務。不久完稿之後，我就以中國代表團頭號顧問的身份，隨黃華外長赴紐約出席裁軍聯大。

由於我所起草的講稿在會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黃華外長講完話後，當場有六十七個國家的外長與代表，在會議廳裡排著長隊依次和他握手表示祝賀。六月初從紐約回來不久，外交部又馬上要求我再次為黃外長起草出席當年9月正式聯大的講稿。雖然時間相當緊迫，但前後兩篇講稿使外交部感到十分滿意，因此事後特地致函《人民日報》編輯部表示謝意，對我本人的工作予以高度評介和讚揚。這種情況，無論在外交部或在《人民日報》，都是從來也沒有過的。

後來，吳學謙繼任黃華為外長，下令於1984年將我正式調入外交部，授予參贊頭銜，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在我轉到外交部後，吳的貼身秘書（註：黃桂芳先生，後任駐菲律賓大使）對我談到了外交部調我的原因和吳學謙本人對我的評介。他說：「吳部長調你來，是因為你有三個條件：一是有政策頭腦；二是思路清楚，分析問題很有條理；三是文筆好，出手快」。

從此以後，我就成為外交部的專職筆桿子，主要任務是為外交部與中央領導人起草有關國際外交與出訪外國的講稿，內部傳達的國際形勢報告，以及供高層參閱的形勢與政策分析文件。

在政策研究室的四年內，我每年都為領導人起草外交講話稿，並以中國代表團重要顧問名義隨行出訪。除了1982年隨黃華外長出席裁軍特別聯大之外，其他重要的活動還有：

- 1984年9月隨吳學謙外長赴紐約出席聯大。
- 1985年10月隨趙紫陽總理參加聯合國成立四十周年慶典，名義是包括錢其琛副外長在內的九名隨行人員之一。
- 1986年9月再次隨吳學謙外長出席聯大。
- 1987年5~6月間隨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出訪美國、加拿大、巴黎。
- 1987年8月隨錢其琛副外長出席聯合國世界裁軍與發展會議。

通過這幾年的工作，我作為一個幕僚人員，實際上在一定範圍內進入了從事外交決策的圈子，有條件了解到中國對國際外交事務的決策思想以及決策程序，也經歷過不少重要的國際外交場面。特別是積累了觀察分析世界形勢、戰略格局與大國關係，以及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的經驗。同時，多年的政策研究工作，也使我養成了注意動向、掌握信息、積累材料和勤於思考的習慣。

這就是我必須在本書開始時向讀者介紹的，為什麼我在中國外交部任職四年後，得以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大使館政治參贊的背景。

作為駐美使館的政治參贊，其主要任務是協助大使處理政治事

務與兩國關係，必須掌握政策，了解情況，匯集信息，胸有成竹，分析問題，判斷形勢，考慮對策。工作的對象首先是美國國務院和白宮負責中國與亞洲事務的官員，通過登門拜訪、工作午餐的方式與他們進行交談。其次是與美國各學術機構和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交往，了解他們對當前形勢與問題的分析見解。另外也要有選擇有重點地同美國各界與中國有關的人士，包括企業界人士保持接觸，並通過華盛頓活動頻繁的外交場合，與有關國家的外交人士交流信息和看法。當然，美國新聞媒體中充滿著大量的情況、動態與信息，是任何國家駐美外交官對美國與世界形勢進行分析判斷的豐富養料和重要依據。

總而言之，一個稱職的負責政治事務的高級外交官，既要像一個觀察哨的哨兵那樣，密切注視著地平線上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任何新情況，也必須像生物學家那樣，把任何微觀的個別物體與現象放到顯微鏡下，從宏觀的角度上加以觀察、分析和判斷。

春花秋月變成天崩地裂

作為一名中國外交的哨兵，我的觀察哨設在使館大樓八層的835號房間。那是一個套間，外間由公使夫人與一位一等秘書佔用，裡間是我的辦公室。它面向東南，有兩面窗戶，一邊對著熱鬧的康乃狄克大道，另一邊對著幽靜的卡洛拉馬大街。

每天，在晝夜伏案工作之餘，我總要從窗口張望街景。除了車水馬龍常年不變之外，那街景總是隨著冬去春來的四季變化而變化。春天，那盛開的杜鵑、丁香、鬱金香、迎春花和玉蘭花相互爭妍鬥麗，吐露出沁人的芬芳。進入夏季，豎立街道兩旁的一棵棵楓樹、銀杏和橡樹，在盛夏驕陽映照下長得枝葉繁茂，顯示旺盛的生命力。秋風一起，天高日晶，星月交輝，大自然好像有一支巨大的畫筆，把滿街滿谷楓樹的綠葉隨意塗抹成碧空中黃裡透紅的斑斕色彩。然後是「滿地黃葉堆積」，枯枝敗葉在寒風中搖曳，那飛雪漫天，令人畏縮的隆冬季節來到了。

四周景色固然十分值得欣賞，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通過我這個哨所的窗口，來觀察中國與世界形勢的變化。這種變化，比自然景色更加多姿多彩，變幻無窮。誰也沒有料到，在我來到華盛頓之後幾個月的時間內，從我的觀察哨看到的中美關係與世界局勢的圖景，竟然發生了從春花秋月的美景，到山崩地裂慘象的急劇轉變。

本來，在臨近八十年代末的時候，中國的國內形勢與外部環境都是比較好的。十年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經濟高速增長使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得到明顯改善，也使中國國力大為增強。雖然黨內高層圍繞著改革的速度、幅度與深度問題存在意見分歧和權力鬥爭，但中國大陸總的局勢還是穩定的。

在國際外交方面，布希剛剛當選美國總統，中美關係發展出現了更為廣闊的前景。在華盛頓，中國外交官原來是比較吃得開的。

韓敘大使與美國高層，上自總統外長，下至學者專家，都有良好的關係，享有很高的威信。為了加強中美關係，布希當選總統不久就作出了訪問北京的決定。美國商務部也宣布對中國放寬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包括中國渴求的通訊設備、電子儀器、發電設備與石油化工設備等等。美國、日本與西歐顯然被中國大陸未來潛力無窮的市場所吸引，希望加強與中國大陸的經濟交流和政治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美蘇關係改善為推動中蘇關係改善創造有利條件，鄧小平提出的掃除妨礙中蘇關係三大障礙的條件得到蘇方的響應，兩國外長在長期脫離接觸之後終於舉行會晤，北京與莫斯科雙方正在朝著舉行兩國首腦會議的方向前進。中美蘇之間多年來第一次出現了三邊關係互動的局面。因此中國駐美使館在做1988年年終總結的時候，提出了要利用新的有利形勢，爭取今後使中美關係、中蘇關係好過美蘇關係的設想與政策建議。

但是，在卡洛拉馬高地中國大使館上空出現的，僅僅是日落前一片轉瞬即逝的絢麗晚霞。從遙遠的天邊，有片片烏雲，和黑暗的夜幕正在悄悄襲來，並且孕育著一場帶著閃電雷鳴的疾風暴雨。

首先是中國大陸突然發生天安門事件。愛國學生與廣大人民群眾反對腐敗特權，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與示威遊行，被中國政府定性為否定黨的領導與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活動，而加以武力鎮壓。一場血與火的悲劇，使中國大陸的形勢急轉直下。改革派失勢，保守派捲土重來，當權者驚惶失措，老百姓憤憤不平，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發展出現嚴重倒退，國際上陷於空前孤立。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東歐也發生了蛻變。先是匈牙利開放邊境，允許公民自由出入。波蘭團結工會在選舉中大獲全勝，政權轉到非共人士手裡。接著捷克與保加利亞產生連鎖反應，取消共產黨權力。然後這股浪潮又席捲東德，沖垮了二十八年來屹立不動，把一個德國切為兩半的柏林圍牆。當羅馬尼亞的喬塞斯庫還想用刺刀、坦克和秘密警察與宮廷衛隊來遏制人民起義的時候，他遭到了歷史的懲罰，落得了被槍決的可恥下場。

最後輪到了那個自稱為「社會主義祖國」卻被美國總統雷根稱為「罪惡帝國」的蘇聯。短命的1990年八月政變，敲響了蘇聯的喪鐘，而戈巴契夫與葉爾欽這一對政敵，則成為聯手埋葬紅色帝國的掘墓人。在克里姆林宮頂上照耀了七十四年的紅星熄滅了，沙皇俄國紅白藍三色旗重新飄揚，取代了那面年長日久污跡斑斑、顏色泛白了的鐮刀斧頭紅旗。

《人民日報》1970年元旦發表過一篇題為「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的社論，有過這樣一段豪言壯語：「一座座火山爆發，一頂頂皇冠落地，當今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塊帝國主義安定的綠洲了。」然而，帝國主義沒有垮台，一心盼望帝國主義垮台的社會主義卻垮台了，而且垮得那麼迅速，那麼驚人，那麼出人意外。

東歐演變與蘇聯垮台，就像地球突然發生一場十二級的大地震一樣。先是發出咯吱咯吱的斷裂聲，然後裂痕越來越大，處處火山爆發，天崩地陷，組成地球表面的板塊結構開始崩裂，發出轟然巨響，最後是隨著餘震的不斷，整塊整塊的板塊脫落下來，完全解

體。

形勢估計失誤再失誤

從天安門事件到蘇聯瓦解消亡的兩年多時間內，世局變化的速度、廣度與深度，簡直令人頭暈目眩，難以置信。

1958年中國大陸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的「陳布雷」——中共頭號理論家與筆桿子陳伯達，從馬克思著作中挖出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一句話來形容「大躍進」的速度，結果完全是空想和吹牛。但是1989~1991這兩年世界社會主義兵敗如山倒，全線崩潰的速度，倒真的稱得上是「一天等於二十年」。當歷史的閘門一打開，歷史的潮流一瀉千里、洶湧而來時，東歐與蘇聯那些用軍警刺刀、專制集權與美麗謊言支撐起來，統治了幾十年的共產政權，頃刻之間就紛紛倒了下來，被沖刷得無影無蹤。什麼胡薩克（捷）、何內克（東德）、日夫科夫（保）、雅魯塞斯基（波）、阿利雅（阿爾巴尼亞）之流曾經不可一世的當權者，以至一度成為世界政治舞台新星的戈巴契夫，全部「糞土當年萬戶侯」，變成了歷史的侏儒，被歷史剝奪了存在的權利。

世局變化的速度，連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研究班子的謀士與軍事學院負責戰略研究的將軍，都無法跟上，難以捉摸。

美國國務院政策計畫司司長丹尼爾·羅斯透露，有一次中央情

報局的官員前來匯報情況，因為在開往國務院的汽車上聽到新聞廣播，而不得不臨時三次改動匯報內容。這使得像羅斯這樣的老手都不得不感嘆道：「這個世界的變化的確是太大了，幾乎每個小時都在變」，「變得使你不得不謙虛謹慎起來，因為你無法預測歐洲未來的圖景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

當北約集團的幾十名將領集合到美國海軍學院來，按照老一套辦法討論北約一年一度的例行軍事演習時，海軍學院正在為不知如何修改教材是好而發愁，因為他們覺得，「要擬訂一項戰略，來適應不斷變化中的形勢，就像描繪一列行進中的火車一樣的難」。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中國領導人及其政策研究班子的智囊人物，究竟是怎樣分析判斷中美關係與世界形勢，又是如何採取因應對策的呢？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毛澤東、周恩來與鄧小平的決策和領導下，中國外交有時高瞻遠矚，選擇時機，利用矛盾，勢如破竹，取得很大成就。但有時卻主觀武斷，不顧主客觀條件強行推進世界革命而一意孤行，從而加劇矛盾，以至遭受挫折與損失。不論如何，中國從來也沒有碰到過像天安門事件之後這樣內外交困的形勢，因而禁不住驚惶失措，彼此失調，猶豫不決，在估計形勢與進行決策時出現了不斷失誤的情況。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將在以後幾章內加以詳談。這裡先作一些簡單的概括，說明北京在當時複雜情況下，對中美關係與世界形勢所作出的與事實脫節的錯誤分析判斷。

第一，他們認為，天安門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外因重於內因，主要是由於西方對中國大陸推行和平演變政策所致，美國對中國的國家政策就是要推翻中國政府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和國會在對華政策上唱雙簧，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布希總統是兩面派，表面上要修復中美關係，實際上是想拉戈巴契夫，拉蘇聯壓中國。美國眾議員佩洛西關於要讓中國留學生延長留美簽證的提案被否決，表明布希並非沒有力量對付國會。

第三，他們認為，既然美國應對中美關係惡化負責，「解鈴還需繫鈴人」，美國就應該先走一步。斯考克羅夫特將軍的北京之行表明美國有求於中國，中國不必著急，不妨等待美國採取主動。

第四，他們仍然留戀於中國利用美蘇對抗以漁翁得利的時期，遲遲不願承認，甚至在內部文件中避免提到中美蘇大三角已經成為過去。

第五，他們曾想拉蘇制美，對美國打蘇聯牌。江澤民1990年5月訪蘇，大唱中蘇友誼萬古常青高調，結果完全錯估形勢，因蘇聯不久垮台，而使江的講話成為笑柄。

第六，他們曾寄望於蘇聯八月政變，劉華清甚至已經準備搭乘專機前往莫斯科表示支持。但政變馬上流產，北京希望落空。

第七，他們急於插手德國統一問題，希望參加對德和會，企圖利用德國的崛起牽制美國。但德國拒絕召開對德和會，使北京大失所望。

第八，他們認為，美國出兵波斯灣地區，是以反對伊拉克侵略為藉口，旨在控制中東石油資源，牽制德國、日本。美國將像老殖民主義者那樣長期佔領波斯灣地區。而波斯灣戰爭則會拖延幾個月或幾年，使美陷入沙漠泥潭，從此走下坡路。

第九，他們認為，美國在波斯灣戰爭中取勝，與布希的「世界新秩序」出籠，表明美要獨霸全球，其主要矛頭將從莫斯科轉向北京，把中國當作美國的主要敵人。

第十，他們認為，保衛社會主義比改革開放更重要，因此中國必須以反對西方「和平演變」為首要任務，把美國當做頭號敵人。

是歷史的終結 還是共產主義的終結

中國在1989～1991年期間對世界形勢判斷的最大特點，是不管東歐蘇聯局勢如何演變，反正拒絕承認這是共產主義理論的破產、社會主義的失敗以及共產集權統治的終結。他們無論在公開講話中或內部討論中，都從不總結為什麼失敗的經驗教訓，而是簡單地把一切都歸結為西方的「和平演變」。這種論斷，不但完全與事實不符，而且也違反了毛澤東關於決定事物變化的內因重於外因的理論。

一方面，中國領導人對歐洲社會主義世界的消失難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因為無論它們與中國的關係如何，這些國家總是掛著社會

主義的招牌，是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體系。蘇聯瓦解，東歐變色，使中國在世界上更加形影孑立，而且少了一個制約美國強權的對手。但另一方面，北京又通過內部傳達，要使全國黨政軍和人民相信，中國大陸與蘇聯東歐的情況根本不同，蘇聯瓦解是由於實行對外侵略擴張，改革開放失敗。東歐政權則是蘇聯在二次大戰後輸出革命的結果。中國之所以能夠立於不敗之地，是因為遵照鄧小平的理論政策，選擇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取得成果。

其實，中國革命勝利雖然是中國本身的產物，但中國幾十年來的整套制度與政策，都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斯大林主義模式，實行政治上的集權專制與經濟上的全民所有制和中央計畫體制。

社會主義的最大弊端與必然失敗的原因，在於它對人的控制束縛與壓抑，使一切個人完全從屬於國家、政府、黨和領袖。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但事實證明，一旦無產者與人民成為所謂「國家主人」之後，他們失去的不光是身上的資本鎖鏈，而是他們自身的一切。他們從此將在黨所控制的國家和社會中完全消失「自我」的存在。而一個不容許「自我」存在的社會，個人的權利願望需要和利益得不到實現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僵化、封閉，沒有活力，長期停滯，最後被人民拒絕的社會。

即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說，在生產力諸因素中，人應該是最活躍的因素。但實際上，無論在蘇聯、東歐或中國大陸，人這個最活躍的因素完全被限死了。由於共產黨的理論教條、集權統治、政治束縛以及種種限制，個人要不是成為俯首貼耳聽命於黨的工具，就是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使人無法自由發揮，甚至失去了其在生產、工作與一切社會活動中的價值。

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在解釋他為什麼不能成為共產主義同路人的時候說：「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使共產主義最終成為一種邪惡的制度，它要靠共產黨的獨裁和列寧主義的一切殘酷無情的手段來實現它的理想。」「我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它們採用的列寧主義方法，不在於它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註：1998.11.4《新加坡聯合早報》）

共產黨所最關心的是如何鞏固其統治權力，而不是如何滿足人民的基本權利與需要。因此，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即使像蘇聯這樣一個軍事實力與美國旗鼓相當的超級大國，居然連食品、肥皂、衛生紙與尿布這些人民日常生活基本需求都滿足不了。當人民從自己切身體驗和兩個制度對比中發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與許諾不過是謊言，他們原來是生活在虛假的「波將金村」（註：波將金是俄國的一位伯爵，他為了欺騙凱薩琳女皇，在她巡視莫斯科近郊時以虛假的人工布景來製造俄國農村的繁榮假象。）裡時，他們寧可在「社會主義天堂」與「資本主義地獄」之間選擇後者而唾棄前者。這就是為什麼蘇聯被埋葬時，俄國人沒有為它唱輓歌、掉眼淚的根本原因。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切合理的東西都是實在的，一切實在的東西都是合理的。」由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違反理性與人性，所以它就必然要失去存在的權利。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的消失，並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共產主義的終結。因為歷史還將前進，而共產主義則已經到了盡頭。

當然，中國領導人會爭辯說，蘇聯垮了，中國沒有垮，因此中國的制度比蘇聯好。鄧小平甚至說，「只要中國的社會主義能夠存在，世界社會主義就有希望。」

問題是，中國過去實行的究竟是不是社會主義？即使鄧小平自己也承認，「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他還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那麼，蘇聯垮了，中國能夠生存下來得到發展，究竟是不是靠社會主義？

從根本上說，中國之所以不得不實行改革開放，恰恰不是說明社會主義的成功，而是失敗。正是因為過去那種社會主義搞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向資本主義求救，需要借助於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手段與方法，來給氣息奄奄的社會主義注入活力，使它起死回生。而一旦把資本主義因素移植到社會主義的機體內，中國的經濟、社會與人民生活就開始活躍興旺起來。

誰也不能否認，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以及人們頭腦中，社會主義的因素越來越少，資本主義因素越

來越多。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借資本主義之助才得以發展的，儘管中國力求把許多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籤。

因此，中國靠改革開放而使經濟充滿活力，與蘇聯因改革開放失敗而走向滅亡，兩者同樣證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兩種制度競賽中的失敗。雖然資本主義固有的弊端並沒有因為社會主義的失敗而得到相應克服，但自從《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共產黨人喊了一個半世紀的，所謂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預言，已被無情的事實粉碎了。

無論是蘇聯的消逝，東歐的演變，或者中國的改革，都有力地證明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革命理論，一種社會制度，一種令人嚮往的美好理想，一種使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奮鬥獻身的崇高事業，已經消失在歷史的煙雲之中。它不再植根於社會的現實中、人們的心坎裡，而只存在於圖書館與學術機構褪色發黃的故紙堆裡，只能讓後人去研究、去憑弔了。

第 2 章

使館內外的震盪

沸騰的康街

在中國大使館大樓內，有一百八十多名外交官。其中大使、公使與參贊級幹部三十多人，參贊以下近一百五十人。他們大部分是由外交部派出的人，在館內掌管辦公室、政治組、國會組、新聞組、領事部與對台事務組的工作。還有來自國內其他外事部門的官員，分布在武官處、商務處、經濟處、科技處、文化處與教育處。除了外交官之外，另有近五十名從北京與全國各地調集來的各類工作人員，在使館擔任醫務、司機、炊事、勤雜、水電、園丁、土木以及專給大使洗衣等工作。

與其他外國使館不同，中國大使館是一個小社會。全體人員，除大使與公使享有單獨的官邸外，全都住在同一座樓內，一日三餐都在同一個食堂進餐，朝夕相處，過著和國內一樣的集體生活。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日子裡，大家都密切關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

早在三月間，當胡喬木前來訪美，與美國學術界人士會見的時候，在使館內部舉行的一次大會上，政治組的外交官張德廣、陳明明和我就向他提出過關於國內局勢的問題，甚至還有人以責問的方式說，「我們黨什麼時候才能廢除家長制？」我本人在會上，後來又在陪同他參觀華盛頓的航空博物館時，跟胡喬木談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我認為，從美國的理念來說，當然它希望把西方的自由民主推行到全世界，但這和中國宣傳的所謂社會主義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是一樣的道理。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定美國政府的現行政策就是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中國的政權性質。如果以此決策，那對中美關係是不利的。但當時胡喬木給人的感覺是，他似乎心事重重，對中國大陸與蘇聯東歐局勢的發展演變非常憂慮，內心有所思考，但是不願在那個敏感時刻發表任何個人意見。所以無論對誰的問題，他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不予回答。

隨著天安門事件的變化，使館內部人員的心情也日趨複雜，由欣喜與興奮逐漸轉變為沉重、憂慮、哀傷和憤怒。

起初，從電視上看到學生成群結隊在天安門遊行示威，反對特權腐敗，要求政治改革的情景，人們都為他們的愛國熱情和秩序井然的理性行動感到鼓舞，交口讚揚。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中國貪污成風、特權盛行，腐敗現象變本加厲，引起人們普遍反感與不滿。而學生們的呼聲與行動，反映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和要求。大家都希望黨政領導能聽取意見，採取必要措施來克服腐敗現象。

但是中國領導人對學生的愛國熱情最初還表示嘉許，越到後來就越漠然置之，加以訓斥，最後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把這一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定性為一場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這就激起了廣大愛國學生的憤怒，激化了人民群眾與政府的矛盾，使雙方從對立發展成為對抗，最後終於導致了一場以「平暴」為名的血腥鎮壓。

隨著中國大陸形勢的不斷惡化，中國駐美使館內的氣氛也日益緊張起來。人們不但嚴重關切局勢的演變，更擔心國內家屬的安全與命運，迫切希望通過長途電話與家屬聯繫，了解情況。但使館是規定不得用公費來打長途電話的，由於駐外人員待遇菲薄，一個月的工資打不了幾次長途電話。因此，使館不得不放寬限制，允許每人給家裡打一次長途電話。這樣，使館的長途電話費開支，就從五月份的5,852美元，增加到六月份的12,180美元。

六·四以後，中國新聞媒體除了不斷重複官方的宣傳論調以外，是很少披露事實真相的。使館人員要想了解國內情況，只能通過海外媒體、訪美的中國人士，以及各種來源不同的傳聞，點點滴滴地了解一些信息。儘管使館不時地傳達從北京傳來的文件，說「極少數壞人」如何操縱學生運動，外國勢力如何插手干預、幕後支持，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說非軍人死傷三千多人，而軍警卻死傷六千多人，使館內還放映國內緊急運來的天安門事件實況錄影帶，裡邊有很多軍人挨打的鏡頭，但多數人對官方的說法仍然深表懷疑，不予置信。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中國大陸貪污成風、特權盛行，
腐敗現象變本加厲，引起人們普遍反感與不滿。
學生成群結隊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反對特權腐敗，要求政治改革。

據說當時外交部有七天時間不知道中國的領導人是誰，都在哪裡。即使身為政治局委員與外交部長的錢其琛，也由於出訪外國，而不了解國內局勢真相。6月3日，韓敘大使在使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說，他在紐約會見了剛要赴南美訪問的錢其琛外長。錢說，據他了解，至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還沒有開過會，只有中央軍委開會研究過局勢，趙紫陽仍然是黨總書記。實際上趙已在5月20日提出辭呈，並在此後被解除職務。

關於中國局勢的大道消息沒有，但是小道消息和各種傳聞與謠言卻不時傳來。

一會兒說前中國駐美公使錢永年的兒子在街上給流彈打死了，前外長吳學謙的兒子吳曉鏞是北京國際電台的新聞部副主任，在六·四當晚值班時發了一條消息，說天安門死傷一、二千人，被西方媒體引用，遭到停職檢查處分。還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宣稱不當刺刀下的官，而拒絕參加李鵬宣布戒嚴的高幹會議，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副會長胡洪範因為參加遊行反對武力鎮壓而被停止黨籍。而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則說什麼中國留美學生百分之九十靠不住。後來證明，這些傳聞都是正確的。

不僅如此，中國駐美外交人員還一再遭到恐嚇威脅，例如駐聯合國大使李鹿野回國開會所搭民航班機，因為有人恐嚇要炸機而延遲兩小時起飛。駐芝加哥、洛杉磯總領館接到要暗殺中國外交官的恐嚇信，甚至韓敘大使也收到有人要他在美政治避難的恐嚇信。

即使這些威脅中國外交官的恐嚇只是謠言，但是在天安門發生

流血事件之後，中國大使館的確被包圍在一股憤怒與強烈的敵對氣氛中。六·四當天上午，由於華盛頓與北京有十二個小時時差的原因，美國所有人都已經知道天安門發生的流血事件了。前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示威遊行，抗議中國政府武力鎮壓學生的人群越來越多，最後增加到三千五百多人，把使館附近一帶，從塔夫特大橋往南，到卡洛拉馬大街與康乃狄克大道（使館人員平時簡稱為康街）的整個地區，擠得滿滿的，成了一片沸騰的海洋。

在華盛頓地區與從美國各地匯集來的無數中國留學生，在使館前面舉著各種旗幟和標語牌，喊著「打倒鄧李楊」、「反對法西斯」、「救救同胞，放下屠刀」、「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美國黑人領袖喬塞·傑克遜從人群裡出來，站到使館門前，要求中國大使館為天安門的死難者降半旗致哀。但是出面接見他的趙錫欣公使，以沒有先例和無法判斷死者是誰而加以婉拒。一陣陣憤怒的浪潮過後，電子琴奏出了蕭邦的「葬禮曲」，人們捧著藍白色的鮮花，流著悲痛的眼淚，為天安門無辜犧牲的愛國同胞默哀。

在以後的很多天內，一批一批的中國學生和美國朋友絡繹不絕地來到這裡，在使館門前一塊小小的街心花園裡點燃蠟燭，揮動旗幟，呼喊口號，表達悲憤的心情。令人驚異的是，有一次傍晚時分，當人們抬頭對著使館大樓窗口喊叫「中國人下來」時，樓上窗口兩邊掛著的窗簾，忽然被聯接成一個V字。當人們會意到這是以某種暗示方式來表達對學生的同情與支持時，就情不自禁地歡呼與熱烈鼓掌起來。

華人痛心疾首

人們可能沒有想到，當時在中國大使館門前示威遊行的成千上萬華人中，有許多是過去經常出入使館的朋友。其中有在華府從事各種商業與服務行業的人士，有教授、作家、畫家、工程師、律師以及知識界人士，還有一些多年來被作為使館統戰對象而保持經常往來的旅美台灣同胞們。在天安門事件以前，由於中國大陸國力日益壯大，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以及與美關係穩定發展，常年居住在華盛頓地區的華人，願意和中國使館交往的人越來越多。每逢節慶或有重大活動，中國大使館門前總是張燈結綵，車水馬龍，門庭若市，迎來眾多的華人賓客。人們聚集在使館大廳內談笑風生，洋溢著親切的氣氛。

可是現在，他們為天安門事件感到震驚和憤慨，無論感情上心理上都无法接受這樣一個令人椎心泣血的中華民族歷史大悲劇。因而不能不立刻與中國拉開距離，甚至參加到遊行的人群中來向中國喊一聲「NO」。特別使使館感到不安的是，他們中間包括了原來成為使館上賓，並曾應邀訪問過中國大陸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馬里蘭大學、天主教大學以及德拉瓦大學的一些華人教授。

令人奇怪的是，正如美國國會中民主黨自由派與共和黨極右派在反對天安門事件中站到一起那樣，華府地區的華人，無論左派右派，或者台胞中的統派獨派，也發現自己站在反對天安門事件的同

一條戰線上，儘管他們在許多方面仍然保持著原有的分歧。

有些原來親北京的華人更是痛心疾首，覺得過去多年來白白地對北京表示好感，沒有想到中國會發生這樣令人髮指的事情。而很多人更把憤怒傾瀉在李鵬身上，至今還懷著激動的情緒說：「誰也不會喜歡李鵬，李鵬不下台我就不到大陸去！」還有一些文人學士，則從過去為中國唱贊歌的左派，來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變成了狠批中國、否定中國一切的右派。

在天安門事件剛剛發生那幾天內，有幾位與我有往來的華人打電話來，向我十分激動地表達他們內心的憂傷與痛苦。有的人說著說著，難以抑制心頭的悲憤，就在電話中低聲嗚咽起來，使我也不能不為之動情。

還有一位黃埔軍校的老前輩，出於對他的尊敬，我曾書贈七律一首，讚揚他「老驥伏櫪在海外，志在報國興中華。壯心何日始能酬，行看彩虹掛海峽。」6月4日，他從電視裡看到北京所發生的一切之後，立即打電話來，極為激動地向我訴說自己的感受與見解。

他說：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共產黨當年能夠取得勝利，打敗國民黨，就是因為得到人民的擁護。現在中國學生要求的只是整治貪污腐敗，實現民主自由，你就用軍隊去鎮壓。軍隊的職責應當是保護國家安全，不能對內鎮壓百姓，他們應當馬上從天安門撤出來。

他還說，共產黨這樣做，讓人覺得連國民黨也不如。當年蘆溝橋事變，學生起來要求抗戰，見蔣介石，蔣沒有開槍，只說好好

好，你們都到軍校去報到，一起打日本。現在共產黨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必然會失去人心，後果非常嚴重。中國好不容易統一起來，有了發展，現在又倒退了。

這位已經過世了的將軍還要求我把他的意見轉告北京。可是北京需要的是向他們發出歡呼，表示支持的聲音，有誰願意聽這樣的「反面」意見？儘管我對他表示十分同情與尊敬，但是我只能讓他的意見保留在我的心裡，靜靜地躺在我的記錄本上，直到今天才讓它與世人見面。

電視室裡看北京罵李鵬

以上所說的只是有關華人的一些內心反應。其實在中國大使館這座高樓紅牆之內，天安門事件所引起的強烈情緒，並不亞於街上的示威者。

在那些氣氛熾烈而又使人感到十分寒心的日子裡，整個樓裡，唯有政治組、國會組與武官處三個部門才安裝有線電視的房間，是比餐廳與後院更為熱鬧的場所。每天晚餐，幾乎一放下筷子，人們就紛紛往幾個電視室裡集中。雖然已到初夏季節，房間不大，但大家卻盡量往裡邊擠，擠得幾乎沒有空隙了，才靜下來，懷著迫切而緊張的心情注視每天傍晚黃金時段的新聞節目。那時美國幾大電視網派往北京採訪的頭牌記者，如NBC的湯姆·勃洛科，ABC的科

勃爾，CBS的丹·拉瑟，以及CNN的波納·蕭，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形象。隨著他們的講述，北京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中南海新華門，以及其他重要場合的現場畫面，一個個地閃在眼前。

那在夜色蒼茫中摸索前進的戒嚴部隊士兵，那劃破夜空的刺耳槍聲，那在坦克面前無所畏懼的使得舉世驚嘆的不知名的青年，那載著血跡斑斑軀體疾馳而過的平板三輪，那趙紫陽探望絕食學生時深深內疚而又無可奈何的神情，那李鵬宣布戒嚴令時殺氣騰騰的面孔，那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宴請戈巴契夫時筷子上掉下來的肉塊……所有這些反映著中國在動盪，大地在顫抖，民族在受難的歷史鏡頭，在電視螢幕上看得比在北京還清楚，在人們心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

隨著畫面的變換，擠在一個屋裡的外交官和家屬以及工勤人員們，也就無所顧忌，七嘴八舌地紛紛議論起來。如果隔牆有耳的話，他們準會聽到從電視室裡發出來的，這樣一些憤怒中夾著諷刺的評語：

「瞧李鵬那副凶相，周恩來把他當養子，誰知道他有多壞？」

「李鵬抱八十幾歲老人的大腿絕沒有好下場，還能有幾天？」

「我看他是被鄧給耍了，鄧有資本，李鵬有啥？」

「將來人大開會，不光要把李鵬撤了，還要判刑，讓他嘗嘗鐵窗滋味」。

「對，最好把他關在江青的對面，讓江青天天罵他，把他氣死」。

「最可恨的是他一面裝好人，探望學生，一面調兵遣將，準備鎮壓」。

還有人乾脆說：「我現在什麼消息也不想聽了，就等著李鵬下台的消息」。

也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的憤怒都集中在李鵬身上，希望他早日完蛋，以解心頭之恨。當時這種強烈情緒，在使館內是毫無遮掩的，甚至連一位主管行政的官員都公然宣布，只要李鵬一下台，使館就擺宴席慶祝。

即使大部分外交官出於職務的考慮，表面上顯得比較含蓄謹慎，盡量把怨氣藏在心頭，但是公務班、司機班與炊事班的工人們卻無所顧忌，常常怒形於色，表示強烈的不滿。有一天，一個電工看到有人休息時在後院打球，就走上前去把球搶了過來，氣呼呼地喊道：「北京在死人，你們還打球，像話嗎？以後我見到誰打球就打誰。」

當時李鵬在美國留學的一個名叫劉智源的女婿，因為害怕被人暗殺，就躲到使館裡來避風頭。他不但隨意吃喝，而且天天給北京掛長途電話，往往一打就是半小時一小時。開始時他很神秘兮兮，誰也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來頭。後來傳出來他是李鵬的女婿，在官邸工作和從使館過來的工人師傅們，就故意當著李鵬的女婿的面罵李鵬，存心說給他聽聽。後來，過了兩個月，在天安門的風波稍稍平息之後，使館特地派了一位參贊，帶了兩名有記者身份的人，把這位駙馬爺護送回國。上了飛機，還特地把他的座位放在兩

個有關的中國人的中間，以防萬一。

如果說句公道話，把對六·四事件的憤慨全部傾瀉在李鵬頭上，讓他充當天安門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似乎也有欠公允。因為畢竟軍隊不在他的手裡，開槍也不是他下的命令。但不知為什麼，無論國內國外，人民都把李鵬當作六·四的元凶和象徵。即使李鵬後來的姿態有所變化，也做了不少實際工作，但人民還是改變不了對他的印象，總是饒不了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不過，對鄧小平與中共的保守派來說，讓李鵬當惡人，作擋箭牌，由此而多少轉移了人民對整個中共的憎恨，使六·四的責任主要集中在李鵬一個人身上，這對整個中共來說，倒是真也不壞。

他們一個個走了

過去正常的使館生活，被天安門事件打破了平靜，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在辦公室，走廊上，食堂裡，宿舍內，或後院散步時，大家心裡想的，嘴上講的，幾乎都是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事。平時比較相好，可以互相信任的人，碰到一起往往無話不談，可以大發牢騷。但是對自己不大了解，或從對方表情上可以推測與眾人想法不一，或出身於高幹家門的人，就會保持沉默，或者只聊家常。究竟誰有什麼看法，誰的心裡在想什麼，人們大體上有一個差不多的估量。

6月4日上午，即北京時間6月4日午夜，使館召開了天安門事件之後的第一次全體人員大會。除了使館人員之外，還有國內駐華盛頓各單位的人奉命前來參加。韓敘在會上傳達剛從北京傳來的戒嚴部隊公告。當他念到文內所說的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軍隊必須執行任務，「制止動亂」，以「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字句時，擠滿兩百多人的會場馬上人頭騷動，議論紛紛，發出一片噓聲，來反駁這個文件的武斷說法。

忽然間，一個個子不高的年輕人站了起來，衝著大使憤怒地喊道：「別唸了，這是反革命文件，我們不聽。」

會場的氣氛立刻緊張起來。韓大使從來也沒有碰到過這樣的場面，覺得很尷尬，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稍停一會兒，他才反應過來，不過他沒有厲聲斥責，而是委婉地，甚至有點為難和歉意地說：「不要這樣麼，這是傳達國內文件。現在要照顧大局，盡量保持安定團結麼。」

這個年輕人，是使館新聞處的三等秘書張熾偉。他生於1954年，1980年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曾在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進修兩年，1988年2月由外交部新聞司調來美國使館工作。夫人韓國紅，是中國在七十年代派往倫敦學習的高中生，1982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分配到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後調駐美使館，任辦公室秘書，為韓敘大使安排禮賓活動日程。

當天傍晚，張熾偉大概感到自己的行動使大使為難，過意不

去，就到官邸去找大使面談，一方面表示歉意，一方面表達自己內心難以壓抑的憤慨，甚至激動得流下了眼淚。韓大使深感此時國難當頭，大家應該冷靜下來，等待政府善後處置，因此沒有對張加以譴責，而仍然是以一個領導與長者的身份，對他進行慰勉與解釋。

但是，小張大概早已打定主意不再為這個政府服務，與之斷絕關係了。因此當天半夜就在大家睡夢中不知不覺地出走了。第二天一早，人們發現他們夫婦兩人既沒有到食堂進早餐，也不在宿舍內待著，而由張熾偉使用的一部公家小臥車也不見在後院裡停著了，這才斷定這對夫婦已經離開使館不知去向了。後來，張熾偉從外面打電話給使館，說他最近身體不好，想在外邊休息幾天，以後會與使館聯絡，讓使館派人到指定的地點去取回車子。

小張夫婦的出走，並沒有引起使館內部的很大震動，使館沒有開大會宣布對他們的處分，人們在下邊紛紛議論時，除了有個別人罵他們可能被美國收買之外，沒有人把他們當作叛逃的敵人來對待。平時有所了解的人，對張的行動並不感到奇怪，因為很久以來，張經常流露出對國內腐敗特權現象的強烈不滿。最近公開表示過，「如果解放軍對學生開槍，我就退出共產黨」。事後發現，張熾偉夫婦今年2月回北京休假時曾經買了價值兩百多元人民幣的書籍帶回美國，顯然是早有出走之意。

這是六·四事件之後，使館發生的外交官首次出走事件。使館無法隱瞞，只能向北京報告。但為了減輕使館的責任，只好把張出走的原因說成是個人平時有驕傲偏激情緒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

羨慕美國人的高收入與高生活水平。還說他六·四後受美國輿論影響，產生思想波動，對北京戒嚴和使用武力的行動有所抵觸，終於導致出走行動。

過了十天之後，美國國務院證實了張熾偉夫婦出走的行動，和給予他們政治避難的決定，西方通訊社也播發了有關的消息。

但張熾偉出走並不是一個孤立與偶然的事件。在他們之後四天，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的兩名年輕的領事官員，周黎明與張利民，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出現在當地華人悼念天安門死者的燭光晚會上，宣布與中國政府決裂，支持愛國學生運動。接下來，還有中國大使館文化處的楊寧，駐芝加哥總領館的教育參贊張念人夫婦，僑務副領事來永慶夫婦，中國大使館教育處的王維祺與徐林，以及中國駐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法國、比利時、丹麥與日本的外交人員。從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到同年7月中國召開使節會議的一個多月時間內，中國駐外人員共有七十七人脫離中國當局，向駐在國申請避難或居留，其中有的人則要求轉往別的國家。所有這些人中，屬於中國外交部系統派出來的外交官與家屬，共有十七人。

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的外交人員離開駐外使領館出走，在當地尋求避難或長期居留，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自從那時以來，已經很多年了，這期間，還有更多的中國駐外公職人員，已經拿公派護照出國的留學人員，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按期回國，滯留海外，總數約有幾千人之多。

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由於政治原因出走，很多人只是想在國外謀得一個更好的職業，享受更好的研究工作條件，或者只是由於婚姻、家庭甚至單純想在國外多掙些錢。但是中國政府卻把一切都泛政治化，一概拒絕對這麼多的中國人換發護照或延長期限。這實際上等於剝奪了這為數幾千名海外中國人本來擁有的中國公民身份。在沒有充分事實根據確認並宣布這些人犯有違反中國法律，和反對中國的罪行之前，就先按照敵我矛盾來處理。使這麼多的海外中國人喪失國籍與公民身份，這是既缺乏法律根據，又違反人權與人道的行為。如果這些海外中國人都聯合起來，向中國政府提出集體申訴，中國政府就無法給予合理的答覆。

第3章

天安門槍聲 使中美關係一落千丈

天安門的槍聲與血跡，不僅使中國大陸陷入了一場深重的災難，也使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從高峰跌入了低谷。

多少年來，出於共同對抗蘇聯威脅與美國本身利益的考慮，美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把中國當成友好的非盟國對待。兩國關係儘管存在分歧，有過波折，但總的說來，一直是保持穩定，不斷發展的。

暖流變成了寒流

1988年12月15日，我作為中國大使館的高級外交官，陪同韓敘大使一起，應邀出席由舒茲國務卿在國務院八樓富蘭克林大廳主持的慶祝中美建交十週年招待會。

國務院八樓是美國政府接待外國貴賓的主要場所。除了總統以外，副總統、國務卿與內閣部長都在這裡會見或宴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在整個層樓裡，分布著許多富麗堂皇的廳室，陳列著十八、

十九世紀歐美古典式的家具、繪畫、雕塑、鋼琴、銀器與燭台。落地的長窗，明亮的鏡子，鑲嵌著國徽的地毯，以及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巨大水晶吊燈，把各個大廳與寬敞的宴會廳裝扮得既豪華又典雅，使親臨其境的每一位來賓如同置身於宮殿之中。舒茲國務卿曾經以這樣一段話來形容這裡的陳設、裝潢與氣派：「我到過世界上的很多國家，會見過它們的首腦。那裡有不少地方的布置裝潢是令人驚嘆的，但沒有一處能和我們這裡相比。」

就在這個富麗堂皇的富蘭克林大廳，舒茲國務卿舉行了有許多美國高級軍政官員，包括歷任國務卿、內閣部長、駐華大使、大企業家與知名學者參加的盛會，並且以這樣的美好詞句來開始他的祝酒詞：

「在這個寒冬的夜晚裡，看到有這麼多曾經為開拓中美關係盡過力的傑出人士歡聚一堂，使人心裡感到溫暖。」

他指出，十年前兩國之間微不足道的經濟文化交流，已有長足進展。雙方貿易量增加了十倍，合資企業遍地開花，中國留美學生已達三萬多人，兩國間的合作，正在從經濟、文化、軍事向航天領域拓展。因此可以說，「中美關係在八十年代交織得更加充實，更加緊密了。」

在杯觥交錯的熱烈氣氛中，人們看到了美國新總統上台以後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前景：

新的一年裡，布希將訪問中國，並歡迎一位中國領導人回訪美國。從1989年5月到10月，預定陸續訪問美國的還有：中國人大委

員長萬里，外交部長錢其琛，國防部長秦基偉，國家科委主任宋健，郵電部長楊天放，外貿部長鄭拓彬。

但是，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使中國的形象一下子完全改觀。美國人從上到下都對中國突然之間的變化感到震驚和茫然。他們簡直無法相信，一個因推行改革開放成功而受到世界尊敬的中國，竟然會發生用槍彈對付自己人民的事情，那些原來具有開明形象與崇高威信的領導人，怎麼會變得如此的殘酷無情。

「中國的國際形象，在過去十五天內倒退至十五年前的狀況。」——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佩爾這麼說。

「我們面對的已不再是惹人喜愛的熊貓所象徵的中國。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熊貓不會殺死年輕人。我們現在交往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它除了與蘇聯為鄰之外，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這是美國國務院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的評論。

「中國政府還沒有學到最基本的一點是，你不可能殺死一種觀念，你不可能用坦克碾碎希望，你不可能用子彈洞穿人民的渴望。」——曾經在1985年訪問中國大陸時稱讚過他看到的「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美國總統雷根，在倫敦發表紀念邱吉爾的演說中，講了這一段話。

在中國大陸形勢發生突然變化之後，美國政府對中國作出了強烈的反應，於6月5日和6月21日先後兩次宣布對中國進行制裁。具體內容包括取消兩國間的高層往來與助理國務卿以上的高級官員互訪，停止對中國出售武器與雙邊軍事合作項目，停止世界銀行對中



美國國務院八樓的富蘭克林大廳，是美國政府接待外國貴賓的主要場所，陳列著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古典式的家具、繪畫、雕塑等豪華擺設，令人嘆為觀止。

國的貸款，為了保護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而允許他們在簽證到期後繼續留在美國。

接著，美國國會參議院以100：0票通過決議，譴責中國政府對手無寸鐵的人民使用武力，要求布希政府與盟國磋商，對中國進行國際制裁。眾議院也以418：0票通過決議，要求在布希政府制裁之外，對中國進行包括中止貿易與發展計畫，禁止出售與警務有關的武器，限制高科技、核原料或零件轉讓的進一步制裁。

美國輿論一邊倒

六·四以後，幾乎一夜之間，美國舉國上下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甚至可以說充滿了對中國的強烈反感與敵意。國會兩院一片咒罵聲，報紙電視一面倒地站在中國學生一邊。很多原來對中國友好，推崇中美關係的人，在美國輿論和風向大變的情況下，不是公開表態責備中國，就是保持沉默不言。即使像季辛吉、霍爾德里奇、奧森伯格、鮑大可與哈定這樣一些對中國持有友好與公正態度的美國前政府官員和知名學者，在電視節目討論中，也不得不發表這樣的評論：

「天安門事件是中國領導人的悲劇。」

「他們曾經有過很多機會與辦法來解決問題，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武力，美國感到震驚，無法容忍。中國領導人不能預見到改革所

產生的後果，而且沒有辦法來對付它們。」

美國是一個尊重輿論和民意的國家，民意對政府的決策有很大影響。據《紐約時報》6月13日公布的蓋洛普民意調查，有75%的美國人贊成對中國停止軍售，讓簽證到期的中國學生繼續留美。《洛杉磯時報》的另一項民意測驗表明，以6月與3月相對比，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對中國好感的人從72%降為16%，而對中國表示厭惡的人，則從13%增加到78%。

美國公眾情緒的變化，與中美關係的惡化情況，也明顯地反映到中國大使館來。在六·四以後的日子裡，使館各部門不斷接到美國公眾打來的抗議電話與大量抗議信件，表示他們對中國學生的同情，與對武力鎮壓的憤慨。

每天都有一大摞郵件送來。其中有美國十五所著名大學校長的聯名信。這封信是由哈佛大學校長巴克發起，由密西根大學、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布朗大學、賓州大學、史丹福大學、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康乃爾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校長簽名後發送給中國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信內表示對中國學生的同情支持，與對中國軍隊殺害和平示威學生的憤慨。

我看到的還有紐約州司法部助理大法官羅伯特·匈費爾德（Robert Schonfeld）寫給鄧小平與韓敘大使的一封信。他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北京大學與政法學院的四名青年法學教授，認為中國未經審訊，不按法律手續隨意抓人，違反了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的國際

公約以及人權普遍宣言的規定。還有羅德島州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路易斯·普特南（Louis Putternan）寫給李鵬，費城律師多娜·貝克（Donna Baker）寫給公安部長王芳的抗議信。

一位普通美國人來信說，你們應該把北京的人民大會堂（People's Hall）改為人民拘留所（People's Haul）。還有一個人用郵包把壓碎了的玩具坦克車寄來，附有一張一個中國青年站在坦克面前的照片，信上寫道：「你能忘記這個勇敢的人嗎？」

由於中國政府從來也不在乎中國大陸的民意，更不在乎外國民意，這些來信又不合中國領導人的口味，那千百封信並沒有送回北京，讓中國領導人過目，只是由秘書草草地作點摘要，向大使簡單匯報一下，就束之高閣，最後變成了一堆廢紙。

在韓敘大使於1989年8月離任回國之前，美國國會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杜爾與副領袖辛普生，還特地於7月19日聯名寫信給他，對天安門事件表示嚴重抗議，並要求中國政府寬厚處理被捕學生，改善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大使先生：

我們無意於干涉貴國內政。但是在您行將結束您在敝國的傑出服務，返回北京之前，我們需要明確一點，即對於我們對中國大陸最近事件所作的反應，以及我們對這一事件對中美關係影響的關切，請勿抱有幻想。

美國人民，以及被他們選舉出來代表他們的美國議員

們，對於貴國政府如此殘忍地鎮壓成千上萬學生和平示威的行動，表示憤慨。我們認為，對於那些負責組織遊行示威的人的沒完沒了的侵擾、拘捕甚至予以槍決，是對貴國公民的人權的大規模侵犯，這種行為是沒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可以作為藉口的。

如果貴國政府繼續奉行這種由官方策動的暴力與恐嚇行動，這將對美中關係帶來巨大的傷害。這不是威脅，而是一個事實。美國人民決不會容忍一個政府把自己的人民當作敵人來對待，而仍然與這樣的政府「一切照常」地打交道。

大使先生，我們請您把這個信息帶回給貴國政府。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很重視我們兩國之間近年來的互利關係。我們沒有人想破壞這種關係。但是除非貴國政府恢復理性的與溫和的政策——它使貴國近幾年內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否則的話，我們相信美中關係將會繼續惡化，並會給我們兩國帶來嚴重的後果。

杜爾與辛普生都是韓敘平時經常打交道並保持著良好關係的人。但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他們不能不對這位中國大使提出直率的忠告與警告。但是韓敘是否把他們的信報回北京，或者即使發回北京，外交部是否敢於上報中央，我是深表懷疑的。

美國政府和輿論對中國態度變化如此之快，簡直難以令人相信。當中國大使館開會匯報情況時，幾乎人人都唉聲嘆氣，一籌莫

展，對中美關係急劇惡化感到憂慮和失望。

科技處匯報說：今年本來要慶祝中美科技合作十週年，但是現在全美科學院宣布停止與中國一切雙邊往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拒絕到中國大陸開會，中美科技合作的二十七個部門沒有一個不受影響。原定今年要在北京召開的國際農業會議、環保會議、統計會議、郵電會議與銀行會議，現在全吹了。

領事部匯報說：六·四以後，僑務工作難度很大。華人對中國大陸的形勢反應很強烈，有名望的人帶頭反對。台胞中的統派感到痛心，抬不起頭來。有人說，台灣宣傳多年，共產黨殺人放火，現在證明國民黨說的沒有錯。

負責人民外交的人匯報說：中美兩國四十個友好城市活動全部停止，紐約市長郭德華宣布斷絕與北京往來，華盛頓與北京，舊金山與上海，洛杉磯與廣州，今年取消全部友好活動。華盛頓美中友協會員二、三百人，表示拒絕到使館來參加活動。

甚至連使館採購人員都感覺到氣氛的變化：過去上街採購西瓜，店裡的人讓你隨意挑大的，現在見了人不愛搭理，也不讓你揀個兒大的了。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午三點鐘」

在北京，中美關係的氣氛也越來越緊張。由於美國對中國進行

制裁，又讓方勵之教授躲進美國大使館裡邊避難，中國政府認為這是敵視中國，蓄意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採取了一系列的對抗措施。

先是下令逮捕方勵之，然後是驅逐「美國之音」與「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本來只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不知道根據什麼規定，由誰授予權力，居然擅自派人到北京各大涉外飯店去沒收供外國旅客閱讀的美國報刊，甚至不准外國遊客把西方報刊帶進中國大陸境內。中央廣播電視部切斷了CNN電視網對各大飯店的衛星轉播。國家教委則取消了中美之間學術交流的富布賴特計劃。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原來與中國各界人士的交往活動受到了重重限制。在北京的美國人，包括外交官及其家屬，常駐記者與企業界代表的人數，由於安全不能保障，紛紛撤走，總人數從原來的八千人，減到五百人。

在那些日子裡，美國大使館更是風聲鶴唳，幾乎處於朝不保夕的境況之中。6月3日下午，在中國軍隊進行武力鎮壓前一天，北京市裡已經是滿城風雨，人心惶惶了。美國使館的一些中國工作人員，都想提前下班回家。美國使館就打電話問外交部美大司，美大司的回答是，如果沒有緊要的事情，不妨讓他們先走一步。

6月4日凌晨，中國戒嚴部隊入城，用槍彈掃射建國門外的外交公寓。住在裡邊的美國使館人員擔心生命安全，曾經想往外衝，但被外交人員服務局所勸阻。6月7日上午，據中國方面稱，一支戒嚴部隊路過建國門立交橋時，遭到來自外交公寓與路南兩個方向的槍擊，因而予以還擊。但美方卻向中國政府抗議，認為這是中國當局

的預謀行動，認為子彈是戒嚴部隊自己從附近一座大樓內發射出來的。

在此以後，為了防止方勵之從美國大使館輾轉外逃，中國當局在美國使館附近布滿了警戒。手執AK-47衝鋒槍的中國軍人，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把守著通向美國使館的所有通道，還有便衣人員在附近一帶巡邏查看。任何人到美國使館辦事，都必須經過嚴格盤問，甚至美國使館人員出入，也在中國軍人的監視之下。因此，在對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發表談話時，美國大使李潔明說，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處於「危險之中」。

6月7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朱啟禎本來要約見美國大使館負責人士，但是離約會還差兩個小時，美國大使館就打電話給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告急說：「我們實在不知道還能不能活到下午三點鐘」。因為有一位美國使館的官員從使館回住處時，遭到了駐守在使館門前持槍軍人氣勢洶洶的嚇阻。

當時北京陷於一片混亂。連外交部也不知道上面究竟誰是領導，人在哪裡。因為錢其琛部長正在南美訪問，美大司就請示周南副部長，周南要他們馬上打緊急報告，吩咐在報告中引用貝霖的話。報告送呈給北京市戒嚴司令部，由楊白冰與遲浩田再往上請示，最後不知由誰作出決定，很快地從美國使館門口撤走戒嚴部隊的持槍軍人，不再阻擋美國外交人員。

美國對華政策的「義」與「利」

儘管形勢如此危急，矛盾這麼尖銳，關係急劇惡化，但是無論在朝在野，在官在民，政界學界，美國仍有不少人抱著清醒的頭腦與務實的眼光，來看待陷於危機中的中美關係。這實際上是美國外交的「義」與「利」之爭：究竟是應以美國的價值標準與人權問題——「義」為重呢？還是以美國當前與長遠的國家利益為重，或者必須兩者兼顧，求得平衡？

在指責中國政府所作所為這一點上，美國上下並無二致，但如何對待兩國關係，就出現了強硬派與務實派的分歧。對於白宮與國務院來說，問題不僅在於如何就中國局勢表態，而是如何主控中美關係，是讓它不斷惡化下去，還是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而設法防止惡化與對抗。從美國國務院官員就美國對華政策在國會聽證會上的陳述中，就可以看出美國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之間的不同。

1989年6月13日，在天安門事件不到十天之內，已被任命但還未經參院外委會批准的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索羅門，向參院外委會作證。外委會主席克藍斯頓則認為，自從中國政府使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以來，「美國已不可能再和這個政府維持原有的關係了，不管這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但是索羅門說：「中國國內的形勢仍在演變發展。當我們檢討美國對華政策時，我們不希望做出會切斷兩國關係的事來。」雖然他認為，鄧小平引發了「中國大陸的民主浪潮，而後又壓制了這股

浪潮，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悲劇」，但他籲請參議員們給鄧小平以一定的肯定，因為鄧擺脫了毛澤東的束縛，「選擇了一條新的現代化之路」。「中美關係是經歷了二十年艱苦努力之後才發展起來的」，索羅門說，「美國不應該輕易放棄所有這些聯繫，因為它代表了中國大陸過去十年發生的巨大變化。」

後來，國務院中國處處長理查·威廉斯在對眾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作證時，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他強調說，如果國會要對中國進一步制裁，兩國每年一百四十億美元的雙邊貿易，與美國在中國三十億美元的投資將會發生危險。國防部助理副部長卡爾·福特則指出，如果美國取消對中國的軍售，那麼今後中國可能就再也不會買美國的武器了。在眾議院以100：0票通過對中國進一步制裁的決議時，國務卿貝克表示了相反的態度，並且強調指出，人權因素並非美國外交決策的決定性因素。在這以後，美國的六位前任國務卿，羅傑、季辛吉、范錫、默斯基、海格與伊爾伯格，曾在緬因州聚會，主張盡快結束美國與中國的不正常關係。

美國一些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學者，如鮑大可與哈定等人，在美國朝野眾說紛云的時候，對中美關係與美國對華政策提出了冷靜客觀、值得重視的務實看法。例如，鮑大可在眾議院外事委員會上就中國大陸局勢作證時，表達了這樣一些明智的見解：

- 中國大陸的改革力量並未消失，使中國大陸保持與外界的聯繫會有助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
- 美國的政策目標應當是使中國回到改革的道路上來。應當承認

國外力量影響中國內政的可能性很小。美國對中國施加強大壓力，只會使中國延緩而不是加速改革，只會鼓勵中國強硬派的敵意；

- 不能要求中國領導人一下子做所有的事情，對中國制裁會起反效果；
- 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終結並沒有使中美兩國之間進行磋商的重要性消失；
- 對於斯考克羅夫特的北京之行，應當從更為根本的基礎上加以考慮，不必拘於形式。

後來的事實證明，以上這些看法都是很有遠見的。

第4章

李鵬不同意說中國孤立

天安門事件的結果，是中國改革派的失勢與保守派的獲勝。自從1987年中共十三大趙紫陽接替胡耀邦為總書記，並加速推行經濟改革以來，他就成為黨內保守派的眼中釘和攻擊目標。他們對趙的政策橫加指責，早就想把他拉下馬來。

扳倒趙紫陽 李鵬掌實權

在華盛頓的中國外交官雖然對國內消息不太靈通，但是1989年2月姬鵬飛的兒子姬勝德來美國訪問時，曾經向使館領導透露，鄧小平在二月間到上海時，李先念曾要求鄧小平再次換馬，撤掉趙紫陽。鄧表示時機不到，要等戈巴契夫訪問過中國大陸以後再說。趙紫陽已經有了要下台的預感，所以才在5月15日與戈巴契夫見面時把老鄧仍在作主的話拋了出來，表明他對事態發展無可奈何。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那麼即使沒有六·四，趙紫陽也免不了要被保守派轟下來。

趙紫陽雖然在1989年5月20日就已大權旁落，但直到六月下旬

他才被正式解除黨內職務。

6月23到24日，中共舉行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處理趙紫陽的問題。事先還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與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趙紫陽作了四十分鐘的發言，談天安門事件經過與個人想法，拒絕承認支持動亂與分裂黨。會有二十八人講話，其中包括十個元老級人物。對趙紫陽批評火力最猛的人是李鵬、陳希同和李鐵映。

李鵬指責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還批評趙紫陽主政後，「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說什麼「在趙領導下，中國大陸會進一步自由化，出現反對派，幾年後問題會更大。」

作為中共黨內保守派的寵兒與主要代表人物，李鵬是天安門事件的主要受益者。儘管鄧小平沒有讓他取趙而代之，讓江澤民從上海到北京來摘了桃子，但由於李鵬得到了黨內保守派的全力支持，主持中國內政外交的重要權力實際上落到了他的手裡，江澤民在最初一段時間內是被架空的。

李鵬不但宣布實行戒嚴，而且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堅決主張延長戒嚴時間。

李鵬為中國使用武力百般辯解，強調中國政府對學潮和動亂「一直採取克制態度」，而且反過來問，那些攻擊中國的國家，能夠像中國那樣克制嗎？

李鵬把任何不相信中國官方報導的說法一概斥之為謠言，指責西方國家把對中國的政策建立在「聽信謠言的基礎上」。

李鵬甚至不顧國際關係的準則和起碼的國際禮儀，對美國總統進行公開的攻擊。9月6日，李鵬在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談話時，竟然點了布希總統的名，把他和當年極端反共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相提並論。後來李鵬發覺這個談話有所不妥，讓外交部去通知《費加羅報》記者不要把有關內容發出去，但是已經晚了。

當時從北京休假回來的人說，現在對美外交的實權都掌握在李鵬手裡，江澤民很少說話，鄧小平也不管日常的事情。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任期結束，提出來要向江澤民、李鵬、萬里、李瑞環與朱鎔基等中國主要領導人辭行。但是李鵬不同意，江澤民也沒有話說。

李鵬是中共元老們的寵兒，黨內保守勢力的一根台柱。作為革命先烈的孤兒，周恩來撫養長大的義子，又是在蘇聯留學培訓多年的革命後代，他具有所謂根正苗紅的先天優越條件，在政治上被認為是絕對忠實可靠的接班人。李鵬對六·四事件的強硬態度，實際上反映了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的立場與利益。李鵬在5月19日宣布實行戒嚴以後，中共中央顧委立即發表聲明，表示支持李鵬，「並強烈要求揭露一小撮打算製造動亂的人的面目」。陳雲也在同一天指出，「我們必須揭露少數人策劃的陰謀，必須同他們鬥爭，決不向他們投降。」

當時在李鵬周圍集結著一大批主張不計任何後果對美採取強硬



李鵬（右）與江澤民（左）是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時的當權人物。

立場的保守派勢力。姚依林主張少要西方貸款，彭真發表文章表示堅信社會主義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王震竭力鼓吹派解放軍衝進美國大使館去把方勵之抓出來。公安部取消了紐約投資商索羅斯在中國大陸設立的基金會辦事處，這個基金會曾為趙紫陽手下的體制改革研究所捐贈一百萬美元作為研究經費。此外，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教委、《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黨校等意識形態重要部門，都掌握在左派手裡。從吉林省調任《人民日報》社長的高狄，對外交問題一竅不通，也不主管國際宣傳，卻硬要插手國際評論，以赤裸裸的反美高調來顯示中國的堅決立場，因而一再受到外交部的阻攔，在審稿時抹掉了很多不利於改善中美關係的刺耳空話。由中宣部控制的《光明日報》，曾經發表文章指名攻擊尼克森，指責美國企圖通過和平演變，把社會主義國家變為他們的附庸國與殖民地。

李鵬在天安門事件過程中對形勢估計與對美外交的僵化強硬態度，可以用這樣一件事情來說明。

天安門事件以後，由於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中國駐美使館對形勢變化表示嚴重關切，大使本人與幾名政治參贊不得不緊張工作，加強外交活動與形勢調研，不斷地把了解到的重要信息與形勢分析見解發回國內，供高層決策參考。這些電報，大部分內容都對事態發展採取務實的態度，加以客觀的分析，並根據中國的基本立場，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在當時形勢十分緊迫的情況下，由於駐美使

館所擔負的重大任務，它所發回的重要電報，無論日夜，一傳到北京，往往來不及經過外交部領導的審批，就由機要部門直接上送中央。有時形勢發生變化，政治局與常委的領導人要等著閱看前方發來的電報，以便及時了解事態與使館意見。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電報是受到國內領導重視與好評的。

駐美使館電報說實話吃批評

六月下旬與七月上旬，使館研究室（政治組）經過認真討論並由館領導批准，向北京發了兩份重要的形勢分析電報，第一份關於當前中美關係及對策建議，第二份關於中國國際處境與對策建議。後者的主要觀點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國際上陷入了孤立，現在處境困難，必須從修復中美關係著手，首先要改善國內環境，對形勢客觀分析，認為美國所以作出強烈反應，主要是因為中國使用武力，死了人。為了扭轉局面，改善中美關係，建議中國早日解除戒嚴。

這種形勢估計與對策建議，是完全符合事實和中國利益的。但是第二個電報到了李鵬手裡，他卻在上面加了批語，而且不讓把批語傳給外交部，使外交部完全蒙在鼓裡。過了十天之後，外交部才聽說有這麼回事，知道李鵬對這份電報提出嚴厲的批評。李鵬認為電報沒有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來看待「平暴」的意義及其必要性，對

整個國際環境估計得過於悲觀，不符合國內認為「平暴」取得了巨大勝利的看法。李鵬還認為，使館的電報沒有從本質上認清，西方之所以對中國使用武力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是因為對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陰謀遭到了失敗。另外，使館一再反映美國人士希望中國解除戒嚴以改善中美關係的建議，也引起李鵬等人的不快，批評這是有意借外國人的嘴來對中央施加壓力。

後來中國外交部並沒有因此而批評駐美使館，但是傳來一個口信，提醒以後要盡量注意不要冒犯上面。關於中美關係降到最低點之類的話少說，甚至認為韓敘大使說美國力求維持中美關係的話也不妥，因為上面並不這樣看。至於建議修復關係，雖然提得沒有錯，但是要與上面合拍。當時上邊對中美關係問題正在激烈爭論，國內形勢很吃緊，慶祝建國四十周年活動，公園裡全都駐紮軍隊，根本談不上取消戒嚴。問題是，駐美使館遠離中國，無從了解國內政情變化與每個領導人對當前局勢、中美關係的具體看法，怎麼能夠預先防止「冒犯上面」。如果對任何事情的反映評析都要事先考慮一下是否符合領導人的喜惡，那又怎麼能夠反映客觀的現實情況呢？

李鵬當時對外交部是很不滿意的。除了上述電報一事之外，還發生過另外幾件事情。

一件是，尼克森為了了解中國的形勢並與中國領導人當面探討防止中美關係下滑之道，決定於1989年10月底訪問北京。但在訪問之前，他通過自己的助手向中國大使館打招呼，要求在北京期間會

見鄧小平、江澤民、李瑞環、萬里等人，但表示不想見李鵬。因為當時在美國政府與公眾的心目中，李鵬的聲譽和形象最壞，誰要是在那個時候與李鵬握手，誰就要倒楣，即使尼克森是下台總統，他也不能不顧及自己的名聲和影響。駐美使館把尼克森的要求如實報回北京。外交部美大司一看電報就覺得會有麻煩，擔心會惹怒李鵬。後來李鵬辦公室果然給外交部打來電話，說尼克森這麼做是在分裂中國的中央領導，北京實行戒嚴並不是李鵬一個人作主的。其實當時要到中國來訪問而不願會見李鵬的外國人士不光是尼克森，從英國與澳大利亞來訪的重要人士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不過使館沒有發電報，沒有把這樣的信息讓李鵬知道而已。

還有一件事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出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員，江澤民、李鵬、姚依林、喬石、李瑞環與胡錦濤等六名常委在會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國內外亮相。西方通訊社發出的消息認為，這是「中國自六·四以來為爭取西方輿論而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努力。」駐紐約總領事館在收集紐約華人反應後發回北京的電報，卻如實地反映說，人們對江澤民反應最好，李瑞環次之，李鵬最差。李鵬看到對他這樣的評介，心裡當然會十分惱火。

這些事情，究竟是無意中發生的，還是有意借此機會給李鵬一點好看，是很難說的。因為當時在中國駐美外交人員中，對李鵬十分反感與不滿的情緒極為普遍，拿他來開玩笑或出氣的事是經常有的。按理說，在發回這樣的電報時，人們不會想不到它們會引起李鵬的不快，甚至會挨罵。但是明知故犯的目的，就是想出一出李鵬

的洋相，存心讓國內領導層知道，李鵬在國外是多麼不得人心。說不定能看到這種電報的人中間，還有人會覺得很痛快呢！

李鵬儘管否認天安門事件使中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但過了幾個月，他又在接見全國友好城市工作會議代表時說，「在經過嚴寒的冬季之後，我國外交活動的春天正在到來」。這豈不有點矛盾嗎？既然不認為中國孤立，為什麼有「嚴寒的冬季」，既然有了「嚴寒的冬季」，冬去春來就會這麼快嗎？

其實，中國因天安門事件而陷於孤立，是事實，不是謊言。這種孤立，決不是李鵬所能否認得了的。

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不必說，就是西歐、東歐、日本、亞洲，無論與中國關係是好是壞，有沒有重要經濟利益，都以反對、抗議、譴責、遺憾或感到沮喪的不同方式，表達了對中國使用武力的不滿。

美國總統布希表示，美國「堅決和天安門要求民主與改革的人站在一起」。

西德總理柯爾說：「對一個如此漠視人民生命、踐踏人權的政府，所有文明國家都應表示憤慨」。

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對中國事態發展表示沮喪，呼籲中國「採取最大程度的忍耐與克制」。

歐洲共同體決定取消原定與中國部長舉行的會議。

在巴黎召開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發表聲明，要求中國避免由於

「鎮壓中國民主運動」而受到的國際孤立。

法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挪威、澳大利亞凍結與中國的一切高層往來，英國與瑞典禁止向中國出售任何武器。

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格羅斯說，中國的暴行「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

泰國一百名國會議員要求中國停止武力鎮壓。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與印度外交部對中國的事情表示「遺憾」或「沮喪」。

李鵬在六月下旬會見巴基斯坦副外長時振振有詞地說：「疾風見勁草，路遙知馬力。在中國遇到暫時困難時，誰是真朋友，誰是假朋友，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他沒有認真地想一想，為什麼中國原來有那麼多朋友，現在都紛紛離去，對中國失去了信任。究竟他們是假朋友呢，還是他們認為中國這個朋友太不可信，太不可捉摸，太令人失望了。儘管與中國建交的139個國家中只有二十幾個國家採取了制裁或其他對中國不友好的行動，但是中國的威望與形象，由於天安門事件而在政治上遭到的巨大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作為一個歷史的傷痕，它不僅無法從中國人的心裡，也無法從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消除。

儘管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早已完全擺脫了國際孤立的處境，今天在世界上發揮著比過去更大更重要的作用，但是誰能否認當時中國確實陷於嚴重孤立的事實，而且誰又應該忘記這樣的事實呢？

實際上，中國不僅在政治外交上遭到孤立，而且在經濟上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由於天安門事件造成的巨大創傷，中國國內生產下降，對外貿易減少，赤字增加，外來投資與外匯收入急劇下降。世界銀行負責亞洲地區事務的副行長卡勞斯·馬諾格魯在年度報告中指出，六·四事件使中國1989年的經濟增速放慢，旅遊業的收入也嚴重下降，私人投資大幅度減少。世界銀行把1989年度給中國的貸款從十三億減少到七·八億美元，由世界銀行主持的七筆貸款項目全部中止。

不能忽視的是，由於外國旅客大量減少，原來航行在長江上的峨嵋、白帝、神女、巴山等豪華輪全部停駛，杭州、桂林、西安等旅遊勝地接待外國遊客的旅遊業務幾乎全部停頓，工作人員的薪水不得不靠銀行貸款來開支。在香港，旅行社的大陸生意幾乎減少了80%，申請移居海外的人數急劇增加，股市因為中國局勢動盪而不斷下跌。

他從骨子裡親蘇反美

李鵬在天安門事件後的很多講話，無論對內對外，都包含著四個基本點：

第一是談事件性質，強調中國政府被迫使用武力是很不得已的。

第二，認為西方很多人指責中國，是因為對中國的事態不了解，一旦事情的真相大白，人們就會改變看法。

第三，天安門背後有黑手，美國對中國搞和平演變，企圖推翻中國政權。

第四，中國外交人員對於美國和西方的反華逆流要理直氣壯地堅決頂住。

例如，他在五月底召開的一次外事工作會議上說，中國對動亂採取的寬容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國的事情很複雜，外國人一時看不清，可以多觀察，只要不存偏見，會對中國逐步了解。因此中國外交人員應當找機會積極開展工作，讓外國人消除疑慮。

6月22日，他在接見巴基斯坦副外長博瓦尼漢時指出，中國發生的事情「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背景，關鍵是國內外都有人不喜歡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

後來他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日中友好聯合會會長伊東正義時，又進一步指出，天安門事件的背景「在於美國企圖使中國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

從李鵬的歷史來看，毫無疑問具有親蘇反美的深刻思想基礎。1948年他從延安去蘇聯學習，一直待到1955年，前後長達七年之久，在思想感情以至生活方式上受到蘇聯的薰陶和影響肯定是很深的。這種思想感情，即使在中蘇關係惡化對抗的時期也沒有消失。

1986年，在李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曾經出訪法國與匈牙利。在結束此行回國之前，他發電報給外交部，表示希望路經莫斯

科回國。當時中蘇關係並未緩和，蘇聯正在力圖拉攏北京，離間中美關係。身為中國副總理，李鵬即使從蘇聯過路，也會使人產生懷疑與誤解，因此主管蘇聯事務的錢其琛副外長認為李鵬的要求不妥，外長吳學謙也作不了主。外交部只好向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請示，胡耀邦感情上也有相當的親蘇色彩，竟然對這樣敏感的事情未經請示鄧小平而擅自批准，同意李鵬路經蘇聯回國。

李鵬到了莫斯科，雖然名義上是路過，但蘇聯當局卻故意把他當作正式訪問來接待，由戈巴契夫出面與他會見。李鵬儘管當面重申鄧小平提出的改善中蘇關係的三個條件，即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減少部署在中蘇邊境的蘇軍數量，以及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但是沒有按照中國政府既定的口徑強調，必須在蘇聯實現了這三個條件之後，才談得上改善中蘇關係。

李鵬還推行「校友外交」，回到他的母校莫斯科動力學院去參觀訪問。在那裡，他曾經度過了自已一生的十分之一，長達七年的時間。對於舊時的師友情誼，他始終未能忘懷。而動力學院以至蘇聯當局，則把李鵬當作「那沙切羅維克」，即由蘇聯培養，吃俄國「赫列勃」（麵包）長大的「咱們的人」。當年李鵬從動力學院畢業回中國時，他的學友為他送行，恭維他二十年後會當中國的電力部長。這回李鵬以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中蘇關係依然僵化對立的時候重返母校時，那些俄國人都高興地與他熱情擁抱，甚至把他抬舉到空中。

但李鵬那次訪問，卻遭到鄧小平的嚴厲批評，因為鄧的政策是

堅持不能在外交上對蘇聯鬆動，而李鵬居然違抗鄧的旨意，擅自跑到莫斯科去見戈巴契夫，等於送上門去給蘇聯一筆厚禮，從而不可避免地會引起西方的猜疑，擔心中國的對蘇政策會發生什麼變化。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這樣的事情，鄧下令從此以後任何副部長以上高級官員在訪問歐洲國家之後都不許路經蘇聯回國。不僅如此，細心的人還會注意到在那以後的一個微妙變化：報紙消息裡關於國務院副總理的排名次序中，李鵬的名字一下子被放到了田紀雲的後邊。

實際上，這麼多年來，鄧小平無論公開或者私下裡，都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表揚李鵬的話。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已經選定了江澤民為新的接班人之後，明知保守派人物會有所不滿，因而接見保守派主要代表人物李鵬與姚依林兩人，發表長篇講話，作出一個「政治交代」。鄧要求他們著眼於將來，服從大局。他說：「人都有缺點，我們在座的三個人都有缺點。各有各的帳，各有各的弱點。」李鵬聽了，當然不會不明白，鄧的意思是認為他有缺點，不能當一把手，但不要不服氣。

李鵬對蘇聯的態度是如此的親熱，而對美國則始終抱有敵意，兩者差別有如冰炭。

中國孤立難道不是事實嗎？

李鵬雖然在總理的位置上坐了十一年（1987～1998），但他從

未被邀請正式訪問過美國。他前後到過美國兩次，一次是1985年隨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當時他給美國的印象是很傲氣，態度不友好，表現出一副不屑與美國打交道的樣子。在中共很多高級幹部中，對美國向來懷有根深蒂固的敵意，總是念念不忘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即使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他們內心也認為這只是一種策略。尼克森1972年訪華打開中美關係僵局之後，中美兩國開始進行文化交流，北京在七十年代派出一個芭蕾舞劇團訪問美國。美國特別給予面子，請他們進白宮參觀。但擔任領隊的對外友協副會長張映吾，為了跟「美帝國主義」劃清界線，竟然在與尼克森握手時把頭擰了過去，目光不對著美國總統，故意顯示傲慢與冷淡，結果回北京後受到嚴厲批評。但是過了多年，李鵬在八十年代中訪美時，仍然擺出這副架式。

李鵬另一次到美國是1992年1月底。他臨時中斷了對歐洲的訪問，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首腦會晤。由於美國在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進行制裁，中美兩國領導人一直既不能互訪，又沒能在國際場合會面。李鵬很想利用這次機會，在紐約與布希總統見一面。這既可以抬高他自己的身價，又可以藉此顯示中國在國際上已經脫出孤立，連美國總統最終也不能不承認中國的重要地位，與中國總理會見。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通過外交渠道一再向美國提出中美兩國領導人在紐約見面的要求。但是美國朝野與公眾對李鵬的印象很壞，把他看作是天安門事件的罪魁禍首，根本不願意與李鵬打交

道。參議院有二十一位議員聯署寫信給布希總統，反對他與李鵬見面。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由江澤民出面給布希捎了一個口信表示，如果中美兩國領導人能藉此機會會面，雙方可以就當前重要的國際問題交換意見，意思是中國可以給美國一點甜頭，作為雙方會見的交流。中國駐聯合國使團與駐美大使館，則奉命在紐約與華盛頓兩地分頭加緊活動，向美方竭力爭取高峰會見的實現。

在北京的催促下，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於一月下旬緊急要求會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商談此事。但斯推說正忙於四十七國援助獨立國協（前蘇聯成員國）會議的事情，故意躲著不見。後來副國務卿坎特通知朱啟禎，如果李鵬想見布希，必須拿出一點實質性的東西出來，使會見有些成果才行。朱問坎特，美方是否已經就雙方會見的問題作了決定，坎說沒有。朱表示，如要會見，應當早日決定，中國會考慮美方要求，進行認真會談，但是不能事先作出承諾。坎特回答說，你要會見，總得在籃子裡多裝一些東西才行。

於是中國駐美使館向北京匯報說，看來有可能會見，但是美國要東西。

對於北京的要求，美國始終保持壓力，採取低調與含糊其詞的態度。先是《華盛頓郵報》傳出布希可能會見李鵬的消息，但白宮馬上予以否認，表示布希總統「沒有這項計畫」，後來又改口為「不知道」，然後又說「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實際上是在與北京討

價還價，等待結果。

這樣，一直拖到1月28日，離安理會各國首腦會晤只剩下兩天了，紐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才接到美國代表團的電話通知，說布希決定於1月31日下午，在安理會成員國首腦會晤之後，與李鵬在聯合國會見，但只能見十五分鐘。據後來有關人士透露，布希同意會見李鵬，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班子在1月25日星期六那天，經過兩個半小時的激烈爭論之後才作出的決定，說明在布希手下的人中間，會見也有很大的阻力。

但是白宮規定的這個時間，短促得只夠使雙方照個面，根本談不了什麼問題。這使朱啟禎不得不向坎特表示驚訝，要求美方予以重新考慮。但坎特表示，布希的日程已經排滿了，雙方能會見就不錯了，總比不見要好，而且會見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他還開出要價，希望中國能就遵守「導彈技術控制體制」(MTCR)問題達成協議，而且最好在李鵬與布希會見時就宣布。

本來，在貝克國務卿於1991年11月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中國已表示願意遵守MTCR規定的準則與參數，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必須取消1989年6月宣布的對中國的三項制裁，即解除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的禁令，其中包括解除不許中國代別人發射美國商業衛星的決定，以及同意支持中國在條件符合時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

接到美國的通知，北京心裡可以說是憂喜參半。李鵬與布希會見的目的總算快要實現了，但對美國的要價怎麼辦，理還是不理？

如果要理，中國就得改變過去的一貫立場，表示同意遵守MTCR。

為了與布希見面，中國調整了原定李鵬與非洲佛得角和奧地利兩國首腦會見的時間，取消了出席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招待會。另外，出於安全考慮，中國還對美方提出了一個十分無知與荒唐的要求：由紐約市警察當局採取措施，保證屆時反對李鵬的示威只能在李鵬本人看不見、聽不到的地方舉行。李鵬以為，美國當局就像中國一樣，可以隨意干涉人們的集會遊行自由，結果碰了個釘子。

3月31日上午，李鵬在安理會各國首腦會議上發表講話，重申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並提出「不謀求霸權、不搞強權政治應成為國際上普遍遵循的原則」，實際上是針對美國而言的。

下午，李鵬在聯合國安理會走廊的一個接待室裡與布希會見。美方參加的有國務卿貝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發言人費茲吉拉德與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亞洲主任帕爾。中方參加的有錢其琛、朱啟禎、劉華秋與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

會見時，布希表示，「美中關係回到正常的軌道符合雙方的利益」。他提到了人權問題，強調中國如能在改善人權方面做些事情，會有助於美國對華政策。如能對年輕人寬容，世人就會慢慢的淡忘六·四事件。他還表示要堅決反對有條件的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並且在會上將了李鵬一軍，問中方能否在會上提出一份關於遵守MTCR規定的文件。

在這以前，由於受到軍方的抵制與壓力，李鵬一直不大願意接受美方要求，把原來準備和美方換文的信件壓了一個多星期。政治

局為此開會進行討論，為了爭取與布希見上一面，不得不改變態度，準備作出讓步。據朱啟禎回來在小範圍內傳達說，中央有人說，「本來不應該當李鴻章，這回只好當一下子了。」

在與布希會見時，李鵬說，「貝克國務卿訪華時雙方達成一些諒解，中國方面將信守自己作出的承諾。中國方面為改善中美關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希望美方認真履行自己的承諾。」這聽起來好像是中國已經做了它應該做的事情了，就等著瞧美國怎麼辦了。但是貝克國務卿卻對法新社記者表示，李鵬暗示過，「美國政府將會很快收到一封中國重申不會進行導彈擴散的信件。這是貝克在11月間訪問北京期間作出的保證。」

實際上，李鵬對於遵守MTCR仍然猶豫不決，在會上只表示要考慮美方要求，籠統地提了一下導彈技術的參數，而沒有提到準則，想敷衍一下了事，拖過兩國首腦會晤再說。但布希當面催促中方，要求在會上就有所表示。朱啟禎因為已經向美方有所表示，覺得不能食言，就遞條子給李鵬，希望能把信件拿出來。李鵬作了一個姿態，問錢其琛，錢說沒有帶來，實際上信件已經在錢的口袋裡。只是有些內容還需要與軍方協調，尚未簽字，所以不便拿出來。結果中國等於是空許諾言，把美國耍了一頓，使美國很失望。

這次會晤，只是使兩國領導人碰了個面，交換了一下意見，對於緩解中美關係實際上並沒有起什麼作用。而且，就在會晤的當天，美國務院還發表人權報告，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外交部照例加以反駁。但是中國對內卻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似乎李鵬參

加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以及與布希會見，已經表明西方對中國制裁的終結，中國已經突破了六·四以來的國際孤立地位。

這次會晤也沒有改變李鵬在美國人心目中的負面形象。無論美國政府，或美國輿論，都始終把李鵬當作天安門暴力鎮壓事件的一個象徵，加以指責、諷刺與否定。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從布希到柯林頓政府的任何美國官員，都不願意把自己跟李鵬連在一起，深怕因此而有損於自己的聲譽，成為媒體攻擊的對象。

1997年美國副總統高爾訪問北京時，在出席中國購買大批波音飛機與合作生產通用公司汽車的簽字儀式時，李鵬向高爾舉起香檳酒杯表示祝賀。但高爾卻把酒杯放在腹部上，遲疑而又尷尬地想迴避與李鵬碰杯，因為他很顧慮會不會因此而在下次美國大選時受到選民的指責。柯林頓1998年6月訪問北京時做得更妙：在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國宴時，他把左手放在背後跟李鵬握手，故意顯得怠慢，而與朱鎔基握手時則兩隻手都伸向前去，表現出明顯的親疏之別。

李鵬在國內外這樣不得人心，遭人厭惡，完全是罪有應得，是他自己造成的。

第5章

萬里訪美進退兩難 北京發來三封急電

訪問日程精心安排

當北京天安門風雲激盪的時候，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正在北美訪問，先到加拿大，後到美國。

本來，萬里訪美，是在布希總統二月間訪問北京時中美雙方達成的協議，是繼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八十年代中趙紫陽與李先念之後，中國國家領導人對美國的又一次重要訪問。

萬里思想開明，曾經反對過四人幫，七十年代後期在安徽省農村最早推行「包產到戶」，使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顯著提高。他在文革時期鄧小平1974年復出主政後，曾擔任過鐵道部長大力整頓中國的交通運輸，遭到四人幫的反對。文革後，他與在四川的趙紫陽齊名，相互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和鄧小平的兩大支柱，因而在美國享有較高的聲譽。再加上布希當年在北京當美國聯絡處主任時，曾與萬里有過交往，兩人是網球場上的對手，關係很好，因此美方很希望萬里的訪問能夠取得圓滿成功，使布希上任後的中美關

係推進一步。

但是事與願違，天安門事件的演變，使兩國關係蒙上了陰影，也使萬里不得不中斷訪美之行，提前回國。

按照精心安排的預定計畫，萬里及其隨行人員乘坐專機於5月22日到達美國，6月1日離去，歷時十天。在美國各地，萬里出門都坐防彈汽車，除了美方負責全程保衛之外，萬里還隨身帶了六名中國警衛人員，配備六支中國七七式手槍。根據美方要求，中方還向美方報告萬里及其夫人的血型，以防發生意外。萬里乘坐的專機也由中方加以簽封，必須經中方同意才能開啟機艙。

萬里在美國各地的參觀訪問日程，是按小時來安排的，其中最重要的活動是：

5月22日：上午十時到達華盛頓，住麥迪遜旅館。下午拜訪白宮與國務院，分別會見副總統奎爾與國務卿貝克。晚上在中國大使館出席韓敘大使歡迎萬里來訪的酒會，並在酒會上與華府的華人代表見面。

5月23日：上午自由活動，下午二時去白宮會見布希總統，然後與布希在白宮網球場進行「球敘」。晚上出席由季辛吉主持的美中協會晚宴。

5月24日：上午會見參議院議長與議員，在美中協會討論會上發表演講，並會見與中國有關的美國各界知名人士。下午去五角大廈會見美國防部長錢尼，晚上出席奎爾副總統在國賓館舉行的宴會。

5月25日：上午去巴爾的摩接受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出席校長午宴，然後進行體檢。晚上去馬里蘭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並出席校長歡迎宴會。

5月26日：上午去馬里蘭州首府安納波利斯會見謝弗州長並出席午宴。下午去美國商務部會見莫斯巴赫部長。

5月27日：離華盛頓飛往佛羅里達州的甘迺迪航太中心，進行參觀訪問。

5月28日：在奧蘭多參觀迪士尼樂園。

5月29日：離奧蘭多飛紐約，會見中國駐紐約總領館與駐聯合國代表團人員，參觀帝國大廈。

5月30日：參觀紐約股票交易所，分別會見紐約市長科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蘭普頓，出席該會與著名的公司舉辦的聯合午宴，介紹中國經濟改革情況。下午會見國際橋牌新聞協會負責人，並接受該會榮譽獎狀。

5月31日：離紐約抵紐澤西，會見AT&T電話公司國際部總裁海因茲，參觀世界通訊網路中心。晚上返抵紐約，觀看林肯藝術中心的芭蕾舞演出。

6月1日：上午參觀自由女神像與聯合國總部，傍晚結束訪美，離紐約飛義大利首都羅馬。

整個日程，安排得十分緊湊，既與美國高層進行會談，又能接觸美國大企業家與各界知名人士，還可以對美國的名勝風光瀏覽一番。

使館自作主張勸阻萬里訪問

但是，萬里還沒有結束對加拿大的訪問，他的美國之行就成了問題。因為就在他逗留加拿大的幾天內，中國政海波濤洶湧，高層鬥爭激烈，局勢忽明忽暗，使萬里身在海外，心繫國內，拿不準天安門與中南海的風向究竟會往哪個方向颳，甚至不知道在公開場合應該對國內局勢作什麼樣的評介。

為了迎接萬里來訪，中國駐美使館早已作了種種準備：為確保訪問圓滿成功，與美國務院以及其他有關接待單位一再商討如何擬訂訪問日程；確定配備陪同參觀訪問的人員，以保證整個訪問順利進行；與有關各地華人社團進行聯繫合作，安排與萬里會見；為了舉辦盛大的歡迎宴會，事先派人回國採購大量高檔食品；使館全體人員要與萬里合影留念，事先進行了站隊排練。

萬里關照每天要喝一點茅台酒，還要在白宮與布希打網球之前先找一位網球好手進行熱身練習，因此事先特地從加州請了一名華人女子網球選手到使館來小住等待。1987年10月，布希作為美國副總統訪華時，在北京國際俱樂部與萬里打過一場網球。（1994年1月，布希在天安門事件已經事過境遷之後再訪北京，又與萬里在天壇網球場打了一場網球，第一局萬里以6：4勝，第二局布希以6：3勝，第三局萬里又以7：5勝。）這回，布希以總統之尊的身份歡迎萬里來訪，兩人決定再在球場上較量一番。

但是，萬里還沒有到來之前，使館內部卻對萬里此時此刻訪美

是否合適，駐美使館是否應當接待萬里來訪的問題，發生了爭議。爭議的結果是，大使、黨委書記（公開身份是公使館參贊）、辦公室主任以至個別政治參贊都表現得情緒激動，一致認為現在國內形勢緊迫，萬里不宜再在國外遊山玩水，應當向北京發電，建議取消萬里訪美之行，立即回國。

但是公使趙錫欣考慮得比較冷靜周全，認為萬里是否訪美，應由他本人決定，而且此行負有推進中美關係的任務，可以在中美關係面臨困難的時刻借機進行一些協調工作，不能隨便說他遊山玩水。最後決定在萬里來訪前幾天，由使館派一名官員去加拿大當面陳述意見，勸阻萬里訪美。

萬里原本以為是國內發生什麼緊急情況，需要通過駐美使館向他當面交代，結果見到來人後，了解到原來只是駐美使館本身的意見。他考慮再三之後表示，是否結束訪問立即回國，應由北京來決定，自己作不了主。只要北京不來電召回，訪問就應當繼續下去。因此，駐美使館自作主張，在萬里面前碰了釘子。後來，韓敘大使於八月間奉調回國之前對人表示，當時使館幸虧沒有向北京發電，否則就等於對國內權力鬥爭插了一腳，必然會造成嚴重後果。

其實，在萬里於5月22日離開加拿大飛抵華盛頓安德魯空軍基地之前，他已經收到了北京發來的三封急電。

第一封急電：5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來電要求萬里結束訪問，提前回國。這份電報，是萬里自己提出要求回國，經趙紫陽批准後，由全國人大黨組起草電文給吳學謙，但是未經李鵬同意，而

由趙決定簽發的。

第二封急電：5月20日早晨，李鵬、姚依林知道趙電召萬里回國之後，又以政治局常委的名義另發一份急電，說中央決定要萬里繼續訪問。但這封電報最初發到外交部機要室時，機要室因為一時找不到部領導簽字批發，退回給了李鵬，後來由李鵬再次發給駐加拿大使館轉交萬里。

第三封急電：到了5月20日中午，萬里又收到以黨中央與國務院雙重名義發來的急電，再次重申要他在外繼續訪問。據看到過這份電報的有關人士說，電報是經鄧小平同意之後，由他的秘書王瑞林簽發的。

為什麼北京在這個時候來了三封急電，而且內容前後矛盾，使萬里莫衷一是呢？

北京風雲突變 萬里舉棋不定

因為5月19日前後，正是中共高層對於如何處理天安門事件的問題發生嚴重分歧，無法協調，面臨攤牌的時候。

在這以前，趙紫陽曾經於4月23日至30日出訪北韓。他回國後，發現《人民日報》在4月26日根據中共強硬派意見發表的社論引起學生強烈反彈，造成嚴重後果。這篇社論指責天安門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和「動亂」，企圖「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

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於是把廣大學生定為敵我矛盾，使學生群情激昂，本來已經有所緩和的形勢重新趨於激化。

為了把廣大青年學生與極少數企圖製造事端的人區別開來，著重疏導，避免激化，儘快平息事態，趙紫陽利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機會向學生發表講話，以委婉的語氣強調現代化建設與改革只能在「穩定而不是動亂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因此必須「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局面」。緊接著，在對亞洲開發銀行會議的講話中，趙紫陽又以一種與4·26社論相反的語調，肯定大多數學生「絕對不是要反對」現行制度，而是要求「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強調要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5月19日凌晨，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慰問正在絕食中的學生，苦心孤詣地勸導他們與政府對話，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時趙紫陽顯然預感到事態嚴重，他已無能為力，因此用一種頗為感嘆甚至絕望的聲調對學生說：「你們還年輕，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

就在這天傍晚，李鵬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中共黨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實行戒嚴，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實際上，在這以前，5月17日舉行的中央常委會議上，李鵬已經指責趙紫陽對學生採取退讓態度。會議決定調集部隊進入北京，準備實行戒嚴，但趙紫陽表示無法執行，因而提出辭職。他藉口身體不適，向常委請假，拒絕出席5月

19日李鵬宣布實行戒嚴的會議。這以後，趙紫陽就被排除出中共高層的政治活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5月19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

李鵬等強硬派之所以接連向萬里發出急電，要他繼續訪問，是因為在那幾天內，萬里是否回國，很可能關係到中共兩派鬥爭的結局。

萬里是改革派大將，與趙紫陽在進一步推進經濟與政治改革方面具有共同的思想與見解。作為人大委員長，他掌握著重要的立法大權，至少在名義上有權監督政府。雖然萬里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在中共十三大上，根據鄧小平意見作出的決定，國家主席楊尚昆與人大委員長萬里可以參加常委會的投票，必要時會起左右局面的關鍵作用。從法律上講，萬里完全有權召開人大，撤銷戒嚴令，改組政府，撤換總理，而這正是當時學生與許多知識分子要求人大與萬里所做的事情。

李鵬是十分擔心這種情況出現的，因此他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宣稱，實行戒嚴以後，「動亂製造者的一個重要鬥爭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會提前舉行會議，作出撤銷國務院戒嚴令的決定，並且進而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現政府。」

當然，如果萬里真的站在趙紫陽的一邊，回國召開人大，解除戒嚴，撤銷李鵬總理職務，一定可以平息學生與群眾的憤怒，緩和當時的緊張局勢，避免後來發生的那場危機。如果那樣的話，中國一定會出現完全不同的局面。

但當時中共黨內從上到下並未正式形成對立的兩派。儘管很多黨員以及高層人士同情與支持學生，反對武力鎮壓，例如軍人出身的葉飛副委員長就在人大副委員長聯席會議上拍桌子大罵李鵬，說中共建國四十年來的成就，幾天之內就給李鵬毀之殆盡了。但是萬一黨內高層分裂，實行攤牌，各級黨組織與廣大黨員真的被迫選擇一方的話，大多數人是否就會完全站在趙紫陽一邊來反對黨內強硬派，還很難說。

主要是因為鄧小平受到強硬派元老級人物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的包圍，鄧本人也傾向於採取鎮壓手段，趙紫陽當時夾在學生與保守派的中間，學生又不懂得暫時退讓，使趙紫陽可以向強硬派有所交代的策略，而讓趙處於兩面夾攻、左右為難的境地。論趙的權力地位與政治實力，當然遠遠不足以與鄧對抗。在這種情況下，要萬里回國和趙紫陽聯手起來與強硬派攤牌，違抗鄧小平，顯然沒有可能。

上海避風頭 高處不勝寒

萬里就是在這樣一種複雜的形勢下來到美國訪問的。

5月22日上午10時，萬里乘坐的專機飛抵華盛頓安德魯空軍基地。美國務院禮賓司副司長菲茲拉爾德與韓敘大使一起登機，陪同萬里及其夫人走下飛機，與排列在機場上的迎賓隊伍見面。美方人

員有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華盛頓軍區空軍司令羅哈奇准將、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幫辦威廉斯、中國處處長貝德等人，中方有大使館全體高級官員，以及一群華府華人代表。由於中國局勢與中美關係正處於變化的關頭，賓主都對前景感到不安，機場上的歡迎氣氛雖然顯得彬彬有禮，但似乎熱烈不起來。

萬里一行先到位於M街的麥迪遜旅館下榻。那是華盛頓地區一家著名的五星級旅館，國務院與它有約，經常在這裡接待外國來訪的貴賓。過去中國領導人來訪，大多數都在此處下榻。萬里夫婦被安排在一個價格昂貴設備豪華的總統套房。為了安全起見，附近幾個房間都由中方人員住宿。除了外出赴宴活動，萬里與夫人平時就在總統套房內用餐。

訪問第一天，萬里還是按照日程拜訪了奎爾副總統與貝克國務卿。在與貝克會談時，貝克表示了美方對中國局勢的關切，聲稱美國政府雖然支持中國實行言論自由與民主，但希望中國政府與學生都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避免流血。美國願意中國保持穩定，因為中國不穩定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希望中國能夠繼續進行改革開放，政治上能夠寬容，不要倒退，否則將對美國輿論產生不利影響。貝克還關切地問到了鄧小平、趙紫陽與李鵬的近況。

萬里除了一般地強調中美友好的重要性與此行抱有增進兩國關係願望之外，還在談到中國局勢時向貝克表示，當前在中國發生的問題「必須在民主與法律的軌道上解決。亂中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動亂不利於中國，也不利於美國」。他還說，中國已經注意到國際

上對中國局勢的關切。至於中國採取何種手段來解決問題，那是中國的內政。

傍晚，萬里先是出席了有華人參加的使館招待會，然後在使館進餐。可以感覺得出來，萬里雖然身在美國，然而心裡惦記著國內，表現得極為心神不定。他不斷地詢問國內有什麼最新消息，對中國政局演變的趨勢心裡無數，也無從了解趙紫陽在北京的情況究竟如何。

當萬里舉杯啜飲茅台時，門外的中國學生正在高呼「萬里回國，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維護憲法」。這幾句口號，正是中國留學人給萬里一封公開信裡所表達的基本觀點。該信要求立即召開臨時全國人大，討論緊急局勢，撤銷戒嚴，按照憲法第61條與62條的規定，改組政府，罷免李鵬，並組成特別調查委員會對官倒與貪污腐化情況進行獨立調查，公布事實，依法懲處。萬里雖然在使館接見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幾名代表，肯定同學們的愛國熱情，但是在國內局勢難以了解和預測的情況下，萬里必須言談謹慎，留有餘地。如果此時表態不當，走錯一步，無論往那邊靠，都會給他帶來不利的後果。

在加拿大訪問時，萬里面臨中國學生的責難，曾經表示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同情。5月17日與加拿大總督會見，萬里講話的調子曾明顯地傾向於肯定學生的愛國情緒，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現在看來，政治體制改革慢了一些，民主發揚不夠，群眾監督也不夠」。他還承認，學生、知識界和工人「要求

民主，反對腐敗，是促使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這一段話，顯然是承認了中共的缺點和學生運動的合理性。但是5月20日在加拿大向華人告別宴會上講話之前兩三個小時，當他得知北京已經戒嚴並看到李鵬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後，立即根據新的形勢發展，及時修改了自己的講話內容。

訪問美國的第一天晚上，萬里就不斷地思索究竟要不要馬上回國。

傍晚6時，他決定第二天會見布希總統之後當晚回國。但是到了晚上9點，萬里的隨行人員、外交部美大司司長張毅君又說可能有反覆，因為萬里聽說北京局勢有些緩和，又想留下來繼續訪問。最後，萬里決定讓使館通知美國務院，明天下午到白宮會見布希總統，但是不打網球，晚上就打道回府，結束訪美之行。

第二天萬里會見布希，在那樣的場面，雙方的心情和會談內容，已經主要不是如何推進中美關係，而是如何防止關係的進一步惡化了。

5月25日清晨3時，萬里經過二十多個小時的飛行，在愁雲迷霧籠罩下，懷著對國家和個人前景捉摸不定的心情，在人們睡夢中飛抵夜上海。按照中南海的吩咐，他的專機沒有直奔北京，而是暫停上海。

等候在機場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市長朱鎔基與市人大主任葉公琦上前表示歡迎。萬里的兒子，北京對外經委副主任萬季飛也

從北京趕來迎接老爸。在他們把旅途勞頓，憂心如焚的萬里送到賓館之後，萬里就知道了北京局勢的全部真相，也明白了他本人應當作出什麼樣的選擇。接著，新華社從上海發出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消息：萬里因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決定暫時留在上海治療。

5月27日，趙紫陽下台已成定局，鄧小平也已欽定了新的接班人，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經過兩天的休整，一個以萬里名義發表的聲明出現在中國的報紙上：

「由於健康的原因，我提前結束了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現在在上海治療。出訪期間，我一直密切注視著國內局勢發展。回國後，又從多方面進一步了解了國內的情況。」

「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決定，完全同意李鵬同志和楊尚昆同志5月19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

聲明還說，實行戒嚴，「對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國務院採取的這一堅定措施。」

既然萬里的調子已經跟李鵬完全一樣，背後有強硬派全力支持的李鵬，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再對萬里和全國人大可能會做出什麼對他不利的事情感到擔心了。

這個聲明發表之後，萬里的「健康」也就很快恢復，因而專機再次起飛。

5月31日，在北京機場上，萬里受到了吳學謙與彭沖兩位副委員長的歡迎。

這樣，萬里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原定的訪美行程只完成了大

約十分之一，就匆匆忙忙地趕回北京了。

啊，北京！你是多麼的神秘，多麼的不可思議。在那藍天之下，在那紅牆之內，你蘊藏著多少詭譎的風雲，又深藏著多少迷人的陷阱。雖然訪美之行未能完成，雖然那華盛頓巍峨的國會大廈與其大無比的五角大廈，那壯觀的甘迺迪航太中心，那聳入雲霄的紐約帝國大廈與自由女神，還在等待著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有朝一日前去參觀，不過，一場曾經孕育不測風險的災難，總算安全地躲過去了。登上「瓊樓玉宇」，方知「高處不勝寒」。對於這位人大委員長來說，在風雲變幻的時刻，無論如何，保持政治上的安全，總比出國參觀訪問重要得多。

第 6 章

鄧小平決策： 對內用武力，對外抗壓力

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巨大的悲劇，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幾十年來，由於內外矛盾交織而使中共政權面臨傾覆危險的一場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機，而鄧小平則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決策者與幕後指揮者的重要角色。

泰山崩於前而色變

作為中國僅次於毛澤東的政治強人，鄧小平一生中遭遇過無數次生與死的殘酷鬥爭和嚴峻考驗，在中共半個多世紀波濤洶湧的政海沉浮中有過「三落三起」的經歷：

在三十年代初工農革命根據地反對「左傾機會主義」鬥爭中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職務，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時期又重掌權力，二十多年後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在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後被打成「黨內第二號最大走資派」流放江西勞動，1973年又在

文革動亂中復出，擔任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在1976年春由於抵制四人幫而被打成天安門群眾紀念周恩來逝世的「四·五」事件「總後台」，四人幫倒台後又被全黨推舉為中共實際上的頭號領導人。

然而，鄧小平個人以前所遭遇的三次危機，其規模、影響與嚴重程度，顯然遠遠比不上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天安門事件中所面臨的危難局面。

首先，起因於要求懲治腐敗，實行民主改革的學生愛國運動，發展成為有廣大青年、知識分子、機關幹部、城市居民與各界人士參加的一場全民愛國民主運動，並且從北京擴散到全國各大城市，出現了政府與人民對峙的局面，使中共陷入了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政治危機。

其次，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主張對學生運動採取通過對話進行疏導緩解的政策，與強硬派的強力鎮壓主張完全相左，中共高層出現了嚴重分歧無法協調的對立局面。以陳雲、李先念、彭真與王震黨國元老為首的強硬派聯合起來，形成逼宮之勢，對鄧小平一再施加壓力，堅決要求採取有力措施對學生運動進行鎮壓，以至使攤牌不可避免。

另外，在國內政治危機不斷加劇日益惡化的同時，中國的國際環境與對外關係也發生了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於價值觀念與政治思想的不同，支持中國學生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對中國政府不斷施加政治、外交與經濟壓力。

東歐的演變與蘇聯內外政策的變化以及加速解體的過程，更使得中國原來利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來為自己謀取利益的外交謀略基礎發生動搖。由於中美關係日趨惡化，美蘇關係不斷緩解的趨勢，中國從七十年代初尼克森訪華以來，第一次處於既不能對蘇聯打美國牌，又不能反過來對美國打蘇聯牌的不利境況。

對於鄧小平來說，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孕育著極大風險與危難的局面。因為過去他所遭受的一切打擊與政治災難，只是涉及到他個人地位與權力的得失，而現在的危機所涉及到的，則是整個國家以及中共權力能否繼續存在下去的問題。如果說以往一切的危機，無論是韓戰、越戰、中蘇邊境衝突，或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動亂與林彪事件發生時，即使天塌下來也由毛澤東頂著，那麼現在整個中國的安危與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掌權的命運，完全繫於鄧小平一身，取決於他的決心和駕馭局勢的能力。

宋代著名作家蘇洵寫道：「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無論在南征北戰中出生入死，在國際鬥爭中面臨強敵，或者因為被政海波濤吞沒而有滅頂之災，鄧小平作為一個久經鍛鍊的革命家，從來也沒有在不利形勢面前低頭屈服或認輸退卻過。但是這回，「黑雲壓城城欲摧」、「山雨欲來風滿樓」，面臨如此複雜的內外形勢與重重危機，即使連鄧小平這樣具有鋼鐵般意志與決心的政治強人，也不能不感到力不從心，窮於應付了。

在5月15日人民大會堂歡宴戈巴契夫的宴會上，鄧小平明顯地

表現出緊鎖雙眉，心神不定，若有所思而又強作鎮靜的樣子。在從北京向全世界轉播的電視節目裡，人們都看到了鄧小平用顫抖的手給戈巴契夫挾菜時，因為握不緊筷子而讓一塊肉掉在餐桌上的尷尬鏡頭。甚至在他下令使用武力把這一場所謂「動亂」鎮壓下去之後，於6月9日接見戒嚴部隊時，仍然顯出他心有餘悸，說話翻來覆去，有時想不起要講的話，而由身邊的楊尚昆來提示的情況。

從匈牙利事件到天安門事件

鄧小平要進行決策，首先必須以內外形勢判斷為依據，而他的判斷主要有三條：

一、「這場風暴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二、「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三、「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用武器，用原子彈、氫彈，……現在搞和平演變」，「西方對中國也抱有同樣目的，他們不喜歡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

雖然這些話是在六·四之後說的，但是它們也完全反映了鄧在六·四之前的想法。從這三個判斷看來，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對

於中國出現的嚴重局勢與危機狀態，首先強調的原因是在別人而不是自己，主要來自外部而非內部，首先歸之於客觀而非主觀。

由於中共的基本信條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但要靠槍桿子來取得政權，也要靠槍桿子來保衛政權，一旦統治權力面臨威脅，其最後手段必然是以國家利益為名，搬出軍隊來保衛中共政權，以免落到別人手裡。

其實，鄧小平決定使用武力來平息天安門「動亂」的思路，可以一直追溯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當時作為中共中央的總書記，鄧小平曾經在1957年1月12日親自到北京清華大學去對學生講話，解釋中國為什麼要支持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的「暴亂」。

他首先認為，在匈牙利發生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因為匈牙利人民搞「大民主」，「結果匈牙利的元氣喪失了，不知何時才能恢復。」他說：「國營企業破壞了，生產下降了，損失大，結果是誰吃虧？是人民吃虧，因此大民主是要避免的。」

鄧小平還說，「蘇聯出兵挨罵，但不出兵也要挨罵，罵的更多。……不出兵會罵得更凶，子孫萬代都要罵；可以挽救不救，見死不救，居心何在？……現在罵，以後人民終究會不罵，還會覺得挽救得好。如果復辟了，就永遠罵下去，不可救藥了。」

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使用武力尚且如此支持，何況事情輪到中國自己頭上，如法炮製更加不在話下。鄧小平在1989年四、五月間中共高層內部就已指出：

「不能讓他們（學生）為所欲為。」

「必須準備好進行全國性的鬥爭，堅決鎮壓這次動亂。」

「我們有幾百萬人民解放軍，我們怕什麼？」

事實上，在鄧小平的面前，當時也只有兩種選擇：不是進，就是退。

由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幾萬學生只有高昂的激情而缺乏冷靜的理智，懷有追求民主的理念而不知道以什麼方式實現民主，沒有統一的思想、明確的綱領與有力的核心，很難形成一種懂得運用策略，能夠統一調度，進行團結奮鬥的理性力量。他們是用毛澤東思想的乳汁哺育起來，並經歷過文革風暴洗禮的一代。一旦接觸到外部世界，衝破意識形態的政治束縛，發現了自我和意識到自己的能量，眼看連國家總理也可以被毛頭孩子當面訓斥時，就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天真地以為民主可以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達成，其思想方法就像當年毛澤東以為中國強盛可以靠「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來實現一樣的簡單。而且，學生們還幼稚地以為，光憑舉拳舉頭就能把一個掌握著五百萬軍隊的共產黨推翻。

列寧說，「革命是人民盛大的節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熱氣騰騰，慷慨激昂，把這一場運動當作革命的狂歡節日一樣來過，很有點文化大革命再現的味道。所不同的是，從前人們是奉命造反，現在則是自發地造反。可是事態發展到後來，特別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最後日子裡，北京當地很多學生已經回家，天安門廣場上成了來京串連外地學生的集合地。許多人白天遊逛北京，晚上回來大

搞革命，天安門成了群龍無首，一片混亂的局面，誰也無法作主，誰也解決不了問題，誰也不知道會拖到什麼地步，會有什麼結局。

在當時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如果中共要退，只有一退到底，自動下台，政權解體，才能滿足對方的要求。因為學生中間已經提出了「打倒共產黨」、「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那個連自己也不知道憑什麼被推為「廣場總指揮」的小女子，甚至激動得痛哭流涕地主張要以流血來促使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的誕生。

這說明，到了那種地步，從對立雙方的任何一方面來說，流血都是不可避免的了。不是由中共動手鎮壓，就是由學生推翻中共，二者必居其一，其結果都同樣是非流血不可。人們不要忘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思想鼓動得頭腦發昏的「革命小將」們造起反來，殺起人來，哪有什麼理性、人性可言。如果那樣的歷史重演起來，暴力也同樣難以避免。只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不管是誰使用暴力，獲勝者總是正確的。

也許那個小女子是出於一片真誠，作出這樣的夢想。但要是她所嚮往的共和國真的在血泊中誕生，由「廣場總指揮」來取代鄧小平擔任共和國總指揮，哪怕只要一個星期或者一天一夜，中國不知道會亂成什麼樣子，對國家與人民會帶來什麼樣的禍福，其後果真是令人不堪設想。

一年以後，鄧小平1990年7月9日在會見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時，談到了如果當時中共實行退讓，中央政權解體，中國發生天下大亂之後可能出現的情形。他說：

「到那時黨已經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分散，沒有統一思想，沒有凝聚力。這一派抓這一部份軍隊，那一派抓那一部分軍隊，打內戰。如果新的內戰發生，多黨制、民主化搞得人心不穩，民主鬥士上台，慾念無窮，野心也永遠無法滿足。你容忍他一次民主，就會有幾百次；你容忍一個人犯罪，就會有幾百人、上千人、上萬人犯罪，控制不住。一旦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什麼人權？那時大家都忙於打內戰，各自為政，各霸一方，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農民沒有興趣種田，人都往外跑，往香港跑，五百萬人的香港受得了嗎？」

其實，鄧小平所擔憂的這些情況，除了沒有打內戰和大批難民外逃之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都已出現過。不過，當時雖然天下大亂，所有的人仍然掌握在毛澤東的鐵腕之下，而現在則是鄧小平成了頭號的反對目標。

天安門事件的前因後果是十分複雜的，不能僅僅從一個角度，以反映一個方面的觀點來加以評定。這是一個誰都不希望它發生而最終又無法避免的不幸事件。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無論從學生或從政府方面來說，他們對待與處理這個事件的動機與效果都是割裂與自相矛盾的：學生雖然有良好的動機，但最後並非出於自願地造成了使衝突無法避免的結果。政府採取武力鎮壓行動是錯誤的，但當時除此以外也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改變那種曠日持久的混亂局面。

人們在評價鄧小平悍然決定採取武力行動時，往往忽略了他所

認定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來恢復社會穩定，使已經取得顯著成效的改革開放得以繼續下去，以便加速發展經濟，實現使中國富強起來的現代化目的。

鄧小平說過這樣的話：「這次死他二十萬人，如果能把四化搞上去，也是值得的」。這個話聽起來非常可怕，簡直沒有人性，但很符合他的思想。因為鄧小平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在當時已經形成的形勢之下，唯有不惜付出慘重的代價才能控制局勢，避免惡性發展。至於他本人將來是否會背負遭受世人譴責為劊子手或屠夫的罪名，對他來說是無所謂的，他毫不在乎。

在對特魯多的談話中，鄧已經指出了這一點：「我們不在乎名譽好壞，真正在乎的是有一個好的環境發展自己」。在這一點上，鄧小平很像毛澤東。

對於鄧小平的決策行動與歷史功過，人們褒貶不一，可能永遠不會取得一致，大概最後只能有待於讓歷史來作出客觀、合理與公正的評定了。

要尼克森轉告布希：中國讓不起 美國須主動

天安門事件在國際上引起的強烈反應，完全出乎中國的意料，使中國對外政策與對外關係遭到巨大的衝擊與挫折，在國際上陷於空前的孤立。六·四過後的幾個月內，西方國家政要一概拒絕登

門，取消對中國的訪問。只有少數幾個亞非國家的二三流人物到北京來，受到李先念、李鵬、楊尚昆等人的隆重接見，但這只能更加凸顯出中國的國際孤立處境。

在接見戒嚴部隊之後，鄧小平消失了三個月，直到9月11日才出面會見外賓。鄧小平對國際形勢究竟如何評價與決策考慮，除了在這些外交談話中有所體現之外，主要見諸於一些內部談話。有時是與有關領導人見面時交代的，有的則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後，利用很短的空檔時間，就某些政策問題講幾句關鍵的話。如果有些重要的話被領導人反覆強調，就表明可能是鄧的指示。

總之，鄧小平六·四以後在國際外交方面考慮的主要問題，是國外反應如何，對中國有何影響，東歐蘇聯的局勢如何演變，中國在世局急劇變動中處於何種態勢，需要採取什麼對策。鄧的主要對策是採取強硬態度，把內政外交分開，強調中國政府對天安門事件採取什麼行動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中國決不會屈服於任何人的壓力，而對外交涉的主要對手是美國。

從1989年9月到年底的三個月內，鄧小平會見過的外賓有三位美國要人：尼克森、季辛吉與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三批日本人（包括前外相伊東正義），以及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李政道。除此以外，還有泰國總理差猜和前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由此可見，鄧最關心的是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後者主要是出於利用美日矛盾來牽制美國的目的。

鄧小平是在1989年10月底會見來訪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對

尼克森來說，在天安門血跡未乾的時候到中國去，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因為他不僅會受到美國公眾輿論的指責，而且也不知道北京態度如何。因此在啟程前三個多星期，他就先給鄧小平發了一封長信，提出訪問中國的目的，以及他要和鄧談的問題。尼認為，現在雙方就美國反應是否過度等問題進行爭論是「無補於事的」。因為很多美國人，包括中國的朋友在內，都認為中國的鎮壓行動破壞了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領導人的尊敬和信任。因此，他將向鄧當面說明美國對中國作出反應的原因，也希望鄧能同樣坦率地說明中國領導人對美國不滿的原因。

後來，兩人於10月31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一個半小時，但《人民日報》只報導了很少一部分內容。鄧小平首先對美國的制裁表示不滿。他說：「十幾年來，中國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情」，但美國對不久前北京發生的動亂陷得太深了。「中國是受害者，對中國進行指責是不公平的。」

鄧認為，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國政府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中國必須採取強硬態度，「在國際敵對勢力沒有收斂和犯罪分子沒有得到應有處理的情況下，我們將不會結束戒嚴，只有在西方七國結束對中國的制裁時，中國才能取消戒嚴，要等中國先停止戒嚴是不可能的。」

鄧還請尼克森捎話給布希：「我們之間不管怎麼爭吵，還是朋友」，希望中美兩國早日「結束過去，開關未來」，通過雙方努力來改善關係。鄧表示，中國可以考慮解決方勵之的問題，恢復富布

賴特計畫，取消戒嚴，對示威者實行大赦，但前提是美國必須結束制裁，恢復兩國高層接觸交流。他主張雙方「不爭論，做幾件實事」，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只能美國主動，中國不可能主動，否則中國站不住。」後來在宴會上，鄧又再次強調，「中方讓不起，沒有退的地方。美國沒有這個問題。美國大，我們小，你們沒有面子問題。」

尼克森在中美關係面臨危機時前往北京與鄧會見，是負有重要使命的。他是美國四位前任總統——雷根、福特、卡特與他——唯一在內外決策上對白宮有所影響的人。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稱，布希經常找尼克森談話，聽取他的意見，尼克森幾乎每個月都要跟布希或其他高級幕僚接觸。尼這次是否帶了布希的信件給鄧，白宮不肯證實，但承認尼在行前曾經與布希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過交談。而尼克森回到美國後，除了向白宮提交一份關於此行的報告外，還向參議院共和黨資深議員本遜、伯德、杜爾等人提出一份絕密備忘錄，認為中美雙方現在雖有難以彌合的分歧，但不應因此而使中美關係受到長期影響。他還列舉了恢復中美關係的七大好處，其中包括如果聽任戈巴契夫打中國牌會對美不利，防止核擴散需要與中國合作，中美關係有利於平衡蘇聯日本在亞洲的影響，中國具有潛在的巨大市場，中國下個世紀必然強大，美國不應使它成為對手，等等。

繼尼克森之後，季辛吉也於11月8日到達北京，會見中國領導人。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季辛吉在六·四之後不但從未公開批評過

北京，而且相當惋惜地為中國進行解釋和辯護。例如，他在六月中的西德《星期日世界報》上寫道：「我以一種痛苦的心情注視著中國的事件，就像對某個家庭懷有好感的人看到這個家庭發生爭吵一樣。」在另外一篇文章裡，他甚至為中國辯護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示威者佔領首都主要廣場達八個星期之久」，由於造成了「混亂和失去秩序」，使得進行鎮壓成為「不可避免」。

為了緩解中美關係，季辛吉連同美國前國務卿范錫（Vance）、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在國會山莊與二十名議員共進早餐，力圖勸阻對中國進行進一步制裁。10月4日，季在紐約會見前來參加聯大的中國外長錢其琛時，向他提交了這二十位議員的名單。他表示，他個人認為美國不應當捲入中國的內部事務，採取什麼樣的制度是中國的內政。但是美國政府無意改變中國的制度，更不想推翻中國政府。季辛吉認為，中美關係對世界局勢有重要影響，日本蘇聯都有可能成為美國的威脅，但是中國不會。他對中國有深厚感情，將竭力維護中美關係。據他估計，如果中國近期內不再出事，美國在年底之前有可能會取消制裁。

11月10日，鄧小平會見季辛吉，表示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誰要走回頭路，誰就會垮台」。對於中美關係，鄧以責備的口氣對季辛吉說：1971年尼克森訪問中國時，「中國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四人幫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那時美國都可以接受（中國），為什麼我們現在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美國反倒不能接受？」

鄧指責說：「美國確實有人希望中國動亂。你只要查一下『美國之音』前兩三個月的報導就可了解」，「我跟布希講過，美國在中國動亂中捲入太深了」。

鄧小平和中國領導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尼克森、季辛吉的作用，把他們請到中國來面談，是因為他們都以為這兩位美國前政要依然能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而且在布希政府班子裡還有不少舊部，可以為維護中美關係說話。所以中南海不久以後通過駐美大使朱啟禎向尼克森與季辛吉傳話，對他們兩人的見解與努力表示「欣賞」和感謝，希望他們繼續運用其影響力推進中美關係早日恢復發展。

鄧小平這樣做，既高估了兩人的影響力，又低估了美國對中國事態強烈反應的程度，以為美國少不了中國，通過尼季兩人對布希表達強硬立場，曉以利害，就能使布希知難而退，放鬆對中國的壓力。他又高估了中國承受西方制裁的能力，而對天安門事件在美國人民心目中造成的深遠影響及其對布希政府的壓力完全估計不足。比如他說：「1980年我們取消了民主牆，外國人不是照樣跟我們做生意嗎？」

其實，深居中南海或北京西山的中國領導人，很難了解資訊時代電子媒體傳播資訊與影響輿論的驚人作用。據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的一項調查，美國三大電視網在1989年前六個月內總共發了近六百條中國消息，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十二倍。其中從四月中旬到六月中旬，中國新聞佔三大電視網頭條消息總數的四分之一。六·四以後的五天內，在傍晚黃金時段節目中收視中國新聞的美國人，達到

全美人數的四分之三。而著名的CNN有線電視則更是集中全力報導中國事態發展，其報導數量與規模只有美國大選年的兩黨代表大會與登月探險才能相比。

因此可以這樣說，美國與西方各國的人們從電視上看到的天安門現場情景，要比中國領導人自己在北京了解的情況更迅速、更實在，也更有切身感受。不管鄧小平怎麼強調天安門事件是中國內政，不容他人干預，但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國人從螢光幕上看到的活生生的事實，是軍隊在開槍，人民在流血，是一幕幕血跡斑斑的慘象。不管在天安門或者其他地方，也不管死傷一萬人、一千人，或者一百人，都改變不了事態的嚴重性質。大多數美國人幾乎在一夜之間完全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出於對人權和民主自由的理念，美國人民也決不可能因為中國政府強調這是中國內政，反對外國干預，就對天安門事件保持沉默。而這種強烈的民意，對於美國對華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壓力，作為總統的布希，決不是鄧小平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可以毫不考慮國內反應而隨意向中國讓步。

因此，即使尼克森與季辛吉，也回天乏術，挽回不了陷於危機的中美關係。

韜光養晦 站穩腳跟 沉着應付

儘管如此，鄧小平深深地了解到中美關係對於中國的重要性。

中國要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不能不需要美國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中國要提升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也少不了與美國的合作。而且在世局劇變、大國外交牌局在重新洗牌的時候，中國手裏的王牌正在逐漸消失。第三世界國家小貓三隻四隻，沒有多大能量，不可能為了幫你中國而聯合起來對付美國，蘇聯自己要拉攏美國，決不會拉中國而得罪美國。要對付美國，主要得靠中國自己的力量與手段了。

因此，鄧小平對美國採取強硬態度是有目的、有限度的，是與陳雲、李先念、王震、姚依林這些黨內強硬派有所不同的。後者因為天安門事件而把美國當作主要敵人，為了防止「和平演變」而使中美關係破裂也在所不惜。鄧的目的則不是要使中美關係繼續惡化破裂，而是要使它恢復正常，但不能用退讓屈服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

因此，鄧小平對付美國的策略與手腕，頗為類似中共從前對付國民黨的策略，就是以鬥爭求聯合，準備最壞的，爭取最好的；就是首先頂住壓力，不惜對抗，但又要竭力避免對抗。鬥的目的不是要破裂，而是要聯合，要把中美關係扳回到正常、和好、交往與繼續合作的道路上來。

所以，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召開的中國駐外使節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的重要指示：「對美國採取什麼態勢很重要。不要怕，要立場堅定，禮貌周到。用軟弱態度不能穩定關係。硬一點，反而能促使它轉彎子。」

這短短幾句話，目的與手段都講得很清楚。它十分明顯地表現了鄧小平作為飽經憂患、高瞻遠矚的戰略家，在如此危難、多變而混亂的世局中，能夠一下子抓住問題的核心與關鍵，定出對美外交的基調與策略。

半年以後，中國外交部又在一份全年形勢分析報告中引用鄧小平的「二十四字令」對外政策方針，就是後來流傳出來的，「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沉著應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數。」

鄧小平用「韜光養晦」四個字來形容中國對外政策，是很恰當的。在中國古代，「韜」是用來裝弓箭或刀劍的外殼，「晦」是光芒，「韜光養晦」亦稱「韜晦」，含有收斂鋒芒、隱蔽才能之意。《晉書》曰：「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鄧要中國「韜光養晦」，表明在時運不濟，國際形勢不利的情況下，要對外採取低姿態，收縮力量，首先致力於穩定國內局面，等待內外條件改善，立足基礎更加穩固時再開拓新的局面。

根據這種策略，鄧小平在1991年秋天又提出了對美政策的「十六字令」，即「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避免對抗」。雖然直到1992年11月江澤民會見美國大選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國會議員團時才首次公布這一方針，而且外界都以為這是江的獨創，但實際上這是鄧在一年之前就已提出來的對美外交方針。

根據這種策略，鄧既反對在蘇聯加速演變與衰落時公開批判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也反對中國在第三世界高舉什麼旗幟，做什麼帶頭人。

事實證明，鄧的這套策略，對於改善中國國際處境，積蓄自己力量是有利和有效的。

到了1992年初，中國頂住了美國的壓力，美國陷入嚴重財政困難，蘇聯因國力衰退危機深重而宣告瓦解，中國改革開放繼續前進，軍隊因為抗洪搶險立功而改善了自己的形象。這種內外環境的變化，不禁使鄧小平發出高興的歡呼：「蘇聯垮台幫了我們的大忙，壞事變好事。不要驚惶失措，沒有人能把中國搞垮，我們站住了。」

關於鄧小平究竟如何運用策略，對付美國，開展外交，其效應又是如何，這將在以下幾章內論述分析。

第 7 章

布希與中國： 「情結」變成了「死結」

六·四天安門事件使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幾乎滑到了對抗與破裂的邊緣。

在錯綜複雜的危急情況下，中美兩國領導人究竟如何判斷局勢，摸清對方意圖，進行重要決策，既要應付對手以至各自內部的壓力，又要避免局勢失控，力求防止關係破裂，這無論對鄧小平或對布希來說，確實是個棘手的難題。

自從尼克森1971年訪華以來，在中美關係近二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布希大概可以說是最具中國情結，最看重中國作用，也最願意與中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的一位美國總統。跟尼克森、福特、卡特與雷根有所不同的是，布希不但有過一段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外交生涯，對中國情況發生濃厚興趣並有切實的了解，而且他在跌宕起伏的中美關係中，有過一落一起，一起一落，跟中國密切相連的親身經歷。

韓敘官邸的聖誕晚宴

如果把布希與中國關係的一落一起與一起一落比作中美外交戲劇的四幕場景，在這裡加以展現的話，我想首先應當把鏡頭的焦距對準華盛頓西北麻薩諸塞大街附近使館區的一座白色小樓，看一看布希與中國不同尋常的關係。

那是S街2301號的韓敘大使官邸。

那是1988年12月22日，聖誕節前夜的一個晚上。

寒冬裡的官邸溫暖如春，花團錦簇，燈火通明，洋溢著熱烈友好的氣氛。原來是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布希夫婦祖孫三代一家，包括表親，一共十八口人，浩浩蕩蕩地開到中國大使的官邸來歡度一個中國式的聖誕佳節。

因為那天白宮的日程中有這一項活動，美國記者就要求來進行採訪。但中國大使館說這是私人活動，加以婉拒。實際上白宮也不想讓記者來找麻煩，幾個粗壯的保鏢嚴嚴地把守著大門。

客廳裡陳列著幾幀布希夫婦與韓敘夫婦合影的照片，不時傳出朗朗的笑聲。小宴會廳裡只能擺兩張圓桌的宴席上，賓主杯觥交錯，盡情地享用著豐盛的中國佳肴。而那作為甜食最後端上來的香甜可口的糯米湯圓，似乎象徵著各自代表中美兩個大國賓主之間的融洽關係。

晚宴從7時開始，一直進行到9時才結束。為了助興，韓敘夫人特意請了使館一位當過歌唱演員的外交官夫人，在宴席過後為賓主

演唱中美兩國的民歌。除了*Holy Night*，*Ginger Bell*等這些傳統的聖誕歌曲外，還按照預先改編好的歌詞，唱起了寄調美國民歌「你是我的陽光」(*You Are My Sunshine*)的歌曲：

青青友誼樹，茁壯在成長。
多虧了園丁，辛勤地培養。
展望那未來，下一個十年，
充滿了陽光，希望的陽光。

在華盛頓這個世界外交中心所在地，堂堂美國總統移樽前來一個外國使節官邸過聖誕節，無論是美國與它的母國大不列顛、歐洲的北大西洋盟國，或者東方的盟友日本，都是絕無僅有的，更不用說其他任何中小國家了。駐華盛頓一百多個國家的使節，看到韓敘得天獨厚，享此殊榮，真是羨慕死了。而布希的這份情誼，則是充分表現了他對中國的重視，與中美之間存在的良好關係。

那天晚上，韓敘特意打了一條鮮紅的領帶，出身大家閨秀的夫人葛綺雲則穿了一件在上海特製的玫瑰色中式旗袍。

韓敘掩不住喜悅的心情，對布希夫婦說：「你們來，表現了對中國的親切感情。因為你們在中國工作過，生活過。我們把你們當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待。」他還特別深情地表示，在布希競選總統時，他始終注視著電視上的有關報導，有時看到深夜，為布希的選情操心。而且，韓敘還告訴布希，鄧小平在北京已經向來訪的美

國國防部長卡盧奇表示，他也要投布希一票。

布希也非常開心，這種熱烈而又親切的場面，不禁使他回憶起了當年。他自問自答地說：「你還記得十一年前在揚子江上我們從四川泛舟而下的情景嗎？我就是在那時決定競選總統的」。

是的，1977年，在那金色的秋天裡，布希夫婦重訪中國，同行者除了有後來任駐華大使的李潔明與國務卿貝克之外，還有《華盛頓郵報》記者布勞德與老播音員湯馬斯。他們一行，在韓敘陪伴下，從北京到成都，然後在重慶登上遊輪，順流而下。一路上，層巒疊翠，水碧峰青，景色美不勝收，真是「滔滔長江水，悠悠遠客情」，即使歲月消逝，又怎能忘懷此情此景呢？

在聖誕晚宴的僅僅一個半月之前，布希以四比一選票的壓倒優勢，擊敗民主黨對手杜卡吉斯，實現了他從政二十多年來的夢想，當選總統。雖然還要等一個月才能入主白宮，但是此時此刻，他已經有所腹謀，在進行美國內外政策的構想了。布希當選總統，正好是中美兩國建交十年之際，因此，如何推進下一個十年的中美關係，顯然是他優先考慮的問題。

布希對韓敘說，他對美日關係很關心。如果明年天皇逝世，他將去日本弔唁，準備順道訪問北京，可以不拘禮節，主要是想見一見鄧小平。不過，他說，這個想法還沒有跟國務院商量過。

布希還問起鄧小平、趙紫陽、楊尚昆、李鵬與萬里的近況，表示明年要邀請萬里到美國訪問。他說，中美關係是美國外交的一個基點，美國將遵守中美三個公報，致力於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美中關

係。布希還表示歡迎中蘇改善關係，說現在打三角關係牌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上次他見到戈巴契夫時，戈對他說，你應該趁鄧小平還在時到北京去看看他，表示中蘇改善關係不會損害美國利益。

談起美國新的駐華使節人選，布希說很多人在爭這個位置。他認為這個人選應該和總統有密切的關係，能夠代表總統，他將任命一個中國熟悉並會使中國滿意的人去擔任大使。

福特要他當大使 不愛倫敦愛北京

布希曾經當過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在1971年10月間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發生過一場支持和反對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激烈爭奪。布希由於力圖阻止中國進入聯合國遭到慘敗，在看到投票結果後氣得直跺腳，甚至罵出了“Son of Bitch”（他娘的）的難聽話。但也許正是這場「滑鐵盧式」的外交慘敗，使布希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了中國在國際上的份量，而作出了將來要參與中美關係的決定。

因此，當以喬冠華副外長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於11月15日從北京來到紐約，第一次出席聯大會議的時候，布希為了擺脫以敗軍之將身份與他見面的尷尬處境，故意在喬冠華即將到達時，站在會場入口處的走廊裡打公用電話，然後假裝碰巧，由聯合國的禮賓官員出面打圓場，介紹給中國代表團認識，算是雙方接觸的開始。

後來，當許多國家的代表一個接著一個登台講話，歡迎中國加

入聯合國時，布希也改變調子致詞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到來，使聯合國更能反映當前世界的現實情況，他並且說：「美國人和中國人有著長期的友好聯繫。美國相信，只要（中國）重新獻身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我們就能促使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實現。」

在聯合國當了三年代表，布希回美國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正好碰上水門事件，搞得焦頭爛額，不想再幹了。尼克森下台後，由福特副總統繼任。福特在國會眾議院當過多年共和黨領袖，不但和布希（1966～68曾任眾議員）共事過，而且與布希的父親普雷司考特（1952～63年任共和黨參議員）的交誼也很深。

出於這樣的背景，為了酬謝布希在處理水門事件中的功勞，福特當政之後就把布希找了去，讓他在駐英大使或駐法大使兩個美差中間任意挑一個。誰也沒有想到，布希居然對兩者都不感興趣，唯獨挑上了北京。福特當時背靠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總統座椅上抽煙斗，聽了布希的話幾乎難以相信，把煙斗從嘴裡拔出來，帶著疑惑的口氣問道：「北京？」

沒錯，是北京。布希對北京情有獨鍾，表明他很有眼光。因為在布希看來，駐節倫敦或巴黎，固然是一流的外交差使，但在那種地方，搞外交主要是交際應酬，耍嘴皮，喝香檳，很少可能在外交上開拓什麼新的局面。而北京對於西方世界來說，這時還蒙著一層厚厚的神秘面紗，多半只能從外部捉摸它，而更重要的是要進到裡面去對它進行日常的觀察。這個仍然陷於文革動亂中的、正在興起的東方大國，在毛澤東統治下究竟會如何發展，走向何方，它跟蘇

聯與美國的關係會如何演變，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外交新領域，使布希大可施展一番。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北京更具有挑戰性，是很少人知道的地方」，芭芭拉也認為，「這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一個新的冒險」。

於是，在1974年10月2日，布希夫婦帶了他們寵愛的小狗弗雷德，除了隨身行李之外還帶了十七箱罐裝狗食，經由阿拉斯加與日本飛往中國，如同當年馬可·波羅於1295年離開威尼斯遠航到中國去那樣，開始了他們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險之旅。（註：參閱布希夫人芭芭拉回憶錄：*A Memoir: Barbara, Lisa Drew Book, 1994*）

到了北京，布希夫婦住在建國門外秀水街使館區的美國大使館內。中國外交人員服務局為他們的官邸配備兩名服務員，兩名清潔工和兩名廚師。開始的時候，布希夫婦對中國食物還不熟悉，當廚師頭一次端上一道菜時，兩人不禁看了發愣。因為盤子裡盛的是一段段兩寸長、滑膩膩、灰白溜球，看上去好像橡皮似的東西。布希和芭芭拉不知道這玩意兒究竟是什麼，也不敢下筷子，捉摸著怎麼對付它才好：要是讓廚子把它端走，怕他掃興；或者乾脆把它倒進抽水馬桶裡沖掉，假裝已經吃下去了。商量結果，還是把這道菜留了下來，表示他們不愛吃。廚師看到他們沒有胃口，覺得既可惜又抱屈，告訴他們，這叫海參，是中國宴席上必不可少的高檔菜，價值美金二十五元一磅哩。

布希的前任老外交家布魯斯，因為聯絡處主任不算是代表國家元首的特命全權代表，一向保持低調，盡量減少對外接觸，包括參

加外國使團的活動。但是布希來後，作風大不一樣。他認為自己的使命是「要了解中國人，也讓中國人了解美國人，建立個人之間的聯繫」。

因此，他和夫人芭芭拉一改前任甘心坐冷板凳的作風，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學中文、上教堂、打網球、逛商店，甚至買了兩輛天津產的「飛鴿」牌自行車，夫婦兩人騎著到處走街穿巷，盡量設法跟中國人接觸。他們還常常離開北京，到上海、南京、無錫去旅行，在夏日裡到北戴河避暑勝地去度假。

當然，也不放過機會去參加外國使館在北京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以便獲得與中國各界的代表人物接觸。但遺憾的是，芭芭拉在她的回憶錄裡寫道：他們發現，每逢這種場合，前來參加招待會的「這些中國人很快地就圍著（自助餐）餐桌認真地吃起來。我們試圖跟他們談話，發覺他們來是為了吃，而不是為了跟人談話」。

除了每年十月初的中國國慶節日活動之外，布希夫婦一般很少能見到中國的領導人。但是1975年10月，季辛吉來訪時布希卻有機會進入中南海見毛澤東。布希說，「中國是季辛吉個人外交的領地，是他進行偉大外交探索的地方」。每次他來，不是毛澤東，至少也是周恩來，都要接見他。10月21日，作為季辛吉的陪同人員，布希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遠遠看上去，我對他的健康狀況感到吃驚」，布希事後寫道。

當季辛吉問起毛的健康時，毛指著自己的腦袋說，「這部分工

作正常，我能吃能睡」，然後又指指大腿，「這部分不大好使，走路有時站不住。總之，我的身體狀況不大好。」

過了一會兒，毛突然說，「我很快要見上帝去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帖。」

季辛吉不禁一怔，不過他馬上勸告說：「可不要馬上就接受上帝的請帖」。

毛澤東因為說話不方便，就用筆寫在紙上回答：「我接受博士的命令。」博士，DOCTOR，在這兒是既指季辛吉也指醫生的雙關語。

在他們臨告別時，毛澤東衝著布希說：「這位聯絡處主任上任後，為什麼不到我這兒來看看？」

布希有點受寵若驚，連忙回答道：「能見到您我不勝榮幸，我只是怕您太忙。」

「我一點兒也不忙」，毛澤東最後說，「國內的事我不管了，我只看看國際新聞，你早就應該來了。」

沒有想到的是，見過毛澤東一個星期後，布希忽然收到華盛頓發來的一份只供一閱（For eyes only）的急電，召令布希回國去接替威廉·考爾貝，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

本來福特答應布希去北京當聯絡處主任時，生怕他將來會後悔而要求他至少在中國幹兩年。誰知現在布希幹得正津津有味時又要調他回去，而且是當中央情報局長，這實在使布希感到意外和困惑。

「在那個時候，中央情報局因為濫用權力而遭到批評，正處於一個很不光彩的時期」，芭芭拉在她的回憶錄裡寫道。究竟如何是好，布希夫婦對這個新的任命商量了很久。除了發電報回去徵求長子喬治的意見之外，布希還特意寫信給他的四位同胞兄弟姐妹普雷斯、布克、南賽與約翰。從這封信裡，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項新任命的猶豫和複雜心情。

布希首先要他們相信：「我並沒有去尋求這項工作，它是一星期以前自己找上門來的。」

他承認，擔任中央情報局長，等於進入一塊「政治上的墓地」，不僅因為它是政府中最棘手的工作，而且它所幹的往往不是「乾淨的令人喜愛的行當」。

但是，布希又在信裡為這個差使辯解說，「這個世界是一個嚴酷的、不擇手段的世界，美國必須保持強大。」

他說，他一接到調令就想起了他們的老爹（Big Dad）普雷司考特。要是他活著，他會怎麼想呢？

「我想他會說：這是你的責任。因此，這是我的責任，我應當去幹。」於是布希就這樣作出了抉擇。

入主白宮先訪中國 鄧小平大罵北極熊

布希在北京當美國聯絡處主任的1974~1975年間，正是中國政

局風雲詭譎、激烈動盪的時期。鄧小平在1974年10月復出，又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被四人幫再一次打倒。作為實際上的美國大使，布希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很多機會見到鄧小平。但是他很了解鄧小平的領導能力與水平，在中美蘇大三角中運用自如的韜略，毛澤東與周恩來對他的倚重，以及他在中國黨政軍與人民中間所享有的威望。布希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鄧小平是中國正在興起的力量，很可能會在毛澤東與周恩來之後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

從駐美聯絡處主任被調任中央情報局局長這個角色，中國當局會怎麼看他，會不會使他受到中國的鄙視甚至敵視——布希雖然沒有去摸中國的看法和意圖，但總覺得有點不大光彩，更不便主動要求向中國的主要領導人辭行。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當鄧小平知道布希要調回美國去當中央情報局長時，不但沒有任何責備非難之詞，反而邀請布希去跟他會面，並且親自設宴為他餞行，當面說了很多稱讚布希與希望他為促進中美關係繼續努力的好話。

布希受到如此禮遇，真是喜出望外，他不但內心對鄧小平表示十分感激，而且從中看到鄧小平的闊大胸懷和對中美關係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布希後來對鄧小平懷有的尊敬、欽佩和親切之感，與鄧小平在布希離別之前的這次會面有很大關係。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在使館內部以及私下對本書作者曾多次談到過這一點。

正是因為這樣，布希一當選總統，在外交上想到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到北京去會一會鄧小平。在1988年12月22日韓敘官邸那次聖誕

過後不久，布希派已經內定擔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在1月11日下午登門拜訪韓敘，正式通知中國大使，布希定於1月20日就任總統，兩三天後赴東京為1月7日逝世的日本裕仁天皇進行弔唁。而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要到北京去會見鄧小平。

1989年2月25日，布希夫婦一行在下午四時半到達北京。對他們來說，重訪中國，除了從事一項重大外交活動之外，簡直還有點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味道。從十五年前的聯絡處主任到今天的堂堂美國總統，其權力地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當年中國還如此厚待布希的話，現在中美關係和他本人在中國的份量就更重要了。

北京那天天色陰沉，太陽躲在雲層裡邊不肯出來迎賓。但是布希夫婦受到了像節日一般的隆重歡迎。他們在警車開道與一長列車隊護衛下從機場經過市區來到天安門廣場。長安街兩旁的燈柱上，飄揚著五星紅旗與美國星條旗。平時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自行車，已經被穿著色彩斑斕衣服的夾道歡迎隊伍所代替。人們舉著中美兩國的國旗，向布希的車隊進行歡呼。布希夫婦特意下車來與歡迎的人群打招呼。無數的攝影機隨著他們而轉動，拍下了許多動人的場面。

「當我們在北京生活的時候，確實從來也沒有想到過，我們會有一天看到這種歡迎場面。這樣子回來，可真了不起」，芭芭拉這樣高興地回憶起他們那次重訪的情景。

在北京兩晚一天的訪問日程中，布希要先後與楊尚昆、李鵬、

鄧小平、趙紫陽會談，參加歡迎晚宴、午宴與告別宴會，上電視台發表講話，27日一早就搭專機離開北京。

布希最重要的訪問活動，當然是與鄧小平會談。在26日上午9時開始的與李鵬的會談中，布希就已談到了他對鄧小平的看法。他說：

「鄧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於思考全球性重大問題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鄧也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我的夫人結束在北京的任期時，鄧小平為我們破例地舉行小型宴會的情景，使我們至今難以忘懷。現在我作為總統來到中國，不會忘記當年鄧小平給我的禮遇。」

26日上午11時，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布希。在他們開始會談之前，有五分鐘時間給記者照相。就在這短短的五分鐘內，兩人進行了以下的交談：

鄧小平：「我衷心地歡迎你！」

布希：「你非常健康。」

鄧：「你很辛苦啊！」

布：「我們長途跋涉，但是不感到疲勞。」

鄧：「你是一名運動員，所以身體好得很。」

布：「我每天都想騎自行車活動活動。」

鄧：「是啊，你這個喜好好得很。我們還有個同好，就是打橋牌，我們可以當個夥伴。即使我們在橋牌上是對手，也是好朋友。」

布：「我很久前就放棄打橋牌了，因為太難，太複雜了。」

鄧：「現在你打橋牌就更困難了。我知道美國總統不好當。每天的事情多得很，恐怕是世界上最忙的冠軍。」

布：「是比較忙，但是非常有意思。這次訪問中國雖然時間很短，但是進行得很好。」

鄧：「工作訪問，禮儀方面就從簡了。希望以後適當時候，你認為適當的時候，到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布：「非常感謝您對我提出這個邀請。下次來，我一定找機會到外地走走。」

鄧：「但是我認為你這次工作訪問，雖然只有兩天，比正式訪問還重要。」

五分鐘很快過去，等記者退場，雙方就座後，鄧小平就先談起來。他一開始就肯定中美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並且讚揚布希本人在發展兩國關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認為發展中美關係的潛力很大，中國領導人都希望使這種關係在世界新的格局下更好前進。因為戈巴契夫不久就要訪問中國，鄧小平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向布希解釋中國對蘇聯與中蘇關係的看法。

布希當然明白鄧小平的意圖，所以接著就表示：「現在世界上發生很多變化，為我們提供了機會與挑戰。報紙上有人說，我訪問中國是因為戈巴契夫要到中國來。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我來訪是因為我同意你對我們兩國關係的看法，兩國關係有很大的潛力。美國國內對中美關係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正因為中美關

係已具有自身的價值，我們才能再來討論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挑戰。如蘇聯的變化、1992年歐洲共同市場的一體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問題。這也就是我就任總統以後就來訪問中國的原因。我們有分歧，都是一些小問題，可以進行討論。但分歧點遠遠少於共同點。我向你保證，在我四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要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鄧小平說：「中國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對維護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情。」不過他仍然認為，和美蘇關係一樣，中蘇之間也是問題成堆。接著，鄧小平就給布希上了一堂有關中蘇關係的歷史課。他說：

「中蘇之間不僅積累的問題很多，而且有很深的歷史根源。中國人是很重視歷史的。中國遭受外國列強的屈辱、侵略與干涉，從鴉片戰爭起有一個半世紀。在這段時間內，列強都給中國人民造成了不小的損失。但算總帳，使中國受害最大的是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一個是從沙俄到蘇聯。而戰爭的結果，從中國得到實利最大的是沙俄與蘇聯。日本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最大，損失幾千萬人，用金錢是無法計算的，但日本最後沒有得到中國領土。」

鄧小平的最後結論是，在侵略中國的所有列強中，俄國與蘇聯占的便宜最多。他對布希算了一筆老帳：「從沙俄到蘇聯就不同了。到二次大戰結束時為止，它得到的實利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沙俄一百五十萬，史達林時把幾百年以前就屬於中國的外蒙古分割出去，現在叫蒙古，實際上受蘇聯控制，面積也有一百五

十萬平方公里，合起來總共有三百萬平方公里。」

鄧小平認為，自從中蘇關係惡化之後，蘇聯對中國奉行的戰略是：「除了對付美國與其他國家以外，就是對中國實行包圍。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了一百萬軍隊，三分之一擺在我們面前。」

「打開中國地圖看看，外蒙這一塊被割去了。對中國是什麼樣的戰略態勢，很清楚，這是一種對中國十分不利的戰略態勢，是個威脅。二次大戰末，蘇聯日本在中國東北打仗，蘇聯就是利用這個態勢，從外蒙古和東北夾擊，把中國東北一分為二。」

鄧小平還更具體地描繪了蘇聯對中國構築軍事包圍圈的圖景。他說：

「從赫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蘇聯完成了對中國的包圍圈。北邊西邊有蘇聯軍隊，包括導彈部隊。南邊有印度、越南，東邊利用在北朝鮮取得的戰鬥機領空通行權，一直延伸到（越南）金蘭灣。蘇聯飛機常常從海參崴起飛，沿中國海岸進行勘察活動。這怎麼不使中國感到威脅來自蘇聯呢？」

在講了這一大通話之後，鄧小平又自問自答地說：「難道這樣的歷史，能寫出一篇文章來談中蘇兩國什麼親密關係，恢復到五十年代的盟國關係嗎？寫不出來。」

鄧小平侃侃而談時，布希一直在洗耳恭聽。對他來說，這真好像是「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使他對中蘇關係的來龍去脈和中國對蘇政策的思想脈絡，有了透徹的了解，而且也對中蘇關係改善的前景有所放心。因此，鄧的話一結束，布希馬上接著說：

「這個一小時，對我和在座的美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我們來說，了解這一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我們將就蘇聯問題作出重大決定。我們可以向您保證，我們所做的任何決定，不管是有關戰略武器、常規武器或任何其他問題的決定，都不會只對西方有利，而損害中國利益。」

2月26日中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宴請布希。萬里、李先念、姚依林、吳學謙、錢其琛參加。鄧小平覺得在介紹中國情況方面意有未盡，所以在宴會上又就改革與民主的問題發表意見。他說：「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是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國有一兩百年的選舉經驗，如果我們現在搞十億人的選舉，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混亂局面。年輕人各執己見，就會出現毛澤東說的全面內戰，內戰不一定需要槍炮，用拳頭木棒也行。」所以，他認為，「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不能用西方發達國家的觀點來判斷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

在六·四風暴中受到兩面夾攻

布希與鄧小平在坦率而又親切的氣氛中進行的這次會談，使中美雙方都感到很滿意。布希覺得中美關係又進了一步，前景充滿著陽光，使他更有信心去和戈巴契夫打交道，在新的形勢下推行美國

的全球外交。鄧小平則覺得中國已經打了多年的「蘇聯牌」，在國際形勢正在變動時對美國依然有效。由於布希十分重視中國，鄧小平相信，在他當政以後，中美關係大概可以更上一層樓了。

但是誰能想到，布希離開北京返回美國不到一個月，由於中國學生反對腐敗要求民主運動的日益發展，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學生與政府對立的局面。隨著運動規模的擴大，以及學生與政府對抗情緒的激化，在美國公眾中引起了強烈反應。由於華盛頓在時差上比北京早十二個小時，白宮在6月4日天安門事件發生的當天就發表聲明說，布希總統「對使用武力反對和平示威者的決定深為悲痛」。

第二天，布希舉行記者招待會，強烈譴責中國當局血腥鎮壓學生群眾，呼籲中國政府「避免使用暴力，恢復原來的克制政策」。與此同時，他還宣布了對中國進行制裁的兩項具體措施：立即停止美國官方與民間對中國出售武器，暫時停止美國與中國的高層軍事人員交流。布希還說，他的決定雖未包括經濟制裁，但保留「在暴力行動升級時，重新審議整個形勢的權利」。

當天中午，布希在白宮接見了經過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挑選的在華盛頓地區的四名中國學生：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賈浩、馬里蘭大學的趙善陽與史正富，以及喬治城大學的韓小興，向他們表示了對中國學生運動的支持與慰問。

下午，布希在白宮會見國會兩黨議員，眾院民主黨領袖弗利表示，國會議員都支持布希總統採取的行動。布希認為，既不能對中國的暴力行動予以姑息，但也不能從中國撤回大使或斷絕外交關

係。他說，美國大使必須留在北京密切注視事態發展，這是重要的消息來源。

布希當時最發愁的是如何與北京接上聯繫，與中國領導人互通信息，了解中國局勢的真相，以便作出判斷，向美國公眾表示美國政府的看法和立場。

因此，6月7日上午11時50分，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後來擔任中央情報局長的蓋茨電告韓敘大使，布希總統希望在當天下午6時以前與鄧小平通話，請中國使館把布希的這一要求轉告國內，幫助安排。但此時北京形勢危急混亂，黨內高層關係緊張，鄧小平不願意對美國總統作出任何姿態，布希碰了一個硬釘子。下午3時，中國大使館收到外交部美國與大洋洲司的回電，請其轉告美方，中國領導人沒有與外國領導人直接通話的習慣，布希的要求無法安排，美方有事可以通過中國使館與北京聯繫。

布希本想在當天晚上黃金時段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向美國公眾表明，他和中國領導人仍然保持著接觸，但是北京的回答卻使他十分難堪。當有記者問，既然他與中國領導人有私交，為什麼不跟他們通話時，布希只好無可奈何地說：「我們想分析中國國內局勢，但很困難。我今天確實想跟一位中國領導人接觸，但是電話打不通。」

又有記者問他有沒有關於鄧小平的下落與信息，布希只好坦率地承認：「我是想說我不知道。我也想說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局外人誰也不知道。中國的體制就是這樣運作

的。」

但布希顯然是想把鄧本人與天安門武力鎮壓的行動加以分開，並對鄧有所保留。在6月5日宣布對中國進行第一次制裁時，布希就為鄧小平說了好話，指出鄧在中國文革時期受過打擊，他所推行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發展是有功的。而在6月8日舉行的記者會上，布希再一次要求人們不要把天安門發生的事情與鄧小平相聯繫。他說，「當我們沒有確切根據時，請不要對個別的中国領導人亂下結論。」

但不幸的是，布希企圖為鄧小平辯護，鄧小平卻翻過來打了布希一記耳光。

6月9日早上，也就是北京時間的傍晚，從5月15日與戈巴契夫會談以後銷聲匿跡了的，被布希認為已經下落不明的鄧小平，突然出現在北京的電視螢光幕上。畫面顯示，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代表。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出動武力鎮壓學生的行動，不是像布希所期望那樣與鄧小平無關，而是在鄧小平的指示與領導下進行的。

到了這個時候，內心感到蒙受羞辱的布希才恍然大悟，鄧小平拒絕跟他通話，不給布希回答，就是一個無情的嚴厲回答。儘管兩人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談與歡宴的情景歷歷在目，布希對鄧小平舊情未忘，以為鄧還會給他一點面子，但實際上，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已經在中美之間無形中劃了一道深深的鴻溝，使兩國關係再也不像從前那樣了。

這使布希感到很大的挫折。由於不能和鄧通話，布希就決定親自起草一封給鄧的信，以便說明他的想法，爭取逐漸恢復中美關

係。布希在信裡向鄧一再表白自己對中國和對鄧個人的善意。他寫道：

「我是以沉重的心情」，「以一個對您懷有很大尊敬的人」，「以一個真正老朋友（Lao Peng You）的身份來寫這封信的」。

「我曾經很為難地試圖不使我本人介入中國內部事務」，「試圖不要顯得是我在指點中國應該如何處理它的內部危機。」

但是，布希說，由於美國所奉行的原則，「我作為美國總統而採取的行動是無可避免的。如您所知，現在要求採取更為強硬行動的呼聲仍在增加，我已經對此加以抵制，這清楚表明我不想看到中美關係受到毀壞。」

因此，布希在信裡提出要派一名特使去中國，希望中國有所回應，以便讓特使「得以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完成他的使命」，這就是後來斯考克羅夫特北京之行的由來。（註：*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Alfred A. Knopf, 1998.）6月7日和11日，布希還兩次讓國務卿貝克打電話給韓敘大使，討論此事，並商量如何適當地處理方勵之問題。

六·四之後，布希本來希望中國當局能對學生採取寬容態度，但是中國政府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安全考慮，決定除惡務盡，繼續加緊鎮壓行動，開列黑名單下令通緝天安門事件中的二十一名主要活動分子，並在黨政機關展開大規模的清查運動，嚴厲處置同情和參與學生運動的人員。同時，還加強了對美國駐華使館活動的限制，以及驅逐「美國之音」與「美聯社」常駐北京的記者。這又翻

過來使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情緒更加激化，從而形成了對布希政府的更大壓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布希不得不於6月20日下令對中國進行比第一次更為嚴厲的制裁。其內容包括推遲國際金融機構對中國的貸款，中止美中兩國助理國務卿以上層級的高級官員互訪（美國財政部長布萊迪與商務部長莫斯巴赫原定下半年訪問中國），中止美國政府對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對中國投資的擔保，停止頒發由中國發射美國製造的通訊衛星的許可證，以及中止1985年中美兩國簽訂的核合作協定等。

美國國會與總統之間向來存在著權力鬥爭。特別是在外交政策的決策與執行，以至外交經費的撥款與外交人士任命方面，國會經常力求對行政當局施加影響和進行牽制。到了六月底和七月中，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以418：0票與81：10票的懸殊對比，在歷年都要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授權法」中附加條款，主張在布希政府已經採取的制裁措施之外，進一步對中國進行制裁。其內容包括：禁止對中國出口可供偵察使用的裝備，推遲美國進出口銀行對中國的貸款。這個決議規定，總統必須證明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進步」，如取消戒嚴、停止槍決和釋放政治犯、不再干擾「美國之音」、方便外國記者進行採訪等等之後，才能取消對中國的制裁。

按照規定，總統必須在三個月內對國會通過的法案作出批准與否的決定。從當時形勢來看，布希要阻止這項決議的可能性已經不大，而且會造成總統與國會的對立。因此，雙方作了一項妥協，就

是由國會修改這個附加條款，授權總統可以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戰略利益來靈活處理，然後總統對這項附加條款不加以否決，避免與國會攤牌。

1990年1月23日，國會眾議院又通過了由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佩洛西提出的一項法案（以下簡稱佩洛西法案），准許中國留美學生在簽證到期之後繼續留在美國，以免他們回國後受到政治迫害。這項法案還規定，凡是持J-1簽證的中國學生可在申請改變身份之前在美國居住兩年，並獲得工作權利。北京對此提出強烈的抗議，威脅說這將影響中美之間的教育交流計畫，使雙方本已惡化的關係更加惡化。

如果布希接受這項法案，那就等於在中國問題上讓國會來掌握主動權，自己要受到國會的制約而處於被動地位，因而對這項法案加以否決。但是，後來眾院又以390：25票的壓倒多數，推翻布希的否決。不過這個決議必須經過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票通過後才能生效。因此在參議院於1月25日舉行會議討論這一法案的當天，布希從早上到下午接連不斷地與共和黨參議員進行談話，加以勸說。同時，尼克森與季辛吉也從旁助一臂之力，在一些關係較好的共和黨議員中展開拉票活動，爭取到關鍵的四票，最後終於使參議院只能以62：37票，即不滿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這一議案。經過這一場苦戰，朱啟禎大使根據國內指示，於1月29日前往紐約，對尼克森當面致謝。尼克森說：「我們打贏了這一仗（battle），但還沒有贏得戰爭（war）。」

後來，布希在1月30日前往馬爾他與戈巴契夫舉行美蘇首腦會議之前，正式否決了這項編號為HR2717的法案，而宣布以一項總統行政命令取代這個法案。

從以上這些事例來看，布希當時在中國問題上的確處於進退兩難、腹背受敵的境地。一方面，他出於民主自由與維護人權的基本信念，迫於美國公眾的壓力，不得不公開譴責中國的暴力行動，甚至對中國進行制裁。但另一方面，他又認識到中美關係對美國的重要性而必須防止局勢失控，力求使美國朝野對中國的強烈反應有所節制，不至於使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危機更加惡化，走向完全破裂。

因此，布希既要作出一些強硬姿態以反映美國民意與討好國會，又希望中國理解他必須如此以平息民憤，要求中國當局能夠採取適當步驟改善局勢，以便向美國朝野證明他的對華政策的可行性與有效性。所以，布希一方面要求國會與公眾理解，「必須由總統來考慮決定」，另一方面，他又對中國局勢的發展，與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激烈反應感到失望。

實際上，正如著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埃利奧特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哈里·哈丁在他的《脆弱的中美關係》一書中所指出的，雖然布希政府兩次決定對中國進行制裁，但也正是布希政府自己，首先違反自己的規定，突破了制裁，並且試圖與中國進行悄悄的聯繫。

比如，在第二次下令對中國進行制裁的兩周之後，布希就批准按照原定計畫向中國的上海航空公司出售價值一億四千萬美元的三

架波音757型飛機，另外出售兩架同一型號的客機給廣東的南方航空公司。由於這些導航設備可以軍民兩用，實際上也可以說是突破了制裁。

其次，決定繼續代號為「和平珠」的，為中國改裝「殲8」戰鬥機的中美軍事合作項目，讓中方人員進入現場，與美方合作。

另外，中美之間還有一項秘密的軍事合作協定，也沒有因為中美關係惡化而受到影響。這就是在新疆靠近蘇聯地區，建立的兩個對蘇聯核試驗與導彈發射進行監聽的情報站。據《華盛頓郵報》6月25日報導說：「中美關係惡化，但兩國之間秘密情報交換工作仍在繼續進行。……中國研究人員已向美國同事作出保證，他們將繼續把在中國建立的另外九個監聽中心記錄下來的有關蘇聯核試驗等方面的保密資料交給美方。」該報認為，「這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對中國事態反應低調的原因之一。」

天安門事件過後不久，經過雙方的多次交涉，中美兩國外長先後在巴黎與紐約聯大期間進行了會談。

更為明顯的是，布希在6月20日宣布對中國進行第二次制裁後的下一天，就悄悄地派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拿著布希的私函，到中國大使官邸來見韓敘，表示要委派特使到北京去和中國領導人會談。關於它的詳情，將在本書下一章內加以介紹與分析。

北京有人批評布希是兩面派

但是，布希在中國問題上的為難處境，以及他竭力想維繫已經極為脆弱的中美關係的努力，並沒有被中國當局所理解和作出相應的必要回應。相反，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政府以至布希本人對中國的政策意圖抱著極大的懷疑與敵意。

本來，自從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把中國當作友好的非盟國，北京也把美國看成是對中國友好的國家。就在六·四事件之前三個月，當鄧小平1983年3月間會見泰國總理差猜時還認為：「美國至少在本世紀內不會構成對中國的威脅，日本也無此能力，歐洲更不可能，威脅主要來自蘇聯。」

但是天安門事件一發生，由於美國對中國的強烈反應與制裁，中國領導人很快就改變了對美國與布希的看法與態度，把美國當成了中國的主要威脅。

使館政治組有幾名高級外交官，負有從事形勢分析與政策調研的任務，專門與白宮、國務院的有關官員交往，收集政治情報，及時向國內反映美國政策與世界形勢動向。大家最關切的情況，當然是中國決策高層對美國與布希的看法。六·四以後兩三個月內，政治組的人員陸續回國休假。參贊王均美於9月間回來講的情況，使人十分驚訝，簡直難以相信。他說：「北京覺得布希是個兩面派。他假裝與中國好，實際是想跟蘇聯好，孤立中國。布希估計中國要動亂十至十五年，現在政權穩定下來對美國不利，所以要讓中國

亂，甚至可能對中國搞暗殺。」

在他之後陸續回來的人，也有類似的說法。當時據一位與軍方重要領導人劉華清接近的人士透露，劉華清表示他本人已被列入暗殺名單，中央領導所有人的地址都已被人掌握。

北京的這種估計與猜測有何根據？簡直是完全瞎說，令人可笑。

中國與所有其他大國一樣，外交情報來自多種渠道，從國外發回後經過篩選都匯集到中央領導那裡。王均美所說的高層對美國與布希意向的估計，決不可能是外交部的產物，因為從駐美中國外交官的實際接觸與了解判斷來看，無論是韓敘大使或是任何一個政治參贊，都決不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也不可能向國內提供這樣離譜的情報分析。

但當時北京的氣氛極為緊張，對內對外的極左思想大大抬頭。很可能有人為了迎合上邊某些人的想法，提供符合他們需要的信息，而這正是使中國領導不能根據客觀情況，依據主觀意向來進行決策的一個不利因素。從北京帶回來的信息，顯然表明上面有人相信這種估計，而且成為高層一些人的共識。因為那種講話的口氣，決非出自一般的人，而是權力地位比外交部更高，儘管對真實情況相當隔閡，卻具有能夠影響外交決策的人。

這種估計之所以錯誤和有害，是因為它對布希與對中國局勢的估計，對美國對華政策目的以及美蘇關係的狀況，作出了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判斷。從這種判斷得出來的唯一結論只能是：布希不

但是兩面派，而且存心要把中國搞垮，所以中國要把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9月7日，李鵬對法國《世界報》記者談話，也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布希。他說：「布希總統看來似乎還在做當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迷夢，認為中國青年一代總有一天會起來推翻政府。」這種說法，等於是把美國政府歷來最敵視中國的國務卿與對中國最好的總統等同起來，認為從艾森豪時期到布希時期，美國企圖顛覆中國政權的政策是一脈相承，沒有變化的。

李鵬甚至借機對布希個人進行人身攻擊。他表示懷疑西方在根除腐敗方面能夠做得像中國那麼多，並且舉例說，布希有一個兒子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另一個兒子也在從事商業活動。言下之意是，別以為只有中國才有「官倒」，美國總統的手上也照樣不乾淨。這完全是按照中國的情況來對美國作出臆斷：既然是總統的兒子，難道還會不沾光嗎？

後來美國國務院的人告訴中國外交官說，布希看到這個報導簡直氣得要命。

鄧小平本人沒有直接抨擊布希，但是他含沙射影地故意貶低了對布希的評介。1989年9月19日他在會見日本前外相伊東正義時表示，他「最尊敬的政治家有尼克森、季辛吉和田中」。為什麼不提布希？顯然是因為六·四，而有意把布希從鄧所尊敬的、對中國友好的外國領導人名單中勾銷了。另外，鄧在對李政道的談話中，也不指名地攻擊尼克森主張要「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對社會主

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

在這種氣氛之下，甚至言談比較謹慎，作風比較務實的錢其琛外長，也不得不照搬上面的說法。他在1990年3月的一次內部講話中說：「美國現在對蘇聯感興趣。有人（又是有人）認為布希這個人不可信任。他並非像他所想那樣無能為力。否決佩洛西法案證明，如果布希需要，他可以（在參議院）拿到三十七票。」錢其琛所說的這個「有人」，即使不是「鄧大人」，至少也是其權勢影響相當於鄧的人，究竟是誰，那就只有留待歷史來考證了。

實際上，從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的一兩年內，從中國領導人公開的或者私下表達的意思來看，中國對美國政策意圖的基本估計與對中美關係的基本政策，可以概括為這樣三點：

- 一、美國是天安門事件幕後的黑手；
- 二、美國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 三、破壞中美關係的責任不在中國而在美國，因此必須由美國先走一步。

鄧小平在1989年10月與尼克森會見以及12月與白宮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會見時，一再表達過這個意思。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只能美國主動，中國不可能主動。……美國捲入太深，美國應當先走一步」，這也就是鄧所謂的「解鈴必須繫鈴人」。

究竟中國領導人這三種見解與主張是否符合事實，是否合理，是否可行？

我們不妨作一些客觀的分析。

首先，天安門事件中有沒有美國情報人員活動？這完全有可能。在布希當美國聯絡處主任時，季辛吉就告訴過中國領導人，布希的耶魯大學校友、時任一等秘書的李潔明就是中央情報局派駐北京的站長。不過，李在出使南韓之後接任洛德為美國駐華大使時，他早已脫離中央情報局，成為國務院的人了。

不管中央情報局當時在北京有無活動，要把它的作用誇大到似乎中國學生運動是由美國情報機關煽動起來或幕後操縱的，或者像鄧小平說過那樣，「美國之音」在中國學生運動中扮演了挑唆者甚至指揮者的角色，這是荒唐的。如果說天安門廣場上的幾萬學生以至後來示威遊行的上百萬中國群眾，都是因為受到美國情報機關的欺騙、煽動與指揮而起來反對中國政府的話，那不但是對中國學生與中國人民愛國行動的侮辱，而且也等於承認，自稱受到人民愛戴擁護的中國共產黨，這時對人民的影響力還敵不過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實際上，本書作者在美國曾經親自問過李潔明大使對於美國與天安門事件關係的看法。他的答覆與解釋是，美國並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外界盛傳的所謂「黃鳥事件」，即協助民運人士逃離大陸、出亡海外的行動，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傑作」，而是同情中國民運分子的香港商業界人士所策劃的。

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是，第一，如果天安門事件確實具有美國背景，而且被中國政府拿到了把柄，中國為何不把這些罪證拿出來

公諸於世？如果中國政府並沒有確鑿的有力證據，光是隨口而說美國在天安門事件幕後操縱，那顯然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有意掩蓋真相，而把外因說成是天安門事件的主要原因。

其次，美國在天安門事件後的真正目的是不是要推翻中國政權？美國這樣做有可能嗎？其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如果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真的陷於極大混亂，發生內戰，中央政權瓦解，軍隊各霸一方，地方各自為政，在那樣的情況下，美國或許還有施加影響，插手中國政局，使之服從於美國利益的可能。但當時中國局面基本上仍在中共控制之下，遠遠沒有發展到那種分崩離析的嚴重地步。美國對中國形勢的判斷即使可能失誤，也決不至於糊塗到認為中共政權就要垮台，可以由柴玲、劉賓雁來取代鄧小平的地步。中國當局硬是認為美國要顛覆中國政府，這如果不是有意誇大事實，至少也是缺乏根據的懷疑。實際上它是反映了當時處於內外夾擊形勢之下的中國領導人，有如驚弓之鳥的緊張心態。

最後，能不能單方面地把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完全歸之於美國，而根本否認中國方面的原因？

固然，美國公開支持中國學生運動，並對中國進行制裁，從中國當局看來，是破壞中美關係的嚴重行動，美國難辭其咎。但是反過來說，從美國的立場來說，美國政府與布希本人能不能因為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的內政，就必須保持沉默，甚至接受中國當局的說法，認為這是「一場動亂」，中國當局既有權也有理進行「平暴」，否則就是不友好，就是干涉中國內政呢？

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常常強調中國的主權與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個國家的主權，也應當包括其政府與人民按照本國的價值觀念與道德標準來看待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政府堅持中國有權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評介與判斷別國事務的話，它就沒有理由反對和指責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也按照美國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介中國的事務，因為這也是屬於美國主權範圍之內的事情。1990年7月12日上海市長朱鎔基來訪美國，會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時，斯曾對朱表示過：「中國領導人認為六·四是中國的事，與他國無關。但是美國認為，這件事在美國引起的反應，與美國人對此的想法，也是美國的內政。」你能說這樣的解說毫無道理嗎？

其次，作為美國總統，當然也應該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然而，如果當中國發生的悲劇使美國人民的感情受到極大震動與傷害的時候，布希究竟應當首先考慮美國人民的感情，還是置美國人民的感情於不顧，而為了討好北京，維繫中美關係而首先聽命於北京，對中國的事保持沉默，從而激起美國人民的反感與譴責？更何況中國政府在天安門事件中使用武力，究竟是考慮了還是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至少值得懷疑的問題。

1993年11月17日，在江澤民到西雅圖參加亞太經濟合作首腦會晤，與美國總統柯林頓會見的前夕，作者曾在紐約《世界日報》發表《向江澤民進一言》的文章，提出過上述論點。我現在仍然認為，中國當局應當好好考慮這個觀點，不能只知己、不知彼，在兩

國關係中僅憑主觀意願，來要求美國按照中國的立場觀點來處理中美關係。

正是因為中美之間存在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矛盾，而且使得中美關係糾纏不清的原因並非來自一方而是兩方，所以布希與美國政府無法接受鄧小平關於「解鈴還需繫鈴人」的要求。

1989年11月7日，布希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人有句俗話叫『解鈴還需繫鈴人』。中國認為，是我們繫了這個結，因此應該由我們來解開，我可不那樣認為。」

布希在這裡把「鈴」(Bell)改成為「結」(Knot)，是因為在英文裡，只有把出自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裡的這句話加以變動，才能使美國人理解原話的含意。而這正好表明，布希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就懷有的「中國情結」，由於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已經變成了中美之間難以解開的一個「死結」。

第8章

斯考克羅夫特的北京之行

白宮謀士 布希親信

布希在六·四後公開宣布對中國進行嚴厲制裁，但實際上第一個違反中止兩國高層往來決定，從而打破制裁的不是別人，正是布希自己。

在中美關係因天安門事件而風雲突變陷入危機的情況下，布希前後兩次派白宮重臣——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訪問過北京。一次在7月初，一次在12月上旬。

斯考克羅夫特這兩次訪問，是經過一番曲折過程的。本書前一章內提到，布希6月7日晚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曾試圖打電話與北京當局聯繫，結果碰了釘子。但是6月12日晚上，北京忽然通過中國駐美使館發來致布希總統的一封英文口信。它一方面為中國政府的鎮壓行動進行辯解，同時表達了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政策與維護中美關係的願望。

口信是沒有抬頭，也沒有署名的。它用的第一人稱是「我們」而不是「我」，說明鄧小平此時還不想以個人名義，而只願意用中

國領導集體的名義來跟布希打交道。它首先重複中國官方的老調，說「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一小撮人製造反革命動亂的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來的發展成就將毀於一旦。這將使改革開放政策難以為繼，中美關係也將受到損害。」（以上為作者根據英文口信摘譯，下同）

口信表示，「我們已經極為克制，只是在事情超過了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後，才採取堅決的措施。現在，動亂已經基本平息，形勢正在好轉，公共秩序將很快恢復正常。」接著，口信指出：「作為一位曾經在中國工作過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您對中國情況是有所了解的。我們願意坦率地告訴您，中國政府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形勢，我們一貫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將不會有所改變，我們的和平獨立外交政策也不會改變。鄧小平主席在最近所作的講話中已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口信最後說，「您表示願意恢復與發展中美關係，這和中國方面的想法是一樣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重要的是雙方必須加深相互了解，並且任何一方都不應當做傷害對方民族感情與利益的事情。」

用「反革命動亂」與「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之類的僵硬語言來跟美國總統交談，其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中國歷來只有一套硬梆梆的官方宣傳語言，即使起草如此重要的外交文書也不例外。給布希的這份口信，總共只有四十九行，不但口氣生硬，甚至連文章的段落都分不大清，很可能是在局勢危急情況下，匆匆忙忙

地出於一個思想貧乏、文墨粗通的低級官員之手。但無論如何，這至少是六·四以後中國當局私下向美國政府發出的第一個姿態，發出的第一個信號，表明北京有意想把雙方已經切斷了的聯繫重新接上。

對中國局勢感到焦慮，正在不知所措的布希政府，正需要北京的這個信息。

過了幾天，6月21日上午，斯考克羅夫特拿了布希的一封密函到中國大使官邸來見韓敘。他說，布希總統本來想在下午時接見韓敘，但是怕被記者洩露，改為派他前來與韓敘碰頭。布希表示他本人將不再「捲入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希望中國政府發表寬恕鬧事學生的聲明，並妥善解決方勵之問題。另外，布希還希望中美之間協議的一項「特別工程」，即設在新疆中蘇邊境對蘇聯戰略武器試驗進行監控的監測站，能夠不受影響地繼續進行下去。為了商談中美關係面臨的問題，布希決定派一位特使去北京會見中國領導人，希望中國予以考慮。

和兩周以前斷然拒絕的情況不同，北京這回很快地就給白宮回音，表示願意接待總統特使。下午5時，韓敘約見斯考克羅夫特，面交北京來電。這樣，中美兩國高層之間的私下聯繫渠道，出於雙方的需要，又打通了。

為了避人耳目，斯考克羅夫特是在6月30日悄悄飛往中國的，正好在北京過一個周末，然後於7月4日美國國慶日神不知鬼不覺地回來。由於當時北京的局勢仍然動盪，中美關係仍很緊張，雙方在

很多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斯考克羅夫特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帶有摸情況的性質，他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見未能解決什麼實質問題。關於這次訪問，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直到12月18日才第一次予以公開報導，而白宮則在同日發表聲明，並把聲明的副本送交中國大使館，以協調對外口徑一致。聲明指出：「斯考克羅夫特確於1989年7月代表布希總統訪問中國，以親自表達美國對天安門暴力行動的震驚和不安，並向中國政府說明這一事件在美國引起的嚴重關切。總統認為，為了表明美國政府的目的與意圖，這一出使任務，與斯考克羅夫特最近進行的訪問，是同樣重要的。」但是，中美關係並沒有因為斯考克羅夫特的第一次訪問而有所好轉，而是繼續惡化。這就推動了斯考克羅夫特的第二次秘密的北京之旅。1989年12月8日深夜2時15分，斯考克羅夫特在國務院第二把手、副國務卿伊格伯格的陪同下，從華盛頓安德魯軍用機場起飛，前往中國。第二天半夜到達北京。

在介紹斯考克羅夫特與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情況之前，有必要先來介紹一下這位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來歷，以及布希為什麼要選擇他作為特使訪問北京的背景原因。

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1925年3月19日生於猶大州的奧格登市。1947年從西點軍校畢業後參加空軍。1949年初，他在駕駛P51型戰鬥機的一次飛行訓練中，因飛機電源斷絕而墜落在地，跌斷三段脊椎骨，住院兩年養傷。後來轉修國際問題，先後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碩士與博士學位，在西點軍校教了四年俄國史。歷

任駐南斯拉夫武官、空軍學院教授與政治系主任，以及國防部高級官員。在尼克森執政期間，他是白宮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季辛吉的親密助手，與布希也有過長期的合作關係，曾隨尼克森訪問中國與蘇聯。

布希在1988年11月23日宣布任命斯為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說：「我曾與布蘭特一起工作——也許我應該這麼說——我曾為他工作，因為我在福特總統時期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而比布希年歲小九個月的斯考克羅夫特則在他之上，是福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希必須通過斯向福特匯報工作。後來，布希當上了雷根的副總統，斯有時就向布希匯報工作。斯考克羅夫特離開政府的十二年內，時常與布希共進早餐午餐，保持接觸，布希競選總統時，斯又成了他的外交政策顧問。

國務院的一位官員這樣告訴過本書作者：斯考克羅夫特「為人十分謹慎，有宏觀，在決策上有自己特點。當年尼克森與蘇聯搞緩和，到了福特任內，連這個名詞也被取消了。這正是斯考克羅夫特掌權的時候，說明他對蘇聯的謹慎小心是一貫的。」在中美關係的關鍵時刻，布希派到北京來的正是這樣一位關鍵人物。

暗渡陳倉 會見鄧李江

半年多以前，斯考克羅夫特曾經陪同當選總統不久的布希訪問

北京，見過鄧小平。那時的中美關係氣氛是多麼熱烈，布希與鄧之間的情誼是多麼親切。曾幾何時，斯又踏上中國的土地，來見鄧小平。儘管他懷著殷切的心情，並且表示能再次見到鄧是很大榮幸，但這次的氣氛完全變了。中美之間充滿了相互抱怨、指責、懷疑與不信任感，在美國朝野眾目睽睽之下，斯考克羅夫特不得不作為密使悄悄地前來，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懷著難以逆料的心情。

12月10日上午11時，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斯考克羅夫特，談了以下幾點主要內容：

一、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鄧說：「中美關係歸根到底還是要好起來。這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需要。你們來訪，表明兩國有共同意願。盡快解決6月以來中美之間存在的某些糾葛，使關係得到新的發展，這是我們的共同心願，我想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

鄧小平指出：「1972年到現在已經十七年了。世界局勢穩定，中美合作是取得好形勢的原因，中美合作關係在其中的份量不輕。中美兩國不能打架，我說不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不要提倡這些。美國的制度不能照搬，美國制度好不好，美國人說好，我不干預。但是中國不能照搬，希望你把這個話轉告給布希總統。」

二、強調中國的份量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鄧說：「中國在國際上有特別的重要性，關係到國際形勢的穩定與安全，如果中國動亂，問題就大得很了，肯定不是地區性的，至少亞太地區將一片混亂，當然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美國之福。」

三、強調中國沒有對不起美國。鄧顯然是憤憤不平地向這位白宮高參表示：「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能把中國當作對手。真正威脅中國的不是美國，因此1972年以來，中國的政策從來也沒有把美國作為對手。1972年以來，我們沒有作過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情，沒有作過任何一件傷害美國人民感情的事情。」

四、強調要雙方努力改善中美關係。鄧認為，「彼此要盡可能照顧對方，只照顧一方不行。真誠合作的態度是彼此照顧，這樣在技術上總能找到解決辦法，可以想出好辦法，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雙方都讓點步，這樣美國能順利應付國會，你們也要使我們能向我們的人民講出點道理。」

講到這裡，鄧還頗為動情地說：「你告訴布希，請他不要忘記，在東方的北京，還有一個退休的老人，關心中美關係的良好改進與發展。儘管兩國之間存在糾葛，我們還是朋友。作為老朋友來處理調解兩國之間的某些糾葛，有些用處。」

五、但是，鄧小平又強調要美國先作出讓步，作為改善關係的條件。他說：「我知道布希總統遇到困難。但是總的說，中國領導遇到的困難更多。這個困難不僅是我們要對人民有所交代，要使我們的人民能夠心情舒暢些，重要的是，如解決得不好，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要受到影響。」

怎麼受影響法？他特別舉了日本的例子。他說，日本人過去對中國比較謙遜，因為日本欠中國的債太多了。現在它對制裁非常積極，這說明，由於中美關係的糾葛，日本現在相當自負。

六、鄧也談到了蘇聯局勢與美蘇關係。他認為，東歐發生的事，是個動亂，比中國六月份的動亂性質嚴重得多。究竟什麼後果，很難預料。但他肯定，「在這個局面中，蘇聯沒有得分。美國即使得分，也不會多，得分多的是另外的人，今後美國遇到的對手就不是一個了。」總而言之，鄧小平利用這次談話，對布希進行了一番攻心戰：即曉以大義，要他記住中國與中美關係對美國的重要。嚇唬布希中國亂了對美國沒有好處，要美國幫助中國穩定；要布希原諒他處境危難，拉中國一把。

除了鄧小平以外，斯考克羅夫特在兩天之內還與李鵬、江澤民和錢其琛進行了另外三場會談。雖然斯很客氣地表示對江澤民的尊敬，但這不過是為了禮節性地和鄧小平親自挑選的接班人照個面，打量一下江的能力與水平。由於中美關係掌握在李鵬手裡，江當時實際上處於沒有實權的地位，也談不出什麼實質性的東西來。

儘管斯考克羅夫特已經表示，布希否決佩洛西案，是冒了很大政治風險來採取這個行動，但是李鵬卻並不領情，反而責怪布希。他說：「布希總統對佩洛西案予以否決，又採取行政措施，你們認為作了很大努力，但我們不可理解。因為實際效果是一樣的，用中國的話說，叫做換湯不換藥。」

李鵬的這些話，實際上印證了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北京有人說布希是兩面派」的事實，說明對布希採取否定的看法來自上層。

在這幾場密集會談中，斯考克羅夫特向中國領導人表達了美國

政府對中國形勢的看法，如何改善中美關係的意見，並通報了美蘇馬爾他首腦會談的情況。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布希希望兩國關係回到正常軌道」。此行目的是要減少兩國關係中刺激對方的事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而來的。重要的是，不要指責誰應為現存的分歧負責而消耗精力，相反，應當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內，為尋求解決共同的問題，和排除那些刺激因素而一起作出努力。

「像中國一樣，美國也忠於自己的價值觀念、遺產和傳統，不可能改變成其他的模式。但是雙方應當尋求能達成一致的廣泛領域，把分歧留待以後處理。總統的強烈願望是尋求會談取得進展，為尋求解決辦法奠定基礎。」

關於美蘇關係與中美關係，斯考克羅夫特表示，「美蘇之間沒有任何需要向中國政府隱瞞的東西」。由於東歐與其他地區局勢的不穩定，強調中美關係更有必要。美國「並非像有些人所聲稱那樣是中國的主要敵人或威脅」，「中美互不構成威脅」。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考克羅夫特在估計當時形勢時竟然表示，「在變化的時代，必須考慮可能產生的新的聯盟」，對於「蘇聯日本的聯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他認為，「中美戰略價值今天具有更大價值」。

雖然當時國際形勢正處於大變動的時候，中美關係由於天安門事件而陷入低谷，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正在從對抗走向合作，但在這位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頭腦裡，似乎仍然保持著美國長期以來利用中國對抗蘇聯，從大三角關係的角度來思考中美蘇美關係的

固有觀念。而且，他對美日矛盾估計得這麼高，甚至作出了日本可能聯合蘇聯與美對抗的超乎現實的估計。很難斷定他這樣講的目的，究竟是為了強調中美關係而討好中國呢，還是當時布希政府與美國朝野確實認為美日矛盾已經發展到了必須如此嚴重對待的地步。

斯考克羅夫特在會談中的確向中方提出了一連串的要求：撤銷戒嚴，停止對學生的迫害，釋放方勵之，停止對「美國之音」的干擾，不向中東國家出售導彈，作為美國放寬對中國制裁與改善中美關係的條件。他還警告中國，如果中國不能在短期內採取這些步驟以改善中美關係，布希將無法阻止明年一月下旬復會的國會採取反對中國的行動。

儘管如此，斯考克羅夫特的談話卻使中國領導人產生錯覺，而且相信，即使天安門事件對中美關係產生了嚴重影響，美國朝野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但是布希政府仍然把中美關係置於中國的內政問題之上，仍然像過去一樣，甚至在新形勢下更加看重中國在大三角中的戰略作用。

本來，斯考克羅夫特此行是來排解糾紛而非顯示友好，所以他事先就向中方提出，希望對會談採取低調，不事聲張，報導時只講雙方會談進行得坦率、友好，不必提具體內容。但中方卻利用美國總統特使來訪大做文章，進行了非常突出的宣傳報導：《人民日報》配合消息登了三幅很大的照片，電視上出現了斯考克羅夫特與中國領導人相互碰杯祝酒的鏡頭，似乎中美關係依然完好如故。陷於國

際孤立的中國政府，顯然是想借此機會向國內人民與國際社會顯示中國局勢的穩定性，說明美國有求於中國，少不了中國，到頭來還是要與中國和解。

其實，這種做法引起了美方的很大反感。因為它完全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一種氣氛，與當時中美關係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相符合。它不過是把雙方正在討論，準備要做的事情，當成似乎已經實現的事情來對待。後來的事實證明，儘管中國故意渲染斯考克羅夫特來訪，但是這次訪問並沒有達到扭轉中美關係的預期目的。由於中國對這次會談抱有過高期望，作出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認為美國會按照中國要求來做，使斯考克羅夫特此行一開始就潛伏著注定會遭到失敗的因素。

北京錯估形勢 失去修好時機

斯考克羅夫特訪問結束之後，中國政府無論對內對外，都對中美關係的前景表現出一派樂觀的情緒。1989年12月14日，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感謝布希總統派特使訪華，中國很重視中美關係，並且相信經過雙方共同努力，中美關係將可完全克服現有的困難，短期內恢復正常關係，以至取得進一步的發展。至於方勵之的問題，因為「涉及到中國的主權與國際準則」，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雙方努力。

在中國內部，也對斯考克羅夫特的訪問作出肯定的估計，認為此行對突破美國制裁會產生積極影響；表明布希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願意使中美關係恢復正常；現在雖有困難，但實際上美已採取步驟改善關係。當前形勢下有必要與美保持接觸，結束糾紛，共同採取步驟，克服困難。

中國外交部在一份關於當年國際形勢的年終總結中，對中國的國際地位與作用作出了頗為自信的估計。認為雖然大三角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內容有所變化，但作用仍未消失。美蘇仍互為對手，中國對它們不構成威脅，兩者都不能忽視中國的戰略地位。美國仍然把中國視為平衡蘇聯的重要力量。蘇聯也認為與中國保持正常關係具有戰略意義。中國作為堅持獨立的一支獨特力量，和擁有十一億人口的大國，在國際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這個文件第一次引用鄧小平的話說，在當前形勢下，中國「應當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沉著應付」。文件指出，由於取消制裁主要取決於美國態度，要積極抓緊做好對美國的工作，促使它對中國的態度逐步有所變化，進而推動其他西方國家。

為了給改善中美關係創造條件，中國政府在斯考克羅夫特訪華之後採取了一些步驟：

- 允許「美國之音」記者Stepheni Mann Niler到北京常駐。
- 解除對美國駐華使館的特別警戒。
- 決定接受美國和平隊派二十個人到中國工作，但只准他們去四川省教英語。

- 同意中美雙方就恢復美國富布賴特計畫與中國交流的項目進行協商。
- 保證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之外，中國未向中東出售導彈，否認出售導彈給敘利亞。
- 宣布釋放天安門事件後的573名在押犯。

美國方面也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取消在六·四以後對美國公民到中國旅行的勸告；宣布「美國之音」電台自北京時間1月15日起停止廣東話播音，並將從天安門事件起由原來每天八個半小時增為十二小時的北京話節目，縮減為九小時。

同時，作為對中國承諾不向中東出售導彈的回報，美國政府決定批准中美之間原有的一項合作協定。根據這項協定，由中國火箭於1990年4月為香港亞洲電視台發射一顆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的人造衛星，91~92年為澳大利亞發射兩顆美國人造衛星。由於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這項計畫被擱置了下來，它必須由美國政府在12月15日以前予以批准，否則就要作廢。

除此以外，美國還於二月中旬通知中國政府，批准世界銀行給予中國三千萬美元貸款用於地震。由於天安門事件，世界銀行推遲了原定對中國的七筆貸款，總共為八億美元。這是六·四後放寬的第一筆貸款。

但是，與中國所設想的相反，斯考克羅夫特的北京之行在美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應。《紐約時報》前總編輯羅森索爾指責布希派特使去北京是「出賣行為」。認為布希宣稱要「結束與中國高層往

來，以表示對中國人民的支持」，是一種偷換概念的遊戲，因為布希說「不想孤立中國人民」，實際上「受到孤立的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他們的政府」。他指出，美國對中國一百八十度轉彎的做法使「北京感到洋洋得意」，因為這充分表明中國「強大得足以使美國叩頭」。

由於北京只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做點姿態，而未能按照美國的要求，在斯考克羅夫特訪華之後及早解除戒嚴和讓方勵之離開中國，使布希政府無法向美國國會與公眾證明他的對華政策的正確性與有效性。中美之間好不容易在斯考克羅夫特與中國領導人會談中營造起來的良好氣氛，很快又被原來的冷漠與疏遠的氣氛所取代。

因此，當李鵬於1990年1月10日鄭重其事地宣布撤銷戒嚴，稱之為「重大事件」時，美國的反應極為冷淡。

在宣布前半天，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前往白宮會見斯考克羅夫特，把中國政府的這一決定提前告訴美方。原以為這位白宮助理會說幾句稱讚中國政府的話，誰知碰了個冷釘子，自討沒趣。斯考克羅夫特明白地告訴中國大使，光是這個行動不足以平息美國國會，使之改變態度。如果中國只是撤銷戒嚴而不釋放方勵之和被捕的學生領袖，它決不可能換回世界銀行的貸款。因為國會裡邊反對中國的情緒仍很激動，布希很難走這一步，否則會招來適得其反的後果。

本來解除戒嚴是中國可以用來爭取美國改變態度，改進中美關係的一張大牌。但是北京一拖再拖，等到這張牌幾乎已經失去效應

時再把它打出來，不但已經換不回北京所需要的代價，反被美國國會和輿論譏諷為施放「藍色煙幕」和「塗脂抹粉」。

為什麼北京不能早日宣布撤銷戒嚴來改善它的國際形象呢？這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天安門事件之後，北京的形勢一直很緊張，大量槍枝流失在外，社會治安不能保證。1989年10月1日舉行國慶活動，雖然表面上強作鎮定，實際上如臨大敵，市內交通要道與舉行遊園會的公園裡布滿了軍警。薄一波有個司機，因為晚上開車對戒嚴部隊巡邏的查問未作回應，被當場打死。

二、中共高層對美國看法不一。務實派希望以斯考克羅夫特訪華為契機，通過雙方努力，盡早修復中美關係。但是強硬派則認為，既然斯考克羅夫特承認中國的戰略價值比過去更重要，有求於中國，那就何必操之過急，不妨讓美國先走幾步，看一看再說。他們主張把解除戒嚴拖過下一年的春節。

三、中國政府原已決定在斯考克羅夫特走後兩個星期，即12月25日聖誕節前撤銷戒嚴。但是這中間發生了羅馬尼亞政變與喬塞斯庫被處決的事情，使北京極為震動。

在這種情況下，國會眾議院於1990年1月23日通過的關於給中國留學生延長簽證的佩洛西議案，更加引發為中美關係的一個衝突點。儘管布希最後予以否決，宣布以總統的行政法令來取代這一法案，使這個問題不致操縱在國會手裡，但是中國毫不領情，仍然作出強烈反應，譴責美國的行動。作為反擊美國的措施，中國教委甚

至宣布今後中國大學生畢業之後必須先在國內工作五年才能出國進修。

這一行動，顯然使布希十分難堪。布希覺得自己好心沒有得到好報，在1990年2月12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深表不滿地說，中國宣布大學生畢業後要在國內工作五年後才能出國，「我認為這個政策不好，非常不好，使我覺得有些困擾」。

從這時開始，美國政府內部產生了對華政策嚴重受挫、難以為繼和需要調整的想法。美國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見到朱啟禎時抱怨說：「布希受到壓力，沒有從中國得到應有的反應。在否決佩洛西案之後，中國宣布大學生五年後才能出國，等於給布希一記耳光。布希地位虛弱，不能再為中國付出代價。」因此，在布希去馬爾他與戈巴契夫會談之前，白宮總管蘇努努與貝克國務卿勸布希多考慮一下內政問題，把對華政策暫且放一放，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也不必過分操心。

蘇東形勢大變 美國以壓促變

正當中美兩國在為相互關係爭執不下的時候，東歐與巴爾幹半島社會主義國家的形勢加劇動盪演變：波蘭團結工會接管政權，匈牙利捷克開放邊境，柏林牆倒塌，何內克下台，喬塞斯庫一命嗚呼，戈巴契夫對蘇聯友邦的演變無動於衷，置若罔聞。這種變化，

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不能不產生影響。美國朝野的很多人認為，既然東歐蘇聯能變，為什麼中國就不能變，因而主張採取觀望政策，對中國施加壓力，靜待變化。

由於中美雙方的原因以及東歐變化的外部因素，從斯考克羅夫特訪華開始的中美關係暫時有所好轉的勢頭，又重新回到了曲折徘徊以至停滯倒退的狀況。在這位白宮特使訪華後的幾個月內，接連發生了以下的一系列事情：

——美國通知中國，今後世界銀行對中國的貸款將只給有關人類基本需要的項目，只有在中國內部情況有所改善之後，才能考慮放寬貸款；

——布希下令必須在1990年5月1日之前收回由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在美國收購的曼可公司。這是一家只生產小零件，不供出口的公司，年營業額僅1900萬美元。美國從中國手裡收回顯然是一種政治姿態，並非出於經濟考慮。

——美國取消原定為中國改裝「殲8」型戰鬥機的軍事技術合作項目；

——國務院發表年度的世界人權狀況報告，指責中國「鎮壓行動仍在繼續」，人權狀況「急劇惡化」。白宮事先看過國務院的報告，沒有加以淡化。由於國會與總統有矛盾，它在人權報告出籠之前就有意洩漏給媒體。

——白宮負責亞洲事務的官員拒絕與使館政治官員會面交談；

——國務院不准中國大使館公使去丹佛市會見美商人，理由是

北京不許美駐華公使館參贊去西藏參觀。

——中國大使館舉行電影招待會，三分之二被請的客人都不來。只有中國處的一名政治官員前來參加，在大廳內與公使公開爭論人權問題，表示中國錯過了改善中美關係的時機。除非公開宣布天安門事件是錯誤的，才能改變中國的形象。

——美國副總統丹·奎爾與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在白宮接見天安門事件中的學生領袖柴玲。

在這種僵冷的氣氛下，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索羅門，在三月初會見朱啟禎大使時坦率地指出：

今後一段時期，中美關係會很困難。前一階段沒有按預想恢復關係，現在蘇聯發生的變化使人集中注意中國。反對布希的不僅有民主黨，還有共和黨人。在佩洛西法案的問題上，支持布希的人並非支持他的對華政策，而是支持他本人，布希已經注意到這個情況。

索羅門認為，最惠國待遇問題今年會有麻煩，要進行一場艱苦的奮鬥。他希望中國不要再出什麼事情，要放學生出國。

索羅門的談話，表明美國對華政策有了新的考慮，就是對中美關係不抱希望，決定暫時放下，也不再為了照顧中國而束縛自己手腳。

在索羅門講過這番話之後不久，決定暫時中斷與中國使館聯繫的白宮亞洲事務主任道格拉斯·帕爾，又採取另外一種方式向中國傳送信息。他通過一位與中國使館常有往來的名叫格拉齊爾的情報

分析人員，與使館政治參贊張德廣作了一次十分坦率的談話，有意要把美國的底牌亮給中國。

格拉齊爾以十分嚴厲的口氣警告說：

——美國會將在六月審議最惠國待遇問題，如果決定不再延長，布希也不一定會否決，否則等於自殺。

——布希受到壓力要見達賴，他很難拒絕。

——布希政府將繼續阻止世界銀行給中國貸款。

——大三角已經發生變化，美國認為，現在中蘇都有嚴重困難，所以它們都不可能威脅美國。

——如果中國以為它可以玩日本牌或歐洲牌來對付美國，那是誤解。因為無論日本歐洲都離不開美國，它們如果得不到美國同意，就不可能與中國改善關係。

——中國誤解了布希政府力求改善中美關係的努力。美國認為，它越是急於要求中國，中國越是覺得自己對美國是不可缺少的。但事實上，中國需要美國更甚於美國需要中國。中國應當知道，它認為美國非常需要中國只是一種幻想。現在美國將不會再付出代價，是中國自己錯過了修復中美關係的時機，現在即使釋放方勵之也不中用了。

——中國正在執行孤立政策，加緊反對和平演變的宣傳，把美國當作頭號敵人。中國在尼克森時期的戰略作用已經消失。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中國與蘇聯的地位現在正好倒了過來，變得相反。中美對戈巴契夫的看法不同，但是美蘇對中國的看法卻相同。

格拉齊爾最後表示，中美關係的氣氛正在趨於冷淡，不會再有什麼春天。因為中國錯誤地估計了自己，也錯誤地估計了美國，中國在行動上將會有失誤。未來兩三年內，中美關係的發展將會慢下來。

天安門事件以來，從來還沒有一個美國人，即使最強烈反對北京的國會議員，向中國傳達過如此強硬又如此明白無誤的信息。格拉齊爾談話所表達的只是不滿、指責和警告，它甚至連一丁點兒勸告的意思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友好和期望了。它等於直截了當地告訴北京：我們本來是可以和解的，但你自以為了不起，覺得美國少不了你，不按雙方應該做的去做，那你就得承擔後果，反正事態不會按照你的要求發展。你軟的不吃，我就來硬的，今後如何，隨你的便，美國已經無所謂了。

對於格拉齊爾傳過來的信息，中國大使館感到茫然和為難，因為過去沒有遇到過類似這樣的情形。究竟格的原話是不是完全反應帕爾的意思，而帕爾的話又是不是白宮所要傳達給北京的信息，是不是應該予以嚴肅對待，傳回去北京，要是北京對這個談話的內容感到不快，認為使館應該當場予以批駁，而張德廣又未予以駁斥而有所失職，使館在發回這個信息時就必須同時作出檢討，否則就會挨批。

由於中國高層在對美政策上仍然存在分歧，由於摸不準北京當時的政治氣候，由於對帕爾的傳話如何處理沒有把握，使館最後決定把張德廣獲得的這個信息加以「貪污」，即以格拉齊爾的身份與

講話內容不能代表美國官方作為理由，暫時扣下不發北京。

但是北京當然不會不感到美國對華政策的明顯變化。

1990年4月，錢其琛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談到了這個變化。他說：美國進行制裁是因為它對中國和平演變遭到失敗。布希錯誤估計形勢，對他也要有充分估計。制裁是由美國帶頭的，即使撤銷制裁，中美關係也不可能完全好轉。

由於美國政府態度改變，國會壓力增加，最惠國待遇第一次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嚴重問題。過去北京不太在意這個問題，經駐美使館一再提醒，並不斷回報有關這方面的險情之後，北京才覺得問題的嚴重性，認識到這是中美關係的基礎，決定以保住最惠國待遇為迫切任務。但是反覆研究對策，始終覺得手裡沒有多少牌可打，心裡有點發愁。因此，江澤民有一次在駐美使館的電報上批註道：「能不能在其他方面放鬆，以便保持最惠國待遇」。

但當時中國對形勢的估計仍然是，儘管美蘇關係有所改善，但雙方仍互為對手，蘇聯失去的多，美國得的少，美國現在有兩三個對手，蘇聯仍需要中國。

總的來說，斯考克羅夫特北京之行之所以未能使中美關係好轉，固然有國際形勢變化的原因，但也不能忽略中國本身的因素。在1989~1990年中國形勢與世界形勢都發生大變動的時候，中國總是在不斷地估量自己和估量美國，一再思索究竟美國還重視不重視中國的作用。無論鄧小平、李鵬或其他領導人對美國人的講話，都貫穿了這樣一個思想和這樣一種關切。問題是，北京一方面十分盼

望美國繼續重視中國，而一旦它感覺到美國仍然重視中國的時候，又馬上翹起尾巴，以為既然美國有求於我，我何必必要對你作出讓步。本來，斯考克羅夫特訪問北京，等於是向中國領導人移樽求教，為中美兩國修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但由於北京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量與作用，硬要「解鈴還需繫鈴人」，就白白地錯過了這個機會。

在那種情況下，北京不懂得，幫助布希就是幫助中國的道理，對布希有時完全出於應付公眾輿論的一言一行斤斤計較，對布希提出了他作為一個美國總統根本不可能按照中國要求來辦的過分要求，使有心想使中美關係恢復正常的布希總統處於兩面不討好的尷尬境地。

雖然，後來美國出兵波斯灣，由於要對伊拉克動武而再次重視中國與拉攏中國，使中美關係進入了另一個徘徊起伏的階段，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中國在前一段時間內對美政策的決策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第9章

江澤民因禍得福 從上海灘掉進中南海

臨危受命 權力架空

天安門事件使中國政局發生一場大地震。對改革開放早就心懷不滿的保守派，乘機對改革派發動一場大反攻。在中共高層自文革以來最為激烈的權力鬥爭中，趙紫陽因為反對鎮壓學生而遭廢黜，江澤民則一步登天，從上海到北京來摘桃子，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1989年11月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當著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的面，宣布引退那一天，江澤民作為鄧小平欽定的接班人，緊握著鄧小平的手激動地說：「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兩句話，本是一千七百多年前蜀漢昭烈帝劉備托孤後，諸葛亮向劉備表明心跡時所說的。江澤民是在天安門事件中臨危受命，被鄧小平親自扶植起來的新主，沒有比引用千古傳誦的諸葛亮這兩句話，來向鄧小平表示忠誠與感恩戴德更合適了。因為沒有鄧小平的恩惠，也就沒有江澤民的今天。

在天安門硝煙未盡的春夏之交，鄧小平究竟在哪一天作出讓江澤民接任總書記的決定呢？這是世人至今還有所不知的事情。

按常理來推斷，趙紫陽在5月19日已被撤職，因為他拒絕參加李鵬宣布實行戒嚴的高幹會議。而鄧小平則是在5月31日接見李鵬、姚依林，要這兩個比江更有資格接替趙紫陽的保守派領導人物打通思想，勸說他們同意讓江澤民來當總書記。

這就是說，鄧對江的任命，必然是在5月19日之後，31日之前的十二天內作出的。

另外，從上海的情況來看，六·四那天，在電視上向全體市民公開講話的是朱鎔基而不是江澤民。上海當時的形勢，都是由朱鎔基出來掌握處理的，這表明江澤民六·四時已經身在北京，不在上海。

其實，江澤民本人在內部曾不止一次談到過他怎麼從上海來到北京的情況，其中有一次是對中央扶貧會議，一次是對外交部召開的駐外使節會議。

關於那段經歷，江澤民是這樣說的：

「5月26日，叫我來北京。半夜裡進城，化裝成教授，還換了眼鏡。隨身帶了四名警衛，還有上海警衛局長，他用手抓住我，很緊張，好像要犧牲。當時的局面不是政府在管理，而是在學生的控制下。從機場到中南海，走了一個多小時。車子每到一個地方，遇見學生就掉頭。」

實際情況是：五月下旬江澤民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要他去

北京開會。因為江在上海處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中表現得先硬後軟，以為受到中央批評，心裡很緊張。江的夫人王冶坪更是憂心忡忡，以為將要大禍臨頭，到北京去挨整，因此與江分手時不禁抱頭大哭一場。

江澤民到了北京，中辦主任溫家寶與8341警衛部隊的一位副團長在南苑軍用機場迎接。其實溫已知道江的任命，但只對江說要他來擔任宣傳工作，因為那時負責宣傳的胡啟立和芮杏文已經隨著趙紫陽一起靠邊站了。

上海市的中共領導本來以為江澤民是被召到北京去開政治局會議的。但他們在六·四後收到的一份關於平暴統一口徑的中央文件中發現，江澤民已經意外地躋身於楊尚昆、李鵬、喬石與姚依林等中央領導人的名單中了。

在北京，中央辦公廳6月9日發出一份通知，要求中央黨政軍各部從那天起向外發送機要文件時，加添一份給新成立的「江澤民同志辦公室」。過了兩個星期，在6月23~24日舉行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正式當選為中共總書記。

江澤民六·四之前到北京的事實，還可以從他對季辛吉的一次談話中得到證明。1989年11月9日，季辛吉在六·四以後第一次來到北京訪問，他也是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後會見的第一位美國客人。江對他談到天安門事件的情況時說：「6月3日晚上，我在天安門看到帳篷林立，都很現代化，混在集裝箱裡運入境內。外國還通過各種渠道及貿易形式向學生大量捐款。學生能在天安門待下去有兩個

原因：一是沒有法律規定，沒有足夠的警察力量，四十年太平盛世，使我們在這樣的問題上缺乏思想準備。二是當時中央有兩個聲音。」

這麼看來，儘管外界到現在為止都不了解江澤民在六·四事件中的作用，但是他後來對季辛吉說的這番話，說明在6月4日出動軍隊前的晚上，江澤民肯定是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一起到天安門城樓或人民大會堂頂上，察看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而且也必然參與了對第二天行動的討論與決策。

對江澤民來說，這個「總書記」完全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自己有朝一日會登上中共權力頂峰的寶座。因為正當北京天安門局勢告急的時候，他在上海勒令《世界經濟導報》停刊，開除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不但弄得上海滿城風雨，而且激起北京和全國的抗議，以至國外的強烈反應。

5月4日，江澤民到北京開政治局會議，當場遭到所有人的指責。趙紫陽說，你在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負責。芮杏文說，我們在北京救火都來不及了，上海的事情你回去自己想辦法解決。

開完會，江澤民回到上海，兩次在幹部大會上用上海話說，「我成了縮頭烏龜」，意思是做錯了事，見不得人了。後來他一面向欽本立賠不是，找巴金、馬達、李銳等人出面打圓場，要欽本立不必作檢討，對事件過程寫個文字說明就行了；一面又派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當政治密探，到北京去摸海裡（中南海）的情況。

那幾天，北京風緊雲急，政濤翻滾，情況變化莫測，誰也不知

道將來會是什麼樣的結局。江澤民起先擔心趙紫陽從朝鮮回北京，對亞洲銀行會議發表講話之後，會使局勢緩和下來，擔心自己處理《導報》事件「可能偏左了」，將來趙要跟他算賬。為了預防萬一，江已經做好安排，準備讓處理《導報》事件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至立給他當替罪羊。

但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江澤民猶豫不決，考慮要不要轉彎的時候，與黨內元老有聯繫的曾慶紅（乃父曾山在三十年代擔任過江西蘇區省主席），在北京嗅到了元老可能要對趙紫陽下手的政治氣候，因此勸江澤民先沉住氣，不急於表態。結果局勢果然很快翻了過來，趙紫陽被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抹掉，江澤民卻由於受過趙的批評因禍得福，被鄧小平和元老們看中，取趙而代之。

曾慶紅給江澤民立下了汗馬功勞。後來江澤民上台才一個月，就把曾慶紅從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提升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共十四大後又升為正主任）。有的資料說曾慶紅是江從上海帶到北京來的，這是訛傳。因為曾慶紅在北京的母親病重，他為了探望母病而到北京來的時間，比江澤民還早半個月。但自此以後，江澤民就對曾慶紅倚為股肱，一再提拔，曾成為總書記身邊最紅的紅人。

江澤民為什麼被鄧小平和一班元老重臣們挑選為新的接班人？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們從政治上考慮，覺得胡耀邦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只抓經濟改革，放鬆「四個堅持」，一手硬，一手軟，差一點



鄧小平(右)選擇江澤民(左)作為他的欽定接班人。

葬送了中共的社會主義江山。江澤民在上海的幾年，兩手都抓，而且跟「正確路線」跟得緊。1988年北戴河會議期間颳起一股批趙之風，江澤民就在上海聞風而動，下半年由「新華社」分社社長徐光春召開老同志座談會，提出既要改革開放，又要「四個堅持」，不能一手硬，一手軟的主張，事後把座談會的情況報給中央。但是趙紫陽看了說，這個問題已經在黨的十三大上解決了，就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主，可見江在政治上早已跟趙有分歧。特別是在最近這次全國性動亂中，老人們覺得江澤民表現得政治堅定，手段強硬，使上

海安然度過危機，因此對江作出了「柔中有剛，能掌好舵」的評介。

其次，江澤民是中共歷來領導人中唯一知識份子出身，既有文化知識，又懂現代科技，而且從基層、地方到中央，具有長期工作經驗的人。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江澤民曾經留過蘇，在羅馬尼亞當過專家，改革開放年代裡擔任過中國進出口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與第一機械部的領導，率領中國經濟特區考察團出國考察過亞洲、歐洲與拉美國家的十幾個出口加工區，回來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過匯報。江澤民自己說過：「我是按台階一級一級上來的。參加革命至今，有二、三十年在基層工作，十九年在領導機關工作。我的工作涉及機械工業、電子工業、電力、建設和進出口業務。我的經驗是幹什麼學什麼。」

江澤民的經歷，無疑成為他被選拔的重要因素。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江澤民作為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對前來上海休假、養病以至過路的元老們以至他們的家屬百般奉承，深得他們的歡心。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這些King Makers和毛澤東一樣，平時最喜歡到上海來小住，因為上海的條件好，比北京還舒服。外人有所不知，從1988~1994年這七年間，鄧小平每年都是攜老帶小，到上海來過春節的，而且，有時一住就是好幾個月。

在北京局勢最動盪的日子裡，鄧小平他們曾經扳著指頭考慮過，由誰來接替趙紫陽當黨的總書記：楊尚昆作為軍方領導脫不了與六·四事件的血腥關係；薄一波太老，姚依林、宋平太保守，李

鵬宣布戒嚴一副凶相，他們都缺乏一個開明的改革開放的形象。在北京、上海與其他地方領導幹部中，只有江澤民最理想，既有推行改革開放的經驗，又能在政治上把關，跟天安門事件沒有瓜葛，上海又沒有出亂子。鄧不想因為趙紫陽下台而把改革派「斬盡殺絕」，也不願意讓保守派統領全局，最佳選擇就是推出一個中間派的新人出來，各方面人士比較容易接受。因此，鄧小平不得不讓楊尚昆曝光，讓李鵬當惡人，而把江澤民放在後台，一到時候就讓他出場亮相。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接見政治局常委新班子時是這樣說的：「什麼事都有個比較，比過來，比過去，現在該輪到他（江澤民）了」。

這樣，江澤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就從上海灘一腳踏進了中南海。

左右搖擺 從馬拉松到百米衝刺

一腳踏進中南海，是禍還是福？中南海的水有多深，水溫有多熱？

掉進去能如魚得水呢，還是曾經不起風浪，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被險惡的政治浪濤吞沒，沉入「海」底？

江澤民雖然坐上了總書記的交椅，但是畢竟他的資歷、才幹、威望與政治經驗遠遠不足以應付這樣大的局面，因而對自己的政治

前途捉摸不定，惴惴不安，一切都得小心翼翼。他沒有把夫人王冶坪接到北京來住，也沒有要求安排總書記的官邸，只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原來胡耀邦住過的大辦公室套間裡暫時安身。無論趙紫陽或李鵬，在中辦和國務院都有一個班底，都已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基礎。但是江澤民單槍匹馬來到北京，孤家寡人掉在「海」裡，徒有空名，不掌實權，不知道如何開始，從哪裡開始，行使他的總書記職務。

那年六·四之後，北京流傳過一個政治笑話：有一天，鄧小平、楊尚昆、李鵬與江澤民出去散步，看到一頭毛驢站著不動，擋住他們的去路。鄧先叫楊李去把毛驢趕跑，他們兩人上前向毛驢吆喝道，你再不走開，我們要派戒嚴部隊來趕你走了，但毛驢照樣一動不動。於是鄧又叫江澤民上去試一試。江過去對著毛驢耳朵輕輕地嘀咕了兩下，毛驢驚慌地跑開了。鄧小平很奇怪，問江用什麼辦法把它趕跑。江回答得很簡單：我只是警告那頭驢子說，你要再不走，小平同志要任命你當總書記了。鄧聽了不禁哈哈大笑。這個笑話，實際上是從一個從前諷刺越南的笑話改編過來的。

陳雲讚賞江澤民「辦事穩，有見解，不跟風，坐得正」。但幾十年來，中共的政治風向經常隨著領導人的思想、主張甚至個人好惡而變。下邊的人，即使身在中央的人，也得隨時觀察風向，見風使舵，以便在波濤洶湧的政治局勢中求得生存發展。對剛剛出頭的江澤民來說，更是如此，坐在中南海裡，不聽風觀雨，不往主流派一邊靠，能行嗎？

天安門事件後的北京，左派保守派聚集在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的名下。在國務院有李鵬掌權，黨組織人事系統有宋平把關，宣傳部有鄧力群，再下邊則是中宣部的王忍之，《人民日報》的高狄，廣電部的艾知生，教委的何東昌，文化部的賀敬之，「左家軍」真是人多勢眾，影響力大，即使總書記也得對這股勢力另眼相看，忌他三分。

當時中共黨內在政治與政策上的主要爭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改革開放要實行到什麼地步，有沒有界限？另一個是對美政策究竟是硬是軟，用什麼辦法來跟老美鬥爭？鄧小平儘管表面上超越於兩派之上，希望繼續推行改革開放，但因為他在天安門事件與挑選胡趙兩人問題上已經跌了交子，受到保守派的責難與制約，也不得不對他們有所遷就。

江澤民過去跟這幫人並無很深的聯繫，雖然他在腦海裡有很多左的潛在意識，但也算不上是鐵杆兒左派。然而在六·四後左派占上風的情況下，江在政治上對自己的選擇與定位，只能是離右遠一點，盡量往左靠。他是靠了鄧小平才當總書記的，但即使鄧本人，這時也感到力不從心，江如果往鄧那邊靠得太緊，就會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對他自己不見得有多大好處。反過來說，既然已經有了鄧小平的保護傘，至少暫時是保險的。因為事不過三，鄧小平接連兩次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抹掉了，才把江扶上台，難道會馬上再來一次，把他趕下台嗎？

出於這種政治計量學的精密計算，江澤民在靠左登基之後，仍

往左靠，決定虛跟鄧，實跟左，往陳雲、李先念那邊靠，想盡量取得保守勢力的支持，以便鞏固自己的權位。

請看江澤民在六·四之後最初幾年內的一系列言行：

1989年6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舉行的黨外人事座談會上說，「要下決心把那些製造暴亂與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幕後指揮者，各種非法組織的骨幹分子，和進行打、砸、搶、燒、殺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分子徹底清查出來」，從嚴懲處。

1989年7月1日，他在中央組織部紀念七一黨的生日座談會上說，北京平息暴亂，再一次證明「中共不愧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這話本來是毛澤東多年前說過的，由於發生了文革鬧劇慘劇和天安門悲劇，使得中共在人們心目中威信掃地，已經沒有人好意思再講了。但是江澤民明知不符合實際，也硬著頭皮要把吹捧中共的調子升到高八度。他這話不是講給中國的老百姓聽，而是為了討好那班老頭子們才講的，讓他們覺得這回選他沒有選錯。

1989年7月8日，他在駐外使節會議上說，「我很欣賞邱吉爾的話，要把蘇俄扼殺在搖籃裡。今後對鬧事就要扼殺在搖籃中。」

1989年9月29日，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發表的講話中指出，共產主義在中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世界社會主義終將最後戰勝資本主義」，被西方記者認為「充滿了過時的意識形態語言和傳統的社會主義詞句。」

1989年12月29日，他在黨建理論研究班上多次強調反對和平演

變的重要性，譴責「國際敵對勢力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支持、收買、培植社會主義國家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實際上是把美國當作與中國敵對的勢力來對待。

1989年5月26日，江澤民、李鵬一起到外交部視察，江對外交部幹部說：反對帝國主義與和平演變的鬥爭是長期的。我們心裡一定不要忘記反對和平演變與反對顛覆活動的鬥爭。

1991年7月1日，江在講話中指出，「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線。」

這是改革開放首先要問一問「姓社」、「姓資」主張的最早版本，以後被左派分子大量反覆引用，並且在宣傳中加以廣泛引申。

江澤民還說過，現在問題是分配不均，為了縮短貧富差距，要使個體暴發戶破產。他反對西方流行的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匯合論」。他還提倡學習列寧在一個世紀以前寫的已經完全過時了的「帝國主義論」。總而言之，無論對內對外，江澤民的觀點都是從馬列老祖宗、老本本中抄來的左的理論，脫離實際，左得可愛。

江澤民對改革開放的這種態度，當然會引起鄧小平的不滿。鄧小平在1992年一、二月間到南方巡視，沿途作了一系列的講話。他說，「我在北京講話已經沒有人聽了」，「改革是大勢所趨，得到全黨全國的擁護，誰不願改革誰就下台」，等等。回到北京，鄧又在參觀首都鋼鐵廠時大發議論，說「有的同志政治上再強，不懂經

濟不行」，其主要矛頭就是針對江澤民的。

江澤民被擊一猛掌之後，才猛醒過來，知道事情的厲害，於是急起直追，馬上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子，以百米短跑的姿態往改革開放的跑道上猛進。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對省級幹部進修班說：在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一切有用的東西時，「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膽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辦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被姓社還是姓資問題的抽象爭論束縛自己的思想和手腳，邁不開前進的步子」。關於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問題，他表示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江澤民說的這些話，跟以前說的正好相反。如果前後作一對比，江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好比從萬米馬拉松慢跑，一下子變為百米衝刺，前後判若兩人，因此有人就給他扣了一個「風派」的帽子。不過，中共歷來這麼多領導人，難道只有江澤民是風派，就沒有別人是風派了嗎？幾十年來，中共的政治一直是左右搖擺，反覆無常的。上面玩弄左右兩手，下面見風轉舵，成了中國政治生態的特點與必然現象。毛澤東要颶風下雨，誰敢不跟著風聲倒來倒去。鄧小平一會兒左，一會兒右，無論以右制左，或者以左制右，都是為了黨國，誰敢不聽，誰敢不跟？李先念是最大的風派，所以他就能成為不倒翁。張聞天、彭德懷是敢於大膽直言的炮筒子，所以他們就遭到羞辱和清洗。胡耀邦天真地以為思想解放沒有個邊，趙紫陽敢於獨立自主，抗拒元老的命令，他們最後全都被強烈颱風颶倒

了。

跟風，是政治生存的需要；風派，是中共鬥人又鬥己政治的必然產物。無論誰坐上總書記的寶座，都必須跟著風跑，否則就逃脫不了那十二級的政治颱風，江澤民也絕不能例外。他能夠歷經颱風而生存下來，倒反而證明他的本事比別人強。

無奈錯打蘇聯牌 舊地重遊莫斯科

在最初兩年內，江澤民名義上是主政，實際上是權力架空，只能浮在面上，講空話。

國內問題是如此，外交問題更不用說。當時李鵬大權在握，重大外交問題的決策和執行，主要由他掌管，江澤民很難插手。在天安門事件以後的三年內，為了打開外交孤立的局面，李鵬以總理身份先後出訪了亞洲、中東、歐洲的二十多個國家，楊尚昆以國家主席身份出訪了十幾個國家，而江澤民作為總書記卻只訪問了北韓、日本、蘇聯三個近鄰國家。

1991年5月15日，江澤民帶了國防部長秦基偉、外交部長錢其琛、中聯部長朱良、外經貿部長李嵐清、中辦主任溫家寶離開北京飛往莫斯科。

到了蘇聯，江澤民除了與戈巴契夫舉行會談，簽訂有關劃定中蘇東段邊界的協定，參加克里姆林宮盛宴之外，還對蘇聯公眾發表

長篇演講，上電視台講話，舉行記者招待會，觀看文藝演出，在中國駐蘇使館會見當年從事中蘇友好活動，對中國懷有友好感情的蘇聯各界代表四百多人，和他們握手、擁抱、交談，一起歡唱革命歌曲。為了顯示他個人與蘇聯的特殊關係，江還特意舊地重遊，訪問五十年代他曾在那裡實習過的莫斯科利哈喬夫汽車製造廠。

江澤民表示，他這次訪問，是對兩年前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回訪，希望此行能給「日益發展的中蘇關係以新的推動」，要蘇聯相信，中國「將一如既往，辛勤耕耘，精心培育，使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樹枝繁葉茂，四季常青。」

江澤民難道真的是為這種舊情復燃的中蘇友誼深深地陶醉嗎？其實，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而已。當江澤民訪問蘇聯的時候，這個國家正面臨著嚴重的經濟衰退、極度的政治動盪以及蘇維埃聯盟走向分崩離析的深刻危機。訪問過後還不到三個月，蘇聯保守派就發動政變，而政變又馬上短命地夭折，跟著就是蘇聯解體和戈巴契夫下台。最後，照耀了七十多年的克里姆林宮頂的紅星熄滅了，不可一世的蘇維埃紅色帝國和羅馬帝國、大英帝國一樣成為歷史的陳跡了。這一切，都跟江澤民訪蘇時所做的美夢完全相反，使他充滿主觀色彩的講話成為無情的諷刺。

蘇聯當時的形勢已經如此動盪不定，前景莫測，江澤民還要前去訪問，其目的完全是為了拉蘇聯來牽制美國。

1990年12月中旬，中國駐莫斯科使館發給北京一份關於蘇聯局勢的分析報告，指出蘇聯軍方似有介入政局進行干預，蘇聯政局要

發生劇變的可能。後來，中共領導估計，蘇聯保守勢力抬頭，戈巴契夫往左靠，莫斯科決定對波羅的海三國用兵，美蘇關係不大好。蘇聯如能保持穩定，戈巴契夫能站住腳，會使局勢有助於中國牽制美國。反之，如果蘇聯變成了美國的小伙計，那將對中國和世局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對於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問題，中國內部有爭論。江澤民認為雖然大三角的內涵發生變化，但不能認為已經不存在了。江的訪蘇之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決定的。

當然，美國此時也在密切注視蘇聯局勢，並相應地觀察中蘇關係的變化。但華盛頓的觀察分析及其對蘇政策，顯然要比北京客觀現實得多。

在江澤民訪蘇前後，由於駐美使館的兩名政治參贊輪流回國休假，我一個人暫時要兼管中美、中蘇、美蘇關係、東歐與西歐形勢，因此與國務院主管蘇聯和歐洲的官員，主要是助理國務卿幫辦凱曼、蘇聯處處長維什波、代處長奧德威、裁軍署長助理萊賽以及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索南費爾特與大西洋理事會歐洲問題學者斯維爾什等美國學者不斷接觸。從他們那裡了解到的看法，遠比中國官方與學者的看法更為符合蘇俄的實際情況。

這些美國官員與學者認為，戈巴契夫正在左右搖擺，時而往強硬派靠，時而又想跟葉爾欽妥協，想借助於他來平息群眾的不滿，制約軍方的壓力。美國的態度是，只要戈巴契夫能站住，就要支持他，因為有他比沒有他好，戈巴契夫總比蘇共強硬派亞佐夫好。但戈是長不了的，前美國裁軍署長埃爾德曼在他最後倒台前就預言，

戈拖不過1991年底，蘇聯可能發生大動亂。

對於中蘇關係，美國也是心裡有數，知道雙方走不了多遠。國務院蘇聯處長維什波五月間對我表示，「現在已經不存在中美蘇戰略三角，形勢變了。美國並不擔心蘇聯打中國牌，或者中國打蘇聯牌。」戈巴契夫要求參加西方七國會議，他把解救蘇聯經濟的希望寄託在西方援助。為了發展與美國的關係，他也不會打中國牌。何況蘇聯內部對中國的看法有分歧。改革派不贊成中國的現狀，強硬派也不可能和中國結盟。」

相比之下，北京對蘇聯形勢的估計與對策是多麼不切實際，連蘇聯政治脈搏跳動的快慢強弱都把握不住。它至少有三個基本失誤：

第一，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欽兩人都估計失誤。認為戈仍然忠於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還能站得住，因而要對他押寶，要拉他一把。而葉爾欽則是馬列主義叛徒，即使葉想拉北京的關係，要求與江澤民會見，江卻因為他是戈的對立面而無情拒絕。

事實上，無論是戈是葉，都已經摒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雖然蘇聯垮台是由於本身內部的深刻原因所致，但戈與葉卻共同扮演了「蘇維埃社會主義祖國」掘墓人的角色。

第二，以為戈巴契夫需要借助中國的支持來制約美國，同時又高估中國有足夠的份量來牽制美國。其實戈對美國的要求遠遠超過中國，中國所能提供的一切，根本滿足不了蘇聯的需求。即使北京提供三百萬噸糧食可以一時解蘇聯食品缺乏的燃眉之急，但這不過

是九牛之一毛，算得了什麼呢？莫斯科難道會揀了芝麻、丟了西瓜，為了取得中國的支持而去冒犯美國嗎？

第三，北京以為，通過江澤民的莫斯科之行，可以給華盛頓一點顏色看看。既然過去毛澤東能打美國牌來制約蘇聯，今天必要時也不妨反過來向美國打一打蘇聯牌。即使中國龍與北極熊不能結盟，相互擁抱一下也足以使人寒心。但這種盤算完全落空了，在波斯灣戰爭之後，兩個弱者加起來也成不了一個與美國對手的強者，美國根本不在乎。

這樣，江澤民五月間在莫斯科的大吹大擂，過不多久就變得無聲無息了。

由於江是以總書記名義出訪的，為他這次訪蘇之行負責籌畫和準備講稿的主要是中聯部。它是中共中央從事國際共運並與各國兄弟黨進行聯絡的機構，向來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得很左。它曾竭力支持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與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但因為是黨的機構，其地位往往凌駕於外交部之上。這一回中聯部因為缺乏調查，脫離實際，讓總書記在訪蘇之行中大唱空城計而丟了臉，按理說隨行的中聯部長當然難辭其咎。一度傳出中國領導想撤換朱良，調外交部副部長田增佩去接替。然而拖了很久，因為田已到退休年齡，最後換成了另一位年輕的副部長，黃鎮的女婿戴秉國，在中共十五大後當了新任的中聯部長。

總書記對美國：嘴上硬心裡熱

江澤民是烈士子弟，早年加入中共，學過馬列著作，崇拜過蘇聯，又在莫斯科有過一段經歷，所以心裡總有個蘇俄情結揮之不去。1997年他重訪莫斯科時，曾遠道前往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故居雅斯納亞巴良那去參觀，可見他對俄國文學心嚮往之，與俄國的淵源很深。

比起對蘇聯的情結來，江澤民對美國的感情顯然要淡薄得多。他最早和美國的聯繫，可以追溯到他早年求學的揚州育才中學。因為那是一所由美國教會辦的學校，校內的老師、教材、生活與作風，肯定會有相當的美國味。江澤民在那種環境裡究竟受到過多少影響，現在還無法證實。

但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注意，1986年上海鬧學潮的時候，江澤民到母校交通大學去講話，被學生噓他。江就當場對學生背誦起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詞來，把學生鎮住了。雖然全文只有幾百個字，但因為林肯在這篇短短的講話中提出了「民治，民有，民享」的主張，成為美國政體之根本，也為後世所傳頌。問題是，江澤民是在什麼時候，為什麼把林肯的演講全文倒背如流，念念不忘的？他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著作也會下同樣的功夫，背得滾瓜爛熟、脫口而出嗎？這是不是說明，即使他信奉馬列，內心卻仍然保留著對美國資產階級總統林肯的敬意？

有相當諷刺意義的是，和當年鄧小平曾經在法國一個由美國老

閩經營的哈金森工廠做過工一樣，被奉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一生中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也是一家生產糖果餅乾與冰淇淋的美國公司。1947年7月，他從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據傳他本來差一點要到台灣日月潭水電站去工作。因為他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黨組織要他留在上海。正好這時美商海寧洋行招考電機人員，他就去應徵報考。應考時，美國人認為他的英語表達能力不算好，但專業知識相當不錯，洋行正需要電機方面的人才，就錄取了他。雖然那時江澤民已經從事地下學運工作，以革命為職業，但在名義上，他總是一名被美國公司雇用的職員。

上海一「解放」，中共軍管會就讓具有地下黨員身份的江澤民參加對海寧洋行的接管工作，讓他擔任改名為益民食品廠的副總工程師。從此，幾十年來，步步高升，一直登上總書記的最高職位。

從江澤民的經歷看來，無論是七十年代在北京，八十年代在上海，他作為一機部外事局、國家進出口委員會或外資管理委員會的領導，在工作中接觸得最多的還是香港、東歐、日本與第三世界國家，跟美國很少往來。現有資料表明，1980年，江澤民曾以進出口委副主任兼秘書長的身份，接待過由美國著名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主席弗里曼、陸軍工程師莫里斯中將、墾務局長希金生領導的三峽考察團，與他們進行了交談。江澤民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是在他當了上海市長以後，作為上海與舊金山姐妹城市交流互訪，而光臨美國西岸的這個最大城市。

六·四天安門事件，把江澤民拋進了中南海。但在最初兩年

內，江澤民主要是管內務，抓政治，很少涉足外交活動。因為實權抓在李鵬手裡，況且中美關係惡化，江澤民很少管對美外交，會見美國客人。

當時有些事情顯出江李之間關係不大融洽。有一次季辛吉訪問北京，江澤民和李鵬先後與他見面交談。但當晚黃金時段的電視新聞中，江會見季辛吉的鏡頭一晃而過，李鵬的場面卻延續了兩三分鐘，前後輕重之別很明顯。事後江辦打電話給國務院外辦主任劉華秋責問這是怎麼回事，劉很為難，只好要求北京的報紙在第二天頭版新聞報導中把江的位置處理得比李鵬更為突出，作為彌補。江李兩人，雖然差不多同一時間在蘇聯待過，但八十年代後李鵬地位一直在江之上。1983年江被提拔為電子工業部部長後，下一年兼任國務院電子振興小組副組長，組長即為李鵬。1987年6月，江澤民當上海市長時，中國從國外引進的最大項目寶山鋼鐵廠的原料碼頭出了事故。李鵬為此趕到上海，在江澤民陪同下到現場進行視察，江還對李鵬匯報了上海市的工作。因此，對江澤民越過他當總書記，李鵬內心很不服氣。

作為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江澤民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對美國的態度究竟如何？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江澤民對美國問題與中美關係十分重視。因為中美關係不光是中國的頭號外交問題，而且密切關係到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對外關係，還牽涉到台灣問題。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如果中美關係處理不好，兩國處於對抗狀態，中國就不可能得到穩定

的發展。而作為中國的頭號黨政領導人，江澤民必須在中美關係上有所作為，避免發生衝突，爭取穩定發展。因此，不管江澤民受到環境條件的制約，有時不得不對美國說一些強硬的話，但在他心底是絕對希望把中美關係搞好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江澤民在中美關係上的最初表現可以說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因為最初不大了解實際情況和不處理具體問題，所以講話內容比較空泛，有點不著邊際；另一個是表面姿態強硬，但公開沒有像李鵬那樣說硬話，實際上很希望中美和解。

例如，1989年9月4日，北京《光明日報》刊登文章批尼克森，這是中國自從1972年尼克森訪華以後從來也沒有過的事。外交部搞不清來頭，主管美國事務的副部長朱啟禎有一天見到江澤民時就問及此事。江說這不是中央的有意安排，現在下邊有的事上邊不知道，他本人不同意公開批尼克森。這個態度與李鵬不一樣，他對《法國世界報》記者發表談話，還點名攻擊了在任美國總統布希。

1991年5月8日，即將離任回國的美國大使李潔明向江澤民、李鵬辭行。本來李潔明還想多見一些人，但是李鵬說，別的國家大使都沒有這種待遇，為什麼美國大使就特殊，對李的要求加以拒絕。但江澤民見李潔明時，還對他說了幾句好話，認為在中美關係處於低潮時，李作為美國大使還是作了很大的努力。江說，中美價值觀念不一，我們不反對國際關係有時與意識形態有關，但是雙方應該尋求共同利益。不過，他又要求李潔明轉告白宮，「希望布希總統不要因為國內政治問題的考慮而影響中美關係。」

這就完全是外行話了。作為美國總統，布希首先要考慮的是國內政治，因為他的權力受到國會制約，不能不設法與國會周旋，有時候甚至要如臨大敵似地打一場爭奪戰。由於天安門事件後中美關係成為兩黨爭執的國內政治問題，布希怎麼也不可能撇開國內政治來單獨考慮和處理對華政策與中美關係問題。江是向這位美國大使提出了一個對方實際上無法辦到，因而也不可能引起重視的問題。

江澤民可能感覺到自己對美國的情況了解有限，而將來如要進一步掌握對美外交的實權，必須對美國有更多的了解，因此要求駐美使館提供一些關於美國背景情況的深度分析。

1991年6月間，朱啟禎大使找我談話，布置一項任務。他說，去年他回國休假見到總書記時，江要他談談美國政治與民主自由的問題。因為他沒有準備，而且對這方面的情況不夠了解，他當場沒能交卷。今年七月中旬，他又要回北京，會見到總書記，萬一再問起這個問題，需要事先有所準備。最好你起草一份文字材料，好向江交代。朱說，你是搞大東西的，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吧。

由於當時別的參贊回國休假，我的任務已很繁重，但我不便拒絕。只好參考了不少美國書籍，還約請德拉瓦州華人副州長吳仙標先生在使館附近的希爾頓飯店進行交談，了解他對美國民主利弊得失的看法。最後以一個星期不完整的時間，寫出一份題為《關於美國民主自由的幾點基本看法》，長達十七頁的文稿。文內對美國的「天賦人權」、兩黨制、三權分立、總統、國會與選舉、權力與權利分配，以及美國民主自由對世界的影響等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

介紹、分析與論述。雖然總的說來，這篇文章不可能完全離開共產黨的基本觀點，但它根據事實來說理分析，而不以馬列教條來妄加武斷，可以說是中國歷來關於美國民主自由問題最客觀、最完整，也最具理性分析的一篇文章。

特別是針對天安門事件後，北京高層有人認為美國總統與國會在對華政策上演雙簧的錯誤說法，我在文內塞進了這樣一段有針對性的話：

「國會與總統爭權是真實情況，並非在唱雙簧。……民主黨因為在其他問題上抓不住布希的辮子，他們更熱中於拿中國問題來作文章，攻擊總統。……因此現在中國問題已經成為國會與總統、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一個政治問題。」

1991年7月上旬，朱啟禎拿了我的這份稿子回北京。過了一個月回來，在餐廳裡遇見我。他端著一碗剛打好的菜，站著對我說：「你的東西送上去了，也報了你的名字。江本人看了，說很好。」這件事就算打發過去了。

朱說的是否事實，江是否看了我寫的東西，這功勞究竟記在誰的帳上，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因為我馬上就要退休了，這件事對我既沒有壞處，也不會有好處。如果江看了真的說好，那說明我寫的東西對他有用，而且對他了解美國產生了影響，這樣，我的目的也就算達到了。只是我在緊張的日常工作之餘日夜趕寫這篇長文，累得疲憊不堪，連日尿出血，就沒有人來過問了。

江澤民真正開始插手對美外交，大概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波斯灣局勢緊張之後。

1990年12月底，朱啟禎回北京匯報工作時見到江澤民。江與他討論波斯灣局勢，了解美國的意圖。在談話中，江澤民表示他一直很關注地閱讀駐美使館發回來的電報，注意所有與美國交涉的情況。他說，現在鄧小平要他親自過問對美外交，他自己也很想與駐美使館建立直接聯繫。鄧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以及為什麼要求江親自抓對美外交的，不得而知，但在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1989年訪問北京，與鄧會見時，鄧曾要求美國邀請江澤民去訪問，顯然是因為李鵬令人厭惡，要讓江出頭。朱啟禎後來對使館政治組說，中央很重視駐美使館的來電，我們的任務很重，起了重要作用。中央需要更多材料以便進行決策，如果要提具體建議，必須十分慎重。

江澤民如何親自過問對美外交，準備插手到什麼程度，與李鵬如何分工？下邊的人並不太清楚，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從那以後，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江澤民改變對改革開放的冷漠態度，在中共十四大上獲得鄧小平的重新授權，接著當上國家主席之後，他對美國問題和對美外交越來越有興趣，也涉足得越來越多了。

1992年11月30日，中共十四大後不久，美國大選後第一個國會議員團訪問中國。江澤民在會見它的領頭人眾議員施羅德女士時，第一次拋出中國對美政策十六個字的四句話：「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避免對抗。」

在此後好幾年內，海外媒體都誤以為這是江澤民的創造，實際上這是一年前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鄧小平的話。雖然中美關係的實際狀況並不能達到這十六個字所希望的地步，而且後來發生了李登輝訪美，中美關係大倒退的情況，但總的來說，北京仍然是以鄧的這個「十六字令」作為對美政策依據的。

1992年12月3日，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波倫來訪，江澤民又對他強調中美兩國應當在三個公報基礎上發展關係，雙方有合作的共同點與利益的匯合點，國際上可以合作，經濟上有互補，要著眼於未來。

後來，江澤民要求外交部美大司為他多安排會見一些美國客人。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國際地位的提高，江本人地位的逐漸穩固，江會見的美國來客越來越多。其中既有美國高級官員，國會議員、也有企業鉅子和新聞媒體代表。江在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氣派也越來越顯得自信。除了一再重申遵守三個公報對發展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之外，他更加強調中美兩國對於世界的責任。比如，1994年5月12日，江在再次會見季辛吉時說：「中美兩個大國，對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負有重大責任，應當為世界人民做些事情。」這種口氣，聽起來不是有點像當年赫魯曉夫與布里茲涅夫在蘇美爭霸時期，想由兩個超級大國來主宰世界的味道嗎？

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我跟一些美國官員與美國學者進行接觸交談，他們都認為江澤民表現得很左，又沒有權力基礎，只是靠了鄧小平的扶持才能存在，一旦鄧與世長逝，江就不一定能站住腳。

相反，喬石為人穩健，經驗豐富，主管政法，在公檢法三個部門，包括武警部隊，有很大的權力與影響。喬石平時不大說話，但也從來不說大話。雖然他說的話都是老一套，沒有新意，但這正是他的厲害之處，使人抓不到辮子，給自己將來留有餘地。當時美國沒有人想到要邀請李鵬或江澤民來訪，卻有人傾向於讓喬石到美國國會中講話。

但是李登輝訪美，台海發生危機之後，美國朝野感到江澤民對台灣問題和對美政策的態度要比其他領導人溫和現實，在內部受到責難與壓力。相反，喬石、李瑞環等人卻在那時大發狠話，與軍方強硬派唱同一個調。1996年1月1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我寫的〈喬石一席話，台海起陰霾〉一文，引起了一番轟動。因為文內透露喬石曾對一位海外華人學者表示，中國不怕美國，如果美國軍事介入，即使向中國發射核彈，北京也能報復反擊，其基本內容與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所透露的中國軍方人士談話差不多。《海峽時報》第二天譯載了我的這篇文章，引起美國有關人士的注意。從那時起，喬石似乎失去了美國人對他的好感，有的人甚至認為，喬石在台海危機中的表現，讓人覺得他是一個「政治機會主義者」。

對於美國有關人士的這種看法，作為一個關注中美關係的學者，我在交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美國高估了喬石，低估了江澤民。1996年11月16日，我應邀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SAIS）舉辦的「中國論壇」上發表演講，題目是《江

澤民能成為鄧後的中國強人嗎？》

這個論壇，是華盛頓最負盛名並有較大影響的中國問題論壇。歷來演講的都是第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和政府高級官員。在我之前的幾名演講人是：美國助理國務卿羅德，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尼可拉斯·拉迪、喬治·華盛頓大學西格爾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戴維·辛波（沈大衛）。我是歷來能夠登上這個講壇的極少數中國學者和外交官之一，過去只有章文晉大使在八十年代初被邀請演講過。

前來參加聽講的約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與美國新聞署的官員，美國前駐華大使恆安石、著名中國問題學者鮑大可，SAIS的中國問題研究系主任密勒，國會議員助手，加拿大、俄國、澳大利亞與新加坡的外交官，香港經濟貿易代表處官員，以及常駐華盛頓的一些中文媒體記者。

我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的強人時代已經過去，江澤民不可能成為像毛鄧那樣的強人。但是江與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不同，他在位時間長，得到鄧的扶持，策略靈活，富於政治手腕，在權力鬥爭中扳倒了對手，爭取到了軍方的支持。人們很難從江澤民一時的言論來斷定他傾向於左還是右。對他來說，左或右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什麼時候需要左就左，什麼時候需要右就右。江澤民的根本目的是要求得中國的穩定發展，並由此而保持他個人的權力地位。

鄧小平逝世後，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湯姆斯來

函邀請我在1997年3月18日到亞太小組的聽證會上就鄧後中國局勢作證。同時被邀作證的還有剛剛卸任的負責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羅德，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喬治·華盛頓大學艾利奧特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哈定。美國C-SPAN電視節目對這次聽證會全場轉播了兩個小時，並連續播放四次。湯姆斯議員邀請我，是因為參議院外委會的議員助手聽過我在SAIS「中國論壇」上關於江澤民的演講後，覺得我對江的評介客觀公正，而向亞太小組推薦的。

我在聽證會上指出，鄧後最重要的問題，是「江澤民有沒有能力確保自己是鄧的繼承人」，而現在「多數人低估了他」。實際上江在中共十四大後已經逐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今後美國政府跟江打交道時，應該把他看成是跟毛鄧不同的新型的中國領袖。江是一個來自底層，受過儒家思想、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正統馬列主義教育的人。他既不左，也不右，是個講求實效的人。」我還說，「江澤民願意改善中美關係，希望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不過他仍然面臨各種困難與挑戰。

在聽證會上，湯姆斯議員還對作證的人提出問題。他問我中共十五大後中國的總理人選將會是誰。我毫不猶豫的回答說，很可能是朱鎔基。那時離九屆全國人大召開的時間還有一年。事後證明我的預測是正確的。

在九十年代初期，美國一直在密切注視中國高層的權力結構與權力分配情況。對於江澤民，跟他接觸過的美國官方人士都認為他

只尚空談，權力架空。1993年11月中旬在西雅圖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首腦會議上，柯林頓與江澤民曾經有過會晤。美方利用這個機會對江進行了打量，得到的印象是沒法跟他解決問題。所以自此以後，柯林頓在國際場合不再與江個別接觸，在1995年莫斯科舉行歐戰結束五十週年時拒絕與江單獨會見。

這種情況，直到1995年紀念聯合國成立五十週年才發生變化，柯林頓與江澤民在紐約進行了友好的會見，並確定中美兩國首腦互訪，為使兩國關係恢復正常化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尤其是1997年鄧小平去世，江澤民進一步掌握中共領導權後，美國才完全改變了對江澤民的態度，把他作為一個大國首腦來對待。

1997年江澤民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表現了他有別於老一代中國領導人的風格與特點，對推進中美關係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後，我參加了由國會資助建立的學術研究交流機構——威爾遜中心，關於江訪美之行的一次關門討論會，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主任貝德在會上肯定江訪美的成就之後承認，美國過去低估了江澤民。1998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之後，對江澤民的看法才起了根本的改變，對他作出了高度的評介。

由於本書敘述和論析的範圍與時間，主要是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到1992年美國大選布希下台為止的這段期間，因此關於江澤民與美國關係的後期情況，就不在這裡展開詳述了。

第10章

錢其琛剛中有柔
力爭中國擺脫孤立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前後，錢其琛正在南美厄瓜多爾進行訪問。原定訪問古巴後再訪美國。由於中美關係急劇惡化，北京通知他延遲訪美，立即回國。在錢到紐約轉機前往南美時，韓敘大使從華盛頓前往與他會面，回到使館在小範圍內作了傳達。從錢對韓的談話來看，似乎他對國內局勢的變化並不十分清楚，說是至今只有中央軍委開會討論過局勢，政治局與中央委員會還沒有開會，趙紫陽仍為總書記。實際上趙因為自請辭職，拒絕參加5月19日中央召開的宣布戒嚴令的會議，早在5月20日就被剝奪權力，已經靠邊站了。

錢其琛一回來，馬上發現中國的內外形勢完全變了。北京從上到下人心惶惶，籠罩在一片緊張不安的肅殺氣氛中。由於中美交惡西方各國紛紛制裁，對外關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形勢急轉直下，內外困難重重，只有五十年代初韓戰時期與六十年代初中蘇分裂對抗時期的情況，才能與中國現在面臨的形勢相比。

形勢急轉直下 內外壓力重重

如果中國仍然閉關自守，與世隔絕，也許還可以照常過下去，不至於受到很大影響。但是十年改革開放步步深入，已經使中國在經濟貿易與技術方面融入世界，大大地增加了對西方的依賴程度，很難重新回到從前那種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可以跟西方不相往來的地步。

在外交上，美國與西方國家紛紛制裁，不但切斷與中國的高層往來，而且限制轉讓高科技與中止大筆貸款，使中國經濟上蒙受很大損失。雖然對中國進行制裁的西方國家只有二十幾個，只佔與中國建交國家的五分之一，但它們是中國對外開放與引進資金技術來源的主要對象，對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無論美國或是西歐日本，都對中國施加壓力，要北京停止武力鎮壓，尊重人權，並且密切注意中國是否會由此而改變改革開放政策。

同時，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基礎也在發生變化，蘇聯與美國和解，向美國靠攏，使中國對美國打了多少年的蘇聯牌漸趨失效。在力量對比與戰略態勢加速變動的情況下，中國外交上的迴旋餘地大大縮小了。

不僅如此，在中國內部，西方的制裁與改革派的失勢，使黨內保守勢力大大抬頭，國內反美氣氛明顯高漲。以陳雲為首的強硬派，主張中國發展不要依靠西方貸款，回到中央計畫經濟與自力更生的時代。他們有人說，「制裁好，有利於我們自力更生。從前國

共合作時，國民黨給八路軍、新四軍錢，內部吵的要命，後來不給就不吵了。」還有人說，「五十年代蘇聯幫助中國建設156項工程，後來停了，中國不是照樣發展嗎？我們思想上不要把外援看成是主要的，否則要吃虧，他們就拿這個來壓你。」

這些元老們，仍然懷有濃厚的老布爾什維克思想感情，總覺得美國是帝國主義，蘇聯對中國怎麼不好也還是社會主義的哥兒們，因此怎麼也難以放棄拉蘇聯制美國的想法。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當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時，陳雲、彭真、薄一波他們曾經在人民大會堂與來訪的蘇聯客人——五十年代在中國擔任蘇聯專家組組長的阿希波夫相互熱烈擁抱，對中蘇兩國歷盡曲折的關係感到遺憾，不勝歎歎，充分反映出一種無產階級兄弟之間的懷舊感情。儘管中國對美政策的最後決策權掌握在鄧小平手裡，但是中共黨內這股保守勢力卻起著很大的牽制作用。

因此可以說，當時全中國與全世界的各方人士，無論務實派與保守派，親中國或反中國，都在注視著錢其琛這位中國外長，看他如何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錢其琛顯然是面臨內外壓力，處於艱難境地，肩上扛著前所未有的千斤重擔。

錢其琛學歷不高，經歷也無特別之處。早年曾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從事地下學生運動。五十年代以青年團幹部身份派往蘇聯中央團校受訓，然後留在中國駐蘇使館工作。他是當時駐蘇大使劉曉最賞識的兩個年輕幹部，一個是錢其琛；另一個是劉述腳，後來當過駐波蘭大使與國務院外辦主任。文革期間，錢其琛被下放幹校，

1972年調任駐蘇參贊。七十年代中期，外交部起用一批中青年幹部擔任駐外使節，錢其琛由於從莫斯科發回幾篇關於蘇聯政情的分析電報，獲得當時任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好評，被挑選為駐幾內亞大使。後來他調回北京任新聞司司長，1982年提升為副部長，1988年接替吳學謙為外交部長。

錢是中共立國以後的第七任外交部長。在他以前，周恩來是舉世聞名的政治家；陳毅具有威嚴豪放的儒將風度；姬鵬飛、黃華、吳學謙皆為有資歷而少才具的紅色官僚；喬冠華雖然學貫中西、才華出眾，然而身居「危疑之朝」，不幸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雖



錢其琛是第一個從美蘇對抗時期跨進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大陸外交部長，他所面臨的形勢與任務，要比前任複雜艱巨得多。

然錢其琛是外交界的後輩，但實際上在中國七位外長中，除了周恩來是兼任外長不算外，錢在任時間是最長的。因為陳毅的任期名義上是1958～1972年，但實際上他在1966年文革之後已經喪失權力靠邊站了。其餘的人，姬鵬飛的任期是1972～74，喬冠華1974～76，黃華1976～82，吳學謙1982～88，在任時間都沒有錢其琛長。

錢以前的歷任外長各有特色，但差不多屬於同一個時代，即戰後民族反帝運動高漲與美蘇對抗的時代。錢其琛雖然「起於青萍之末」，從底層上升到權力的頂峰，缺乏前人的顯赫資歷與政治背景，但他是第一個從美蘇對抗時期跨進後冷戰時代，並且名副其實地推行全方位與全球外交的中國外長。錢所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既不局限於社會主義陣營，或僅僅立足於第三世界，也不是只從敵我關係考慮而反對誰拉攏誰，因此比前人要複雜艱巨得多。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國力增長與國際地位明顯提高，錢其琛所能施展的外交空間與開拓的外交局面，其深廣程度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工作得力，作風穩健，人望很好，錢在1982年被選為外交部出席中共十二大的代表。但當時的外長黃華為了提拔自己信任的人，竟想擅自勾銷錢的代表資格另換他人，結果激起下邊反感，反而提高了錢的威望，錢因此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86年中共十三大上又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錢其琛是1991年升為國務委員兼外長，1992年才進入政治局的。作為上任才一年的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還只能說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執行者而不是決策者。但他必須向政

治局及其常委提出形勢分析與對策建議，供中共核心領導決策。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新選出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主要是由鄧小平從政治上考慮而選拔的。除了李鵬與喬石過去涉足外事之外，其餘人都不熟悉國際外交事務，對於外交決策只能從一些根本原則上進行籠統的思考，缺乏對具體情況的了解，也沒有運用外交策略的經驗，因此這個領導班子在外交上不是一個很強的班子。

事實上，由於外交部與外交隊伍處於對外鬥爭的第一線，中國領導人對中國外交部與錢其琛個人是十分倚重的。李鵬在1989年5月間就召開外事工作會議，研討國際形勢與外交任務。1989年7月，中國又把一百五十多名駐外使節（包括總領事、商務代表與駐國際組織代表）召回北京開會，加以慰勉，面授機宜，以加強外交戰線的工作。

1990年5月，江澤民與李鵬採取了一個中國領導人前所未有的姿態，親自登門視察外交部的工作。他們分析形勢，講解政策，強調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對中國外交戰線的基本狀況表示滿意，要求所有外交人員站穩立場，堅定信念，提高素質，應付艱難的局勢。

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在天安門事件前後，中國從上到下都有人對外交部表示不滿，甚至指手畫腳，企圖從外部來干預和影響中國外交，特別是對美關係。這可以用一系列事情來說明：

——1989年5月戈巴契夫在北京與鄧小平會談後到上海訪問，正好同一天美國艦隊也到達上海。北京上邊有人就指責這是外交部想故意沖淡和抵銷戈巴契夫訪華的影響，其實美國艦隊訪問上海的

日程，是中美雙方早在六·四之前很久就定好了的。

——中美合作為中國改裝「殲8」式戰鬥機，由於美國軍事制裁而被迫中止。後來經過外交部與美國磋商，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批准，使這個項目得以恢復。但是後來中美關係出現反覆，合作項目再次告吹，外交部卻因此而受到指責。

——美國一直要求派和平隊到中國來，吳學謙在訪美時同意了。但是六·四之後中國領導人認為，這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文化滲透，予以取消，而且把賬算在外交部的頭上。

——萬里訪美，外交部與駐美使館在國內形勢十分緊張時未能及時勸阻他回國，也成了一條罪狀。

——駐美使館在天安門事件後發電回國，說中美關係已經降到了最低點，為了避免惡化爭取好轉，一再建議國內取消戒嚴，受到上邊指責，李鵬因此而覺得韓敘對美立場不夠強硬堅定。

——外交部得到美國亞洲協會資助，每年派一名低級外交官到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進修，這本來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傳到國家主席李先念的耳朵裡，就成了一個嚴重問題。他有一次在接見外賓後責問外交部的人說：聽說你們外交部還拿美國人的錢來培訓外交官，這行嗎？經他這麼一說，外交部當然不敢違抗，只好把進修的名額取消，直到李死後才恢復。

——甚至與外交根本不沾邊的國家副主席王震，也出來瞎指揮，對中美關係亂出主張。他竟然不顧一切後果，主張派解放軍「像當年在 frontline 抓舌頭（俘虜）一樣」，衝進美國駐華大使館去把

在裡邊避難的方勵之抓出來。

——外貿部長鄭拓彬到西德訪問，覺得中國駐西德大使館對外態度太軟弱，回來向外交部正式提了意見。

凡此種種，說明錢其琛主持下的外交部，一舉一動，一得一失，都有人在注意和挑別。中國國內政治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使錢其琛在外交上不能不受到相當的約束。人們在研究1989年六·四以後的中美關係時，必須注意中國國內政治對於中美關係的牽制與影響，否則就難以了解兩國關係起伏多變的複雜性。

使節會議：議論形勢 商討對策

在內外牽制之下，究竟如何估量形勢，確定對策，如何處理對美關係，是硬是軟，何時該硬，何時須軟？中國如何才能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在國際上重新發揮重要作用？

為了審議形勢，商討對策，統一思想，布置任務，中國外交部在六·四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從7月6~12日，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了為期一周的駐外使節會議。

與會者首先學習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然後議論形勢，討論如何改進外交工作，對付當前困難局面。會上傳達了鄧小平的「二十六字令」指示，即「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沉著應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數」。鄧還說，對美國不要怕，要立場堅

定，「硬一點，反而能促使它轉彎子」。

鄧的這些話，後來一直成為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的基本信條和依據。

江澤民與李鵬到會講話，對外交工作有所指示。李鵬還接見駐美國日本與西歐大國等十六個國家的大使，對討論中提出來的問題作了回答。

從會上反映出來的情況可以看出，不少從國外回來的外交官對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感到突然，很不理解，對中國領導人決定使用武力的必要性有所懷疑，甚至向李鵬提出了從學潮發展到動亂，中央決策上有無失誤的問題。李鵬說，實行戒嚴是迫不得已的。現在要「徹底平暴，除惡務盡」，「對罪犯要打擊，起威懾作用」。他強調，目前取消戒嚴不成熟，許多通緝的人還未抓住，槍枝流失在外，群眾思想尚在轉變，學生沒有返校，過早停止戒嚴對穩定局勢不利。

李鵬對內外形勢作了基本估計，認為中國的動亂是局部的。從國際外交來看，大戰打不起來，局勢趨向緩和，美蘇仍然互為對手，要爭奪歐洲。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不變，多極化是長遠的事。西方從戰略考慮，不會把中國作為主要打擊對象，也不會放棄中國。因此，中國的困難是暫時的。對於蘇聯，李鵬說，「列寧的故鄉還要看一看」。但是他對中美關係的前景並不看好，認為即使將來制裁取消了，中美之間還有很多問題難以解決。

江澤民那時剛剛從上海到北京不久，名義上是總書記，實際上

外交權都掌握在李鵬手裡，因此他在使節會議上的講話，空的多，實的少。他對中蘇、中美與美蘇關係的估計，與當時的實際情況都有距離。

使節會議聽取了錢其琛全面分析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政策的報告。他說：「國際氣候，主要是講美國捲入。從事件開始的兩個多月內，美國的國家機器從多方面把中國逼到了牆角裡。美國確有些人一直站在與中國敵對的地位。他們開了一個謠言公司，最大的就是『美國之音』。美國政府，包括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國會，就是按照這些謠言來制訂政策處理關係的。從根本上說，他們這樣做並不奇怪，因為帝國主義西方世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從來不甘心，軍事手段難以奏效，就更多地搞和平演變。」

後來錢在對中國駐聯合國使團的幾次講話中又說，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對中國作了過度與高速反應，一兩天內就對中國施加壓力。他們估計鄧已不在，中國分成兩派，一派親西方，一派保守，等於政變。實際上判斷有錯誤，後來感到有問題。」

其實，把美國與西方對中國的態度歸因於根據謠言決策，這種說法至少是片面的。因為當時中國政局陷於一片混亂，究竟誰在台上，權力如何運作，高層有何分歧，中國局勢會朝哪個方向發展，是誰也無法了解，無法預測的。

在好多天內，幾乎沒有任何有關中國領導人活動的消息，沒有官方關於中國局勢的權威報導，使人們只好猜測紛紜。本來麼，孔夫子就說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當時連老百姓甚至政府

高級官員都不清楚，何況在北京的洋大人。如果美國大使問中國當局，鄧小平現在哪裡，你們政府是誰在管事，中國會給他滿意的答覆嗎？中國能對美國說，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嗎？布希得不到關於中國的正確情報，只好批評中央情報局無能，但這並不等於美國願意根據謠言來決策。

錢其琛估計，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經過這次震盪之後，不會很快恢復，也不會一直惡化下去。由於中國在國際上的重要戰略地位，和西方在中國的巨大經濟利益，他們還不敢把文章做絕。隨著中國國內局勢的進一步穩定，估計美方遲早要轉彎子。值得注意的是，錢在中美關係十分惡化的時候，就認為兩國關係將來總是要搞好的。

至於如何處理與美國和西方關係，錢強調要注意掌握以下幾點：

- 一、對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要據理鬥爭，不屈服於它們的壓力。
- 二、是要注意利用西方各國關於各國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區別對待，注意策略，留有餘地，防止在失控情況下輪番升級。
- 三、是把政府間的高層往來與其他往來區別開來，地方性、民間、經貿和科技往來可以照常進行。
- 四、是要利用各種機會，宣傳中國政策不變，以爭取西方願意和中國保持關係的力量，牽制反華勢力。

錢其琛認為，對蘇關係仍要從大三角全局著想，注意分寸。美蘇在處理對華關係時，是有三角關係考慮的。美國最擔心的是對中國的制裁把中國推到蘇聯一邊，這種顧慮是對美的一種無聲壓力。他斷定，實際情況表明大三角是存在的，中國對外政策考慮中，仍然不能忽視這個因素。

1989年10月2日，錢在參加聯大時對紐約對外關係協會的一次講話中，提出了改進中美關係的四個條件：

一、中美兩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與價值觀念不同，不應成為發展關係障礙，要承認和尊重差異，尋求發展共同點。

二、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不能把另一國的國內政治條件作為恢復發展關係的先決條件。

三、要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避免以本國的標準來判斷別國是非。

四、要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處理好台灣問題。

錢其琛之所以從一開始就堅信中美關係無論面臨多大困難最終將能恢復正常，是因為他是在世界形勢變化的全局中來認識和處理中美關係的。首先是他相信中國的份量與潛力，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被壓服的。其次，他既看到中美之間存在分歧衝突，又堅信兩國在很多方面具有保持關係進行合作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正因如此，錢在對記者發表談話時，用「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這兩句話，來概括地形容中國當時的對外政策。

穩定周邊 開拓外交 扭轉局面

天安門事件後，《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曾經諷刺地寫道：「如果不是根據國家面積大小而是按其重要性來劃定的話，世界地圖就得重新繪製，中國過去一年內戲劇性的縮小了，中國已不再是原來那麼重要的國家了。」

但是西方不亮東方亮，事情是會不斷變化的。如果說由於西方制裁而使中國對外關係緊縮的話，那麼過不了多久，由於北京運用靈活手腕不斷開拓對外關係，這個一度縮小了的中國又重新漲大起來，甚至變得比原來更大了。在改變中國的不利國際環境與開拓對外關係的努力中，作為中國外長的錢其琛，無疑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天安門事件之後，錢其琛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忙的外交部長，至少也是最忙的人之一。據作者粗略統計，從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的兩年半內，錢其琛總共出訪了七十五國（次），包括對一個國家重複幾次訪問，以及參加國際會議在內。他在中國境外度過了一百八十多天，相當於半年的時間。與此同時，李鵬、楊尚昆、朱鎔基等領導人也馬不停蹄地前往歐亞非三洲的許多國家開展微笑外交，爭取改善中國的國際環境。

1990年底，錢其琛對在北京召開的使節會議說：從1990年下半年起，中國外交開始好轉，有所突破。9月舉行的聯大期間，錢其琛會見了六十多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或外長，包括所有西方國

家的外長。

1991年一年內，北京總共接待了三十八個國家的元首與政府首腦，六十名議長、部長與政要，中國領導人出訪亞、非、歐、美的五十七個國家。

1992年，又有三十五個國家的元首與政府首腦訪問中國，其中包括俄國總統葉爾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秋克、日本天皇明仁，南韓總統盧泰愚、印度總統文卡塔拉曼。

從中國在天安門事件後開展的外交活動中，人們可以看到中國對外政策與行動的一系列重大調整：

一、淡化意識形態因素，不以社會制度的異同，或與中國關係的親疏來劃線。

二、著重改善周邊關係，化對抗為和解合作，力爭盡量緩解與某些鄰近國家的矛盾，使中國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周邊環境。

三、推行經濟外交，以中國市場未來發展的廣闊前景吸引西方資金技術，使西方國家在政治上難以選擇與中國相對立或對抗的政策。

四、利用西方各國的利益矛盾，主要是在日美之間與歐美之間進行分化，以便突破對中國的制裁。例如義大利由於參加對華制裁而使它的對華貿易下跌45%，工業投資減為零，在中國外貿夥伴中從第七位下降為第十位。因此，義大利總理安德雷奧蒂說，孤立中國是一大錯誤，不利於中國，也不利於「世界總的平衡」。

五、加強多邊外交，擴大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如參加中

東和會的多邊會談，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以及成為不結盟運動的觀察員。

六、在防止武器擴散問題上採取與西方協調合作的態度。如參加「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推動朝鮮半島非核化而與美國協調行動，使北韓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簽署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查協定。

由於實行了以上這些政策調整，中國在短短兩三年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成果：

——實現中越關係正常化。1990年9月¹，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文靈與總理杜梅訪問中國，與江澤民總書記在成都舉行會談。雙方達成協議，結束兩國長期以來的糾紛與對抗，此後並進而為結束柬埔寨戰爭而採取協調行動。錢其琛在1990年底舉行的中國使節會議上說：「柬埔寨本來是蘇聯包圍中國的一隻棋子，現在條件變了，不用包圍了，越南失去了後台老闆。今年中越首腦會見後，越南把憲法中的反華內容去掉，承認在柬埔寨問題上有錯誤。」

——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由只承認一個朝鮮（北韓）轉為承認兩個朝鮮（加上南韓）。北京不顧北韓反對，贊成朝鮮南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由於與南韓建立了外交關係，擴大經濟貿易交流，中國不但獲得了很大的經濟利益，也擴大了在朝鮮半島的影響。

——發展中俄兩國友好關係。北京從拒絕與葉爾欽交往轉為邀請他訪華，發表兩國關係準則的聯合聲明，簽署解決中俄邊界東段的協定，使中俄兩國結束長期對抗，進入了相互尊重與互利合作的

新階段。由於原屬蘇聯的一些中亞國家獲得獨立，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需要與中國發展關係，北京因此而獲得了在中亞地區立足與擴大影響的有利條件。

——緩和中印邊境緊張局勢。1991年李鵬對印度進行了中國政府首腦三十一年來對這個相鄰大國的首次訪問。1992年，印度總統文卡塔拉曼訪問中國。由於兩國達成互諒互讓，印度首次承認不以麥克馬洪線來劃分中印邊界，中印兩國關係的氣氛有了很大的改善。

——擴大在東南亞與中東的外交陣地。1990年以後，中國先後與東南亞、東北亞、大洋洲與中東地區的十幾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其中尤以沙烏地阿拉伯、印尼、新加坡、以色列、南韓為最重要。這不僅填補了中國在這些地區長期遺留下來的外交空白，而且使台灣喪失了三、四個最重要的外交據點。

——改進中日關係。由於北京加強對日外交，使日本海部俊樹首相於1991年8月突破西方制裁，成為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訪華的第一個國家政府首腦。為了利用美日矛盾，北京在1992年讓江澤民訪問日本，並隆重接待日本明仁天皇來訪。這使天安門事件後一度出現困難的中日關係有所好轉，並使日本恢復了對中國的總額達五十四億美元的日元貸款。

由於中國在外交方面作了重大的努力，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錢其琛在1994年3月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以99.5%的高票率當選為副總理。「路透社」的一則電訊認為，「中國通過其外交攻

勢，正在成功地消除西方自天安門事件以來對它的疏遠，並慢慢地重返世界舞台。」

訪華府進白宮見布希 出奇制勝記者傻了眼

美國重要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一位中國問題學者，前兩年在與作者談到錢其琛時說：「他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能夠很好地代表與捍衛本國的利益，進行有力的外交談判，他是一位討價還價的能手。」天安門事件後，中美兩國間的高層往來即告中斷。雖然不久美國國務卿貝克與錢其琛曾數度會見，進行會談，但那都是在國外，而非在各自或對方的國家。儘管北京一再希望並努力爭取兩國外長進行互訪，以打破制裁，顯示中國並不孤立，但是華盛頓對此卻一直冷若冰霜，竭力迴避，以免在天安門的陰影依然籠罩中美關係的情況下引起美國輿論的不滿。

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美國出於爭取中國支持對伊使用武力的需要，對中國的態度有所變化。布希總統親自寫信給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貝克國務卿則想拉攏錢其琛，討價還價，做一筆交易。

1990年11月19日，在伊拉克入侵三個多月，聯合國安理會將要討論對伊採取什麼行動之前，貝克從巴黎給錢其琛打電話，希望中國能投票贊成聯合國使用武力驅逐伊拉克的678號決議。貝克說，不管中國投贊成票或棄權票，美國都要請中國外長訪問美國。他還

說，布希定於12月1日訪問拉美國家，如要見錢的話，最可能的時間是11月30日。貝克接著問錢，你能否暗示一下中國準備如何投票。錢說決議還沒有看到，怎麼能決定怎麼投票。於是貝克就在電話中把678號決議草案全文給錢念了一遍。錢說，我們要研究一下，現在我不能回答我是否去，怎麼投票。中國外交部把這次電話對話全部錄了音，使貝克留下了一個被動的把柄。

11月24日，在聯合國討論678號決議前三天，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約見美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貝霖。正式通知他，貝克國務卿於11月20日（有時差）打電話告訴錢其琛，邀請錢參加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並訪問美國。中國建議在11月26日發表消息，將此事公諸於世。但是下一天貝霖臨時代辦來見劉華秋，表示如果中國投棄權票，布希將不會見錢，美國也不會邀請錢訪華府。這個態度反應出貝克因為吃不準錢究竟如何投票，想留一手，要中國知道，能否訪問華盛頓或見布希，取決於中國如何投票，如中國投贊成票，就請錢去訪問，否則就作罷。

錢究竟去不去訪美，當時在北京是有爭論的。元老中有人認為，美國還在制裁中國，這個時候中國外長去訪美，無異是向美國磕頭。不僅不去，甚至連安理會都不該參加，不必去給美國捧場。因此錢其琛就以退為進，將了美國一軍：要是那樣，那他就不去參加安理會會議了。

11月27日，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同意以1991年1月15日為伊拉克撤軍最後期限，否則就要面臨武力解決，同時美國反對把伊拉

克撤軍問題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地位問題聯繫在一起解決。

同日，美國務院發言人博切爾表示，中國外長將到華盛頓訪問，但這只是中美外長之間的「接觸」，而非互訪。因為「高層互訪，是指正式而具禮儀式性質的訪問。」

11月28日，錢其琛離北京赴紐約參加安理會會議。飛抵紐約已是當晚半夜時候，他下了飛機就趕去貝克下榻的旅館進行會談。

11月29日，錢其琛在安理會會議上對授權向伊拉克使用武力的678號決議投了棄權票。當天下午7時，美國務院中國處處長魏德曼電告中國大使館公使趙錫欣，布希將不會見錢其琛。而美國務院則把中美兩國外長的「接觸」，改口為錢對美國進行私人訪問。

中國大使館立即發急電回北京，北京回電說，希望美國遵守自己的諾言。

當晚貝克與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外長共進晚餐。他告訴錢其琛，儘管他作了努力，但是與布希會見實在沒有辦法安排。接著，錢就從紐約打電話給華盛頓中國大使館說，他來不來華盛頓有三種可能：不來，來了當天就走，過一天再走。

11月30日，中國大使館一早就叫醒國務院中國處處長魏德曼，要求美方在12月1日早上7時以前給中國答覆。意思是如果布希不見，錢將不來華盛頓訪問。

但是同日上午11時，錢其琛已經到了華盛頓，在天安門事件過去近一年半之後第一次出現在美國國務院，與貝克國務卿會見。

11時30分，國務院公布錢其琛在華盛頓的活動日程，表明貝克

11時與錢會談，12時設午宴招待，下午1時半陪錢去白宮見布希。但到了中午，國務院又發出一則更正，說上午的日程搞錯了。同日上午，白宮官員也說，至目前為止，總統日程上並無接見中國外長一項活動。但是午宴後，當前來國務院採訪的中外記者都被弄得稀里糊塗，不知錢其琛去向的時候，貝克與錢的座車已經分別開往白宮去見布希總統了。

原來，貝克在國務院與錢其琛會見時說，我在巴黎時給你打電話說，布希從12月1日開始對南美訪問，因此11月30日是唯一可能見你的時間，但是我並沒有保證他要見你。如果有什麼誤解，我只能表示遺憾。

貝克說，布希是中國的朋友，他支持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因為如此，他在美國受到指責。我們讚賞中國在波斯灣問題上的合作，但是對中國棄權表示遺憾。中國對安理會決議沒有投贊成票，他個人覺得，這是使布希不大好見錢的原因。但是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布希已經決定要見你。

當天下午，布希在白宮內閣會議室會裡與錢會見。美方參加的人有貝克國務卿、白宮辦公廳主任蘇努努、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與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

布希表示他本人仍然十分重視中美關係。雖然對中國的棄權感到失望，但他認為決議的有效性是更為重要的。如果中國贊成，這對布希本人將會有很大好處，可以對付美國國內對他的批評，也會提供更好的機會促使海珊撤軍。

錢其琛則表示：中國的投票是不容易的。中國領導人一再考慮這次投票，現在我們的行動已經使美國的決議得到通過。在撤軍問題上，中國的立場與美國並無差別。

布希表示，他要向中國領導人呼籲，需要他們在人權和武器擴散問題上幫他的忙。這樣就能使他做他所想做的事情，並且邀請江澤民訪問美國。

錢其琛這次訪問，顯示了他在外交折衝中以退為進，進行討價還價的能力，以及必要時不惜玩弄一下「邊緣政策」的政治手腕。在安理會投票的問題上，其實明擺著中國即使不投贊成票也不可能投反對票的抉擇。否則中國不僅會使美國惱火，而且要與大多數成員國對立。因此，棄權是唯一的可能。即使美國不拿任何東西與北京做交易，北京也決不可能阻撓美國出兵打擊伊拉克。貝克對北京的動向感到焦慮，想與錢其琛做一筆交易，正好讓錢看穿了美國的弱點，加以利用，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其實，即使布希不見錢其琛，錢也照樣會來華府訪問。因為就在11月30日凌晨之前夜深人靜的時候，北京發來一份緊急密電，要求錢其琛不管美方態度如何，應當照常訪問。電文中說：「經請示，現決定，即使與美方交涉無效，錢外長也要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要大大方方的去，不要賭氣。」外交部的電文中是從來也沒有這種說話口氣的。那麼這又是誰的口氣呢？是鄧小平的口氣。這肯定是向鄧請示後，鄧親自口頭關照的幾句話，外交部把它們照抄在電文裡，而錢其琛也會一看便知，這話是出自誰之口。有了鄧的這

個指示，錢其琛的華府之行是更加壯膽了。結果，在這場不大不小的外交角逐中，他成了贏家，而貝克則成了輸家。但是美方對這一場外交遊戲，內心十分反感。因為貝克覺得自己被錢耍了。後來白宮一位官員對作者私下談話，對錢其琛企圖「操縱美國政府官員來推進中國利益」的做法表示不滿。

對於錢其琛的這次訪問，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艾利奧特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哈定有過評介。他認為，「美國是在為一種本來可以免費得到的東西付錢。因為（在當時情況下）中國絕對不可能否決那項（安理會678號）決議。」哈定覺得，波斯灣危機為中國提供了顯示其重要性的機會，所以北京就「十足地利用了他這一票的價值。」

第 11 章

大使的艱難使命：
從韓敘到朱啟禎

友好大使臉上不再有笑容

天安門事件使中美關係受到極大衝擊，而首當其衝的是中國駐美大使韓敘。

在全世界一百幾十個國家的駐美使節中，韓敘要算是得天獨厚，令人羨慕而又無法攀比的一個。這不僅是因為中美兩個大國存在著良好關係，也由於韓敘本人參與過中美關係從開始突破到全面發展的整個過程，而與歷任美國總統和國務卿都有過長期的交往。布希當選總統以後，韓敘跟國務院與白宮班底更是擁有連西方國家大使也望塵莫及的特殊關係。如果說很多外國大使駐節多年也不一定會見得了一位美國助理國務卿，韓敘則是國務院和白宮的常客，能夠經常在官邸招待美國的達官貴人。美國政府官員都把他當作周恩來的親信、中國對美政策的執行人與一位友好的大使來對待。而且，由於韓敘本人誠懇真摯的對人態度與務實負責的工作作風，使他贏得了美國朝野人士的尊敬。

但是，六·四一陣狂飆，颳得中美關係昏天黑地，把韓敘拋進了一個充滿風險、難以自拔的巨大政治旋渦，使他在1989年的整個春夏季節憂心忡忡，緊鎖雙眉，再也看不到臉上的笑容，最後懷著一顆沉重的心返回北京。

韓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關係正常化以後的第四任駐美大使。他原籍江蘇，1924年5月26日出生於北平一個官僚知識份子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他本來的姓名是沈崇健，韓敘的名字是參加革命後改的。傳聞曾祖父沈葆楨是前清道光年間的進士，歷任江西巡撫、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參與籌辦和經營輪船招商局，是與李鴻章、曾國藩同時代的洋務派主導人物之一。韓的父親沈季讓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大法官與北平中國大學法學院院長，據說在北平解放前夕支持過中共地下黨的活動。韓敘有兩個哥哥，一個名叫沈崇誨，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空軍駕駛員，抗戰初期駕機轟炸日本軍艦「出雲號」，人機具毀，成為烈士。另一個哥哥叫沈崇育，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後在美國著名的孟山多化工公司任高級工程師。

韓敘早年在北平燈市口的美國教會學校育英中學學習，與台灣的外交部長錢復是前後同學。1940年畢業後進入燕京大學，但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追隨中共參加革命，投奔華北「解放區」。中共建立政權之後，韓敘作為懂得洋文的知識份子幹部轉入外交部工作。1949至1963年任禮賓司交際處處長和司長助理，1963至65年調任駐蘇使館一等秘書與參贊，1965年任禮賓司副司長與代理司長，

1971至73年升為司長，1973至79年任駐美聯絡處副主任，1979至1982年任美大司司長，1982至85年升任外交部副部長。

1985年4月21日，韓敘被任命為特命全權駐美大使，接替七十歲的章文晉。《紐約時報》在評論中國這一外交任命時指出，北京接連委派兩位接近周恩來的外交官出任駐美大使，表明對中美關係的重視，而韓敘本人則被認為是北京最溫文有禮的外交官之一，受到西方外交官的歡迎。

韓敘在北京外交界早就聞名。作為禮賓官員，他要負責安排中國政府的禮賓活動，接待外國使節與來訪的外國領導人，並在中國重大外交活動中將重要外賓一一引見給中國領導人。韓敘為人謙和，作風穩健，有很強的記憶力。每逢中國國慶或重要國賓來訪，他都要站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門口，根據來賓的面孔，當場向周恩來總理介紹每一位重要客人的姓名、國別與職務。即使人數超過一二百，膚色黃白黑各不相同，他也照樣能記得清清楚楚，好像頭腦裏裝著一台電腦一樣。

到了華盛頓，韓敘仍然保持著他過去的作風與習慣。對重要的美國朋友，只要會過一面，就記住他們的姓名、職務、特點，把名片歸檔儲存。下次再見同一個人時，定能從他的記憶中準確無誤地搜索出來，馬上叫出對方的名字。這不僅使對方感到驚訝，而且覺得這位大使對人很尊重。

當然，作為大使，韓敘的主要任務是了解情況，疏通關係，增加友誼，推進合作，使中美關係不斷發展。由於韓敘的人脈關係，

上自白宮，下至地方，無論商務、文教、軍事，中美之間的各種關係，即使遇到分歧矛盾，也比較容易融通。特別是對美國上層的工作，對於發展中美關係更為重要。

例如，1987年春我以顧問與講稿起草人身份隨同楊尚昆訪問美國時了解到，原來美方對楊的地位影響以及他和鄧小平的關係不十分了解，也不知道楊的軍委副主席身份有多重要，因此在訪問日程安排中除了在白宮會見雷根總統之外，只讓布希跟楊喝茶。

後來韓敘在日本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上碰到布希的助手，向他說明楊尚昆受鄧小平的委託抓軍隊，是中國軍隊實際上的負責人，而且在中國政治中有很重要的影響。美方這才決定把這項活動改為兩人在遊艇上會見，從此布希與楊建立了比較親密的關係。六·四之後，正是憑著這種關係，使得中美之間克服重重困難，重新恢復改裝「殲8」的軍事合作項目，雖然最後由於其他原因還是未能完成。布希入主白宮後，首先出訪的不是西方國家而是中國，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還比如，1991年美國大選後，雷根手下的國務卿舒茲即將下台，韓敘在官邸設宴與他敘舊惜別，舒帶了幾名高級助手前來赴宴，這在華盛頓外交圈內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作為在座陪宴的使館高級外交官，我親眼看到韓敘和美國政要之間在宴席上表現出來的那種友好融洽的關係。多年來，無論在北京或在華盛頓，韓敘是溝通中美兩國關係的一座橋梁，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韓敘在任四年期間，中美關係發展得比較順暢。他不但在華府

廣結人緣，上下左右結交很多朋友，而且四出演講和參觀訪問，足跡遍及美國四十個州。關於他外出訪問的問題，還有個笑話。當時的外長吳學謙強調駐美大使應當多在華盛頓坐鎮，少出去走動。但有一次韓敘回北京開會見到胡耀邦，胡問他在美國走了些什麼地方，韓說到過三十八個州，胡不知道吳學謙對韓敘有意見，就鼓勵韓敘多出去活動，把美國的五十個州全跑遍，這正中韓敘的下懷。但後來天安門事件一出，韓敘光在華盛頓就忙得應付不過來，而且連胡耀邦本人也下台了，韓最後只多跑了兩個州。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完全出乎韓敘的意料，使他受到極大的震動。因為經過二十多年辛勤努力建立與發展起來的中美關係，一下子從高峰跌入低谷。原來友好合作的美國，忽然又變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國主義。在某些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對華政策從當年杜勒斯到今天的布希完全一脈相承，旨在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一切又回到了1971年尼克森訪問中國之前的狀況。

韓敘與外交部的許多老幹部都曾追隨過周恩來。他們內心必然會想，如果周恩來在世，難道會對學生使用武力嗎？但韓敘是一個忠貞的共產黨員，有很強的組織紀律性。面對中美關係急劇變化的形勢，即使心裡想不通，不能同意六·四事件是美國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結果的說法，也不能反對中央的決定，更不能在對美關係的工作中違反北京的要求，其內心的徬徨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989年6月中旬，韓敘要我起草一個關於「中國局勢真相」的說帖。他說，在國外不能照搬北京的說法對外國人講，要把國內的

官方口徑加以軟化，盡可能用比較溫和說理的語調來談國內局勢。根據他的要求，我擬了十一個問答，說明情況的變化、政府的態度、事件的結果，並強調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與對美政策方針不變。後來，中國駐美國的使領館都以這份說帖為口徑，來對外表態。韓敘自己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在佛羅里達演講稿改寫的文章，也用委婉的口氣向美國公眾解釋天安門事件的因果關係，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從韓敘對很多事情的處理中，可以看得出來，他的主導思想是對外要竭力維護中美關係，對內部則盡量容忍對天安門事件的激烈反應，從不動輒給人扣帽子、簡單地從敵我觀念角度去考慮問題。在韓敘傳達關於天安門事件的中央文件時，使館新聞組三等秘書張熾偉竟起立公然斥之為「反革命文件」。要是在國內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個人肯定要被當場抓走問罪，但韓敘面對張的指責反而面有難色，未予以處分，使人覺得自己也有內疚之感，態度強硬不起來。

在六·四之後與美國朝野人士交往中，韓敘一切言行的目的是防止局勢失控，盡可能地維護中美關係。他主要著重於解釋中國政府立場，強調反對外來壓力，希望美國以中美關係為重，從不用硬梆梆的話來對美國政府進行指責，更沒有為了討好上級寧左勿右，重複北京某些人對美國充滿敵意的論調。

在天安門事件中，有的美國記者被北京當局逮捕，有關人士就向韓敘求情，希望他運用駐美大使的地位進行斡旋，爭取釋放。美

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理查·羅斯與德雷克·威廉斯兩人獲得釋放之後，CBS的電視新聞節目主播丹·拉瑟於6月5日致電韓敘表示感謝。他在一份傳真電文中寫道：「由於您的有效幫助，使他們兩人獲得釋放，謹表示深切的感謝。……我知道，您和您的同事們正處於艱難時刻，但請相信，很多美國人，特別是我本人，（對中國）仍然懷有良好的願望和理解。」

由於駐美使館上下在天安門事件中表現了強烈情緒，一再發電建議解除戒嚴，勸阻萬里訪問美國，把尼克森不願在訪華時會見李鵬的電報發回北京，以及李鵬在美留學的女婿劉智源躲在韓敘官邸避風頭的兩個月內受到冷遇，等等令李鵬不快的事實，韓敘的仕途也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本來，駐美大使的任期一般為四年，韓敘也該在1989年調回北京。但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由於中美關係緊張，為了借助於韓敘的人脈關係起一點緩衝作用，讓他適當地延長任期也未嘗不可，何況楊尚昆已在中央提出讓韓敘在美國多待一段時間，但是北京還是決定讓韓敘回國。

無心戀棧離任回國 「白宮」饒行賓主惜別

1989年5月31日，韓敘召集研究室的政治官員開會。他說，外交部已決定讓他6月15日告別，八月份回國。根據慣例，他要向部

裏提交一份離任報告，總結在任幾年的工作，提出自己對中美關係的體會和看法。他的初步想法是，報告要包括三個方面：一、在開放政策中如何搞外交；二、經濟外交怎麼搞法；三、幹部問題，主張使館負責調研、國會與貿易工作的外交官要長期扎根，不能頻繁調換。

我不知道為什麼韓敘沒有把中美關係作為報告的重點來談，不是因為他覺得有些問題有自己的想法，不照北京的口徑談不好，按照自己的想法談也不好，所以乾脆迴避算了。但我還是在會上提出意見，認為他在任期間國際形勢發生很大變化，離任報告似乎首先應該結合形勢來談，特別是要考慮在美蘇、中蘇都改善關係的時候，中國應當如何保持中美正常關係的問題，根據大使這幾年的經驗，談談自己的體會。

後來由研究室集體討論為他起草的報告數易其稿，指出在新形勢下，如何處理好中美關係不僅關係到中美雙方，而且關係到中國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的地位，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雖然報告提到了美國要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但在很多方面的想法與北京當時敵視美國的強烈氣氛有所不同，如認為布希比雷根更加重視中國，主張中國對美宣傳要有針對性，批評美國的事實根據要紮實，避免傷害美國人民感情，都是從外交第一線觀察所得，符合實際情況的想法。

雖然後來中國外交部來電要韓敘把行期推遲到10月1日國慶之後，但是韓敘已經無心戀棧，不想在大使的崗位上繼續多待，決定

八月中旬回國，回國前還要到舊金山停留三天，會見他在美多年的幾位兄妹。

8月12日上午，韓敘向使館全體人員告別，講了不少心裡話。他說，1985年5月1日到紐約，1989年8月18日離開華盛頓，在美四年做了不少工作，也有缺點，比如對調研工作的領導很差，未能就全球戰略問題向中央提出有用的建議。自己各方面的知識不夠，英文底子也差（在燕京大學不到一年），有時和美國朋友在一起，人家說笑話，你聽不懂，反應不出來。

他說，我在任前幾年，中美關係發展平穩，今年布希剛上台就訪華，但是北京平暴後中美關係後退，美國官方的訪問都取消，有一個時期相當緊張，天天跑國務院。中美關係現在已經到了谷底，開始往回升，但局勢究竟能轉得多快，要靠我們的工作與美國的態度，希望國內形勢有利於中美關係發展。

8月14日下午，布希在白宮會見韓敘，表示惜別。不過為了避人耳目，緩和美國保守派的攻擊，會見不在橢圓形辦公室，而由斯考克羅夫特引上二樓，與布希夫婦喝咖啡。布希除了稱讚韓敘的功勞之外，仍然表示希望中美關係能夠克服困難，恢復正常。韓敘在大局變化的情況下也不便表現得過於熱情，只好說些一般的客套話。賓主雙方本來已是結交多年，關係融洽的老朋友，現在韓敘就要離別，布希居然不能大大方方地送行，只好採取這種半明半暗的方式來見一面，今昔相比，雙方真是覺得不勝天壤之別。

同日晚上7時，助理國務卿索羅門設宴為韓敘餞行，地點是離

白宮不遠的F街1725號，華盛頓一家最有名的法國餐館Maison Blanche飯店。它的店名意為白色的房子，所以人們也就習慣地稱之為「小白宮」飯店。

這是美國官方對韓敘安排的最後一次禮節性活動。不但是送別餞行，而且據我的感覺，還帶有一種對韓敘這麼多年為發展中美關係努力奔波作出貢獻，表示肯定與敬意的意思。

應邀參加宴會的，美方人士為索羅門、副助理國務卿西格爾、白宮亞洲事務主任帕爾、國務院中國處處長威廉斯、副處長貝德以及他們的夫人或女友。中方人士為韓敘大使與夫人葛綺雲，趙錫欣公使與夫人李佩瓊，我與內人屠雪英，以及另外兩對參贊及其夫人。

晚宴在一個單間內舉行，賓主十九人（帕爾夫人未出席）圍坐在一張長方形餐桌面前，氣氛雖然不大熱烈，但相當親切。宴會的幾道菜包括冷盤生菜沙拉、什錦肉餅配酸黃瓜，主菜是烤魚排加土豆，最後一道甜食是黑白蛋糕加奶油梅子。用中國標準來看，宴會的菜肴算不上豐富，但是在西餐裏，這已經是很講究了。就是白宮國宴，也不過是一道主菜，一碟沙拉，一盤湯，一道甜食加咖啡。1989年趙紫陽訪問美國回來，有人問他白宮國宴用什麼菜款待他，趙說只吃了一塊肉，就是烤牛排。

宴會上大家先分頭與身旁的人聊天，用餐差不多了，索羅門站起來致祝酒詞。他說，今天為韓大使餞行，回想起當年隨季辛吉第一次去中國，心裡沒有底，不知道究竟誰會在北京機場迎接我們，

猜想會不會是毛澤東或周恩來。結果走下飛機，是葉劍英和韓敘來迎接。第二次隨尼克森總統去北京，在機場上迎接的是周恩來總理，但我們首先見到的還是韓敘。當時中美關係仍很脆弱，近二十年來不斷發展，這都是和韓敘個人相聯繫的。

韓敘則回憶說，他作為中國駐美聯絡處的副主任，1973年來美國。坐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機到夏威夷，機件出了故障，換了飛機到舊金山，美國政府是派索羅門來接的。

雖然中美關係已經陷入困境，雙方不斷發生摩擦，也不知道未來的局勢會如何變化，但是宴會上仍然充滿著友好的氣氛，賓主都沒有打什麼官腔，也不怎麼講客套，好像都想利用這最後一次聚餐的機會，默默地回顧過去，懷念舊情，讓時光盡量在這種和好、融洽而且值得珍貴留戀的氣氛中慢慢地過去。

8月16日晚，韓敘大使舉行告別招待會，由於美國已經宣布中斷兩國之間的高層往來，美方高級官員按理說不能前來出席，但是除了季辛吉與海格兩位前國務卿與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之外，索羅門、威廉斯、貝德等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的官員還是前來向韓敘道別了。

8月17日，在韓敘離開的前夕，我從公使官邸出來，就近到大使官邸去看望韓敘，跟他話別。韓敘在我1984年進入外交部之前就對我的情況有所了解，他參加過部領導對我起草的中國外長聯大發言稿的討論。1988年我在部裏碰見他，表示想去駐美使館工作的意願，問他想不想要我。「我當然要啊」，他笑著說。還教我先把英

文學學好，如能調美工作，置裝時要做兩套料子比較薄一點的西裝。到了美國，要聽WTOP電台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新聞節目，隨時掌握動向。

那天去看他，已是盛暑天氣，韓敘在家只穿一件汗背心，忙於整理行李。會客廳裏放著幾個大紙箱，裡邊裝的是日本JVC牌子的大音響組合。他指著對我說，我和老葛（他夫人）親戚多，要花不少錢買禮物帶回去。這東西值一千多美元，不上算，沒有多大用處。回國後哪有時間聽，北京灰塵又大，還不如買個電腦微機實用。

我問他，今天《華盛頓郵報》說韓敘的新職要回去才安排，究竟他去哪裡。他說可能是對外友協，或外交學會。他自己在美國結交的都是上層，適合去外交學會，但是不一定受歡迎。可能要等半年，那就利用這點時間來寫回憶錄。其實不讓他去外交學會而去友協，大概那時已經定了。這一方面是因為資格比韓敘老的前任駐美大使柴澤民不願意屈居韓敘之下繼續當副會長，同時，也由於上面對韓敘不大滿意，只想給他一個閑差。對外友協是只搞民間外交，不搞官方活動的單位，韓敘去了，不過是搞搞友好城市活動，四出參觀訪問而已。過去陳毅的兒子陳昊蘇，就是因為遭到上面的不滿，才從有實權的廣播電視部副部長位置上拉下來，到對外友協去掛名當個副會長，從此幾乎銷聲匿跡了。

韓敘見了我，問問我的近況，然後就隨便談起自己的過去，講了一些外界不大知道的個人經歷。他說，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他

在北平燕京大學只念了幾個月書，就去投奔華北晉察冀「解放區」，當時聶榮臻是司令，姚依林是邊區黨委秘書長。他先參加革命幹校，校長何幹之，後來學校改為華北革大。但是不久學校精簡，抽出一批人來辦宣傳工作訓練班，待了一陣子，又被調去給晉察冀司令員聶榮臻當英文翻譯。一年多後擔任聯合國救濟總署在解放區的代表，一個人又管錢又管賬，還負責給解放區買書。抗戰勝利後調至軍調部工作，住在北京附近的南口。建國後參加外交部工作，1963~65年在莫斯科駐蘇使館，實際上只幹了一年多。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周總理去莫斯科，回國時把我帶走，當時還以為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回來就當禮賓司副司長」，他說。

韓敘還對我說，他父親當年曾在北平支持過共產黨的革命活動，本人曾與李大釗、毛澤東有過書信往來，韓敘的哥哥在家裏還看到過那些信件。

我跟他談起最近的消息，有傳聞說國防部長秦基偉被軟禁，韓敘沒有直接表示，只是說現在需要安定團結，這種事只會給外界造成壞影響。

談到使館最近工作與美國對中國的反應時，韓敘說，這一段時間大家都辛苦了。我向他表示，如果我們能更為客觀求實地反映情況就好了，不過我又補充說，即使那樣，恐怕發回的電報也出不了外交部。韓敘似乎也有同感，但是他說，你這裡電報一加急，發到部裏，馬上要抄送政治局，等部領導一上班覺得不妥，再決定電報的分發等級，時間上根本不可能。

8月18日中午，韓敘夫婦懷著惜別的心情離開使館去紐約，使館全體人員擁到門廳與大門口來歡送，我舉起相機，為這個動人的場面攝下了珍貴的鏡頭。

回國以後，韓敘先是當了對外友協的會長，後來又把這個位置讓給齊懷遠，自己轉到全國政協去擔任外事委員會主任的閑差。過了五年，在隨政協主席李瑞環訪問尼泊爾歸來不久，忽然發現有淋巴癌，住院治療無效，於1994年7月19日與世長逝。韓敘一生辛勤工作，從七十年代以後，為發展中美關係盡了很大的努力，他胸襟坦白、誠摯待人，這一切，將長留人們的心中。

走馬換將中南海領旨 呈遞國書布希不提李鵬

韓敘走了，但是接替他的朱啟禎還不忙著來。

朱被任命為駐美大使的消息，早在1989年7月初就發表了。然而過了三個多月，直到十月中旬，他才姍姍來遲地走馬上任，光臨華盛頓。

全世界的外交官，大概沒有人不嚮往到華盛頓這個國際外交大舞台來扮演一個角色，而能夠實現擔任駐美大使美夢的人更是鳳毛麟角。韓敘空缺之後，由誰繼任駐美大使一直難以肯定。從北京數度傳聞，主管美國的副部長朱啟禎當然想來，主管西歐事務的副部長周南也躍躍欲試。周南在副部長的名單上排在朱的前面，而以前

朱是靠攬黃華的人。黃華又曾卡過錢其琛，想把錢的中共十二大代表資格擅自勾銷。現在錢當上了部長，挑選誰當駐美大使的決定權在他手裡，因此不能說朱啟禎就有絕對的把握拔頭籌。幸而，周南時來運來，因為許家屯在六·四後出走美國，中南海就順理成章地讓外交部主管英國和香港問題的周南去補這個正部級的缺。

奇怪的是，任命朱啟禎的消息發布得很早，但又很匆促。因為按照外交慣例，任命大使，事先應當通知並徵求駐在國政府的意見，等人家點頭認可了，才正式發布任命的消息。但是北京卻沒有這樣做，這究竟是什麼緣故，連美國國務院也莫名其妙。它的發言人不得不向媒體表示，「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或者徵求同意書的要求」。

但是，任命朱的通知後來還是送到了國務院，並且附有朱啟禎的一份簡歷，表明他1927年12月19日出生於江蘇，大學畢業，1949年後在中國外交部辦公廳、非洲司、美洲與大洋洲司工作過，歷任處長、副司長、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參加過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1979年隨鄧小平，1984年隨趙紫陽，1987年隨楊尚昆三次訪問美國。夫人王裕德，有一個女兒。

令人奇怪的是，簡歷上沒有講從哪個學校畢業，最初一段經歷只寫辦公廳，沒有交代什麼職務。其實，朱啟禎出生在江蘇宜興縣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裏，父親是鐵路工程師。朱1944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雖然這是一所有名的教會學校，但朱在學習期間參加學生運動和地下共產黨。不過，幾年的洋教育對他還是有影響的。在

駐美使館舉辦新年聯歡會時，這位大使登台和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但是濫竽充數，總不見他張嘴。只有換了節目，讓他和老婆雙雙合唱三、四十年代好萊塢電影歌曲「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才顯得感情洋溢，輕鬆活躍，似乎又回到了當年聖約翰大學的年輕時代。

1949年10月，朱啟禎調到北京進入外交部。最初當過三年信使，老是在國外跑。信使隊屬於辦公廳，因為當信使不好聽，所以這個職務就不在他的簡歷上出現了。至於為什麼不提聖約翰大學，很可能因為它是一所美國教會辦的學校，受過洋奴教育不好意思，不想讓人知道，就略去了。

朱啟禎和韓敘都是既受過資產階級教育，又受過共產黨思想改造的知識份子。從工作能力與英文程度來說，朱可能比韓敘略勝一籌。但在人品方面則不如韓敘那麼真誠待人，與他相處過的人都覺得他待人接物相當虛偽，只是在他需要你的時候才理睬你，任何時候他想到的首先是他自己。因此，無論使館內部，或者與朱接觸過的華人，除了想巴結他的人之外，能說這位大使先生好話的，實在數不出幾個來。至於他那位曾在上海聖瑪利亞女中念過書的夫人王裕德，人緣更差，聲譽更糟。朱啟禎上任不到三個月，她就官太太架子十足，把官邸的沙發、地毯以至廚師、司機都換了。結果在官邸工作的一位上海名廚與北京司機，因為不滿大使夫人的張揚跋扈，不久雙雙出走，再也不願受那個官太太氣了。

朱啟禎獲得任命之後，最重要的就是準備工作。中美兩國關

係，不但在政治上難以打開僵局，而且牽涉到兩個國家的很多方面與很多部門。為了了解情況與互相通氣，朱啟禎用了一個月時間來跑中央各個有關部門。先後拜訪、會見、和交談的，有主管上司吳學謙和錢其琛，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科委主任宋健、副總參謀長徐信與總參二部副部長熊光楷、外經貿部長鄭拓彬、中聯部部長朱良、對台辦主任楊思德、安全部長賈春旺等人。

但到了美國如何開展工作，還必須按照中央方針辦事，了解領導意圖，最好是接受面示，以便有所遵循。雖然鄧小平與其他領導人對美國和中美關係講過不少話，但是並沒有專門針對駐美大使的工作指示。所以，朱啟禎就想了一個辦法，先把鄧小平講過的話從頭到尾精研一遍，深刻體會其中要領。然後分頭登門，向中共中央的黨政軍三巨頭江澤民、李鵬和楊尚昆請示。朱同每個人交談近兩個小時，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把他們的談話要點整理成一份題為「關於朱啟禎大使赴美工作請示件」的正式文件，作為今後工作的依據。這就像中國古代朝廷命官出外巡視或出使域外，先得在皇上面前領旨，或者拿到尚方寶劍之後，才能放心地出征。

其實，中南海三巨頭也並沒有什麼獨到的看法，他們所談的對美政策考慮，無非是那麼幾條，美國不用猜也心裡有數。總的來說，他們認為總的世界格局沒有變，大三角沒有變，中國外交政策也沒有變。戰後幾十年的國際形勢發展，始終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戰後歷史就是一本（中美蘇）三國演義。他們

認可朱啟禎的看法，認為只要世界格局不變，大三角還存在，中美之間仍要保持正常關係並爭取有新的發展。李鵬認為，對美國既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軟，要在既不對抗又不低頭這兩者之間找到恰如其分的做法。

朱啟禎雖然領到了中南海的「訓諭」，但是世界形勢並沒有像鄧小平或李鵬所想像那樣停留不變。事實上，鄧所謂世界格局與大三角關係基本不變的情況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而且在鄧這麼說的時候已經開始變，越變越快了。因此，北京根據這種形勢估計而制定的對美政策，事實上根本不足以應付後來的局勢發展。李鵬與朱啟禎所謂的要在既不與美對抗又不向美低頭的兩者之間，找出一個恰當的辦法來對付美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正是因為中國處置不當，才使中美關係不能早日好轉起來。

為了避開10月1日國慶招待會的冷冷清清場面，朱啟禎是在10月上旬到達華盛頓，等了兩個多月，才進白宮向布希總統呈遞國書的。這和1973年5月28日黃鎮大使到達華盛頓就任中國駐美聯絡處第一任主任，第二天就被請進白宮見尼克森的情形真有天壤之別。當時的《華盛頓郵報》寫道，黃鎮大使「到達後不到24小時，就已經坐在橢圓形辦公室內的扶手椅子上了。他同尼克森總統的會見是不同尋常的。因為與美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的大使，有時還得等上一、兩個月。」

12月18日，朱啟禎在大冬天裏帶了夫人王裕德到賓西法尼亞大街1600號白宮正門。大門外堆著一個大雪人，頭戴帽子，嘴裏叼著

雪茄，很逗人的樣子。門廳內筆直站著十二對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因為呈遞國書是分期分批進行的，每一個下午，總統要接見四到十位外國大使呈遞國書。所有大使的汽車，都得在白宮門前排隊等候，每位大使進門與總統握手，遞交國書，照相，說上幾句話出來，總共不過三五分鐘。那天在朱啟禎前面的有馬紹爾群島和中非共和國的大使，他們都帶了自己的孩子來。候客室內備有一些糖果，孩子們就樂呵呵地乘機抓了一大把往口袋裏塞。

朱啟禎夫婦先進入白宮的紅廳會見布希夫婦，布希把朱引入接待室，布希夫人芭芭拉則拉了王裕德到藍廳小坐。這裡是兒童接待室，因為聖誕節快到了，裏邊已經聳立著一棵又高又大裝飾得琳瑯滿目的聖誕樹。樹上點綴著許多小人像與小玩意兒。芭芭拉要她認認看，都有哪些是說得出名堂來的。王只認得出灰姑娘、木偶奇遇記裡的小木偶和愛麗斯夢遊奇境記裡的愛麗斯。過一會兒，朱啟禎呈遞國書的儀式完了，破格地佔了十八分鐘，在中美關係依然冷冰冰的情況下，這已經是夠面子的了。

呈遞國書是走過場的外交儀式，時間短促，見面說不了幾句話。布希先向中國各位領導人問好，就是有意不提李鵬的名字。朱啟禎向布希轉達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與李鵬對他的問候，並且轉述李鵬的話說，希望美國做一些事情以利緩和中美關係氣氛。但布希對李鵬的話還是充耳不聞，還是只當中國沒有李鵬這個人。

中美關係問題成堆 橋牌高手扳不回敗局

韓敘六·四以後在美國只待了不到三個月就回國了。不管中美關係是好是壞，反正與他無關，他已經管不著了。但是朱啟禎卻要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與艱難的位置坐上三年。如果他在任期內不能對恢復發展中美關係有所建樹，那就等於向北京交白卷。

但1993年4月李道豫從紐約來華府接替朱啟禎前的三年多時間內，朱的日子實在很不好過，可以說是經歷了他幾十年外交生涯中最為艱難的日子。朱啟禎有一次在洛杉磯世界事務委員會為他舉行的一次歡迎會上說：「七個月以前，當我來到這個國家時，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有一個困難的時刻前來擔當一個困難的任務。因為我們的關係是如此的面臨危險，對我的挑戰是如此之大。」

對朱啟禎來說，最困難的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天安門事件後中美關係的性質，中國究竟把美國當成朋友還是敵人來對待，或者老是在這兩者之間搖擺不定。從北京的意願來說，是希望與美國修好，爭取中美關係重新回到正常軌道的。但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施加種種壓力，中國領導人，至少其中的強硬份子如李鵬等人，又把美國當成敵對勢力，力求加強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而中國對美國的估計，又因人而異因時而異，經常發生變化。另一個問題是，在對美外交中如何拿捏「予取予求」的分寸。古往今來，大國外交總是有來有往，「來而不往非禮也」，用西方現代的外交語言來說，就是所謂的give and take。你要人家的東西，你

總得先考慮你能給人家什麼才行。但是中國外交的做法，只想從別人手裡要東西，卻不想給別人東西。作為駐美大使，朱啟禎必須十分謹慎小心，隨時觀察國內風向，以免處置不當。如果他不能恰當地掌握這兩點，就會掉進深淵，重蹈韓敘的覆轍。

朱啟禎到任後遇到的局面，首先是老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不斷冒出來。由於天安門事件而引起的一系列人權問題，如釋放在押學生以及讓方勵之出國的問題、最惠國待遇問題、貿易逆差和市場開放問題、出售導彈與核技術轉讓的武器擴散問題、知識財產權問題、勞改產品出口問題、世界銀行貸款問題，以至於台灣、香港與西藏問題等等，過去似乎不存在或不顯眼的問題，接二連三地冒出來。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哈定有一次對我說，中美兩國之間的一些問題，「都是實際問題，不是誰想惡化關係憑空製造出來，也不是誰想改善關係就能加以掩蓋或迴避的。布希政府可以為最惠國待遇問題辯護，但是不能不在這些問題上維護美國的利益，否則他在國內就要挨罵。」

在朱啟禎的任期內，還發生了布希批准向台灣出售F-16戰鬥機，中國主辦公元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被否決，達賴訪美進白宮會見布希，國會通過加州眾議員佩洛西關於延長中國留學生簽證期的議案，中國船隻銀河號在海上遭到美國強行檢查，以及美國悍然搜查紐約二十三家中國貿易公司這種過去難以想像的嚴重事件，使中美關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麼也無法寧靜下來，也使得朱啟

禛疲於奔命，到處告急。

再加上在這期間發生的柏林牆倒塌，喬塞斯庫被槍決，東歐演變，戈巴契夫下台與蘇聯垮台，以及波斯灣戰爭等一系列驚心動魄的事件，中國大使館幾乎三天兩頭就要議論形勢變化，想方設法對付各種各樣的難題。而每逢中美關係出了毛病，中國大使就要奉命到紐約去找尼克森、季辛吉，或者到亞特蘭大去找卡特求援。朱啟禛有一天在研究室的會上深為感嘆地說，他覺得形勢發展令人眼花撩亂，美國西方對東歐蘇聯的演變欣喜若狂。有一次他在宴會上碰到美國駐西德的大使和西德駐美國的大使同時在場，兩個人有說有笑，非常活躍，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顯然覺得社會主義敲響喪鐘，共產主義已經完蛋了。

中美關係之所以不斷發生糾葛，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世界形勢變化，過去美國需要中國聯手對抗蘇聯威脅時，可以照顧中國，小地方不予計較。現在蘇聯垮了，美國沒有必要再單方面處處照顧中國利益。其次，中國的確在某些方面觸犯了美國的利益，比如對某些敏感地區出售導彈，大規模侵犯美國知識財產權，對美貿易的大量順差等等。另外，中國在勞改產品出口，導彈技術轉讓以及盜版等問題上一再言而無信，使它失去了可信性。

對此，哈定說的話也是值得一聽的：「經過這幾年與中國打交道，美國政府、國會和輿論已經產生一種對中國的不信任感。關於導彈擴散問題，早在卡特時期就從中國得到承諾，說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以外不賣，實際上還在賣。中國說不賣中導，但又說中導的定

義需要研究。勞改產品一再否認，實際上也是存在的。美國覺得，中國是在把一件商品分幾次出售，每次給一點，又不肯確認。中國的承諾是不算數的，美國對它已不再能夠肯定。這種不信任感，妨礙美國在中美關係中採取步驟，取得進展。」

當然，對中美關係中的所有麻煩問題加以詳細敘述，並非本書的任務。這裡只想就人權、最惠國待遇與武器擴散等三個重要問題，扼要地來談一談。

首先是人權問題。美國強調人權的普遍性，即維護人權是國際公認的普遍原則，而人權的主要內容是公民應當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權利。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觀點立場與美國正好相反，認為人權沒有絕對的普遍的標準，每一個國家的人權問題都是主權問題，不容外國干涉。人權問題首先是生存權與溫飽權，而不是政治權利。鄧小平強調「國權」高於人權，人權必須服從於「國權」。江澤民則認為，中國的人權問題首先是十二億人民溫飽的問題。而且，中國指責美國企圖利用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事實上是把人權問題當作國家主權問題來處理。

實際上，國權是國家的主權，人權是人的主權；國權不可侵犯，人的主權也同樣不應受到侵犯。在一個國家還沒有取得獨立主權時，國權是第一位的，但一旦獨立自強，特別是國權越加強大鞏固之後，就越應當維護和提升人權，而不應當使人權從屬於國權，以國權壓制人權。

至於所謂人權主要是溫飽權的說法，也完全是出於為中共歌功

頌德，企圖限制人權的一種託詞。雖然解決十二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充其量這只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在質的方面解決人權問題。因為不管怎麼說，溫飽問題只是一個初級階段的人權問題。何況早在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除了「博愛、平等、自由」的口號之外，雅各賓黨人首領羅伯斯庇的戰友聖·鞠斯特，就喊出了「麵包是人民的權利」的口號，而馬克思的朋友，德國詩人海涅則認為這是法國大革命中提出來的最偉大的口號。中國今天明明還停留在人家兩個世紀以前就已達到的水平上，還沾沾自喜並引為自豪，這有什麼可說的呢？

中國之所以在人權問題上堅決抵制外來壓力，是因為北京把人權問題看作是西方對它進行和平演變的主要手段。美國越壓，中國越頂，甚至利用美國對人權問題的高度重視來跟美國進行交易，把在美國大使館避難的方勵之與在押政治犯當作交易的籌碼，一再演出「捉放曹」的把戲，在關鍵的時候以放人來要求美國對中國作出讓步。

既然人權問題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主要因素，按理說，作為駐美大使，朱啟禎就應當十分重視人權問題，在外交活動和公眾場合盡量多講人權，讓美國公眾多了解中國的觀點立場。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無論在華盛頓的全國新聞俱樂部，在亞洲協會、傳統基金會，在季辛吉主持的美中協會集會上，或者在美國大學的講壇上，朱啟禎講得最多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中美關係，而不是人權問題。直到1992年2月25日，也就是中國駐美大使到任兩年多以後，

朱啟禎才在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集會上第一次簡單地提到人權問題，重複北京的觀點，認為人權問題主要是經濟、社會與文化問題。

為什麼朱啟禎不敢多碰這個敏感而又重要的問題？因為他不但知道中國關於人權問題的立論觀點與實際政策在美國根本沒有市場，你要對人宣講中國的一套只能讓人笑話，而且在他自己的心裡，也很難真正相信中國自己的說法。連他自己都覺得理虧，怎麼可能按照李鵬要求那樣，理直氣壯地對美國人進行說服工作呢？

1990年12月下旬，在研究室討論和總結當年形勢時，朱啟禎說了這樣一段心裡話：「我們沒有足夠估計天安門事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許多美國人中斷了跟中國的交往。這不能光責怪美國和平演變。因為許多美國老太太從電視上看到了事實真相，接受不了，這增加了改善關係的困難。」朱所說的「我們」指的是誰？是他自己和中國大使館裡邊的中國外交官嗎？顯然不是，因為他們是了解實際情況的，對於天安門事件在美國引起的反應是有足夠估計的。這個「我們」，指的是以李鵬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強硬派。只有他們，才根本不顧事實，硬著頭皮不認賬，硬要把中國的人權問題縮小為溫飽權發展權，而且把人權問題僅僅當作主權問題來處理。

其次是最惠國待遇問題。自從中美兩國在1980年簽訂貿易協定，決定相互給予降低關稅的最惠國待遇以來，直到天安門事件之前為止，這個問題從未成為中美關係中的重大問題。即使六·四事件發生後，由於布希已經作出了延長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決定，美

國國會想藉此反對中國也已經來不及了。1990年5月24日，布希仍然發表聲明，宣布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但是，到了1991年，情況就不同了。民主黨參議員米契爾和眾議員佩洛西分別在參眾兩院提出主張對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的議案，要求中國釋放天安門事件的在押犯，停止迫害民運人士，自由移民，遵守宗教自由，實行公平貿易，停止武器擴散與勞改產品出口等等。總統必須在一百天之內提出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如果中國仍然向巴基斯坦出售導彈，美國就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時《紐約時報》也發表社論，支持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

當時來勢很凶猛，中國很擔心。1991年4月中旬，李鵬在北京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最惠國待遇問題。外交部主管美國的副部長劉華秋在會上說，波斯灣戰爭後中美關係出現了新的動向，4月16日布希在白宮會見達賴。美國有人頭腦發脹，以為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需要中國了，對華政策存在觀望態度，中美關係一、兩年內不可能邁出大步子。當前工作要力爭保住最惠國待遇，但是附加條件的呼聲很高，要有兩手準備。

經貿部長李嵐清擔心最惠國待遇告吹會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失，主張既要堅持原則，又要靈活處理，不要搞的很緊張。要花幾十億美元從美進口，開放國內市場，簡化手續，增加透明度。甚至連軍方領導人，主管對外軍售的副總參謀長徐信也感到局勢嚴重，不得不表示軍方聽中央，對美鬥爭要注意做到有利有理有節。

當時從北京傳來信息表明，中國對今年的情況摸不準，應該怎

麼對付，中國領導人自己也心裡沒有數。如美附加條件怎麼辦？究竟是一口拒絕，立即報復，還是另想辦法，如果附加條件不接受，那不是美國不給，而是中國自己不要。

朱啟禎也很著急，四出活動找有影響的美國議員談話，還匆匆趕到紐約、亞特蘭大去見尼克森和卡特。卡特表示支持延長最惠國待遇，反對附加條件。但是要求中國在武器擴散、勞改出口方面有所行動，實行大赦，釋放二十一名在押的政治犯，希望從現在起到九月底，中國不要審訊被捕的學生。在向北京匯報時，朱啟禎表示他已要求卡特支持中國，但又堅持原則拒絕了卡特請中國放人的要求。他後來對人說，由於他不知道北京對最惠國待遇持什麼樣的態度，自己心裡沒有底，所以只好講硬話。這說明中國跟人打交道時，總是以我為主。明明是你求人家，人家也是好心要幫你的忙，但只能別人聽中國的，中國決不能聽別人的。

儘管緊張了一陣子，但布希在5月17日還是宣布無條件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雖然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通過決議予以否決，但由於得不到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票的支持，國會主張對中國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的議案最終還是未獲通過，未能否決總統的決定。

經過這一場較量之後，中國懂得在美國爭取民意的重要性，因此北京決定加強公關活動，由季辛吉推薦希爾·諾頓公司幫中國在美國開展公關工作。這家公司在波斯灣戰爭時幫過科威特的忙，六個月收費六百萬美元。北京同意一年花八十萬美元，朱啟禎說先花四十萬，搞半年試一試。

到了1992年，國會與總統之間又進行了新一輪的較量，由於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也同樣會給美國帶來巨大損失，國會仍然未能否決布希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決定。幾番搏鬥下來，中國已經產生了「有驚無險」的感覺，不再那麼擔心最惠國待遇被取消了。

再說武器擴散問題。多年來，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強大和軍事工業的發展，中國的武器出口有很大增長，成為軍方的一個主要財源，每年有二、三十億美元的收入，佔世界大國武器出口的第五位。

中國武器出口最引起美國與西方關注的是導彈與核武器技術的轉讓，特別是對中東、南亞等潛在衝突的敏感地區的武器出口。1987年中國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中程導彈一事，引起了美國的極大關注。1988年9月7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盧奇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見，要求中國嚴格控制導彈出口。鄧當時以十分肯定的口氣回答說：「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中導只出售給沙烏地阿拉伯，不給其他國家。」卡盧奇聽了很高興，表示「完全滿意」，相信除了沙國以外，中國以後不會再向其他國家出售導彈了。

然而，鄧小平的保證言猶在耳，西方又得到了中國向敘利亞和巴基斯坦出售中程導彈的情報，一再向中國表示關切，並要求中國停止武器擴散。在此後幾年內，美國要求中國參加導彈技術控制體制（英文簡稱MTCR）就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MTCR本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國與其他一些國家於1987年4月16日宣布的一項決定。它的內容包括指導方針（guideline）與有關參數

(parameter)，要求嚴格限制轉讓射程三百公里、載重五百公斤彈頭的中程導彈及其相關的技術。1990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立法，對違反規定的國家予以制裁，兩年內禁止對它轉讓高科技。

在導彈出售和軍火貿易的問題上，中國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和主張。外交部主要從對外關係考慮，持謹慎態度，而軍方則在維護國家利益與主權的藉口下更多地考慮自身的利益，因此雙方一直存在矛盾，時常發生爭執。由於某些能夠通天的高幹子弟插手對外軍售，常常越過外交部自行作主，而且從事軍火貿易的不同單位在外面互相搶生意，中國的軍售問題經常出現混亂與失控的現象。後來在1988年底，經高層決定，對軍貿問題作出了四條重要規定：

(1) 對外軍售要顧全大局，服從外交政策。

(2) 針對MTCR的規定，中程導彈載重五百公斤以上不賣。

(3) 五百公斤以下可以根據形勢需要考慮，但不賣給利比亞、敘利亞。

(4) 按審批程序，要經外交部審批會簽，否則不准出售。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並沒有按照自己規定的去做。最初主要是軍方不願放棄出售導彈的生意，仍然想方設法要賣給敘利亞和巴基斯坦。在天安門事件以後，為了牽制與對抗美國，出售中程導彈也成了中國政府的政策。

1991年1月31日，《紐約時報》報導，布希政府的高級官員透露，根據美國情報機構估計，中國雖已表示要限制導彈出口，但實際上還在繼續向敘利亞和巴基斯坦出售導彈。北京最近運交三十噸

製造固體燃料的化學品給巴基斯坦，到三、四月將再交六十噸，足夠它製造數量可觀的中程導彈。美國根據所獲的情報，認定中國要在1991年向敘利亞出售M-9型導彈，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型導彈，因此一再要求中國參加MTCR，遵守它的規定，不對敘利亞和巴基斯坦兩國出售導彈。

1991年5月初，美國副國務卿金米特訪問北京，他原想與軍方領導人劉華清會談，但被劉拒絕。後來，金與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會談，劉正式表達了中國政府關於武器出售的立場。劉說，不能要求所有國家都遵守MTCR。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少量射程二百公里的導彈，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但中國沒有向敘利亞出口導彈。劉強調美國自己也出口導彈，而且美國並沒有作出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證，也沒有支持無核區，還在其他國家部署核武器。劉認為MTCR並不能完全解決武器擴散的問題，因為它只限制射程三百公里、載重五百公斤的導彈，但並未包括飛機運載，又不限制這種導彈在西方國家之間轉讓。

美國認為，劉華秋是在當面撒謊，因為中國給巴基斯坦的導彈決不止二百公里射程，而且向巴基斯坦與敘利亞出售導彈本身就是危害南亞與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由於劉華秋與美國交往中經常表現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後來美國國務院的人就奉送給他一個「撒謊者」(Lier)的外號。

對於MTCR，中國的態度是前後有所變化的。最初北京認為，中國不是MTCR的發起國或參加國，因此沒有理由受它的約束。但

是後來由於美國催逼得很緊，把它當作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來對待，中國才表示願意遵守MTCR的參數，不再出售規定參數以上的導彈。但事實上，北京仍然想用一種改頭換面的辦法出售導彈給巴基斯坦與敘利亞。中國給巴基斯坦的M-11型導彈，射程只有二九〇公里，但是彈頭重七、八百公斤，只要減輕彈頭份量，就能輕易地使射程超過三百公里。李鵬在北京開會研究導彈問題時認為，射程可以不動，但是要在彈頭上想想辦法。

因為北京始終不能給美國一個肯定的保證，布希總統以中國仍要擴大出口導彈為理由，在1991年5月宣布延長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同時，決定扣發出售給中國代外國發射的七顆人造衛星的許可證。只有在證明中國不再出售導彈之後，才能取消這項制裁。

由於受到美國制裁，北京力求美國務卿貝克訪華對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作出讓步，以及李鵬急於想在1992年1月底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上與布希會見，中國才勉強同意接受MTCR。1991年11月17日，中國外長錢其琛正式向美國務卿貝克表示，中國決定遵守MTCR規定，願意就導彈的參數與美國達成協議，不再出售任何其內在性能超過射程三百公里與載重五百公斤以上的導彈。

但這個協議仍然受到中國軍方的抵制。在貝克11月底訪問北京之前，李鵬曾親自登門拜訪中央軍委副主任劉華清，希望軍方同意這個決定，劉華清卻面有難色地表示，中國對付美國，本來手裡的牌就不多，不能什麼都對美國讓步。因此，當貝克來到北京，在與中國領導人會談中要求中國拿出書面保證時，中國並沒有滿足他的

要求。

中國之所以遲遲不肯在不出售中程導彈問題上作出承諾，是出於以下幾種考慮：

一，中程導彈是有時效的武器，超過時限就成廢品，但它卻是世界軍火市場上的熱門貨，越是西方禁售，這種武器越是搶手，越能賣大價錢。每顆中程導彈價值約三千萬美元，如能出售二、三十顆即可獲得幾億美元，成為中國軍方的重要財源。

二，對敏感地區輸出導彈武器，使某些國家仰賴於中國的尖端武器，可以增加中國對這些地區的影響力。

三，中國認為，出售武器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行為，外國無權干預。世界武器市場上的最大賣主是美國，不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四，中國在天安門事件後不滿美國壓力，力圖以尖端武器銷售作為制約美國的一張牌，加強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地位。

五，中國想把出口導彈問題與美國對台灣軍售問題掛鉤，迫使美國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

中國駐美使館對於出售中導的問題，即使了解到美方的強烈反應與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也處於無能為力的地步。然而這又是處理中美關係時無法迴避的麻煩問題。因此朱啟禎在內部就時常流露出對處理這個問題的為難與不滿情緒。

例如，1990年12月25日，朱啟禎對使館政治組說，據我所知，M-9導彈明年要賣給敘利亞，射程比美蘇簽訂的中導協議少，但是

參數要大，MTCR規定不得超過三百公里，中國的可以達到四五〇公里。1991年5月初，他又說，中國對MTCR應當表示一個明確的態度。現在自相矛盾，一方面對外說中國導彈出口很負責，但給巴基斯坦的M-11導彈，射程二九〇公里，實際載荷七百公斤，稍稍減輕份量就可達到三百公里以上。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只承認向巴基斯坦出售射程二百公里的導彈，但又不能說明中國的中導概念是什麼，很被動。有的美國學者要求我們拿出官方文件證明中國不違反MTCR，一下子又拿不出來。

從中國駐美大使的角度來考慮，朱啟禎希望中國對MTCR的問題與美國達成協議越早越好。但這個問題牽涉到中共領導人對美政策的決策考慮，朱必須謹慎小心，不便提出什麼意見。即使在朱啟禎離任之後，中美之間仍然為了中國出售導彈的問題不斷發生爭執。中國外交部並不要求駐美使館對這個問題明確表態，而只須「防止武器擴散影響兩國關係」，說明這個問題並沒有從中美關係中完全消失。

總的來說，朱啟禎三年來儘管為解決中美兩國之間存在的種種矛盾分歧而奔走操勞，但是所有這些問題，無論是人權、貿易、軍售或其他問題，直到他任期結束時，無一得到根本解決。

朱是北京外交圈裏的橋牌高手，經常與外交部副部長齊懷遠搭檔參加橋牌比賽。但是在大國外交的牌局中，他卻施展不了身手，無法挽回因天安門事件與世局劇變而造成的中美關係的逆境。當中

國外交部針對美國1992年的大選形勢作出中美關係一、兩年內不會有所進展，唯有寄望於布希連任的結論時，朱啟禎總算鬆了一口氣，內心盤算著早一點回北京了。

第12章

一個外交官的責任與良心

看了本書前面十幾章的內容以後，讀者可能產生一個想法，作者用這麼多篇幅談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後錯綜複雜的中美關係以及雙方的政策考慮，那麼作為中國駐美使館的政治參贊，你本人在這中間究竟有些什麼想法和活動。

這正是作者要在這一章內回答的問題，不妨先從回顧一次重要的會議作為開始。

麥迪遜旅館嘉賓雲集 即席發言掌聲四起

1989年5月24日，李鵬宣布北京實行戒嚴後第六天，天安門事件發生前十天，在華盛頓著名的麥迪遜旅館舉行了一場不同尋常的中美關係討論會。作為中國使館的政治官員，我和幾位同事也到會聽講。

會議是由季辛吉以美中協會會長的名義發起和主持的。這個在八十年代中美關係鼎盛時期成立的組織，由卡特、福特、尼克森三

前任美國總統擔任名譽會長，羅吉斯、布里辛斯基、海格、穆斯基與魯斯克等前國務卿為副會長，成員包括美國幾任的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前駐華大使，以及美國的知名學者和大企業家。

按照原定計畫，這個集會是為了歡迎中國人大委員長萬里訪問美國而舉行的。但遺憾的是，由於中國國內局勢緊張，萬里在美國只待了一天就匆匆提前回國了。本來他要在這個會上發表的演講，只好由韓敘大使代為致詞。

不過，那天到會的人仍很踴躍，從尼克森到布希歷屆美國政府與中國有關的，特別是為打開中美關係僵局探過路，作出過貢獻的大部分在任或在野的高級官員都來了。與會的還有許多大企業家和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真可以說是高朋滿座，濟濟一堂，空前的盛會。但會議的氣氛是沉悶的，與會的人似乎都懷著對中國與中美關係前景莫測的感覺，擔心天安門的事態會更形惡化，一發不可收拾。

會議的議程，除了季辛吉致歡迎詞與萬里講話外，還有兩個主旨發言，由已獲任命但仍待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批准的助理國務卿索羅門，與應邀從北京前來的中國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李匯川兩人擔當。

索羅門說，現在有人把北京發生的事件比作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如果今後中國局勢的發展引起全世界的反應，人們不會感到意外。他認為，中國局勢的演變，正是鄧小平十年前發動的那場改革的結果。現在鄧好比騎在老虎背上，說不定會從虎背上摔下來。

如果北京採取鎮壓行動，使用武力來把學生清除出廣場，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就會出現一個非常暗淡的時期，他表示擔心中美關係會進入一個「倒退的時期」。

在索羅門講話之後，季辛吉介紹下一個發言者李匯川先生。他說，李擔任過外交部長助理和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現在的名義是高級研究員。昨天晚上他和李交換過意見，覺得「獲益匪淺」。

美國人對李的背景可能不大了解，其實他是中國外交部少有的才子之一。他早年在清華大學學理工，起先在東北中長鐵路部門工作過，後來作為革命知識份子幹部轉入外交部，曾經擔任過中國駐蘇使館參贊與蘇聯東歐司司長。這回北京之所以從大批退下來的人中間挑選李匯川來參加這個重量級的會議，是因為目前中國國內局勢與中美關係都處於複雜變動的狀態，需要像他這樣有經驗的老將出馬，應付局面。

在與會者的矚目下，李匯川開始念他的講稿。他泛泛地談到國際形勢，從頭到尾對中國局勢和中美關係，連一句話、一個字也沒有提。通篇講話都跟當前人們最關切的形勢問題沾不著邊。

如果說索羅門的講話是有骨頭有肉，完全用自己的思想與語言來表達美國政府的觀點，李匯川的講話則像是在反來覆去地嚼一塊橡皮，令人乏味透頂。看得出來，這位資深外交官是有意要用兜圈子、磨時間的辦法來迴避當前的敏感問題。

在李匯川結束發言之後，季辛吉說：「我們現在還有二十分鐘時間可以討論。讓我先來請教一下我們的中國客人李先生，他對戈

巴契夫訪華之行的國際影響有何看法。如果說這次訪問使國際環境有所變化的話，變化是什麼？」

對於季辛吉這位國際戰略大師來說，任何時候都必須從戰略角度來看待中美中蘇關係問題。因此，在韓敘大使念完萬里的講稿之後，他首先關心的是中蘇關係問題，既風趣又巧妙地說：「我覺得中國人是什麼都不會浪費的。我注意到了，鄧小平與戈巴契夫的公報中，居然也套用了中美上海公報中反對霸權主義的句子。」不過他說，「我們並不抱怨中國對美蘇一視同仁，如果每個人反對的都是德國（霸權主義）的話，我們也不必介意。」

現在，他又把這個問題提給了李匯川，希望這位北京來客好好地談一談。他知道李的英文很好，但是半開玩笑地問李：「我們還需要翻譯嗎？」

「My English is rusty.」（我的英文已經長鏽了）。李匯川想推辭，因為通過翻譯，他可以有一個緩衝時間來考慮如何回答問題。

「So is mine, that has never stop me.」因為季辛吉的口音很重，常人不易聽懂，所以他說「我的英文也同樣如此，但這從未妨礙過我講話。」由於難以推卻，李匯川只好用英文回答季辛吉提出的關於戈巴契夫訪華影響的問題。他說：「當然，戈的訪問是很重要的，他會產生重大影響。」

什麼影響呢？大家都豎起耳朵在等著他講下去。可是很失望，李對季辛吉的回答，就到此為止，沒有下文了。但他把話題一轉，忽然表示要感謝季辛吉。大家有點莫名其妙，感謝什麼啊？原來他

曾讀過季辛吉的一本著作，裡邊提到德國學者史賓格勒寫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West*）這本書。

「你瞧，中國人對我可真有研究，」季辛吉打趣地說。

「不過我忘了在什麼地方提到這本書了。」李不大好意思地說，連書名都記不起來，可見他事先根本就沒有考慮過要提這本書。因為臨時應急，出於無奈，才搜索枯腸，勉強想出來的。

「我以前曾寫過一篇關於這方面的論文，」季辛吉解釋道。

於是，李匯川就借了這個話題，迴避討論當前局勢轉變，轉而談論七十多年前史賓格勒那本早已被人遺忘了的著作。他說，我們應當研究二十世紀，特別是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這正是他在拜讀季辛吉這篇論文時所產生的想法。

實際上，究竟李匯川要感謝季辛吉什麼，季辛吉為什麼值得他感謝，他並沒有說出個道理來。

這位中國外交部才子的表現，實在使所有的人感到愕然和洩氣。在座的都是當今美國最知名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高級官員和大企業家。季辛吉幾經挑選，才從北京請了這樣一位資深的人士前來發表主旨演說，希望雙方有所交流。可是沒想到，這位客人竟然把一篇看來好像幾個月甚至一年前起草的內容空泛的講稿，拿來搪塞給人家了事。

會議中間休息，我注意到人們都在交換眼色，有的聳聳肩膀，明顯地表示遺憾和不滿。在洗手間碰到鮑大可教授，我問他有什麼印象。

他說：「Mr. Li didn't say anything, may be you can say something.」（李先生什麼也沒說，也許你能說點什麼）。

「I hope so, but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to say anything on this occasion.」（但願如此，但在這種場合，我不便說什麼）。

作為一個中國外交官，我對這種場面實在感到難堪，甚至有點羞愧。不是為我自己羞愧，而是為中國，為中國的外交部感到羞愧。中美兩國外交官碰在一起，人家侃侃而談，談的都是真實的思想；我們總是言不及義，繞了十萬八千里的大圈子說空話。美國人拿出來的是鮮貨，中國人拿出來的是乾貨。在這樣的場合，雙方雖然不是在決勝負，客觀上卻是在比高低。無論從水平、氣度與隨機應變的外交技巧來說，美國外交官都遠遠勝過中國外交官一籌。

其實，在場的美國朋友對中國都是善意的，對中美關係都是十分珍惜的。如果中國演講人真有膽量，不妨理直氣壯地宣稱中國政府的鮮明立場，否則也不必顯得那麼被動、畏縮，從頭到尾都在打退堂鼓，顯出一副膽怯得不敢應戰，什麼都不想談和什麼也談不出來的可憐相。

我本來不想說什麼，也不宜於在這種場合說什麼。但是內心又覺得，就像鮑大可教授要求我那樣，應該起來說點什麼。究竟說或不說，該說些什麼，在我腦子裡盤旋了好一會兒。如果要講的話，我不能僅僅空洞地表態，必須講點什麼道理出來，而且要考慮到對各方面都能過得去。就在從洗手間回到會議室，季辛吉馬上就要宣布散會之前的二、三分鐘時間內，我急中生智，在內心捉摸出幾點

看法，最後鼓起勇氣，出人意外地站起來要求發言。

首先，我也從史賓格勒的那本書談起。因為在我七十年代所寫，八十年代出版的《季辛吉評傳》一書中，有一章專門介紹與分析他的早期著作，其中有五頁多的篇幅談到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季辛吉對他的評介。

史賓格勒原是德國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學教師，他在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時，發表這部厚達兩千頁的歷史巨著。其內容十分龐雜，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文學、藝術以至科學技術。這部書不僅廣泛地談到歐洲，而且論述古代中國的哲學思想與春秋戰國時代善於思辯的謀臣策士，如陰陽家鬼谷子的門徒蘇秦、張儀。作為一個新起的歷史學家，史賓格勒的觀點來源於尼采與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強調人的主觀意識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即「英雄創造世界」的史學觀點。例如他說，偉大人物的偶然興起，「一夜之間就會使一個民族(如馬其頓)登上事變的絕頂，而他們的突然死亡(如凱撒的死亡)，則會立即使世界從個人所鞏固的秩序陷入混亂。」

二次大戰後，史賓格勒的史學觀點曾在美國風行一時，季辛吉1950年在哈佛大學政治系畢業時，以《歷史的意義》為題，寫了一篇長達三七七頁的畢業論文，論述德國歷史學家史賓格勒、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歷史著作和歷史觀。他在這篇論文中特別推崇史賓格勒的觀點。後來，這篇論文出版成書，就是李匯川所讀過的那本書。

我在會上的即席發言，所舉的論點是這樣排列和展開的：

一、史賓格勒關於西方衰落的預言並沒有實現。整個二十世紀內，西方經濟有很大發展，變得更加繁榮和強大了。現在西方人談論的不是西方的衰落，而是東方社會主義的衰落，甚至預言共產主義將在本世紀末以前結束。

二、但是我認為，現在人們從中國學生運動中看到的不是衰落，而是一種復興，一種巨大的希望。中國的第一波經濟改革之後，接著而來的必然是第二波政治改革。中國正在改寫自己的歷史，不管將來會有什麼樣的困難曲折，明天的中國將會和今天的中國不一樣。

三、中國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表明，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是不可分的。人們有了彩電、冰箱，生活得比過去好了，但不會僅僅滿足於此。他們會在政治上提出各種要求，主張整治日益猖獗的貪污腐敗，爭取享有自由表達自己意志的權利。

四、政治改革中最困難的問題，在於如何區分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差別。有些人認為，議會民主與言論自由都是西方的產物，而無法接受。但如果沒有它們，你又能如何制約政府權力和政治腐敗。

五、從長遠來看，加強議會監督政府權力和使人民享有更多民主自由，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國不能照抄西方模式，應當按照中國的國情尋求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我個人相信，中國是會變的，不過要讓中國自己變，不能從外部來迫使它變。

六、目前中國的局勢很複雜，美國最好對中國的事情少說話，

避免給人以干預中國內政的印象。看到中國學生舉著自由女神像，有些美國人很得意，以為中國人都要以美國為榜樣。其實，你越是強調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越是對學生不利，為他們製造困難。對中國不利的事情，對美國也會不利，美國必須注意這一點。

我的即席發言大概不到十分鐘。本來想把話說完就走人完事，但出乎意料的是，話剛結束，全場就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對我的講話表示歡迎，使得原來死氣沉沉的會場立即活躍起來。季辛吉還特意從主席台上走過來跟我握手，讚賞我的發言，並且同意我講的美國應當對中國局勢少說話的意見。一時間，很多熟識和素不相識的知名人士，包括羅德、恆安石、鮑大可，都過來跟我打招呼，給予好評。有的與會者甚至問我的英語是在哪兒學的，我說基本上是自學的，使人更加感到驚訝。

過了幾天，我約請美國前駐華大使恆安石進行工作午餐，交換對中美關係看法。席間談起那天麥迪遜旅館的會議，他認為我即席講話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給人以一種真切之感。季辛吉的隨身秘書達爾貝小姐，因為擔心我的發言可能在使館內部引起對我不利的反應，只答應以後給我寄會議的材料，但不收錄我的即席發言。

我也擔心過發言的後果，但過了很久，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對我不利的影響。這是因為，與我一起參加會議的同事，甚至使館上下的大多數人，對中國局勢基本上都懷有與我類似的想法，儘管他們不一定像我那樣對史賓格勒與季辛吉的著作有過研究，也不大可

能作這樣的即席發言。

更重要的是，我的講話並沒有反對政府的觀點。我講話那天，李鵬已經宣布北京實行戒嚴，但天安門的流血事件尚未發生，而中國局勢演變的真正分水嶺是六·四，不是五·一九。我即席發言的內容，關於對學生運動的評介，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係，區分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差別，關於中國不能照抄西方，以及奉勸美國少對中國局勢講話的意見，直到今天還是站得住的。

不管對我如何評介，我的發言是出自我的責任，出自我良心，反映出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聲。

賓大演講受「圍攻」 從容對答充「靶子」

如果說上面寫的是我在美國人面前表達自己的觀點，那麼下面要講的則是我與中國留美學生的一場「交鋒」。

1990年4月14日，我收到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張旭成教授的來電，邀請我去參加該校舉行的一場「中國改革與民主運動」學術討論會，希望我就中國改革與中蘇關係問題作一個演講。

張旭成教授是台灣人，六十年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國際關係博士學位。我與張教授是經過使館對台工作小組官員介紹而認識的。由於北京在天安門事件後以觸犯戒嚴令為理由扣押台灣《自

立晚報》駐北京記者黃德北，成為中國涉外關係中的一個事件。在張旭成陪同下，《自立晚報》的社長到使館來投訴求情（最初北京拒絕他們去），希望通過中國使館向北京交涉，爭取早日釋放該報記者。因為我的分工範圍包括美台關係，與台灣事務有間接關係，使館決定由我出面接待他們，並將其要求報回北京，過了幾天黃德北就被釋放了。

事後有一天，張旭成給我來電話表示謝意，並說在與我初次接觸中覺得我的level很高，希望以後有機會請我去賓州州立大學演講，談談中蘇關係。使館批准我去演講後，我就趕緊抽空起草出一篇英文講稿，應張旭成的邀請，在4月20日偕內人前往賓州大學。

賓大是美國著名的州立大學之一，也是美國東部中國留學生最集中的學校之一，全校有四萬多學生。由於天安門事件過去還不到一年，它在國內外仍然是一個令人情緒激動的敏感話題，而賓大校園內又有好幾百個中國留學生，因此我一路上無心瀏覽車窗外的明媚春光，心裡不時地捉摸著明天的演講會，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如何應對。

來到演講的會場，就發現情況很不對頭。大會名稱下面加上了一行「紀念天安門大屠殺一周年」的字，顯示根本不是什麼學術討論會。演講者也不止來電告訴我的三兩人，而是六個人。除了我和國務院政治官員羅賓遜（Larry Robinson），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白禮博（Richard Burnstein），威斯康辛州大學教授傅禮門（Edward Friedman），匹茨堡大學教授格拉斯可（Lawrence Glasco），

以及六·四後從北京來美就讀於賓大的一位中國學生。

「美國之音」電台的兩位中英文記者也聞訊遠道趕來採訪，要我今天的討論會發表談話。但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對「美國之音」恨之入骨，把它稱作「最大的謠言公司」。沒有一個中國官員敢於和它接觸，更不用說是發表錄音談話，除非他決定「投奔自由」，或者是發瘋了。因此，即使他們一再要求，我也只好斷然拒絕。

一看會議現場的這個架勢，我就產生一種落入圈套，即將身不由主、單槍匹馬地面臨一個火爆場面的預感。因為這根本不像是一場平靜的學術討論會，而是要借天安門事件一周年的名義來進行聲討與批判的群眾集會。我這個中國外交官已被置於接受批判的「反方」地位。

這是天安門事件後使館政治官員在美國大庭廣眾的第一次露面。據會後有人對我說，中國駐美外交官在六·四以後一直沒有敢公開出來講話，這回大家都在等著看究竟什麼樣的人來，會講什麼話，怎樣應付這種局面。有人認為，姓陳的此次有備而來，表明中國駐美使領館改變了過去十個月來的「龜縮政策」，準備面對中國學生與美國公眾，「展開公關活動」。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內心同情學生卻不能公開表達，對於政府使用暴力有所不滿但又不能公開反對。我不但要對付在場的幾百名中國學生，而且還必須考慮到我在這裡的一切活動會傳到使館，引起內部的反應。不管怎麼強調我的發言只代表自己，不代表政府，

但是我的身份決定了我必須謹慎從事，避免錯誤，必須在對學生與對政府這一對矛盾之間，選擇適當的語言來表達我的論點。

當我登上講壇時，全場氣氛立刻顯得緊張起來。所有的目光都針對著我，似乎要抓住我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準備我一講完，就馬上向我開炮，進行反駁與質問。所以，我首先做好心理準備，要求自己保持冷靜與清醒的頭腦，明確自己今天到這裡來不是與人爭辯，而是通過委婉的解釋來和他們進行交流。即使遇到難堪的問題，甚至惡意的挑釁，也必須保持鎮靜，不要作出強烈反應。

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講稿，我講了三點主要內容：

第一，我說，很多人認為，在蘇聯與東歐發生的演變，也很快會在中國發生，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中國和它們的情況不同，不能類比。蘇聯改革，只有政治空談，沒有經濟實效，老百姓不能受惠，反遭其害，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填不飽人民肚皮，到頭來政治改革也會無人支持，陷入困境。但是中國十年改革成效卓著，有目共睹。

第二，我說，有人認為前一個時期中國在經濟領域裡的整頓看作是中止改革的一個標誌，只是一種誤解。實際上整頓並不是六·四的產物，早在改革之前一年就已開始了。外界對中國改革有一種觀念上的誤解，以為中國要拋棄社會主義，實行資本主義，其實，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改善社會主義，而不是拋棄社會主義。

第三，我說，中國需要進行政治改革，發揚民主，但是因為國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民主自由的模式，只能按照中國的國情走自

己的道路，不能讓西方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

這三點看法完全是說理的，直到今天也還能站得住。但聽眾仍然不滿意，爭相提出問題：

「中國要求西方尊重中國人民自己決定自己事務的權利，為什麼他們的領導人自己卻不尊重人民的權利？」

「你作為中國的外交官，對天安門大屠殺為什麼避而不談？」

「中國學生明明是要求民主自由，為什麼要對他們進行武力鎮壓？」

對於他們的問題，有的我回答了，有的迴避了，有的只好用答非所問的辦法把它叉開了。

看到會場上的情緒越來越激烈，所有的矛頭都對著我，會議主持人張旭成教授不由得出來打圓場，要求提問人不要把問題過於集中於中國外交官一個人身上。他還稱道我在會上所表現的勇氣，而我則對大家半開玩笑地說我已成了會議的「眾矢之的」。

面對這種場面，我沒有緊張，沒有惱怒，也沒有後悔自己送上門來落入這圈套。由於我在會上自始至終採取說理的、平靜的與溫和的態度，會場的激烈氣氛終於慢慢地緩和下來。很多原來以為從中國大使館出來的官員一定是面目猙獰、慣唱高調的人，這時從我的身上看到了另一種出乎意料的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緩和了自己嚴厲態度。

招待會完了，主人在當地一家中餐館裡舉行晚宴，表示對來賓的謝意。賓大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教授普里比

拉（Prybyla）作為陪客，坐在我的身旁。他很客氣也很誠懇地對我說：「陳先生，你今天的處境很為難，不過你以從容委婉的方式（in a gracious way）對付過去了。」

國務院的羅賓遜先生則表示，他注意到我在演講與問答中既沒有為中國政府使用武力的行動辯護，也沒有抨擊美國政府。

事後聽說，有的美國記者私下裡對我的評介是：「作為一個外交官，在這麼緊張的場面表現得如此鎮定，話也說得相當得體，這樣的人不簡單。」

第二天一早，具體籌辦這次討論會的賓大中國留學生聯誼會的負責人，親自駕車，一路上有說有笑，愉快地把我們送到火車站。坐在車廂裡，瞧著窗外那急速掠過的田野、樹木和房舍，我腦海裡又浮現出昨天那一幕一幕的情景……

回到使館，幾天之後，主管留學生事務的教育參贊在餐廳裡碰到我，很表同情地對我說：「聽說你在賓大受到了圍攻。」

怎麼說呢，是圍攻嗎？不，我心裡想，這是我和中國學生的一次很有益的會見，它使我增加了對天安門事件的感性認識，了解了更多的情況。我不想對這位好意的同事說什麼，只是微微一笑，作為回答。

「眼看著中美關係毀於一旦，我真是傷心得想哭」

天安門事件在大多數中國外交官心裡引起的反應，正如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一樣，是很複雜的。

一方面他們對學生的愛國行動表示同情和支持，對政府的武力鎮壓表示反對和不滿，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認為這個政府應當推翻，更不等於應該由這些天安門菁英份子，或其他政治力量來掌權，使中國出現一個改朝換代的局面。中國駐美使館的極大多數人在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政府使用武力表示強烈不滿，特別是對李鵬個人極盡諷刺咒罵之能事，但也僅此而已。因為不管你如何不滿這個政府，也改變不了你是這個政府一部分的事實，除非你離開它。而出於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原因，大多數人不會選擇這條道路。人們更多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有些人罵一陣子，等風聲一過去，心理上也就恢復平靜，一切如常了。

最明顯的例子是，六·四以後的第一個國慶節，使館大擺宴席舉行聯歡，從中國各地調來的十幾位名廚，各顯身手，每人做出一道拿手好菜，一道甜食，讓大家品嚐。餐廳裡杯觥交錯，歡聲四起，好像天安門悲劇從沒有發生過，實在一點也看不出還有什麼悲情可言。甚至後來不久從教育處出走，高唱支持學生的那位先生，在宴會上也是手舞足蹈，表演得有聲有色，看來比誰都起勁。

從我個人來說，內心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失望與悲情。當時在對外活動中，也曾遇到過不止一人有意無意地試探我是否願意出走的

情況，甚至還有人從西岸打來電話，問我為什麼還待在使館不走。但我不為所動，不認為這是一條該走的路。因為我向來對任何事情都持冷靜客觀的態度，有自己的判斷。我尊重學生的理念，但並不認同他們的方法和行為。我不滿政府動武，但並不認為中國就此應當改變政權，也不認為中美關係就此會一退到底，無可挽回了。因為根據我的了解和分析，我相信，儘管天安門事件使中美雙方互相敵對，但這只是一時的現象。雙方仍然具有相互和解進行合作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經過一番波折，最後總是要回到關係正常化的道路上來。作為一個中國外交官，不論自己職位高低，能量如何，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應當堅守崗位，竭盡所能，為消除中美關係的障礙，增進兩國的相互了解與合作貢獻一分力量。

儘管局勢緊張，但我心裡並不慌張，整天考慮的主要是如何開展工作，搜集信息，了解情況。但要這樣做，有很多困難。首先是你自己的看法與政府不完全一致，在內心不能同意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動亂」，是美國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結果，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全在美國等等的官方說法，因為這與客觀事實印證不起來。我認為，即使中國高層領導人自己也心裡明白，這實在是一種出於需要、出於無奈的說法。作為外交官，我在對外活動中既必須遵循政府的立場，又不能照本宣科背誦這些觀點，因為這根本無法被美國人所接受，不能作為與人交談的基礎，你必須考慮和設法以適當的方式來進行工作，與人溝通。

其次，究竟要不要講實話。中國高層在國內局勢與對美政策上

存在分歧和爭執。在當時保守派佔上風的情況下，北京一方面要求駐美外交官迅速及時反映情況，但又不愛聽對中國不利和不符合自己意願的話，誰要是說了實話，誰就會受到指責。比如美國對華政策的真正意圖，美國公眾的強烈反應，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以至對蘇聯局勢的分析判斷等等，都必須首先考慮到中國領導愛聽什麼，不愛聽什麼之後，來決定對北京報不報和怎麼報。

但不管如何，越是局勢複雜、關係緊張的時候，越是需要外交官加強活動，做好工作，來執行和完成自己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在中國、蘇聯、東歐與世局急劇變化中伸出觸角，捕捉信息，掌握美國對華政策的脈搏、美國公眾的情緒，以及從華盛頓這個世界外交大舞台來觀察形勢，為北京了解動向、進行決策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與分析見解。工作的對象主要是美國主管對華政策與其他有關部門的官員，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熟悉情況的外交記者，華盛頓外交圈裡有關國家的外交官員。主要的活動方式則是去國務院與白宮拜訪，約人進行工作午餐，參加各種有關集會活動，結交各方知情人士，通過經常性的接觸來建立自己的信息網絡。

從1989年5月天安門事件前到1991年蘇聯垮台時為止，包括回國休假不在華府的兩年多時間內，我個人參加大使、公使的小範圍宴請與使館對外活動，參加美國各種政治、學術討論會與午餐報告會，參加外國使館的各種招待會，對美國高等院校作演講，主動約請美國政府官員以及其他有關人士進行交談或工作午餐等等，累計約有三百多起活動，總共起草重要電報與各種文稿近兩百篇。所獲

重要信息與情況，絕大部分報回國內。

現在回顧起來，記載在我單獨會見名單上的人士包括：國務院高級外交官、總統裁軍特使坎普曼與尼采，助理國務卿幫辦傅立民、凱曼、考茲拉里奇、沃爾夫與波倫，前國務卿海格，前助理國務卿何志立，前駐中國大使恆安石，國務院中國處處長魏德曼、副處長貝德、蘇聯處長維什波、東歐處長斯維哈特、中歐處長葛洛勃，白宮亞洲主任帕爾、歐洲主任赫欽斯、非洲主任派塞奇，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鮑大可、哈定、卡內基和平基金會會長阿勃拉莫維茲、華盛頓德國研究所所長雷文斯頓、德國公使普洛格、荷蘭公使茂爾、匈牙利公使帕塔基，蘇聯參贊阿法納西也夫，《華盛頓郵報》主編（相當於中國的總編輯）道奈、著名外交記者奧勃多弗與霍夫曼等。

按照美國國務院的慣例，外國外交人員與國務院官員接觸，是按級別對等的。大使見助理國務卿（比中國的司長高一些，是實際上的決策者），公使見助理國務卿幫辦（相當於司長副司長之間），參贊見地區業務司的有關處長副處長。與其他有關國家外交官往來，也需級別對等，不便超越。但實際上我所接觸的國務院外交官與外國外交官，有不少是等級比我高的，這既反映了他們對中國的重視，也說明了我在外交活動中的能量，使人們願意與我接觸交談。

在與以上這些人的交談中，我得到了很重要的信息和很值得重視的見解。根據當時會見與事後追記的筆記，不妨略為回顧一下這

些會見的情況：

1989年5月12日北京實行戒嚴前一周，與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哈定進行工作午餐，了解對中國局勢的看法。他認為，中國1989年學運與1986年學運的不同點是，它反映了中國大多數人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中國政府能夠保持冷靜克制，避免發生衝突，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局勢發展可能變好也可能變壞。鄧小平讚揚波蘭實行軍管，但中國不是波蘭，更不是緬甸。中國已經與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不可能從國際上撤退。

展望前景，哈定預計，如果中國要使用武力，造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則中國將發生大倒退，由此而可能引起美國四種強烈反應：

一、布希會受到很大壓力，對中國政府的行動有所指責，在軍售和技術轉讓方面對中國進行制裁；

二、中國在美國的幾萬名學生會採取行動，要求美國政府與公眾輿論對中國施加壓力，對他們的影響不能低估；

三、美國工商界會改變對中國的看法，因為中國局勢不穩而從中國市場大規模撤出；

四、中國領導人的形象將受到極大損害，人們會把他們比作南韓的全斗煥、菲律賓的馬可仕，以至台灣的蔣介石，鄧小平的威望將一落千丈。

第四點內容我沒有敢報回，但哈定當時的幾種估計，完全被後來的事實發展所證實。

1989年5月18日北京宣布戒嚴的當天，參加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SAIS）的一個集會。在該所任教多年的鮑大可教授（Doak Barnett）是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他的很多見解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決策參考。他曾訪問中國，就中國外交決策問題對趙紫陽總理進行過專訪，後來出版了一本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由於年邁退休，校方為他舉行告別招待會。出席的人士有已被任命為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索羅門，八十年代初的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蘇利文，賓西法尼亞州長、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謝弗，以及鮑大可的哥哥、曾經擔任過助理國務卿的羅伯特·巴尼特等人。

他們都與鮑大可有深交，懷著對他的尊敬而來，少不了要對鮑教授發表一些出自肺腑的頌詞。但在當時這種場合，大家也很自然地會把話題集中於中國的當前局勢。恆安石認為，鄧小平失去了時機，學生開始時要求很小，現在全民捲入，鄧丟了面子。但是他說，誰能掌握局面呢？要所有人下台也不可能，中國總不能讓北大學生委員會來掌握局面吧。

羅伯特·巴內特比鮑大可大十一歲，曾在1962~71年間出任過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很欽佩鄧小平，一股勁地為鄧說好話，擔心中國局勢惡化。他認為，現在趙紫陽應該做的事情是勸學生不要羞辱鄧小平，要肯定鄧的歷史功績。雖然鄧在政治改革方面遲疑保守，但經濟改革功不可沒。畢竟中國十年巨變是由於鄧的功勞，沒有他的決策和勇氣，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1989年6月16日，天安門事件過後不久，約請中國處副處長貝德共進晚餐。正好是周末，平時車水馬龍的市中心K街，顯得靜悄悄地，我們兩個人在顧客稀少的飯店內就座，更加感受到六·四以後籠罩在中美雙方官員頭上的那種悲涼傷感氣氛。

我點了幾道菜，要了兩瓶冰鎮青島啤酒，兩人一邊喝，一邊談。

貝德一開始就道出自己的心情，說中國局勢嚴重影響了中美關係，對於我們這些十年來一直為兩國關係努力的人來說，看到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係毀於一旦，真是傷心透頂得很想痛哭一場。對於他的感受，作為中美關係的同行，我當然只能表示同情和感慨。

貝德是國務院的「老中國」，被同事認為是個「工作狂」。八十年代初曾在美國駐華使館任二等秘書，九十年代初升為中國處處長與副助理國務卿，後調任白宮專管中國事務的亞洲事務主任。在1997~98年籌畫與具體安排中美兩國首腦互訪這兩件大事中，貝德立下過汗馬功勞，本來白宮有意提升他為主管包括日本、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在內的亞洲事務高級主任，但因為白宮工作太緊張，他已經累夠了，很想出去當幾年大使。因此從密西根大學選拔了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來接替原來的高級主任克里斯多芙·珊德拉。

那天晚上與貝德見面，他很誠懇地表示，布希本人一直在關心中國局勢和鄧的行蹤，主觀上很希望在北京發生的這一切與鄧無關，並在記者會上竭力為鄧說好話。他也把整個軍隊與天安門使用

武力分開，想減輕人們對鄧的懷疑與反感。布希要與鄧通話，是為了澄清這一點。但是鄧拒絕通話，第二天出現在電視上，接見戒嚴部隊，否定了布希原來的希望，使他處境很為難。

貝德說，現在布希受到的壓力很大，但不管如何，對中美關係的決定權不在國會，而在布希手裡。但在目前情況下，布希所能做的只是盡量控制和減少中美關係的破壞程度，要等將來才能想法修復。

貝德最後說，美國不知道今後的中央全會與政治局如何改組，新班子如何。如果上來的人都與軍隊有關，沒有改革派與新面孔，美國將很難像過去那樣與中國打交道。

我不知道美國那時是否已經看到鄧小平5月31日對李鵬、姚依林的談話（當時並未公開發表），但從後來傳出來的這個談話中可以看出，鄧當時所最關心的就是要在六、四之後建立「一個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班子」，這也正是貝德所透露的美國政府最關切的事情。

1989年9月1日，與國務院中國處處長魏德曼進行工作午餐。魏說，中國傳來的信息令人費解，一方面希望恢復關係，一方面又批評美國搞和平演變，把美國當作敵對國家。但是中國說美國要對中國和平演變不符合事實，美國無意改變中國的制裁，因為不現實，行不通。

他說，中國的局勢不明朗，現在國務院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盯著中國，對鄧後局勢很擔心。中央情報局的估計是，只要鄧在，保

守派要想拖後腿的做法會受到限制。

美國仍然把中國當作友好的非盟國對待。如果中國繼續反對美國，懷有敵意，美國很難不作出反應。布希冒著風險力求恢復關係，現在美國內氣氛對布希不利，國會仍要制裁，如以壓倒多數通過，布希很難否決，希望中國為改善中美關係氣氛創造條件。

1989年9月7日，根據使館決定，我在一等秘書張無畏的陪同下到美國務院辦交涉，要求美國當局撤走由前來示威的中國留學生豎立在使館門前的自由女神像和亡靈牌。對方由中國處處長魏德曼與政治官員羅賓遜對談。我先對他們唸了一個簡單的外交說帖，要求美國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將這個女神像搬走。當魏德曼說這是中國學生的行動，美國不便干預時，我就指出，美國當局有義務保證中國使館的安全與工作環境，假如1950年代在韓戰中犧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家屬，也製作一個志願軍雕像，把它安放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門前，美國會怎麼樣。魏表示他將把中國大使館的要求轉送給有關領導，幾天以後，女神像被撤走了。

1989年9月26日，在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學者李政道後，我與白宮亞洲主任帕爾進行工作午餐。他認為，「鄧小平在長期不露面後會見一名美籍華人學者，是向美國發出的一个積極信號，表明中國要堅持改革開放。」

他說他曾給李政道打過電話，問鄧對他說些什麼，但李對談話的具體內容不願多談。帕爾試探地問我，如果布希總統也見一見李政道，會有什麼效果。不過他表示，布希最近日程排得很滿，也許

抽不出空來。但他又說，布希很久沒有談中國了，這次去參加聯大也避開中國不談。現在有人建議他找個機會談一下，表示對中國的關心與對中美關係的期望。

關於中國的領導權問題，帕爾說中國誰是第一號人物現在不清楚。鄧似乎已經不怎麼管事了，江澤民沒有權力，地位很軟弱，李鵬看起來很得勢。美國注意到楊尚昆與別人不大一樣。他甚至異想天開地猜測說，也許有一天會像毛澤東死後那樣行動，楊會把李鵬和他的追隨者抓起來。

在這以前，我還和他交談過一次。他透露，布希已經親自下令停止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中國的活動，帕爾本人也要求「美國之音」電台停止發表關於中國問題的社論，因為按規定，美國政府無權干預「美國之音」的新聞，但評論反映官方意見，要聽上級決定。

1989年7月31日，我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蘇利文進行工作午餐，這個組織是由三百多家美國大企業組成的。他說，過去美國兩黨對華政策一致，只有極少數像赫姆斯那樣的人由於親台反共而反對中國。但現在在中國問題上，無論哪一黨的保守派、溫和派與自由派都持有同樣的立場，反對中國鎮壓學生，主張對中國進行制裁，區別只在於程度不同而已。壓力是如此之大，無論政府、國會、民間、輿論、商界、學者，誰也不敢和不願意出來為中國說話。如民主黨參議員布萊德雷私下談話還比較緩和，但公開講話則聲色俱厲，說人們今後再也別講中國怎麼怎麼好了。布希的做法是讓社會去大叫大嚷，自己則運用行政權力盡量不使事情超出限度，

加以控制。

1990年3月13日，我約見國務院中歐處處長西莫爾進行工作午餐，了解德國情況。

自從1989年11日9日柏林牆倒塌之後，德國局勢急轉直下，北京急於了解，如果召開對德和會，作為五大國之一的中國在解決德國問題上將擁有什麼樣的權利。因此外交部通報中國駐各大國的使館，要求立即收集並迅速報回有關情報。

我們在國會附近的一家中餐館裡交談。西莫爾向我透露的情況，使我大為意外。原來中國政府完全蒙在鼓裡，西德政府根本反對召開對德和會。理由是現在要解決的是德國統一問題，而不是四十五年前戰敗國與戰勝國的關係問題。西德早已成為獨立國家與西方聯盟的平等成員，決不能接受由別人強加於它的一項對德和約。也就是說，中國要想參加對德和會，對德國統一問題插一手，完全是估計錯誤，一個空想。

由於西德的堅決態度，北京只好完全打消了企圖利用德國來制約美國的念頭。後來我回北京休假，碰到外交部西歐司準備派往瑞士蘇黎士去當總領事的一位官員，問他們最早是從哪裡獲悉德國反對召開對德和約會議的。他回答說，駐西德使館在波昂摸不到情況，這個信息是從駐美使館得到的。也就是說，這個連中國駐西德使館都未能摸到的重要外交情報，由我捷足先得，第一個向北京發送回去了。而我之所以能從西莫爾那裡得到這個信息，是因為平時跟他保持著頻繁的接觸，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他才願意向我透

露，使中國避免了被動局面。

1989年12月6日，與《華盛頓郵報》首席外交記者奧勃多弗談美蘇首腦馬爾他會談，他是隨行採訪的記者之一。

他說，這次會晤與以前完全不同，雙方不是致力於爭論分歧，而是致力於如何達成協議，推進合作。過去中國一向是美蘇會談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即使中國並不參與，它的影子也始終籠罩著會議，但這次會晤可以說是第一次沒有中國影子的會議。蘇聯的局勢已經發展到戈巴契夫除了默默地接受進一步演變之外，沒有別的辦法的地步。如果蘇聯要在東歐、波羅的海與軍控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它必須付出巨大代價，而這種代價它是付不起的。事情已經完全顛倒過來，美國要做的不是對戈巴契夫施加壓力，而是拉他一把。他認為，在美蘇關係加速發展時，中美關係仍然處於冷卻狀態，對中國是很不利的。

也許有人以為，外交官的任務，無非是在招待會、雞尾酒會與外交場合喝喝香檳酒，聊聊天，多麼輕鬆自在，很多政治情報就會輕而易舉地拿來。其實那完全是誤解。即使談話，也要看你怎麼談法。你要是公事公辦，直來直去，見了人先把官方的口徑背上一通，說明來意，想了解什麼問題，然後就等著人家給你一五一十地端出來，那你準要失望。因為人家跟你談話，先得打量你的能耐、水平，甚至還得看看你的氣質和文化素養。也就是說，看你是不是是一個夠格的談話對手。如果他發現你除了現成的官腔官調之外什麼也說不出來，就最多應付你幾下，決不可能按照你的要求全都端出

來，而且下回就沒有興趣再跟你聊了。所以，談話是否有收穫，首先取決於你自己，看你有沒有本領把你要的話從人家嘴裡掏出來。

駐美使館研究室有位參贊，經常想約白宮的亞洲主任帕爾談話，幾次以後就碰了釘子，被人家就回絕了。為什麼？據帕爾說，跟這種人談話，還不如自己看看《人民日報》社論，何必浪費時間。國務院對這位仁兄的評介是，「He is terrible」，認為他是中國大使館歷來最無能（weakest）的一個參贊。但是外交部和中國大使館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的關鍵時刻，卻讓這種無能之輩在這樣重要的崗位上白白地蹲了幾年。

不知北京誰作主 怎能冒險發電報

天安門事件後，由於中美兩國關係受挫，很多交流項目一時陷於停頓，中國駐美使館某些部門的工作顯得清閑了。但是負責政治事務的研究室的人員卻更加忙碌起來。他們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密切注視美國朝野對中國的動向，政府人士與國會議員的言論，公眾輿論的反應，以及世界局勢的變化。還要出去活動，摸情況，抓信息，然後對所有情況及時進行研究分析，得出必要的結論，再考慮對策的意見，加以綜合，報回國內。

當時最困難的還不是如何了解與判斷美國的意圖，因為在美國，很多情況都是公開明擺著的。而是國內局勢半明半暗，令人捉

摸不透。比如，六·四之後一段時間內，北京究竟誰在掌權，高層對內外局勢的看法有何分歧，對美外交如何決策，既沒有官方文件通報，更沒有公開的新聞報導，使駐外人員只能憑著一些蛛絲馬跡的現象來進行主觀猜測。這種情況，對使館的工作十分不利，因為你不知道北京的政治行情和領導人的胃口就得小心翼翼，不能貿然地把情況分析與政策建議發回去。

1989年6月7日，布希總統舉行記者招待會，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國的學生運動，另一方面又表示對中美關係的重視，也想為鄧小平和中國軍隊說幾句好話。實際上布希當時已經私下兩次致函鄧小平，但未獲任何回音。現在他公開表示想跟鄧本人通話，但是試了多次都未成功，接著鄧就出現在北京的電視上，以這種方式對布希作了回答。

布希在處境困難時作出這個姿態，是很重要的。因為無論從當時或從長遠看來，中美雙方都需要防止關係進一步惡化，至少仍要保持高層接觸，為以後通過雙方努力來逐步緩解緊張關係留有餘地。

出於這種考慮，在布希講話的當晚，我在研究室議論形勢時提出意見，認為應當向國內發報，建議由鄧出面，對布希發出的信息有所反應，具體辦法是以口信方式說明已經收到布希的來信。表示中國政府現在致力於穩定國內局勢，有信心有辦法解決面臨的問題，中國將繼續奉行改革開放政策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希望外國不要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信的口氣要不卑不亢，目的是表示對

中美關係的重視，作為一種使兩國關係避免惡化、防止失控的措施。

但是我的意見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認同。大家擔心，北京對美國正在氣頭上，說不定正準備採取強硬措施來回答美國的制裁。這個電報發回去，正好被人當成右傾思想的典型。因此覺得我這個建議不合時宜、不可行。但四天後，北京果然發來了給布希回應的口信（內容參閱本書第8章第一節）。雖然它沒有用鄧小平的名義，但實際上就是鄧的意思，至少是經過他批准的。信裡表達的一些意思，與我的想法正好不謀而合，說明我的考慮是有道理的。

在那幾天內，為了方勵之的問題，中美兩國搞得劍拔弩張，不可開交。矛盾在於美國從維護人權出發，不能不給方勵之避難，讓他躲進美國大使館。而中國出於主權和尊嚴的考慮，當然不能容忍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這種事情。因此，如何處理方勵之的問題，就成了中國內部爭論的問題。有一天，從北京傳來消息說，「一個有五十多年黨齡的老同志」給外交部寫信，主張派解放軍武裝衝進美國大使館，像當年在「解放戰爭中前線抓舌頭（俘虜）」一樣，從美國大使館裡面把方勵之抓出來。

這個傳聞引起了人們的議論和訕笑。大家心裡明白，只有王震這個老傢伙，才會簡單魯莽到如此地步，主張蠻幹而不考慮事情的嚴重後果。外交部的人對他向來沒有好感，平時都愛拿他來開玩笑。有一次王震以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名義訪問日本，到中國駐日使館視察工作，大使章曙事先在門口等了好久不見他到來，就進使館

門廳裡去稍事休息。誰知剛進去，王震就來了。他一看大使不在門口迎候，就拒絕下車。後來回到北京，還向外交部告了一狀，說這樣的人不能當大使。

如果中國真的照王震的辦法去做，那對中美關係的危害性是無法估計的。它不僅會受到負有保衛美國使館責任的海軍陸戰隊的抵抗，而且必然會在美國政府、國會、輿論和公眾中間引起爆炸性的激烈反應，使中美關係受到極大的衝擊。

在這種情況下，我當天就起草一份電文，提出對方勵之問題採取上中下三種解決方案的建議。

認為出動軍隊衝進美國使館抓他是下策，通過中美談判讓方勵之出國是中策，讓方勵之繼續在美國使館待著，使美國背上這個包袱，以便作為以後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是上策。

但是，和上一個建議一樣，包括大使、公使在內，大家還是不主張在不了解北京情況時發這樣的電報。於是我只好採取被李鵬指責過的辦法，就是所謂「借外國人的嘴來對中央施加壓力」的辦法，約請馬里蘭大學一位親北京的美籍華人政治學教授共進午餐。我先把話題引到方勵之身上，轉彎抹角地按照我的意思，把我想說的話從他的嘴裡掏出來，然後再以他的名義，作為他的意見，寫入電報，請使館領導批閱。結果，這位教授，除了與我主張相似之外，還說了不少指責學生、討好北京的話，這真是北京所愛聽的。結果沒想到，這個電報還給那位教授增加了政治資本，使他不久訪問北京時受到了江澤民總書記的接見。而方勵之則繼續在美國使館

裡當他的寓公，直到1990年6月初，中國以所謂「人道主義」名義把他釋放出國為止。

1990年8月伊拉克悍然出兵入侵科威特後，北京十分關切美國的動向。有一天，我找《華盛頓郵報》的外交記者霍夫曼談話，想了解美國政府的意圖。據他分析，當時美國仍在繼續增兵，目的並非要打，而是擺出決心一戰的態勢，以戰逼和，壓迫伊拉克從科威特撤退。他說，我採訪白宮多年，了解布希為人謹慎，處事穩妥，不會魯莽行事。雖然美國戰備行動不斷升級，態度十分強硬，但是存在著很多牽制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公眾對波斯灣形勢的反應，是否願意為科威特埃米爾王室的利益去打這一仗，而且要考慮到它對1992年美國大選的影響。至於伊拉克，海珊直到現在看不到退讓的跡象。

霍夫曼還向我透露一個鮮為人知的情報：海珊有一項秘密計畫，要驅趕甚至消滅所有的科威特人，讓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遷入科威特，冒充科威特公民，然後舉行公民投票，偽造贊成與伊拉克合併的民意，以遂海珊吞併科威特的野心。科威特王室有鑒於此，事先早就作了準備，把全國公民的姓名、身份全部輸入電腦，作好檔案，儲存在西德。萬一海珊真的搞鬼，科威特可以訴諸聯合國與國際法庭，揭穿伊拉克的陰謀。這在當時真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後來，隨著局勢的演變，北京急於知道究竟美國打不打，什麼時候打，打了以後戰爭何時結束，後果如何。但是中國駐美使館摸

不到確切情況，朱啟禎大使進不了白宮，甚至在美國開戰三天後，還沒有一個字報回北京。主管中東問題的王均美參贊估計這一仗至少要打幾個月，但我根據對戰場形勢的觀察和多年研究國際問題所得的一種直覺感，在討論會上提出了地面戰爭最多不超過三天的推測。後來這場地面戰爭果然速戰速決，打了一百個小時，只比我原來估計的多了二十幾個小時。

等到波斯灣戰爭以美國的輝煌勝利結束之後，北京又擔心美國的壓力可能轉向中國，因此要求駐美使館對布希提出的「世界新秩序」主張進行分析判斷。研究室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出現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附和北京的觀點，認為布希有意要壓中國，美國可能會把中國當作頭號敵人。另一種認為事情不致如此嚴重，因為布希的「世界新秩序」還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沒有具體內容，不能就此作出那樣的判斷。

當時決定由一位姓馬的參贊起草這份電稿，後來他拿出來提供討論的初稿誇大其詞，完全是按第一種意見來寫的，幾乎把什麼都扯在裡邊，對美國意圖作了超乎事實的嚴重估計。

我是持第二種看法的。為了進一步了解美國的意圖，在我的推動下，由趙錫欣公使出面設宴，邀請《華盛頓郵報》主編道奈（Leonard Downie）先生到公使官邸進行座談。

道奈很誠懇坦率地談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布希的「世界新秩序」還說不上是個什麼東西，沒有定型，甚至還只是一個「句子」（Phrase）而已，連布希自己也未必很清楚。這位大報主

編說，波斯灣戰爭以後，世界上很多人以為，美國打贏這一仗後，就會盛氣凌人，要當世界警察，隨意使用武力，干涉別國，其實很多美國人都不這麼認為。

他強調，美國軍力雖強，但財力不足。布希大肆宣揚勝利，是要重振越戰後的美國士氣，著眼於下次大選。他認為波斯灣戰爭對中美關係不致有很大影響，中國如能在安理會投贊成票，與美國打交道會有更大迴旋餘地，不過沒有投否決票，美國也會記得這一點，美國仍然需要中國的合作。

道奈的看法是很客觀的，但是並沒有被吸收到那個分析布希「世界新秩序」的電文中去。因為北京很緊張，正在提高嗓門反對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在那種情況下，要對布希說好話，即使對他的講話加以淡化，也是不合時宜的。作為外交官，最重要的是反映真實情況，說真話。但是當真話不便說，假話更易討好的時候，有人就寧肯不說真話，往往有意強調「敵情」，把事情描繪成或拔高到「中央領導」需要的高度，來迎合領導意圖，以博上面好感。在那種情況下，真話就只有受到冷落的份兒了。

第13章

波斯灣戰爭： 中南海在震驚迷茫中決策

伊拉克入侵使北京左右為難

中國的內政外交在天安門事件陰影中度過一年以後，中美關係仍然糾結難解，陷於低谷。由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爆發的波斯灣戰爭，更使已經降到冰點的兩國關係平添層層霜雪。

1990年8月2日清晨兩點鐘，伊拉克出動十四萬大軍和一千八百輛坦克對科威特發動突然襲擊，輕而易舉地佔領了這個面積僅兩萬平方米的波斯灣小國。伊拉克獨裁者海珊本想在突襲中抓住科威特埃米爾（國家元首）賈比爾，加以處決或讓他充當傀儡，但王室早有防備，從安裝在氣球上的雷達中得到情報，及時逃亡出國。王儲兼首相薩巴赫則躲進美國大使館，逃脫一死的厄運。

科威特是位於波斯灣北端的一個小國，但擁有全世界十分之一的石油蘊藏量，按人均水平來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海珊對科威特早就懷有覬覦和兼併之心，由於在連年的兩伊戰爭中損失三十萬兵力，耗費了石油出口收入的60%，使伊拉克積欠的外債由

六百五十億美元猛增至一千億美元。到了1990年中，它的外匯儲備降到危險水平，僅能支付三個月的進口所需。本來科威特在兩伊戰爭中已經向伊拉克提供過一百二十億美元外匯，但巴格達仍然需索無度，1990年6月派一位副總理去科威特求援，科威特政府只答應再資助五億美元，難填巴格達的慾壑。實際上伊拉克早在五年前就開始籌畫，並在兩年前開始準備進攻科威特的計畫。它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一舉佔領科威特，使國際社會來不及反應就把這個富有的鄰國一口吞下，用科威特的石油美元來維持伊拉克龐大的戰爭機器。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伊拉克不惜向國際社會挑戰，以為經過多年擴軍備戰，它的幾十萬軍隊和現代化武器裝備足以對付美國與西方，使它們不敢對伊拉克動手。但是入侵科威特的行動，激起了世界各國的強烈譴責和反對。美國出於維護波斯灣地區戰略利益的目的，立即作出強烈反應，宣布派遣美國第82空降部隊迅速趕往沙烏地阿拉伯境內，在1990年秋冬季節加緊軍事集結，其密集程度超過了六十年代的越南戰爭。到了1990年11月，美國已集中了六十艘軍艦、一千架飛機、二十五萬人的部隊。加上其他國家出動的部隊，準備以聯合國名義出兵討伐伊拉克的總兵力達到六十萬人、四千輛坦克和一百五十艘戰艦。與此同時，聯合國安理會也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波斯灣局勢，在1990年8月份連續通過五項決議，強烈譴責伊拉克入侵，宣布吞併科威特無效，決定對伊拉克進行經濟制裁，要求伊拉克立即從科威特領土撤出它的所有軍隊。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與美國出兵波斯灣，使中國感到意外和震驚，也使中國在外交上處於十分尷尬的局面。

波斯灣地區雖然遠在萬里之遙，但是北京在這一地區卻有重大的經濟與政治利益。中國在1958、1971年先後與伊拉克、科威特建交，七十年代以後與這兩個國家的關係有很大發展。據中國外交部出版的《中國外交概覽：1990》記載，自1979年中國在伊拉克開展承包工程、提供勞務以來，兩國經濟合作迅速發展。至1989年底，中國在伊的承包勞務合同達六百多項，總額超過十九億美元，先後派出職工近九萬人次。1989年，中國與伊拉克的進出口商品總額達1.5307億美元。在科威特，中國共有十六家工程公司的近七千人進行勞務承包活動。1989年中國與科威特的貿易總額為1.912億美元。另外，波斯灣與中東也是中國軍火輸出的重點地區。1978年，中國僅佔中東武器進口的1%，1988年增為18%。1982~1989年間，中國向伊拉克出口武器達41.6億美元，佔同期武器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出口項目包括59型主戰坦克二百五十輛，69型坦克五十輛，裝甲運兵車七十輛，殲7式戰鬥機二十架。

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中國要對波斯灣危機採取鮮明的態度與立場，顯然是很困難的。

第一、中國一向標榜自己立足於第三世界，伊拉克和科威特同屬第三世界，而且與中國都有良好關係。現在兩國發生領土糾紛，一方侵略一方，北京必須在它們之間作出支持一方反對一方的選擇。

第二、伊拉克入侵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使波斯灣地區面臨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中國必須在和與戰兩種對立主張之間作出選擇。

第三、波斯灣危機中對抗雙方主要是伊拉克和美國。過去中國總是站在被侵略者一邊來反對侵略者。現在伊拉克是侵略者，美國是反對侵略的主力。但美國又對中國繼續進行制裁，中國既不能站在伊拉克一邊來反對美國，又不能站在美國一邊反對伊拉克，它很難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在局勢迷茫、左右為難的情況下，北京既不能違背國際輿論，又必須維護自己利益，幾十年來從未碰到過這樣的外交難題。面對這種複雜局面，北京究竟如何評估形勢，決定對策呢？

美國陷入波斯灣危機對中國最有利

1990年8月2日，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當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錢其琛外長對波斯灣形勢的報告，並進行了初步的討論。

8月17日，政治局常委再次開會，討論波斯灣局勢的新發展。

8月18日，政治局在江澤民主持下舉行第31次會議，討論波斯灣形勢與對策。會上決定以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的名義，向中央各部與各省發出一個分析波斯灣形勢表明中國立場的內部文件。

8月28日，李鵬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波斯灣形勢。

從1990年8月到年底，錢其琛曾在幾次內部會議上作報告，向黨內高級幹部與駐外使節分析波斯灣形勢與對策。其中包括這樣一些基本估計與看法：

——美國出兵波斯灣，是為稱霸目的，並非真正出於反對侵略。估計美國要想立足波斯灣，控制石油，制約歐洲日本，這是一場石油爭奪戰。美國可能長期不走，現在是誰控制石油，誰控制世界。

——中國在政策上要超脫一些。我們支持聯合國決議，但立場要與美國有所區別，不能支持美國軍隊進入，也不能同意以聯合國名義捲入，部署兵力。

——對伊拉克要留有餘地。伊拉克欠中國很多債。在伊拉克有一萬三千名中國勞工，中央決定派三十架飛機去把他們撤出來。波斯灣戰爭會對中國造成經濟損失，但總的來看，形勢會對中國有利。

——美國在伊拉克進退兩難，沙烏地阿拉伯攝氏45度高溫，二十個人背水，才能供一個人喝。要打一仗不容易。如果開戰，阿拉伯國家的反美情緒會上升。

當時美大司一位負責人，在一次內部報告會上分析波斯灣形勢時更加具體地透露了中國的政策意圖。他指出，波斯灣問題處理得好壞與中美關係有關。美國要打對中國不利，從波斯灣撤出也對中國不利。拖下去，美國陷入越久越會有求於中國，對中國最有利，

可以使中國維護被侵略國家的權利，又保持與伊拉克聯繫，而且不會成為美國公眾攻擊的對象。

對中國來說，當時最重要的是評估波斯灣局勢發展對中國的利弊得失，確定應當採取何種對策，以及如何利用形勢來為中國的利益服務。

在對局勢進行仔細評估以後，北京發現波斯灣危機對中國既有弊，又有利，存在兩方面的情況。雖然伊拉克入侵使中國在外交上處於被動，但如果這場危機能把美國拖住，使美國陷入類似越南戰爭那樣的泥潭而難以自拔，美國的力量就有可能遭到削弱，相應地就會減輕對中國的壓力。由於中國是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安理會討論波斯灣局勢的任何重大決議以及採取的相應措施，都不能沒有中國的同意，美國將有求於中國，北京大可利用這一票否決權來施展大國外交，進行縱橫捭闔，抬高國際地位，牽制美國，進行討價還價。

因此，儘管中國口頭上一再表示反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動，內心卻很希望海珊能把美國拖住，即使不能斷其胳膊，也要傷其筋骨，削弱美國的力量。

事實上，北京對美國的估計與海珊的估計如出一轍。1990年9月20日，海珊對土耳其記者誇口說：「我們已經打了八年仗。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將再打上三年、四年、五年或六年的仗」。「我們知道美國是世界上的主要超級大國，但是我們相信我們能傷害它」，「隨著戰爭延長下去，美國的國際地位將會改變，美國不可能再保

持優勢。」

歸結到一點，北京對波斯灣政策的核心，就是一個「拖」字。

中國堅持和平解決，就是要束縛美國的手腳，不讓美國使用武力，這最受海珊的歡迎。因為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手段能夠迫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這是明擺著的事實。

中國強調波斯灣危機要由本地區各國自己解決，這也最符合海珊的心意，因為本地區所有國家都受到伊拉克的威脅，沒有任何一種力量會使海珊感到害怕。提倡本地區解決，就是為了排除外來力量的介入，使伊拉克佔領科威特的局面長期拖下去。

中國的主張貌似公正，很有道理，實際上根本行不通，不可能解決波斯灣問題。它們不過是中國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旨在阻撓對伊拉克使用武力的藉口。錢其琛在1990年底召開的中國駐外使節會議上承認，中國在波斯灣問題上反對軍事解決，其實就是為了牽制美國。

安理會678號決議 既不Yes也不No

從1990年8月到11月，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波斯灣局勢的過程中，對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投過十一次票。這些決議，大多數是帶有譴責性與制裁性的內容，沒有一項涉及到對伊拉克使用武力。也就是說，決議執行與否，都不能根本改變已經形成的波斯灣

局勢現狀，因此中國所投的票，沒有一票是反對或棄權的。

但由於海珊對聯合國始終採取抵制與拖延的策略，美國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走向使用武力，並為此而力求取得安理會各個理事國的支持，以便通過相應的決議，付諸行動。當時共有十五個理事國，除了美蘇中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之外，還有加拿大、芬蘭、羅馬尼亞、馬來西亞、薩伊、象牙海岸、埃塞俄比亞、哥倫比亞、古巴、葉門等十個國家。

1990年11月19日，美國國務卿貝克從巴黎給錢其琛打電話，說安理會本月底就要開會討論對伊拉克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問題，希望中國能對決議投贊成票。貝克還故意吊錢的胃口，表示願意邀請錢去訪問美國，如果中國投贊成票。但是錢其琛未置可否，表示他要在看到決議草案，並且經過中國政府研究以後，才能決定怎麼投票，把貝克的要求推託過去（具體情況請參閱本書第10章第4節）。同一天，蘇聯外長謝瓦納茲也從莫斯科打電話給錢其琛，說波斯灣形勢緊急，安理會就要開會討論，希望日內與錢在中蘇邊境附近的城市會見，就波斯灣局勢交換意見。

當天晚上，李鵬總理召開會議，對貝克的要求，蘇聯的意圖，以及安理會投票一事進行討論。會上決定對安理會決議投棄權票，並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如何投票的三點指示：

第一，棄權；

第二，作一個簡短說明；

第三，要重申中國的和平立場，但字句上要多斟酌。

對於謝瓦納茲的建議，會議估計蘇聯有三種可能：一是充當美國說客，二是摸中國的底，三是想跟中國一起對付美國。後來錢其琛在烏魯木齊跟這位蘇聯外長會見，中國才明白他要扮演的是第一種角色。

1990年11月28日，錢其琛離開北京飛往紐約，去參加安理會會議。行前，他在北京機場上說，中國不會投票支持對伊拉克使用武力，中國的立場一直是主張和平解決波斯灣危機，避免使用武力或戰爭行動」。但他又對記者否認中國要予以否決，他表示，「我沒有這麼說，等我投完了票，你們就會知道，在這之前我不打算說什麼。」

11月29日，安理會舉行會議，討論對伊拉克採取進一步行動的第678號決議。決議限定伊拉克必須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從科威特撤軍，否則聯合國會員國將與科威特合作，「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來支持與執行決議，以便恢復這一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決議要求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對聯合國採取的任何行動提供「適當的支持」。貝克在安理會決議通過後指出，決議中所稱的「必要手段」，就是「使用武力」的同義語。

十五個成員國投票的結果是，左派國家古巴與葉門反對但無權否決，中國棄權，其他國家全都贊成。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安理會上對中國的立場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中國力主和平解決波斯灣危機。這樣做時間可能長一點，但造成的損失可能少一些，後遺症也會少一些。而武力解決將會導致

嚴重後果，一旦爆發戰爭，各有關方面都將蒙受損失。而且對世界和平和穩定，以及對世界經濟都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聯合國作為一個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既要對國際安全負責，也要對歷史負責。聯合國在授權一些會員國對另一個會員國採取軍事行動這樣重大問題上，應該十分慎重，避免匆忙行事。中國對過去十一個有關決議都投贊成票，是因為那十一個決議所規定的制裁措施儘管嚴厲，都不屬於動用武力的範圍。即將表決的這個決議草案，採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詞，實質上是允許採取軍事行動。而這一內容有悖於中國政府力主和平解決的一貫立場，因此中國代表團難以對這個決議投贊成票。另一方面，波斯灣危機是伊拉克入侵和吞併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從科威特撤軍這個問題上採取實際行動。我們注意到，即將表決的這個決議草案，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會的660號決議和其他有關決議，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從科威特撤軍。對這一點中國是贊成的。因此，中國對這個決議草案將不投反對票。」

聲明寫得頗費心思，既說明了中國不能投票贊成使用武力的原因，又表現出中國不想成為聯合國使用武力的絆腳石。它既沒有得罪和激怒美國，又向巴格達示意中國不想充當美國的幫凶。這是一種企圖兩面討好，左右逢源，以冠冕堂皇言詞來掩蓋維護中國自身利益目的的兩面手法。英國軍事問題專家，倫敦King's College教授勞倫斯·弗里曼與艾夫蘭·卡什在他們合著的《波斯灣衝突——新世界秩序中的外交與戰爭》一書中指出，「作為一個擁有否決權的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懂得它手裡有一張可以在波斯灣危機中使用的牌。對北京來說，投棄權票是它堅持和平解決而又不想得罪美國的最好辦法。因此，伊拉克的侵略，向中國提供了一個因禍得福的好機會。」

布希「新秩序」出籠 北京驚魂

安理會授權使用武力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開戰了。戰爭究竟何時打響，會打多久，結局如何，這都是中國最為關切的問題。根據中國軍事與外交專家的研究分析，以及駐外人員所獲的情報來看，估計海珊的幾十萬現代化部隊至少能頂一陣子，把美國拖住幾個月。至於何時開戰，結局如何，那還摸不大準，要看形勢的發展變化。

安理會通過決議後半個月，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回國參加對外宣傳工作會議與對台工作會議，被江澤民召到中南海去談波斯灣形勢。江說波斯灣和戰難測，蘇聯垮台對中國不利，希望戈巴契夫能挺住，故他決定明年訪蘇。朱啟禎看到，在江辦公室的地上，攤開三幅波斯灣形勢的衛星地圖，一幅是中國自己的，另外兩幅是美國和蘇聯的，在場還有軍方人士。大家議論情況後認為，伊斯蘭開齋節之前，也就是二月間，打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在那以後，就要捲起沙漠風暴，漫天風沙，一片迷茫，能見度很差，坦克也很難開。

江澤民說，波斯灣是和是戰，首先要摸清情況，以便進行決策。江認為，局面拖下去，讓美國陷入波斯灣戰爭對中國有利。他要朱回美國去馬上見尼克森、季辛吉，了解他們對和戰問題的看法。

幾天後朱啟禎回到紐約，先去見了尼克森、季辛吉。尼認為和戰可能性各半，要打，至少得一個月，但要想打垮伊拉克不能少於半年。季則估計和的可能性75%，但他主張打，以便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回到華盛頓，朱啟禎還不指名地說，「北京有人認為美國鼎盛時期已經過去，不能說衰落，但是高峰已過，底子仍厚。未來五至十年內，美國仍是世界的頭，再遠誰也說不準。」

在那一段時間內，波斯灣形勢緊張，華盛頓外交活動頻繁，朱啟禎感到戰爭迫在眉睫，但就是摸不到情況。波斯灣戰爭打響後三天內，中國駐美大使館沒有向北京發過一個分析戰局的電報。蘇聯大使兩次進白宮見布希，但是朱見不了，因為中國不投贊成票，國內也沒有這個指示，他只能跑國務院見副國務卿金米特或伊格伯格。布希會見二十八個參戰國大使的情況，朱也是過後才聽到的。作為中國大使，朱啟禎要跟美國人打交道，他很擔心戰爭一打響，北京又要唱高調，因此在討論形勢時說，千萬別在這個時候批霸權主義，講這種話一點意思也沒有，只能讓人覺得中國明顯地站在伊拉克一邊。

不過，中國已經對戰局作出了估計，就是戰事可能拖長，美國可能失利，局勢可能會對中國有利。但是戰事的發展與結局，卻完全出乎北京意料，使中國感到震驚。

1991年1月16日，也就是限令伊拉克撤軍的第二天，美國就對伊拉克前線部隊與首都巴格達進行大規模轟炸，使伊拉克軍隊立即陷於半癱瘓狀態。接著，又從2月23日發動一場勢如破竹的地面進攻，僅僅一百個小時，就全部結束戰鬥。伊軍不堪一擊，死傷85,000人，被俘175,000人，海珊被迫投降。在這場閃電戰中，美國出動軍隊467,539人，戰鬥死亡僅148人，總共死傷760人（註：引自*The World Almanac* 1995, 163），比原先估計的死傷5,000多人少得多。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郊區的美軍醫院，原來預料每天要處理傷兵1,200人，開戰後沒有超過76人，很多醫生護士只好以下棋打牌來打發時間。

還在地面戰爭開始之前，美國已斷定可以穩操勝券，因而開始考慮與籌畫戰後的事情。1991年1月29日，布希總統向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問題。他說：「很久以來，美國領導了維護與拓展自由的鬥爭。今天，在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上，美國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美國人知道，領導會帶來負擔與犧牲，但是我們也懂得，人類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我們肩負著獨一無二的責任去從事開拓自由的艱難工作。只要我們去做，自由就會成功。」他表示，美國將致力於建立一種「世界新秩序」，「在那裡，不同的國家將為了實現和平、安全、自由與法治的共同事業而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世界。」

布希為什麼拋出「世界新秩序」？他這個「世界」，究竟包括誰，針對誰？蘇聯已經急劇衰落，不再成為它的對手了，今後美國

的矛頭會不會指向中國？北京不知道布希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不禁對此產生疑慮、警惕和隱憂，擔心美國要借推行這個「世界新秩序」來把中國當成後冷戰時期的主要目標，因此決心採取強硬態度，和布希相對抗。

中國的這種心情和政策取向，很明顯地反映在1991年3月7日以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名義發出的一份內部通報裡。對於波斯灣戰爭的性質、目的與後果，通報是這樣分析與評介的：

「波斯灣戰爭是大霸與小霸之爭，美國的目的是要控制石油資源與戰略地區，進而駕馭日本歐洲，確立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為建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新秩序』打下基礎。波斯灣戰後，美國趾高氣昂，將加強在全球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加強對第三世界控制。對蘇施壓，逼其進一步退讓，把有些社會主義國家當作打擊重點。不能排除會在政治經濟上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有思想準備。美可能對中國加大壓力。」

那時駐美使館有一位參贊從北京休假回來說，波斯灣戰爭後，中國的基本估計是，美國加強地位後會更進一步搞霸權主義，因此外交部要各駐外使館提出對布希「世界新秩序」的看法（請參閱本書第12章第4節）。後來，在各使館分析材料的基礎上，外交部概括出強調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五條。本來曾想把它作為一個提案在聯大提出，駐聯合國大使李道豫為此幹得很起勁。但又擔心西方會在討論中國提案時要求加入有關人權的條款，造成被動，最後才改為由錢其琛外長在聯大講話中提出來，對抗布希的「新秩序」。

這中間還發生過一個小小的插曲。上海《文匯報》根據上述中央外事小組通報的精神，發表一篇文章，斷定波斯灣戰爭是「大霸與小霸」之爭。此文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出的每日外電摘要所譯載，而且上了白宮的每日簡報。布希看到中國居然會發表這種歪曲事實真相的奇談怪論，不禁十分惱火。後來金米特副國務卿把布希的反應告訴朱啟禎，朱本來就擔心會出現這種情況，但他沒有辦法予以否認，只好說《文匯報》不代表中國政府，以此作為推託。

後來美國了解到，布希「世界新秩序」引起了北京的不安，為了解除中國的顧慮，解釋美國的立場，美國特地派了主管國際組織的助理國務卿巴塞洛繆訪問北京，與中國負責對美外交的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會談。他說，布希「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含義，是更加重視集體行動，尤其是有領導能力國家的集體行動。它體現在波斯灣戰爭期間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合作與以後的表現。

巴塞洛繆指出，美國提出「世界新秩序」不是為了建立新的霸權，相反是強調集體行動。美國是強國，要尋求自己的利益，其他國家也是一些強國，美國要尊重他們的利益。但任何強國都不能通過單獨行動來達到其目的，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這是美國的原則。

如今回頭來看，北京對波斯灣戰爭的估計確有不少明顯的失誤之處：

——開戰之前，他們估計不會打。即便打，美國也要蒙受損失，陷入波斯灣沙漠，使美國力量受到損耗削弱。但是結果，美國

速戰速決，大獲全勝，與中國預料的完全相反。

——對安理會決議投棄權票，理由是武力解決會產生嚴重後果，使各方蒙受損失，不利於世界和平穩定。事實恰恰相反，這些理由和論斷根本站不住腳。

——戰爭結束之後，北京抹殺侵略與反侵略的區別，論斷這是大小霸之爭，美國旨在制約日本歐洲，會像老殖民主義者那樣長期佔領波斯灣。事實卻是，美軍很快就從波斯灣撤走。

——戰後美國氣勢很盛，北京又認為美國要把中國當作主要敵人，決心與之針鋒相對。事後證明，中國過高估計敵情，美國並非如此。

美國有人說，中國是從來也不認錯的。但古話說：「溫故而知新」。事隔多年之後，再來重新思考一下當時根據什麼作出估計，為什麼總是估計失誤，回顧波斯灣戰爭，看看這段路是怎麼走過來的，既有必要，也有好處。

第14章

蘇聯變色： 七十年社會主義一風吹

1989年是世局急劇動盪變化，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加速衰亡的一年。雖然在中國，由於使用武力穩住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衝擊，平息了一場猛烈的反政府政治風暴，但是在世界社會主義的西翼，在蘇聯及其後院東歐，局勢卻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反對蘇聯控制、極權統治，要求變革現狀的民族民主運動蓬勃興起，勢不可擋，最終摧毀了統治者的一切權力，把社會主義制度送進了歷史的博物館。

莫斯科後院烈火熊熊 骨牌效應紛紛倒下

東歐本來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二次大戰後成為蘇聯勢力範圍。莫斯科不但在東歐派駐大量軍隊，而且對東歐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進行全面控制。由於對外屈從蘇聯，對內實行專制獨裁，東歐發展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人民生活不斷惡化，各國人民對

共產黨的統治早就喪失信心。1956年秋天，波蘭與匈牙利曾掀起過維護民族獨立、要求民主自由的群眾運動。十年後，在捷克又出現過「七七憲章」運動，波蘭則興起了團結工會運動。雖然這些運動都因蘇聯出兵干預或當局鎮壓而遭到失敗，但正如著名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所說的，「歷史是一個夢魘，我要從這個夢魘中覺醒過來」，東歐人民對統治者的憎恨，以及他們渴求變革的強烈願望，就必然是長存我心，難以泯滅的。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戈巴契夫在蘇聯推行改革之風吹到東歐，東歐又重新出現了要求實行改革、爭取民主自由和維護主權獨立的人民鬥爭。從這一年的八月中旬到十二月底，東歐各國人民的抗爭一浪高過一浪高。先是東德人民大批離境投奔西方，捷克人民不顧禁令走上街頭示威，波蘭團結工會大選獲勝登台執政，然後匈牙利開放邊境和拋棄列寧主義，保加利亞禁止共產黨壟斷權力，柏林牆轟然倒塌，各國相繼退出華沙條約，一直到羅馬尼亞獨裁頭子喬塞斯庫被逮捕槍決，人民長期受到壓抑而積鬱下來的憤怒，就像火山噴發的熔岩一樣，衝決了、融化了一切的障礙和阻力，使東歐的統治者像骨牌似的一張張倒下。

對於北京來說，東歐局勢演變中最為觸目驚心的事件，無過於柏林牆的倒塌和羅馬尼亞獨裁者喬塞斯庫的斃命。不久前，在東德與羅馬尼亞兩國共產黨舉行代表大會時，中共還分別派出姚依林與喬石兩名政治局常委去表示祝賀，希望他們能在時勢潮流逆轉時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時不利兮騶不馳」，即使他們多麼頑

抗，也扭轉不了與其奮鬥終身的事業同歸於盡的歷史命運。

當身懷癌症的何內克最後面臨審判，有如喪家之犬無處投奔時，北京為了拉攏西德，企圖利用統一後崛起的德國來牽制美國，竟然背棄了他們引為神聖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見死不救，眼看著這位戰友在落寞中悲慘地了此一生。

至於喬塞斯庫之死，更使北京風聲鶴唳，膽戰心驚。僅僅一個月前，中共還在祝賀羅共代表大會為「社會主義羅馬尼亞展現出更為光輝的前景」。但這個羅馬尼亞太上皇剛從伊朗訪問歸來，就陷入了人民憤怒的天羅地網。最後在1989年12月25日聖誕節那一天，被追捕的軍隊抓住槍決，送進了地獄。

由於北京時間比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早六個小時，第二天一早，全北京的人們都已經從「美國之音」和英國BBC電台的廣播中得悉了喬塞斯庫斃命的消息。幾乎在所有的場合，無論是機關、學校、工廠車間，甚至在公共汽車站，人們都在嘖嘖喳喳地談論昨天發生的這件事情。由於人們對六·四天安門事件餘怒未消，又無處發洩，猛然聽到這個消息，都覺得很解氣。

有聞於這股風聲，為了預防不測，制止騷動，中共命令軍警公安部隊進入一級戒備狀態，並且下達文件，把羅馬尼亞的事態發展，完全迴避制度問題而簡單地歸因於所謂「西方的和平演變，蘇聯的影響干預，以及工作上的失誤」，宣稱中國要「冷靜觀察，穩住腳跟，沉著應付」，並要求全國黨政軍領導做到「內鬆外緊，……一有情況，馬上採取措施壓下去。」

12月28日，江澤民在會見來訪的蘇共中央國際部長法林時，針對羅馬尼亞事態表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能不關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形勢發展」，但「中國將尊重其他國家人民所作的歷史選擇」。其實，在內心裏，中共決不會承認東歐人民起來推翻共產黨統治是歷史的選擇，而把它看作是右派翻天。最有力的證明是，當匈牙利為平反1956年10月人民起義，把因為反抗蘇軍鎮壓而死在監獄中的前匈共領導人納吉封為民族英雄，為他舉行有十萬人參加的隆重葬禮時，中國政府卻仍然堅持二十多年以前的立場，認為納吉是出賣社會主義的叛徒，拒絕派代表出席。

在這中間，還發生過一個小小的插曲：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王蓋卿因為觀察到了羅馬尼亞的實際情況，發電回國指出喬塞斯庫已經失去人民支持，建議中國領導與之拉開距離。結果彭真與王震兩個保守派元老看到這份電報竟然大發雷霆，責罵這個大使是馬列主義叛徒，主張馬上把他撤回。但過不了幾天，喬塞斯庫被人民推翻，遭到歷史的懲罰，北京才覺得他判斷正確，不久將其提升為駐蘇大使。本來，為了緩解中美關係，北京經過一再拖延之後已決定於12月24日解除戒嚴，由於喬塞斯庫之死，又推遲了兩個星期，直到認為中國不至於出現類似羅馬尼亞的騷動時，才在1990年1月10日宣布解除戒嚴。

東歐的震盪與劇變，在華盛頓也同樣能感覺得出來。在那些日子裏，東歐的外交官忽然引人注目地活躍起來，而且幾乎都換了新的面孔，大部分是過去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例如，捷克大使克列

莫娃是一位原來出生在紐約市Bronx區的女士，在劇作家哈維爾當上捷克總統會見西方記者時，由她擔任口譯。波蘭新任大使捷瓦諾夫斯基當過《華沙生活報》的記者，曾經採訪過越戰，也到過廣州。後來成為團結工會的智囊人物，參與過團結工會領導與政府當局的談判。有意思的是，這位大使先生居然不忘中國曾經支持波蘭抵制蘇聯壓力的舊情，到任之後就來拜訪中國大使朱啟禎，我也陪同在座。出乎意料，在告別之前，他竟還把中國當成兄弟國家，希望朱能參加波捷匈三國駐美大使的定期碰頭會。但在朱的眼裏，這位大使不過是社會主義的異己份子而已。

在柏林牆倒塌，東德局勢迅速演變時，我還與一位應邀前來美國訪問的東德議員、馬克思主義法學家Jens Heuer會面，共進工作午餐。這位議員先生是個瘦高個子，穿著一件有點褪色的粗呢外套，臉上還帶有一絲驚魂不定的神色。他的夫人微胖，一身黑底白花連衣裙的樸素打扮。初看之下，他們好像是剛從哪個小城鎮進入大都會的鄉巴佬。我問他們，東德經濟發達，是社會主義的樣板，為什麼一下子垮得這麼厲害，究竟什麼原因？

「主要是經濟因素，生活下降，人民不滿意。何內克拒絕任何改革。他像國王一樣獨斷一切，罵戈巴契夫是叛徒，揚言柏林牆要保持一百年，完全脫離群眾，根本喪失了現實感。他是被人民、被歷史所否定的。」這就是他們的回答。

還有一次，匈牙利公使巴塔基請我在五月花飯店午餐，不勝感慨地談到對東歐形勢的急劇轉變的看法。他說：「匈牙利人民對社

會主義已經完全失望了。黨濫用權力，失信於民，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共產主義理想雖好，但實現不了。匈牙利共產黨要想領導改革，必須以失去自身作為代價，所以，我們宣布拒絕列寧主義，改名為社會黨。」也許是「識時務為俊傑」，匈牙利後來的變革與過渡比較平穩，而且經濟也有良好發展。

戈巴契夫：改革者成了掘墓人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局變化，主要動因來自蘇聯。戈巴契夫1985年登台執政以後，推出一系列激進措施厲行改革。內政方面，他提倡「公開性」、「新思維」，實行新聞自由、民主選舉、議會政治，尊重人權，允許不同政見，結束一黨專政和極權統治，改革經濟體制，開放私營企業，引進西方文化。對外方面，他大刀闊斧地裁減核武與常規軍備，解散華沙條約集團，允許東歐獨立自主，從阿富汗撤軍，減少中蘇邊境駐軍，停止蘇美對抗，改善美蘇關係，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這一切，使得蘇聯的內外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但是，由於經濟改革沒有實質進展，蘇聯國民生產不斷下降，人民生活不但毫無改善，反而日益困難。在1985~1991的六年改革期間，蘇聯經濟的年增長率從2.3%降至-11%，外債從105億美元激增至520億美元，石油出口從117,200萬桶跌至511萬桶，黃金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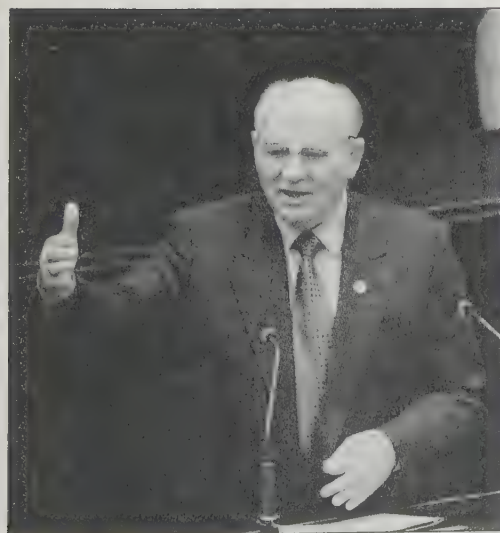
備從2,500噸降為240噸，外匯率從一美元等於0.6盧布降為90盧布，肉價從每公斤3盧布猛漲到100盧布。能夠說得上好處的唯有私人電話機從零增加到3萬多台，關押的政治犯從600人減少為零。（註：《華盛頓郵報》1991.12.25）

戈巴契夫是蘇聯第八位領導人，也是在革命後出生的第一個領導人。與老一代人不同的是，他沒有意識形態的束縛，了解蘇聯體制弊端和民生疾苦，認識到蘇聯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不願意把大量資源用於冷戰對抗，希望致力於加速經濟發展，讓人民享有比較寬裕和自由的生活。用美國報紙的評語來說，戈巴契夫是屬於既要香腸又要自由的那一代蘇聯人，他相信通過改革，能給蘇聯人民既帶來香腸又帶來自由。但幾年之後，蘇聯報紙卻諷刺他只知道怎麼搞自由，不知道怎麼做香腸。一位俄國雜誌主編說：「戈巴契夫擺弄這個國家，就像我老婆擺弄白菜一樣。他以為只要把表面的爛葉子剝掉，就會有裡面的好芯子，但他只能不斷地剝下去，直到剝光為止。」

由於改革毫無實績，人民不能得益，蘇聯國力衰退，過去長期隱藏潛伏下來的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相互交織浮現表面，原來支持戈巴契夫改革的許多人對他失去信心而紛紛離去。反對派的勢力越來越大，曾經受他提拔的莫斯科市長葉爾欽乘機崛起，成為戈的主要政敵。到了1991年，戈巴契夫已經完全陷入了被激進改革派與守舊保守派兩面夾攻的困難局面。眼看一切大勢已去，在蘇共強硬派發動八月政變前三天，戈巴契夫的軍事顧問、前蘇軍總參謀長

阿赫羅米耶夫在克里姆林宮中留下一封遺書自殺，宣告「我為之奮鬥的一切全都完蛋了」。而戈巴契夫則成了這場短命政變的犧牲者，被已經成為俄羅斯總統的葉爾欽巧妙地架空權力，不得不在1991年12月25日宣告辭去蘇聯總統職務，從蘇聯權力角逐場上完全敗退下來。六天以後，克里姆林宮頂上的紅星熄滅了，蘇維埃帝國徹底瓦解，成了一個歷史的陳跡。

戈巴契夫從改革者始，以失敗者告終。他想使蘇聯起死回生，結果卻成了蘇聯的掘墓人。他想給馬列主義披上人性的外衣，給社



戈巴契夫從改革者開始，以失敗者告終。他究竟在蘇聯與世界歷史中扮演一個什麼角色？是和平締造者還是動亂製造者？會成為留芳萬世的功臣還是遺臭萬年的歷史罪人？

會主義抹去殘酷的色彩，結果卻讓資本主義捲土重來。他曾經頭頂光環，腳踩旋風，周遊世界好不風光。然而曇花一現，又像流星一樣墜落得無聲無息，甚至潦倒得給美國披薩店做廣告，到台灣做演講來掙點小錢。戈巴契夫究竟在蘇聯與世界歷史中扮演一個什麼角色？他是和平締造者還是動亂製造者？他是為俄國利益服務還是為美國利益服務？他會成為留芳萬世的功臣還是遺臭萬年的歷史罪人？

美國著名學者和專欄作家克勞索姆爾（Charles Krauthammer）在評介戈巴契夫時講得很露骨。他說：「不管我們能夠做到什麼地步，挽救戈巴契夫是自由世界的最大利益。由他當政的每一天，就是使蘇聯進一步垮台的一天。所以，我們的最高利益，就是幫助他繼續掌權。他在擊退（共產主義）方面所做的事情，比杜勒斯（五十年代美國國務卿）所能夢想的還多。」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則另有一種看法。他在《超越和平》一書中認為，戈巴契夫推行改革，是為了拯救蘇聯。「但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他那個靠武力建立和支撐起來的極權主義帝國，是不可能根本改革的」，「因為一旦放鬆控制，並產生他們無法實現的願望之後，獨裁政權就要垮台」。

不過，中國的看法卻完全與之相反。北京從一開始就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待戈巴契夫倡導的改革。經過多年觀望之後，中共終於在1990年2月蘇共召開全會之後，對戈巴契夫作出評論，斷定他的「新思維」與「人民社會主義」違反馬列基本原則，否定國際階級

鬥爭，改變黨的性質，推行西方民主。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根本不是要完善社會主義，而是向資本主義演變」。

在這以後，中共高層曾經有人主張公開批判戈巴契夫為馬列主義叛徒，再寫一套類似六十年代蘇共論戰時發表的九評。但是文件送給鄧小平後，鄧認為結論過早，論點不夠紮實，要等著看一看，因此沒有在1990年的中共六中全會上討論蘇聯形勢問題，更沒有發表正式文件。

雖然如此，在蘇聯垮台之前，北京仍然希望戈巴契夫能夠回心轉意，並且寄望於莫斯科的強硬派能夠挺身出來扭轉乾坤。八月政變之前，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曾經訪問蘇聯，與蘇聯軍方有所接觸。蘇聯高層某些人士也希望從中國得到一些糧食與財政援助。雖然沒有根據認為北京曾經插手蘇聯八月政變，但是政變符合中共願望則是肯定的。因此，政變消息傳來，北京感到十分興奮。江澤民立即在中南海召開會議研究蘇聯局勢，軍方領導人劉華清準備坐專機前往莫斯科與政變當局進行接觸。

199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通報，掩不住內心的喜悅，強調八月政變是「醞釀已久的，反對戈巴契夫現行政策，堅持社會主義，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改組蘇聯領導的一次重大行動，傾向是好的。」但是沒有料到，政變只延續了七十二個小時就因為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而宣告流產。北京大失所望，在8月22日再次發出通報，痛惜蘇聯「傳統派行動不堅決，策略失誤，猶豫不決，貽誤時機」。更重要的是，為了防止蘇聯演變對中國產生不利

影響，文件提出了加強中共權力統治的「五條」，即「要堅決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不要私有化；堅決不要多黨制；堅決不要軍隊參政；堅決不要議會制。」

1991年9月初，錢其琛對國務院司局級幹部報告，列舉了這次蘇聯政變失敗的幾個原因：

第一是「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內部不團結，散架子」。政變集團成員都是三心兩意，行動不堅決，又想奪權，又想妥協。軍內領導也不一致，海空軍反對使用武力。

第二是「沒有明確綱領」。既然採取行動要糾正戈的錯誤，又說要繼承戈的政策，本質上就矛盾。「政變行動的目的與手段都很混亂，即使三天不垮，也難持久」。

錢其琛指出，中國黨內有些人主張公開批判，支持蘇共，表明中國立場。但從戰略利益與外交政策出發考慮，應當內外有別，堅持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他還說，中國與蘇聯、中共與蘇共不同，不要把蘇聯一套與中國黨的路線連在一起，不要把我們劃到蘇聯陣營中去。蘇共幾十年來對中國做過很多壞事，向外擴張，有霸權野心，與中國有本質區別。

蘇聯在時，北京罵它霸權主義。蘇聯垮了，中共高層很多人又產生兔死狐悲之感，甚至惶恐不安。因為有蘇聯存在，至少還有一股力量可以牽制美國，減輕美國對中國的壓力。他們更擔心蘇聯演變會影響中國，使中國也出現動盪，重演蘇聯局面。當時幸虧楊尚昆出來鎮定人心，說蘇聯垮台是因為沒有改革，中國改革有成就，

所以不會垮。後來局勢發展，總算證明楊的想法是對的。

從華盛頓看蘇聯帝國像「鐵達尼號」沉沒

蘇聯局勢的演變，也在華盛頓外交界，特別是中蘇兩國使館的交往中反映出來。

從七十年代起，由於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處於敵對狀況，彼此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使館人員一直彼此猜疑，老死不相往來。隨著中蘇關係趨於緩和，特別是戈巴契夫決定訪問北京以後，這種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變。

1989年初春，在戈巴契夫即將與鄧小平會晤之前，蘇聯駐美大使杜必寧邀請韓敘大使帶幾名參贊夫婦去蘇聯使館看電影。但韓敘擔心在鄧戈會見時進行這種活動有點招搖，會引起美方的注意和猜疑，只好推託說，四月份的活動日程已經滿了，下旬要回北京開會，只好以後再說。沒想到，一拖就拖了八、九個月，等到韓敘離任回國，朱啟禎來了之後，到了1990年1月22日才去看電影。

蘇聯大使館坐落在華盛頓市中心的第17街上。那是一棟具有歐洲風格的建築物，原是一位美國汽車商的房產，後來於1913年賣給帝俄政府充作俄國駐美大使館與大使官邸。使館內部金碧輝煌，古色古香。賓客們由一樓門廳登上寬闊的樓梯，進入二樓招待廳。東西兩側還有陳設精緻的沙龍。各間廳室都安裝著巨大的玻璃鏡子，

懸掛著水晶吊燈，柚木雕花牆板上的壁燈，則由金色的天使浮雕用雙手托著，整座大樓，很有皇宮氣派。

那天電影招待會上的食物，雖然比不上中國大使館豐盛，但還有俄國魚子醬、火腿、蝦肉、鱒魚和伏特加酒。但是後來，由於蘇聯經濟每下愈況，使館實行嚴格節約，不要說魚子醬和伏特加，連什麼招待會都取消了。

影片的名字叫「泉水」。內容是講一個哈薩克的老頭，過去參加過大運河修建，因為工作所在地水源斷了，退休後住到莫斯科的女兒家裏。女婿是公寓管理人，讓老頭兒看水泵。公寓年久失修，牆壁斷裂，水管堵塞，各家都擁擠在亂七八糟的小房間裏。院子裏水管凍裂，沒人來修，老頭兒氣得把暖氣閘門關上，以示抗議。公寓裏的人們凍得要死，但區領導卻讚揚他是節約能源模範，說要獎給他一套新住房。這引起樓裏電工的不滿，一怒之下也把電閘砍了，沒有了暖氣，大家只好到大院裏去生火取暖，還苦中作樂，跳舞唱歌。

這部影片實在沒有什麼看頭，但它卻反映了蘇聯這個老大帝國，就像那座破爛的公寓一樣，已經百孔千瘡，散了架子。即使有人主張改革，也沒法挽救，人們都已絕望，甚至麻痺了。片裏的主角名叫Kerberkov，念起來與戈巴契夫有點諧音。電影如此明顯地影射戈巴契夫改革失敗，說明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威信掃地了。

杜必寧瘦長個子，一頭灰髮，顯得文質彬彬。1986年到任後，他曾參與戈巴契夫與雷根、布希兩任美國總統的會談，經常出入國

務院，活躍在華盛頓外交界。他還以一副親和姿態開展社交活動，比如安排蘇聯小姐與美國小姐的「選美高峰會議」，為美蘇壘球賽打出第一個球，給雷根夫人送軟緞芭蕾舞鞋，因此而被稱為「解凍大使」。他自稱訪問過美國三十一個州，參觀過的美軍基地比到過的蘇聯基地還多。但蘇聯失去了超級大國地位，大使再活躍，也挽回不了昔日的氣勢和榮華了。

杜必寧之後是亞歷山大·貝斯梅特尼赫，一位在美國度過二十多年，從公使升為外交部副部長的老練外交官。他承認自己是「在困難的時刻來當困難的大使」的。主要的困難在於面臨蘇聯迅速衰落，處於弱勢時如何維繫蘇美關係，以及如何爭取美國對蘇聯的更多援助。眼看自己的國家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分裂衰亡，實在感慨萬千。有一次他私下道出了心裡話，認為「蘇聯走錯了路，一些政客把西方理想化了，沒有實現真正的改革，結果把國家引向毀滅的道路。」

由於蘇聯逐漸走向解體，蘇聯駐美使館內部也開始分崩離析。原來大家都是蘇聯人，現在我是俄羅斯，你是烏克蘭，他是哈薩克、亞美尼亞，分道揚鑣，各自東西。即使同是俄羅斯人，你擁護戈巴契夫，他支持葉爾欽，還有人反對他們兩家，作為外交官，已經沒有統一的觀點和立場了。蘇聯最終垮台後，使館不但要改國名國旗，還要分家。「國破山河在」，惶惶臣民心。一個曾經稱雄世界的社會主義大國，忽然像「鐵達尼號」巨輪那樣急速下沉，大水已經沒進了船艙，很多人就想想在美國謀個差使安排後事。稍有一點

愛國心的外交官，心裡更有一種不勝今昔之感的滋味。當蘇聯國旗最後從蘇聯使館降下的那一天，美國有人打電話來，表示願意出價一萬美元來購買這面已經成為古董了的褪色國旗。聽了這個消息，蘇聯使館裏有人不禁失聲地痛哭了起來。但是，「千古興亡，百年悲笑」，歷史總是如此循環往復，蘇聯帝國既然注定要衰亡，又有誰能挽救得了呢？

鄧小平再也無法「四兩撥千斤」

蘇聯垮台，使鄧小平再也無法在美蘇之間打「大三角」的牌，玩弄「四兩撥千斤」的大國權力遊戲了。

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一位玩弄大三角牌局的高手。不過他玩的時間比毛更長，手段更為巧妙。毛澤東在七十年代初以石破天驚的膽略與手腕，與尼克森會談以打開中美關係僵局，從而扭轉乾坤，開創了中美聯手對抗蘇聯的局面。但他只跟尼克森一個人打過交道，五年以後，毛就撒手人寰了。鄧小平則在雷根與布希兩位美國總統任內掌握對美交往與中美關係。他在美蘇對抗加劇的新形勢下，使中國在中美蘇大三角格局中保持有利地位長達十多年之久。

毛澤東聯美反蘇僅僅是出於中國的安全考慮，從未考慮經濟實惠。鄧小平則除了借助美國對抗蘇聯威脅以維護中國安全之外，還

著眼於發展中美經濟關係，從美國獲取經濟利益。毛澤東時期的中美關係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沒有發生大的波折。鄧小平時期中美關係則時有爭執起伏，北京既要與美國聯手，又想和美國拉開距離，必要時不惜採取邊緣政策，使中國處於更加主動有利地位，使美國更加有求於中國。這是有一系列事實可以證明的。

1980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候選人雷根揚言一旦他當選總統就要和台灣正式建交，鄧小平是年8月對來訪的布希發出警告：「如果共和黨綱領與雷根的主張付諸實施，中美關係必然倒退，連停滯都不可能」，美國「以為中國軟弱可欺是幻想」，結果雷根知難而退。但是三個月後，鄧小平對來訪的南斯拉夫總理洩露了他的「空城計」：「如果雷根堅持在大選中的立場，與台灣建立官方關係，我們肯定會作出強烈反應。至於怎樣強烈，還要研究。」

1982年，中美關係因為美國要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而陷入僵局。當時中國有人主張與蘇聯緩和關係，對美國打蘇聯牌。但是鄧小平說，「你那幾張老K，可能被（美國的）四張A吃掉」，因此堅持不往蘇聯擺動。等到1982年關於美國對台軍售問題的中美八一七公報定局以後，鄧說「可以向蘇聯試探了」。由此而開始了中蘇副外長級的特使磋商，使得自從1969年中蘇發生珍寶島邊境衝突事件以來劍拔弩張的中蘇關係，有了一個可以協商緩衝的豁口。

鄧小平對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策略思想表達得最清楚的，是1985年6月4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說：

「我們長期以來是搞從日本到西歐一條線，現在改變為獨立自

主的外交政策。

「老的路線就是站在美國方面。如果搞老的路線，就沒有大三角，而只有兩角之爭。

「我們這一角是比較厲害的。中國地方大，戰時出一千萬人不成問題。我們這一角即使不能說舉足輕重，加在隨便哪一角上，另外一角就受不了。

「目前，我們對美國的關係比較好。這是因為要從美國引進資金技術，這些蘇聯沒有。現在從美國引進的不多，從長遠看，會更多一點。」

經過將近三十年的爭論與敵對，直到1989年5月15日，蘇聯首腦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以後，中蘇關係才恢復到了正常發展的道路。那一天上午10時5分，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門口會面，他們互相伸出右手握了一分半鐘。鄧小平當著一大群記者對這位來自莫斯科的蘇聯首腦說：「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關係能得到改善。我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布中蘇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然後，他接著又說，「趁他們（記者）還沒有離開，我們也宣布兩黨的關係實現正常化。」

在會談中，鄧小平透露，從戈巴契夫1986年在海參崴的講話中，他已經感覺到蘇美兩國關係可能有轉機，會由對抗轉向對話，覺察到世界局勢有可能降溫。這就向中國提出了一個問題：中蘇關係可不可以改善？出於這樣的動機，他才通過羅馬尼亞領導人喬塞斯庫給戈巴契夫帶口信，提出舉行中蘇首腦會晤的條件。現在他

說：「時間過了三年多，我們才見面。」鄧在會談中談到了過去中蘇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爭論，談到了俄國對中國的侵略與長期以來蘇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但他表示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希望這次會談能達到「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目的。

戈巴契夫則表示，「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談到了他對鄧的印象：「我和鄧小平的會見至少有兩小時。鄧小平使用了昔日典型的概念與術語。但他決不沉溺於這些概念和術語，竭力使其服從於今天的生活邏輯。他的特點是，對主要歷史事件和現實進程有精闢的認識。我認為，他對中國事件具有影響力的秘訣是，他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執著的精神。」

戈巴契夫是在先改善了美蘇關係之後再來改善蘇中關係的。他的目的不是想反過來打中國牌以制約美國，而是卸掉軍備競賽和控制東歐的沉重包袱，改善蘇聯的外部環境。他不會把蘇中關係置於蘇美關係之上，因而也就減輕了原來北京企圖利用美蘇矛盾，而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縱橫捭闔的戰略價值。儘管鄧小平過了一年還派江澤民到莫斯科去訪問，想在中美關係緊張對立的時刻，拉一下仍然掛然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蘇聯，但是當「大三角」隨同蘇聯一起被歷史的風暴吹得無影無蹤以後，鄧小平在中美蘇大三角中運用得非常得心應手的那張老K也就不中用了。

第 15 章

從天安門事件
看中國外交決策思維

敵我觀念支配決策思想

天安門事件已經過去十年了。往事雖如煙，縈迴在心頭。作為一個震動世界的巨大歷史創傷，無論事件本身，或者中美關係，都值得後人再三深思探究，分析其複雜的背景原因，梳理其歷史脈絡，從溫故而知新的角度來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如今回顧起來，中美關係十年前從高峰跌入低谷，以至發展到瀕臨衝突對抗與破裂的邊緣，是否是「大氣候與小氣候」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從中國的感覺與觀點來看，當時的確處於內憂外患的雙重危機之中。本來友好的美國突然翻臉，對中國採取嚴厲的高壓制裁手段，有如晴天霹靂、泰山壓頂，其激烈的程度、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了六十年代初背信棄義的蘇聯。在評介中國對美國的強烈反應時，人們不能不首先考慮到中國由於百年積弱、不甘受辱、強力反彈的歷史敏感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維護主權、反對外來干涉的堅

定性。在北京看來，它對美國的懷疑、憎惡與強烈抵制對抗，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天安門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內部，還是美國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的結果？中美兩國關係難以回升好轉，為什麼會拖延如此之久？如果說雙方都有原因可尋的話，中國在評估與處理中美關係方面有哪些問題值得重新思考，又是為什麼？從中國當時對世界形勢、美國對華政策及其與美國國內政治的關係，以至美國今後發展趨勢的估計預測來看，在很多方面顯然存在著認識不足、估計失誤，致使改善中美關係錯失時機與處置失當的情況。譬如認為：

- 中國沒有做對不起美國的事情，美國不應以惡報善；
- 布希在世局劇變時奉行的策略是要拉蘇聯壓中國；
- 布希對中國是兩面派，他和國會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
- 從杜勒斯到布希，美國一脈相承的對華政策目的就是要蓄意推翻中國政府；
- 中美關係惡化原因完全在於美國，因此美國必須首先退讓；
- 斯考克羅夫特北京之行表明美國有求於中國，故而中國無須急於採取行動；
- 波斯灣戰爭之前低估美國力量，認為它將陷入泥潭而從此走下坡路，十至十五年內將失去霸權優勢；
- 波斯灣戰爭之後又高估美國，認為它將像老殖民主義者一樣長期霸佔不走，乘勝加強世界霸權，把主要矛頭對準中國；

- 蘇聯垮台與東歐演變必將大大促使「西西矛盾」加劇，可資中國利用；
- 美日矛盾難以調和，甚至將來「必有一戰」等等。

有些估計不僅與事實不符，相互矛盾，而且表現出來的主觀意識，幾乎到了一廂情願以至自我安慰的地步。因此在對付美國，處理中美關係中有時不能不表現出目的與手段脫節，願望與現實割裂，宣傳與政策混淆。

幾十年來，中國的外交決策基本上受到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國內政治、國際形勢、領導個人意志、利益集團以及民意等因素的支配與影響。各種因素在決策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均衡的，而且經常是相互交叉又相互牽制的。

比如說，意識形態因素在六十年代以後的中蘇關係中佔有壓倒性的份量，對蘇以至對美與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從馬列主義關於國家學說與世界革命的角度來考慮和決定的。但國家安全利益受到蘇聯嚴重威脅而需要聯美抗蘇時，中美關係又突出了國家利益的因素而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因素。

國內政治因素，即黨內高層權力鬥爭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與天安門事件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林彪以反修防修起家而爬到權力頂峰，最後卻因反毛失敗走向反面，企圖叛逃蘇聯而墜機身亡。在處理天安門事件後的中美關係時，對美國採取敵對還是務實的態度，激烈的還是適度的對策，自始至終成為黨政軍內部，特別是高層不同觀點派別之間的矛盾問題。而外交、安全、軍事、經

貿、教育與宣傳等涉外部門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不同看法與做法，則使對美外交有時在政策步調上難以一致，甚至互相打架。

國際因素表現在發生韓戰、越戰、國際重大危機、大國關係變動、東歐演變、蘇聯垮台時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例如，中國對日本的政策，就因為外部形勢變化與本身利益考慮而不斷作出調整。五十年代初中蘇同盟針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七十年代為了對抗蘇聯威脅而與美國日本聯手，及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想利用美日矛盾牽制美國而有意抬高中日關係。

在天安門事件中，上述這些因素經常交織在一起，互相影響，互相牽制，使中美關係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同時，這也使美國對中國決策過程中各種因素與力量所起的主次作用，領導人公開表態與內心想法之間有何差別，以及他們調控各種勢力，保持政策平衡方面的能力與實際效果，各種情況的估計碰到很大的困難。

除了這些重要因素之外，還必須考慮到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某些固有理念與原則支配下表現出來的習慣性思維。這種習慣性思維方式包括：

第一，敵我觀念根深柢固

中共是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革命與戰爭之後獲得政權的。在對敵鬥爭中，由於客觀環境與條件所致，養成了根深柢固的敵情觀念。當年的根據地、游擊區和敵人佔領的所謂「白區」，呈現出犬牙交錯、經常變動的狀況。很多地方，出了區縣以至村子就是敵佔區，

處於敵人四面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關於分清敵友是革命首要問題的教導，自然成為中共上下指導一切工作與行動的圭臬，支配了幾代人的思想。

即使在掌握政權以後的五十年代，毛仍然十分強調敵情觀念，要求黨內高幹學習唐朝文人柳宗元的〈敵戒〉一文。這篇包含哲理的政論文章認為：「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克克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它還指出了「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辯證道理，即念念不忘敵人存在，才能注意克服隱患；如果沒有了敵人，反倒會因為無憂無慮而招致禍害。這種見解，正好符合毛澤東需要藉大敵當前以加強國內控制的思想。

在國際外交鬥爭與大國關係中，中國一向習慣於從敵我友三方關係來思考問題，據以決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曾經得心應手地施展過「敵人的敵人是朋友」，聯合誰反對誰的策略，並且將這種策略手段作為傳家寶代代相傳下去。天安門事件說明，中國在大國關係中總是在敵友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擺動，按照關係好壞來區分敵友。關係好時什麼都好，關係一壞，就馬上反目成為敵人。同一個美國，昨日是聯手對抗蘇聯威脅的戰略合作夥伴，今日是本性難移、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北京這種根深柢固的敵情觀念至今並未改變，雖然它強調要致力於和美國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但你能保證一旦它認為自己利益受到侵犯時，不會馬上倒向另一個極端，反過來再把美國視為敵人嗎？

第二，教條束縛，思想僵化

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在天安門事件四個月後赴美履任，行前曾經分別向中南海三巨頭江澤民、李鵬、楊尚昆當面請示工作。他所得到的「訓諭」中，對整個國際形勢的概括分析就是兩句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誰戰勝誰」的鬥爭，貫穿二次大戰後的整個歷史，中美蘇之間的關係就是一部「三國演義」。

以「誰戰勝誰」這句話來概括國際形勢，就是上述敵情觀念的產物。

在中共領導人的頭腦裡和實踐中，確實具有兩個制度「誰戰勝誰」、「社會主義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的固有理念，而且以此作為行動目標。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種理念，就是要在兩個階級、兩種制度、兩種力量的較量中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

儘管世界形勢發展的結果恰好事與願違，不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是被資本主義所取代，但是鄧小平、江澤民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並未放棄或改變這種「取代」與「戰勝」的理念。毛澤東一再提出過打倒「帝修反」的口號，鄧在天安門事件以後說過，只要中國的社會主義存在，世界社會主義就有希望。因此，中國是把天安門事件看作「誰戰勝誰」的一場嚴重鬥爭，把一切對外政策與對外關係，包括對台關係，都看作是這種鬥爭的一部分。在這種馬列教條習慣性思考的束縛下，中國必然會把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看作是「和平演變」，而中共對美政策的一切，無論敵對或友好，都不

過是為了達到「戰勝」與「取代」的戰略目標過程中的一種策略運用。

第三，情況不明，脫離實際

在中美關係因天安門事件而惡化的幾年內，很多問題都是因為中國決策者對美國國情缺乏了解，或者以己度人，用中國標準來看待美國國情，而變得困難複雜，難以解決。

首先是總統與國會的權力之爭。由於受到「帝國主義本性難移」，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內部沒有根本分歧這種馬列教條的影響，北京儘管主觀上想對美國各種勢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進行分化，但實際上又不能區分不同事物的差別性，不了解國會與總統在爭奪外交決策權方面的尖銳鬥爭，錯誤地認定兩者在對華政策上是二而一，目的相同，只是手法差別而已。因此，明明是布希力圖為了挽救中美關係而採取一些策略性的行動，需要北京相應地加以配合，從而證明其對華政策的可行性與有效性，以便把主動權操在自己手裡，但是中國卻不理解布希的困難處境，反而認為兩者是在演雙簧，把布希與國會等同起來一併加以攻擊，使他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

由於美國民意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十分強烈，使當政者在對華政策的決策中不得不予以重視和考慮。但中國領導從來也不承認不尊重美國的民意，無視於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影響。一些無知的但有影響的中共元老甚至以為，美國政府也像中國一樣可以隨意操縱民意輿論，因此把民意和輿論對中國的負面反應，也看作是受

美國政府當局指使的行動。

在政府與民意的關係上，連鄧小平這樣的領袖人物也免不了以中國的觀點來要求美國。例如在八十年代發生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滯美不歸的事件之後，鄧以本人的名義要求雷根親自過問此事，以為雷根會賣他的面子，下令讓胡娜回國，結果當然是碰了壁。1989年2月布希當選總統後訪問北京時，中美雙方為了方勵之被美國駐華大使館邀請參加布希答謝宴會一事鬧得很僵。北京原以為只要布希下令取消對這位不速之客的邀請就行，但布希無法照辦，因為那樣做，他一定會遭到美國輿論的指責。更為可笑的是，多年前，據中國駐美使館一位主管國會事務的官員告訴我，有一次美國國會要討論一項具有「反華」內容的法案，國內來電竟然指示「力爭把它打掉」，簡直把美國國會當成了中國的議會。

第四，體制封閉，情報不實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為了推行全球外交，有自己龐大的外事情報系統與各種調研機構。但是中國沒有自己的蘭德公司，沒有真正的Think Tank（智庫），更出不了中國的季辛吉與布里辛斯基。因為在毛鄧時代，領袖是智慧的唯一源泉、政策方針的最高決策者。信息和輿論是有限制的，在政策問題上決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和主張，也沒有任何渠道去發表這種不同意見。所有的調研材料與政策分析文件，都是為了說明與印證領袖的思想、判斷和主張，必須與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既不能有任何的個人意見，也不能從各種不同的Option中作出最佳的選擇。甚至連外交與情報人員搜集與傳送

外事信息情報時，也必須首先考慮到是否符合中央的精神和需要。

在波斯灣戰爭中有人居然作出美國出兵是與德、日爭奪石油資源，美國會走下坡路和只能保持十至十五年優勢的判斷，顯然是出於迎合與討好上面的考慮，而置客觀事實於不顧。當時在北京的這種判斷，是作為一種重要預測傳到華盛頓來的。這種把願望當成事實的錯誤判斷與見解，對於正確決策是十分有害的。

雖然近年來中國在這方面出現了一些可喜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戰略管理學會的一批年輕學者，在內外政策的研究著作中觸及到一些敏感問題，敢於提出頗有新意的大膽見解，但是總的說來，中國在形勢與政策研究方面的思考與實踐，仍然脫不出原有條條框框的束縛，存在著不少的禁區與誤點。因此，美國與西方對中國外交智庫的人員素質與分析水平評價很低，不予重視。認為中國在分析研判局勢與採取對策時，往往拘泥於對方人物的一言一行，而忽視這種言行的政治需要與背景原因，缺乏全局觀點與前瞻性的綜合分析，只是重複官方論調而缺乏個人見解。

第五，天朝心態，唯我獨尊

在天安門事件過程中，中國還反映出一種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為「天朝心態」的思維方式。它的特點是：中國政府在天安門事件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不許別人批評的。任何外國人，必須按照中國標準來評介中國事務，只許說好，不許說壞，說壞就是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就要加以申斥。

但對美國來說，言論自由是每個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無論媒

體或個人，有權對任何人與任何事情表達自己的觀點，即使總統之尊和國家大事也無例外。波斯灣戰爭時，一批批公眾人士到白宮前面示威，有的支持出兵，有的反對打仗，但在電視節目中，雙方都被認為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

美國的國會議員都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可以隨意批評政府、總統，或者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因此，美國國務卿貝克1991年底到北京去訪問時對中國說，美國有536位「國務卿」，除了他以外，100位參議員和435名眾議員也都有權就內外問題發表意見，其用意是要中國政府對美國議員攻擊中國的現象不必太在意，因為北京往往把個別議員的講話，當作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的罪名加以斥責。

事實上，不管這些議員的講話是否符合事實，是否合理，反正嘴巴長在他們臉上，你封不了他們的嘴，無法加以禁止，也不必過分計較。最好的辦法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因為越是在乎，越是抗議，人家就越是抓住把柄來做文章。其結果必然是小事化大，舉輕若重，這邊廂吹縐一池春水，那邊廂掀起三尺巨浪，讓反對中國的勢力興風作浪，恰恰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

天安門事件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是那種類似的思維方式、類似的做法，似乎並沒有多少變化。中國一再宣稱主張求同存異，既然存異，就要允許別人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而不是中國的標準來看待中國的事情，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必動不動就批評人家「說三道四」。美國和世界上不同意和反對中國的人有的是，你能一個個地

申斥得過來，非得要表態不可嗎？中國領導人要求舉國上下都「跟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中國的事情，別人管不著。但是要求世界上所有國家在對待中國的看法上都「跟中國保持一致」，否則就要加以訓斥，這是行不通的。難道你不許人家「說三道四」，人家就會俯首聽命，緘口沈默，不再對中國「說三道四」了嗎？

在現有世界大國中，無論強弱，對外國的反應總是斤斤計較，三天兩頭予以批駁訓斥的情況，甚至施加懲罰外交，除了中國，是很少見的。北京以為唯有如此，才能顯示「天威」，殊不知這只能有損於自己的形象，使人感到中國既然自認為大國，為什麼還如此缺乏自信。

中美兩國既相合又相剋 「戰略夥伴」可望不可即

天安門事件以後的十年來，中美關係經歷了一條曲折、反覆與艱難的道路。

由於當初關係很難好轉，北京曾一心寄望於布希的第二個任期，以為只要他進一步鞏固權力地位，中美關係就能改善和發展。但事與願違，布希卻出人意料地敗給了異軍突起的阿肯色州長柯林頓。

柯林頓上台後，因為他指責過布希討好「從北京到巴格達的暴君」，中國擔心他會把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使中美關係進一步



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左）與舒茲（右）曾在中國大陸與美國外交關係上扮演過重要角色。

惡化。但柯林頓入主白宮才了解事情的限度，考慮到美國的實際利益而不得不改弦更張，最後捨「遏制」而就「交往」，在對華政策中作出了明確的決策。

經過雙方多年努力，終於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實現了中美首腦互訪與高峰會談，使起伏不定的中美關係恢復正常，並推進了多方面的合作。江澤民與柯林頓都有意「結束過去，開闢未來」，宣稱要把中美關係提升到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但曾幾何時，風雲變幻，柯林頓中國之行不到一年，在中國總理朱鎔基即將訪美前夕，由於中國國內的政治迫害，美方指控中國偷竊美國科技情報，以及中國反對美國要把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衛計畫」（TMD）等等情況的發生，中美關係又平添霜雪，氣溫急速下降，出現了倒退惡化的跡象。

這一切，說明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脆弱性與易變性，它總是脫不出進進退退，好好壞壞，良性與惡性互相交替的週期循環。但究竟原因何在呢？為了分析這個問題，讓我們從幾個方面來看中美關係的特點：

一、利益與矛盾互相交織

隨著中國經濟加速發展與國力增長，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彰顯，使美國無法忽視它的存在。儘管中美關係時起時伏，但中美貿易額卻從天安門事件前一年的近十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近五百億美元。對中國的貿易，為美國創造了三十萬個就業機會，雙邊貿易

則為美國提供了上百萬個工作機會。中國潛力無限的廣闊市場吸引了美國大量的資金、技術與出口商品。

在國際上，中美在維護亞太地區安全、防止核擴散與導彈技術轉讓、禁止核試驗與化學武器、促進國際環境保護、防止國際販毒與犯罪，以及推進世界自由貿易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與合作的需要。美國更不能無視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擁有否決權的一票。柯林頓甚至把話說到這種程度：「中美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要」，「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中美合作，任何這些（國際上的）重大挑戰能夠解決得了」，簡直有點當年美蘇兩超主宰世界的味道了。（註：1998年6月19日訪問中國前，在白宮接見中國記者時的談話，見6月22日US1A英文稿）

對中國來說，現在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銷往美國，大量的沿海工商企業，幾百萬的工人及其家屬，靠對美貿易為生。美國宣稱它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高達六百億美元。即使按照中國算法打個折扣，也有三、四百億美元之巨，占到中國一千四百多億外匯儲備的三、四分之一。中美經濟貿易交流已密切到「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程度。

美國的先進科技，特別是電子、電訊、太空、汽車與飛機製造以及材料等領域裡的高科技，對中國進行產業升級、軍備更新與縮短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時間、距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另外，與美國保持正常良好的合作關係，也有助於中國加強在國際社會中發揮作用。如果中美關係發生對抗衝突，必將影響到整

個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

總而言之，無論從經濟、政治、外交與軍事方面來看，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是中國內外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而從美國本身的利益來說，除了與中國交往之外，也沒有別的更好辦法。

但是另一方面，中美之間在理念、制度、人權、貿易、武器擴散以及台灣問題上存在著深刻的分歧和難以協調的矛盾。1999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在參加中國大使館慶祝中美建交二十週年的招待會上，當著中國大使李肇星的面毫不客氣地指出中美分歧的不可調和性。她說：「如果我不強調這一點，我就不能很好地代表美國人民，即我們認為，有組織的與和平的政見表達，決非犯罪或企圖威脅，而是一種被普遍承認的，人類所應有的，自由與尊嚴的基本權利。」（註：《華盛頓郵報》1999.1.13）

美國雖然對中國奉行「交往」政策，但美國領導人並不諱言，「交往」目的是為了影響和改變中國的制度與發展方向。柯林頓說：「越是把中國帶進世界，世界就越將把自由帶進中國。」雖然這是為他的「交往」政策辯護，但實際上這也正是美國的真實意圖。因此，「交往」也可以認為是美國對中國進行的「軟遏制」，其最終目的是要軟化與制約中國將來發展起來的強大力量，使之納入西方軌道，不至於威脅到美國的利益。雖然美國政府反對把中國當作敵人，但美國朝野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需要一個新的敵人，乾脆主張從現在起就把中國當作美國的敵人來對待。

中國一向主張中美之間要「增加了解，減少麻煩，發展合作，

不搞對抗」，希望中美關係平穩發展，不想把美國當作敵人，也反對美國把中國當作敵人。但是深一層來看，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包含著「以人之長，補己之短」，發展關係，為我所用的長遠目的，以利用美國的資金、技術與市場來加速發展自己的力量。如果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意味著中國強大起來將會鋒芒畢露的話，不妨說，中國對美國推行的是一套新的「以夷制夷」策略。

中國領導人究竟在內心裡如何看待美國與中美關係，有兩個重要的例子可以說明。

1971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圓滿結束後，周恩來從上海回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說：「尼克森很高興地走了。他說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毛聽了很不以為然。「是他改變了世界？我看是世界改變了他！要不，他隔海罵了我們好多年，為什麼又要飛到北京來？」可見毛澤東雖然要拉美國，但對美國並不服氣。

第二個例子是：尼克森八十年代中訪問北京，在吳學謙外長陪同下到外貿學院演講。他提到即使沒有了蘇聯威脅，中美兩國在下一個世紀仍然需要友好合作。吳在向鄧小平匯報時特意強調了這一點，以為鄧對此會很欣賞。但是，鄧聽了這個話沒有什麼反應，連頭也不抬，沒有看吳學謙一眼，只是吸了口煙，滿不在乎地從嘴裡吐出兩句話來：

「下個世紀，中國就強大了！」顯然，在他心裡，到了中國強大得可以和美國比個高下的時候，管你中美關係怎麼樣，對中國來

說，已經無所謂了。

二、關係時起時伏，但有上限下限

這種既相合又相剋的情況，決定了中美關係的起伏多變與不穩定性。因為中美關係包含著戰略、利益與道義三個因素，而三個因素又涉及到三種不同力量的背景：

- (1) 美國政府雖也注重人權，但更為強調戰略，看重相互關係與中國在國際上的作用；
- (2) 美國企業家側重投資與市場利益（當然戰略也是利益，這裡指相對而言），眼睛盯著商機無限的中國廣闊市場，不願意讓人權問題壓倒貿易投資，影響賺錢的機會；
- (3) 國會、媒體與公眾則以美國的理念和價值標準為重，揪住民主、自由、人權、宗教以至墮胎問題不放，一心要想按照美國的標準來改變中國。

事實表明，中美關係的波動起伏，就是這三股力量相互爭執、較勁與制約的結果。天安門事件曾經使得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反對中國。但是美國政府與企業界從本身利益出發，不能讓人權問題支配整個中美關係，需要一面對中國施加壓力，一面尋求與保持相互交流合作的勢頭。這樣，中美關係就成了「不打不相識，打了還是要相識」的局面，經常在好好壞壞，好也好不了太好，壞也壞不了太壞的上限與下限之間擺動。

三、可變因素與不變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有可變因素與不變因素

的差別。可變因素是指雙方雖然存在分歧矛盾，但是經過爭執、對話、協商、利益交換、互相讓步與調整政策，可以使某些分歧、矛盾一時得到解決，比如有關智慧財產權、貿易逆差、中國參加WTO，以及核試驗、核擴散等問題。不變因素是由中美兩國的不同理念、制度以及對同一個問題的對立立場所造成的。對於這方面的分歧與矛盾，不管你怎麼談，也談不攏。儘管雙方都表示要「求同存異」，但實際上求同容易存異難，一些基本分歧總是停留在雙方日程上，牽制著中美關係的發展。

正是因為如此，雖然江澤民與柯林頓的互訪結束了中美關係長期徘徊的局面，使之回到正常的軌道，但他們只是確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為處理中美關係建立某種機制，開闢對話與協商的渠道。這只是操作層面上的進展，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關係的性質。

中美關係在柯林頓訪華不久之後出現的反覆倒退，雖然不至於使關係重新退回到天安門事件時的嚴重狀態，但是絕不能認為它僅僅是前進中的一個小小插曲。因為這次關係波動所牽涉的問題，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問題。不管所謂盜竊核導彈技術的罪狀有多大的真實性，它至少明顯地反映了美國朝野對於中國發展強大前景的不安，不想讓中國在大國Give and take的交往中白撈好處，今後將會對中美科技與軍事交流加以限制。過去美國在武器擴散問題上所關切的只是中國向其他國家擴散，而現在他們所關切的是美國本身的戰略安全利益，這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影響，將比人權、貿易等問題更為重要。

另外一種趨勢也值得注意：當年是國際因素，即共同對抗蘇聯威脅的需要，使中美變敵為友，走到一起。但後來是國內因素，即天安門事件使中美兩國發生摩擦衝突。現在雙方雖然仍可在國際上進行有效合作，但各自的國內政治卻已成為妨礙關係前進，甚至發生摩擦衝突的主要因素。這種國內因素的影響今後只會擴大，不會縮小。

無庸置疑，中美關係的重要性超過了當今世界上任何的雙邊國際關係。因為無論從好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它都會給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帶來重大影響。但這種關係本身又是不穩定的。它既不是當年美蘇對抗的敵對關係，也不是今天美日、美歐的聯盟關係，又不是過去中美之間「非結盟友好國家」的戰略合作關係，而是一種包含著矛盾對抗因素，相互可能成為對手、前景難以捉摸的大國關係。退一步說，即使將來中國完全資本主義化了，中美兩個大國在亞太地區就沒有利益衝突了嗎？

因此，不管美國有多少位前總統、前國務卿、前國防部長與前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柯林頓訪華前出來聯名呼籲對中美關係予以重視，但是多年來真正掌管對華政策的前助理國務卿羅德，根據切身經驗，深有體會地說：中國政府是美國「今後二十五年內要打交道的最為困難的對手」，中美關係「將是一種又甜又酸的關係」。（註：1996年10月30日在紐約日本協會上的講話）

這樣一種關係，雖有戰略難成夥伴，要想結成為「戰略夥伴」關係，只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而已。

四、台灣問題是一個潛在爆炸點

在整個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當年尼克森訪華時，毛澤東曾經表示過「世界事大，台灣事小」，把台灣問題摺在一邊。但在天安門事件發生與蘇聯垮台之後，台灣問題又重新浮上了枱面。美國儘管聲稱繼續保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實際上卻提升了美台關係，與台灣開始進行部長級的交往，同時進一步強調台灣關係法中有關維護台灣安全的規定。李登輝1995年訪美與中國的強烈反應，引發了台海危機與中美關係的巨大風波。即使後來逐漸平息，柯林頓在訪華中拋出對台「三不」政策，但過後不久美國國會與政府為了保持中美台三邊關係平衡，又在政策天平上向台灣有所傾斜。

由於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有重大的戰略利益，台灣是美國將來可以用來遏制中國強大的一個重要平衡力量，即使中國對美國的份量大大超過台灣，美國絕不願意台灣落到中國手裡。美國對中國大陸與對台灣的政策，實際上是一根扁擔兩頭挑，根據兩岸的形勢有所擺動，即既要遵守中美兩國的三個公報，又要遵守台灣關係法，儘管兩者相互抵觸矛盾。

在中國是否統一與台海是和是戰的問題上，中國、美國與台灣所追求的利益與奉行的政策是各不相同的：

- 中國：不戰而和，以戰逼和，以戰求統。
- 台灣：和而不戰，和而不統。
- 美國：不戰，不獨，不統。

美國希望兩岸通過協商實行和解，主要是為了避免台海軍事衝突使美國左右為難，把美國拖進去。美國的利益在於保持台灣現狀，它既反對中國使用武力，又反對台灣獨立，因為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會改變台灣現狀，引發一場大的衝突。

中國一向聲稱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他人無權干涉，中國只有在台灣獨立與外國干涉的情況下才會使用武力。但也不能排除翻過來由於北京使用武力而引起外國干涉的可能性。因為台海地區的和戰問題涉及到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而不光是中國內政。迄今美國只強調希望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而對美國將來是否會對台海軍事衝突介入，採取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模稜兩可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因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近乎絕望，或者一旦台灣出現獨立的態勢，而認為必須訴諸武力的時候，它在評估情勢時必須作出兩項重大估計：

一是斷定美國絕對不會介入，二是即使美國介入，中國也有把握不惜與美國對抗。後一種情況，等於是中國必須付出極大代價，使可能一、二十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中美對抗，在力量對比仍然不利於中國的情況下提前出現，必須越過美國這座高山之後去佔領台灣這個小丘。即使美國不介入或來不及立即捲入而使中國佔有台灣，美國也絕對不可能接受台灣落入中國手裡的事實。這不僅會使中美關係受到比天安門事件遠為強烈和嚴重的衝擊，而且對中國國內發展與對外關係將會產生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

鄧小平生前曾經一再向美國指出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

一個爆炸點。不管中美關係是好是壞，這個爆炸點裡的雷管是始終存在的。

睡獅醒來後，它會怒吼嗎？

1817年夏天，更正確地說是6月30日下午，因戰敗而被英國囚禁在大西洋聖海倫島上的法國皇帝拿破崙，在他的朗烏德（Longwood）寓所接見剛從中國訪問歸來的英國特使埃姆赫斯特。

拿破崙雖然戰敗，但是對東方仍然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他在位時曾親自下令編纂法一中一拉丁語辭典，並批閱過法國官員對中國「天朝」的訪問報告。因此，當三個月前獲悉埃姆赫斯特要求來訪時，他就興致勃勃地閱看有關中國的材料，為這次會見作準備。

在會見中，拿破崙好奇地詢問了有關中國的一切，包括社會生活與禮儀問題。

拿破崙知道埃姆赫斯特與他的前任英王特使馬戛爾尼皆因拒絕向中國皇帝行叩頭禮，得罪「天朝」，而不以為然。他曾對隨身醫生奧米拉表示過自己的看法，在會見埃姆赫斯特時，再次表達了同樣意見。這位法國遜帝認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禮節」，「一個人到一個國家去，必須符合那個國家的禮節」。他說，在義大利，人們跪下來吻教皇的腳趾並不覺得有失體面。如果英國的禮儀不是吻國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的話，難道你（到中國）也「要

求中國皇帝把褲子解下來嗎？」

拿破崙反對英國企圖以武力來打開中國大門的想法，認為要跟一個像中國這樣「幅員廣大、資源豐富的帝國交戰」，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最初你可能成功——拿破崙說，——但是你會教他們集結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會被迫採取措施自衛反擊」，製造槍炮船艦，「經過一段時間把你打敗」。

但拿破崙對埃姆赫斯特說的最重要的一句話是：「當中國醒來時，世界將會顫抖！」後人在傳說這句話時，把中國比作一頭正在沉睡的獅子，擔心它會猛醒過來。（註：*The Immobile Empire*, Alfred A. Knop, 1992版，法文原作者 Alain Peyrefitte，英譯者Rothschild）

但是世界並沒有顫抖，因為這頭東方睡獅一直沒有醒過來。不但沒有醒來，而且因為長期閉關自守、固步自封，衰弱得無力抵抗外力入侵，被列強任意欺凌宰割，成了一隻可憐的「偎灶貓」。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雖然「一唱雄雞天下白」，但是他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大搞空頭政治，使十億中國人的時間精力以至生命財富無謂犧牲，付諸東流，使中國只成為一個政治上虛胖、經濟上虛弱的巨人。

只有在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長期積壓的無盡潛力才像火山似地爆發出來，在短短二十年時間內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實現了發達國家需要半個世紀甚至百年時間來實現的經濟增長。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九千多億美元，在世界上從八十年代初的第十一位提升到第七位，甚至有人認為，如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則超

過了日本。

雖然從總體上說，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還遠遠趕不上發達國家水平，但是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一個「幽靈」——「中國威脅」的幽靈，卻隱然出現在西方。有的說歷史將會重演，有的說極權國家要訴諸戰爭，有的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對世界挑戰，有的斷定中國國力增長必然導致對外擴張。這種「中國威脅論」的產生背景之一是西方的優越感。在很多西方人的眼裏，過去那些纏小腳、拖辮子、拉洋車的Chinaman的子孫後代，怎麼忽然一下子要跟洋大人平起平坐了，這是他們在思想感情上所難以接受的事情。因此，一言以蔽之，所謂「中國威脅論」，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強大有害論」和「中國強大有罪論」。

回顧十九、二十世紀，大國的崛起和發展，大都離不開以擴張始而以衰落終的歷史軌跡：

——德國、日本倚仗軍國主義武力攻城掠地，開疆拓土，最後遭到毀滅，雖然二次大戰後又從毀滅中獲得重生。

——英、法殖民帝國在全球稱霸一個多世紀後，終於放棄了遍布亞、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退縮回到歐洲的老窩。

——蘇聯紅色帝國進行意識形態與軍事上的雙重擴張，最後因為心力交瘁而成了一艘迅速下沉的「鐵達尼號」，被拋進了世界最後一個帝國衰亡的歷史墳場。

——唯有美國，借助於得天獨厚的天時地利人和，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登上國際舞台，二次大戰後成為西方盟主，在蘇聯垮台後成

了獨一無二的全球超級大國。但是美國能萬世不竭地永踞世界權力頂峰嗎？

按照中國的發展方向，再過二、三十年，它將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實力數一數二的全球大國，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唯一大國。它將來是不是也會步上二十世紀其他大國強權對外擴張的歷史軌跡？

中國的回答是：不，不會。中國政府一再聲明中國不當超級大國，不會奉行霸權主義政策。1997年10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問美國時表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發展了，人們逐步過上富足的生活，只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

從中共立國以後的歷史來看，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一點。因為中國在1949年以後所捲入的多次戰爭與邊界軍事衝突，都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而對外來力量的侵擾作出反應，沒有一次是由中國蓄意挑起的。

從中國的長期歷史來看，也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一點。因為從盛唐以至前清的一千多年歷史中，沒有記載過中國出兵侵占他國領土的行動。中國早在十五世紀明朝時期已經成為世界航海大國，鄭和下西洋的船隊規模遠遠超過八十多年之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但是中國只作和平友好之旅，沒有進行殖民擴張。

從中國本身的發展來看，它要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趕上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還須付出幾十年以至上百年的持久的努力，沒有任何理由去威脅別人，也沒有通過對外武力擴張來達到目的的需

要，中國將來不至於走軍事擴張與意識形態擴張的道路。

何況中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還遠遠落在西方發達國家之後。按照中國公布的數字，它的軍費只相當於美國的3.67%，日本的22.79%，甚至只比韓國的一半多一點。即使西方有人估算中國的實際軍費開支要比官方公布的高出幾倍（《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作者估計，中國實際軍費高達870億美元。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共和黨首席顧問William Triplett認為，如把中國低勞力成本按西方標準計算，中國實際軍費達到1,000億美元。），但是美國國防大學高級研究員蒙塔培托認為，中國軍隊「目前還無法實施自己的局部戰爭戰略。中國軍隊無法在其邊界以外的任何地方進行持久的軍事行動。而且今後十年內它也很難具備這樣的能力。」

因此，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具有相當的虛妄性，它是為了迎合某種需要而人為地製造出來的。

但是問題並沒有到此結束。目前興起的這種「中國威脅論」，是不會因為中國政府加以否認駁斥，就偃旗息鼓、自動消失的。它之所以能夠風行一時，說明它還有相當的市場。因此，在分析這個問題時，不能不考慮到以下的情況：

第一，中國主觀上有沒有威脅別人的意圖，與客觀上會不會令人擔心這種威脅產生，是兩回事。

古往今來，大國關係總是隨著它們相互力量對比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保爾·肯尼迪說，「所有正在崛起的大

國，都要求改變已經確定下來的，只對現有大國有利的國際秩序。」作為一個最新興起的大國，中國顯然也無例外地不滿意於現存的國際秩序，因此提出要建立符合自己利益與目標的「國際新秩序」。當中國要求進一步參與國際事務，與現存大國利益發生摩擦以至衝突時，中國將順應現有的國際秩序，還是會採取手段來改變這種秩序，從而和有關大國發生摩擦對抗，這是關係到東亞安危的重大問題。

對於大國關係的變動情況，中國周邊中小國家是最為敏感、最為關切的。因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不論誰輸誰贏，都會影響到小國的安全。中國周邊的國家雖然沒有附和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但並不表明它們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及其與大國關係的前景感到放心。這種並非出於惡意的隱性「威脅論」，實際上比西方公開宣揚的「中國威脅論」更值得中國重視。

第二，「中國威脅論」指的不是現狀，而是一種趨勢，一種將來要發生的事情。因此，中國將來有無「威脅」，有待於未來事實的證明，不能只憑今天口頭誓言的保證。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不論有多大權威，他們也只能決定當前，規劃未來，不能決定未來。中國的未來是要由中國的後人來決定的。毛澤東在1956年9月對外賓的一次談話中指出，「中國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子，是要看發展的」。現在中國「有人想翹尾巴，也沒有本錢，頂多翹一兩公尺。但是我們要預防將來，十年、二十年以後就危險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後就更危險了。」連毛澤東都沒

有把握的事情，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就那麼有把握嗎？

中國人被西方列強欺壓了一百多年，想爭取翻過身來，也當一當世界大國，是幾代人所夢寐以求的。清末維新派主將梁啟超曾經夢想過中國有朝一日強大起來，如「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中國人的後代將一享「稱霸宇內主盟地球，指揮顧盼之尊榮」。他沒有想到，事隔一個世紀之後，《中國可以說「不」》一本小書的幾個年輕作者卻成了他的信徒，公開聲稱要實現這種「主盟地球」的美夢，發出了「為什麼（中國）不可以做超級大國」、「為什麼不可以爭取做世界實力的積極領導者」的駭世之言。雖然這並非出自官方的授意，但你能說這裡沒有「毛澤東思想」的影子，不是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產物嗎？在中國國力剛有增長，仍然需要「韜光養晦」的時候，就有人把尾巴翹得比天高了，誰又能保證，當中國真有資格成為超級大國時，後人就不會有更加自大的執世界之牛耳的狂想了？

第三，中國與周邊很多鄰國都存在著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糾紛，包括南海領土與釣魚島的領土糾紛。從維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角度來看，中國絕不會放棄對固有領土主權的合法權益，任何中國領導人也不可能從這一立場後退。

然而這些領土目前有的在他國管轄之下，有的處於無人佔領的狀況之中，存在著歷史與法律上的爭執。雖然中國已經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主張，但這只是一種過渡性的暫時處置方法，並不能根本解決這些領土糾紛問題。如果將來和平解決領土紛爭的

努力遭到失敗，中國不能實行退讓妥協，或者認為已經擁有足夠實力可以採取必要手段來收回這些有爭議的領土，以恢復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時，由於它牽涉到有關國家利益以至地區安全穩定問題，勢必會引起有關國家的抗爭，並且會誘使其他大國的介入。從法理上說，這是中國主權範圍之內的事情，但因為它牽涉到其他國家在這一地區的重大利益，中國的任何非和平性的行動，必將對地區的安全、穩定與力量平衡產生極大的震盪，而被認為是對其他國家的「威脅」，最後有可能導致大國之間的對抗與衝突。

對於這個問題，至今還看不出任何可以尋求合理解決的前景，顯然是中國對外政策中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

觀測中國未來動向要看P-P-P

中國這頭雄獅已經醒過來，站起來了。它將來會不會形成對世界的「威脅」，如何預測和判斷中國外交的未來發展動向？

作者認為必須從三個P來分析，就是Power（實力），Perception（認識），Policy（政策），不妨稱之為「3P論」。

實力是國家推行一切對外政策的基礎，有多大實力就能使多大的勁，在國際上占多大份量。認識是判斷客觀形勢的基礎，有什麼樣的認識就會作出什麼樣的判斷，而有了判斷才能作出相應的決策，根據決策來決定如何顯示力量和使用力量，以追求與實現外交

決策的目的。這三者是相互聯繫又相互影響的。

中國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的發展過程，是與中國國家實力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過程相聯繫的。中蘇關係的變化就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在1950年中共立國前後，儘管毛澤東並不喜歡史達林，但他深知需要老大哥的扶持而宣布向蘇聯「一邊倒」，並親自到莫斯科去向史達林朝拜。事隔十年之後，毛澤東卻把在大衛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會談後前來北京的赫魯曉夫罵得灰頭土臉，不惜與蘇聯分庭抗禮。再隔十年之後的1969年，在發生珍寶島中俄邊境衝突後，中國又感到局勢的嚴重性，面臨蘇聯核攻擊威脅而難以對付，毛就作出了需要借助於美國來聯手對抗蘇聯的決策。

現在西方都認為，國力強弱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決定性因素，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中國必然會加大對世界的威脅。然而，中共立國之初元氣尚未恢復，國力與老美相比不過是九牛之一毛而已，但它敢於出兵韓國，與美國較量。而在1958年「大躍進」民氣高漲的時候，毛澤東雖然下令炮擊金門，挑戰美國，卻小心翼翼地避免與美對抗，因為他認為美國「實力相當強大，不可輕視」，中國「不收復金、馬，並不影響建設社會主義」。

以上對蘇對美關係的表現，說明中國在處於強勢和弱勢的不同情況下，決策考慮有所不同，但並非因為弱勢就不會採取對抗性的行動。另一方面，在實力不如對手的情況下，中國善於運用謀略來彌補實力之不足，如毛澤東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巧妙地打蘇聯牌，利用美蘇對抗的矛盾坐享漁利，來增加中國的安全度。天安門

事件則說明另一種情況，中國越是處於弱勢不利地位，越感受到外來威脅（即使只是自我感覺），越會懷疑對手的敵意，越有可能採取強硬政策，對外作出強烈反彈，使局勢更加複雜化。只有在中國認為內外形勢有利，具有較大安全感之後，它才比較易於作出讓步妥協。

然而，實力固然是決策的重要因素，但對於客觀形勢的認識、了解與判斷，即西方通常所謂的Perception¹，對中國外交決策來說似乎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如何使用實力，採取何種對策，是根據什麼樣的判斷來作出的。這種Perception通常包含四個方面：

1. 對國際外交形勢的認識與判斷；
2. 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確認；
3. 對敵我力量對比與對手意圖的評估；
4. 對所要採取的政策行動得失利弊後果的估算，等等。

正確的決策必須基於正確的判斷，只有對以上這些情況與問題作出充分與明確的判斷之後，才會使決策產生有利的效果。幾十年來，中國的外交決策，總的來說對形勢有切實的了解，原則性與靈活性運用得比較恰當，能夠針對國際形勢的變化，調動各種因素，維護中國本身的利益，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如果對中國在冷戰時期處理對蘇對美關係的決策過程加以深入研究，對中美蘇三角關係發展的前因後果加以顛倒，從後果往前因進行推斷的話，則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毛澤東聯美反蘇戰略決策的最初依據，即對蘇

聯形勢與政策的分析判斷，是根據不足，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中國為什麼要與美國聯手抗蘇？因為蘇聯對中國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

蘇聯為什麼要威脅中國？因為中蘇雙方發生利益衝突，使中蘇關係從破裂走向對抗。

中蘇關係為什麼從破裂走向對抗？因為中國認定蘇聯已經變「修」，對內資產階級復辟，對外與美帝國主義勾結，因此必須掀起「反修、防修」鬥爭，「把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上克里姆林宮」。

但蘇聯當時是否真的變「修」了？變「修」的標準是什麼，「修」對蘇聯有什麼不好？即使變「修」了，中國就有權反對，要推翻蘇聯領導嗎？

無論從今天或者當初的情形來看，認定蘇聯變「修」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赫魯曉夫推行的內外政策，包括為了爭取國際和平環境而力求與美國和解，以及在經濟領域內的有限改革，都有相當的合理性，是屬於蘇聯主權範圍之內的事情，也有利於世界和平的利益。何況，赫魯曉夫、布里茲涅夫時代與史達林時代相比，蘇聯內外政策並無任何根本差別，史達林後繼者的對外擴張還遠不如史達林。如本書第七章所揭示的，鄧小平對蘇聯領土擴張的批評，實際上回溯到了史達林以至列寧時期。在內外政策上，如果說赫魯曉夫是對馬列主義離經叛道的話，那麼中國所做的早已遠遠超過了蘇聯。當年蘇聯所做的與中國今天所做的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而已。反過來說，如果中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必要的，又有什麼理由指責蘇聯當時所做的一切是錯誤的？

雖然中蘇交惡包含著更為根本的雙方國家利益衝突與地緣政治的原因，而且毛澤東內心抱有「以霸反霸」，取代蘇聯在國際共產領導地位的目的，但是中蘇關係的惡化與對抗，首先和主要是以意識形態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中國一切對蘇決策的依據，就是蘇聯變「修」了。從這個前提出發，中國不但反對蘇聯與美國和解，而且自己走得比蘇聯更遠，最後索性顛倒原來的敵友關係，「與魔鬼聯盟」，站到美國一邊來對抗蘇聯。

雖然1971年邀請尼克森訪華是毛澤東扭轉乾坤的高超戰略決策，產生了石破天驚的轟動效應，根本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但如果沒有最初毛澤東對蘇聯形勢言過其實的錯誤判斷，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一切。而毛澤東的這一錯誤判斷，從其產生的後果來看，造成了中國十年文革動亂與中蘇關係緊張狀態，甚至一度走到了兩國發生戰爭的邊緣，對中國的外部安全與內部穩定，以至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都產生了極為有害的嚴重後果。

本文之所以要回顧與分析毛澤東的外交決策思維情況，是為了說明認識與判斷對外交決策的重要影響，說明中國決策思維錯誤所造成的後果的嚴重性。當然，毛澤東在內外決策中獨斷專行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今天的中國外交決策不再受意識形態的支配，而有更多的務實精神，更多地考慮到了世界的實際情況與中國的實際利益，並且在推行大國外交與全球外交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

是，不容忽視的是，制約中國正確認識與適應國際形勢以及外部環境變化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由於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經歷過幾十年的基層工作鍛鍊，比較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差距，在促進中國發展與提高中國地位方面已經獲得了重要的政績。但並不是任何人一登上大國外交舞台的前沿，就能成為得心應手、叱咤風雲、令人嘆服的大國外交家。從國際外交的角度來看，要扮演能夠傲視闊步於世界舞台的大國領導人，與近代、現代世界外交史上的風雲人物塔里蘭、梅特涅、帕默斯通、羅斯福、邱吉爾，或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謀略、才幹、氣度與手腕相比，要具備高瞻遠矚的開闊視野、運籌帷幄的戰略策略，以及揮灑自如的外交技巧，顯然還有相當的距離。而從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全球外交來看，還存在著新形勢與舊思維的矛盾，國力強與謀略弱的矛盾，以及舞台大與角色小的矛盾。

所謂新形勢與舊思維的矛盾，就是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國際關係強調和平合作而不再以對抗為特徵，但中國仍然未能擺脫從敵我觀念來思考對外關係，以及一切以我為主，只求世界順應自己，不能自己順應世界的思維。

所謂國力強與謀略弱的矛盾，是說過去國力較弱時可以運用謀略來補實力之不足，照樣在國際上呼風喚雨，改變不利處境，取得主動地位；而現在則相反，主要依靠國力增長（例如打經濟牌），而非運用謀略來調動國際上的各種因素為我所用。有人對此的比喻

是過去「四兩撥千斤」，如今是「千斤撥四兩」。

所謂舞台大角色小，是說在中國真正開展全方位外交而亟需人才的今天，由於「一刀切」的人事退休政策，使得外交戰線出現嚴重的青黃不接情況。真正有經驗的外交長才被閑置不用，而多數處於一線的外交人員，由於大多出身於翻譯、秘書或較低級的官員，越是得到迅速提升就越顯得缺乏豐富的經驗與足夠的歷練和氣勢。他們在更形複雜多變的後冷戰時期國際局勢中，習慣於在官僚體系與原有框框中守成應付。他們的能力與水平不足以應對後冷戰時期的大國外交局面，很難有大格局的思想，能夠大膽運用策略，開創大起大落的局面。連進過白宮，與美國高層打過交道的人，都被美國對手認為是"small character"，其他在枱面上的人就可想而告了。

今後的世界仍不會平靜，中國外交政策也面臨很多新的問題。中國外交的運作，無非是對世界局勢作出反應，及中國的政策行動引起外界的反應。在這方面，此階段中國不會尋求霸權，不會主動威脅別人的表態是可信的。除非受到外來的威脅，中國不會越界去侵犯別人。但是，中國將來如何認識與判斷國際局勢，在牽涉到中國本身利益的問題上採取何種對策，作出什麼樣的反應？中國的強大會不會打破原有的力量平衡，又會引起其他大國的什麼反應？這些問題，今天都只能預測、難以斷定，有待於未來事實的證明。

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與美國外交內幕 - 一位中國大陸外交官的歷史見證

著 者：陳有為

發行人：武奎煜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

地 址：台北市衡陽路20號

電 話：(02)23822815 · 23821496

FAX NO：(02)23822805

郵政劃撥：0009914-5

<http://www.ccbc.com.tw>

E-mail: service@ccbc.com.tw

出版日期：西元一九九九年五月臺初版(民88)

西元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二次印行(民88)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9742)

分類號碼：578.00.047(版)(4.50)(3000)新

ISBN 957-09-1233-2

海外分局

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地下

電話：(852)23886172-3 · FAX NO：(852)23886174

日本：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03)32914344 · FAX NO：(03)291-4345

泰國：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電話：2226573 · FAX NO：2235483

美國：華強圖書公司

地址：41-35, Kissen Boulevard, Flushing,
N.Y. 11355 U.S.A.

電話：(718)7628889 · FAX NO：(718)7628889

歐洲：英華圖書公司

地址：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V 7LJ

電話：(0171)4398825 · FAX NO：(0171)4391183

定 價：二五〇元

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與美國外交內幕：一位中國

大陸外交官的歷史見證 =The inside
stories of the diplomacy between
communist China and America / 陳有爲著 .

-- 臺初版 . -- 臺北市：正中，民88

面：公分 .

ISBN 957-09-1233-2(平裝)

1. 中國 - 外交關係 - 美國 2. 美國 - 外交
關係 - 中國

578.252

88005733







作者簡介

陳有為

資深國際外交評論家，曾在大陸發表百餘萬字國際評論，出版《季辛吉評傳》與《風情、人情、世情》兩本專著。八十年代轉入外交界，曾以顧問身份隨中國三任外長出席聯大，隨趙紫陽、楊尚昆出訪，並任駐美高級外交官多年。1992年退休後應聘擔任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近年來已在海外著名報刊發表六十萬字評論專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還應邀在美國、台灣、新加坡著名高等學府講學，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就鄧後中國局勢發表證詞。經常對「美國之音」、BBC電台發表評論。在CNN有線電視網「冷戰」系列片第15集中四次出現，與美蘇知名人士一起評論中美蘇大三角關係。

圖片說明：

1997年3月18日，作者應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湯姆斯參議員的邀請，在他主持的國會聽證會上，就鄧小平逝世後的中國局勢發表證詞。同時作證的還有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羅德、前駐中國大使李潔明與喬治·華盛頓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哈里·哈定。

The Inside Stories of The Diplomacy between
Communist China and America

天安門事件後

中共與美國 外交內幕

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亞太政策中心總裁／**帕爾** (Douglas Paal)

陳有為的新著既有內情又將過去發生的事情加以條分縷析。他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與巧妙的筆法，寫出了中國在天安門屠殺事件之後如何陷於國際窘境，以及大力恢復其國際地位的情況。特別有價值的是，書中的內幕情況，反映了中國在跟美國官員交涉時力圖駕馭他們，以維護北京的利益。

前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約翰·霍布金斯大學
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 (SAIS) 中國研究系主任、華盛頓尼克森中心主任／

蘭普頓 (David Lampton)

陳有為寫了一部使人得以了解 1988-92 年期間中國外交政策進程的著作。在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與蘇聯東歐演變之際，陳有為是中國外交系統中的一名高級官員。因此，他對中國領導人在此歷史緊要時刻的想法和目的也能夠有所了解，並在書中加以展現。此書不但會引起學術界的興趣，而且對世界各國的決策人物也有實際的參考價值。

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亞洲部主任、馬里蘭大學歷史系教授／

沃倫·科恩 (Warren Cohen)

陳有為作為一名外交官、記者與學者，具有獨特的資格來寫近年來的中美關係史。在八十年代後期的危急歲月裡，他曾經是中國駐美大使館的高級官員，因此能夠了解中國的決策情況。出於一個學者的動機和決心，他要把事實公諸於世。他的新著，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中國情況，特別是對 1989 年 5-6 月間發生的事情的了解。

華盛頓郵報資深外交記者／**奧勃多佛** (Don Oberdorfer)

陳有為對中國事務與中國的對外關係具有豐富的經驗。在我看來，他是一位對中美關係與中國內部事務的敏銳觀察家。在我所交往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圈子裡，很少有人有像他那樣的獨立思考能力與第一手經驗。

